

文史資料第六輯

定邊起義

尚洪澤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定边县委员会编

谨以此书献给

抗日战争暨安边起义胜利60周年！

文史资料第六辑

安边起义

主 编 马 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定边县委员会编

《安边起义》编(审)委员会

主 任：高登山

副主任：傅宝富 马宝珍 张林森 顾志忠

主 编：马 骥

编 委：王国伟 卢桂花 窦 军 白芳存

李彦龙 郭世权 景常义 乔 丽

高东旺 田生贵 苗斌杰 王文君

王继春 曹 飞 薛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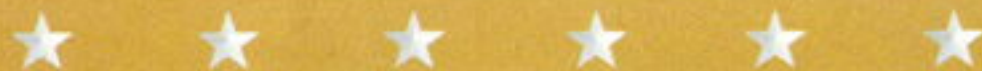


安边起义领导人、新十一旅代旅长曹又参





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一团副团长牛化东





中共三边地委书记、警三旅旅长
贺晋年



新十一旅起义后政治委员
郭炳坤



1992年李树林(中)高宜之(右)
在北京贺晋年家中叙旧



1993年贺晋年(左)马文瑞(中)
郭洪涛在北京共话陕北岁月



旅参谋长王子庄



一团团长李树林



二团政委高波烈士



1982年，十一旅起义部分老同志在一起。

左起：李树林、朱子春、高宜之、牛化东。右一为宁夏区政协主席杨正喜。





新十一旅第一任旅长石英秀



石英秀(子俊)旅长遗物——茶壶



新十一旅创建者之一
八旅旅长谷莲舫



新十一旅创建者之一
八旅十五团团长王子元





新十一旅第二任旅长刘宝堂



新十一旅第三任旅长陈国宾



陈国宾旅长在安边的店铺
——“宝源店”旧址



陈国宾旅长在安边驻地旧址





安边起义指挥部文昌阁遗址



安边堡南城墙一隅



二团史钊城驻地柠条梁遗址

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六六一號 每份五分

新十二旅發表起義週年宣言

力爭和平民主

——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年近半百，士氣大振，精神百倍，以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新十二旅起義週年

衛司聯政電致賀

——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衛司聯政電致賀：新十二旅起義週年，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延安一二九十週年籌備會

發出「一二九」紀念標語

——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延安一二九十週年籌備會，發出「一二九」紀念標語。

新編十一旅全體官兵通電全國

潑陳安邊事變真相

——反對國民黨以特務手段消滅異己之陰謀，擁護鄧總司令、左軍長之領導。

電毛主席致敬

朱總司令致敬

——反對國民黨以特務手段消滅異己之陰謀，擁護鄧總司令、左軍長之領導。

進步的一年

——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進步的一年，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新十二旅起義週年

——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新十二旅起義週年，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新十一旅起義週年

——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新十一旅起義週年，慶祝人民服務之軍隊誕生。

1945年、1946年《解放日報》關於安邊起義通電等報道

序

高 彦 山

1945年10月，驻安边的国民党新一军第十一旅2000余名官兵，渴望民主和平，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作出正确抉择，在旅长曹又参及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牛化东等率领下发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归向人民，奔赴革命。

安边起义轰动塞上，震撼西北，影响全国。它是陕西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事件。这次起义，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三边地委领导，十一旅内中共地下组织联合上层进步军官取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党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它的胜利举行，不仅拔除了国民党长期盘踞在陕甘宁边区的反动堡垒，解放了三边分区周围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十一旅自身获得新生，而且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大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北线包围陕甘宁边区的

军事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地配合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军事斗争，对陕甘宁边区西北边境的巩固和反对蒋介石进攻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中发生较早的一次大规模起义，为其它国民党军队做出了弃暗投明的榜样，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毛泽东主席生动地喻之为“火车头”。在它之后，先后有170多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今年10月25日，是安边起义60周年的纪念日。为真实地记录和全景式地反映发生在我县的这一重大历史壮举，纪念和慰藉长期深入敌穴，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抛头颅、洒热血、屡建功勋的革命老前辈和革命先烈，为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提供生动、翔实的教材，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我县革命斗争历史，同时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研究十一旅历史提供清晰的线索和完整的史料，填补对十一旅研究的空白，我们编辑出版《安边起义》一书，为这一光辉起义60周年献礼。

沧海桑田。6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已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定边这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土地，正在“走出贫困，迈向富裕，追赶发达”。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今天的定边，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在此还可以告慰忠魂是：定边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英雄事迹，特别是曹又参、牛化东将军的传奇故事还在三边人民中传唱，通过这些故事传说，人们不难领略到他们决胜三边的英雄

风采。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将永载史册，成为鼓舞和激励后人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序..... 高登山 (1)

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安边起义述略

——纪念安边起义胜利60周年

..... 中共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1)

“你们是大车头”

——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 牛化东 李树林 王子庄

..... 冯世光 高宝义 李千森 (28)

烈士风云

——忆国民党新十一旅安边起义..... 高登山 (41)

新十一旅起义亲历记..... 王子庄 (55)

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及三边起义

目 录

序..... 高登山 (1)

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安边起义述略

——纪念安边起义胜利 60 周年

..... 中共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1)

亲历见闻

“你们是火车头”

——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 牛化东 李树林 王子庄

冯世光 高宜之 朱子春 (20)

塞上风云

——忆国民党新十一旅安边起义..... 贺晋年 (41)

十一旅起义亲历记..... 王子庄 (56)

伪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及三边起义

.....	慕寿山 石佩玖 (71)
对《伪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及三边起义》一文的几点订正	
.....	李树林 冯世光 王子庄 (82)
安边事变追忆.....	刘丰林 (86)
安边事变历史补白.....	强文元 (95)
忆安边起义和解放柠条梁.....	马文俊 (97)
解放柠条梁	李新民 (102)
打柠条梁	高锦武 (106)
赵级三叛变时脱险经过	赵淮川 (107)
我在三边的兵运活动	马文瑞 (113)
甘肃、宁夏兵运工作回忆	张秀山 (115)
忆在三边做兵运工作	胡颖民 (127)
我在王子元部队里的兵运工作回顾	汪兴民 (129)
刘志丹领导我搞兵运	刘实庵 (131)

人物春秋

曹又参传略	曹国权 (133)
曹又参请命	纪国庆 (143)
牛化东将军传	苗斌杰 (146)
郭炳坤在新十一旅	史继法 (158)
我所知道的高昆山烈士	王子庄 (163)
谢有德传略	张秉义 杜占胜 (168)
缅怀高波同志	冯世光 (178)
张东蛟与靖远兵暴	甄之剑 (184)

安边事变中的夏品三和杜廷之	牛化东 (192)
王子元传	纪国庆 (197)
石英秀传	窦 军 (201)
谷莲舫传	郭世权 (203)
刘宝堂传	苗斌杰 (204)
陈国宾传	党满义 (210)

文献辑存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党组织及工作状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30、1931年4月1日)	(213)
中共北方局对中共陕北特委的工作指示 (节录) (1930年10月18日)	(215)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边区周围友军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 (1945年10月16日)	(217)
贺晋年关于十一旅起义问题致高岗谭政的电报 (1945年10月16日)	(218)
新编十一旅全体官兵起义通电 (1945年11月5日)	(220)
曹又参将军对记者谈话 控诉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 (1945年12月12日)	(223)
新十一旅官兵集会 欢庆首届起义周年 ——牛副旅长号召蒋军站到人民方面来	(227)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宣言 (1946年10月25日)	(229)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	

(1946年10月25日)	(231)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 联司联政驰电致贺	
(1946年10月25日)	(232)
贺新十一旅起义周年	
——《解放日报》短评(1946年10月25日)	(234)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纪念感言	曹又参 (236)
进步的一年	
——纪念新十一旅起义一周年	牛化东 (238)
起义十月 面目一新 曹、王两将军谈新十一旅进展	
(1946年9月27日)	(243)
新十一旅李友竹团长高昆山副团长冯世光营长献地千垧	
(1946年9月26日)	(245)

史海钩沉

新十一旅大事记	苗斌杰 田生贵 (247)
十一旅组织沿革	马 骥 (257)
中共十一旅地下组织简述	余录荣 (263)

历史演义

安边事变始末记	冯世光 (269)
后 记	(289)

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安边起义述略

——纪念安边起义胜利 60 周年

☆ 中共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发生于我县的安边起义，又称新编第十一旅起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中发生较早的一次反蒋爱国武装起义，他了解放战争时期 170 多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之先河，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起义领导人曹又参将军时称赞这次起义是引导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

一、安边的政治形势

安边是定边县各乡镇中颇负盛名的一个古老大镇。明时设安边营，是长城古堡之一；清置理事捕盗同知，后改为二府。陕甘宁边区时期曾两度置县，与定边、靖边合称三边。他承东启西，地处晋、陕、宁、蒙中枢要冲，既是三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重镇，也是军事要镇。

1922 年前后，杨虎城靖国军在关中失利，从三原辗转来到陕北，其一部在安边驻扎，并成立了教导队。杨部官兵大多思想进步，积极宣传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 年定边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定边支部，10 月安边即成立了支

分部，积极开展党的活动。1928 年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先后在此建立了中共三边区委和共青团三边区委，领导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边兵运工作，田作勤、高尚信、高志超、王伯功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安边城附近的国民党地方土匪顽敌纷纷遁逃安边据守。1936 年 5 月，中央红军西征前夕，中共陕甘宁省委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会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定边县辖区内，成立中共定边县委和中共安边县委，确定刘悠安、慕纯农分别任定边、安边县委书记，并初步确定了赴各县工作的干部，组成干部工作队，随军一同西进，待定边、安边解放后开展地方工作。西征红军逼近柠条梁时，国民党靖边县县长张自立（鹤亭）仓皇逃到安边，会同国民党定边县县长李德庵及当地驻军、民团商议防御之计。5 月 28 日下午，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进攻安边。西征红军围攻安边城近两月未克后撤离西进。6 月 17 日凌晨红七十八师解放了定边县城，随即成立了中共定边县委和定边县苏维埃政府。安边因县城未能攻克，中共安边县委和安边县苏维埃政府即在县境内的新安边宣告成立。国民党定边县县长李德庵及部分县政府职员一直龟缩在安边城内。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停止了对安边的攻打。1937 年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骑兵团胡景通部驻防安边，7 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安边县，所辖苏区并入定边县。这样，在原定边县境内，同时存在两个定边县政府：一是陕甘宁边区定边县抗日民主政府，另一是国民党定边县政府（驻安边）。1939 年夏，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简称新十一旅，下同）由榆林三岔湾移防安边。下辖两个团，旅部和一团团部驻安边，一团一

营、二营、三营分别驻砖井、白泥井、定边城郊，二团所辖各营驻防柠条梁、堆子梁等地。这时国民党定边县辖区已形成，辖安边、砖井、白泥井、东滩、柳堡等5个区，6个联保，23个保。1944年改区为乡、镇，下辖4个乡（镇）、20个保，总人口28455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安边成为国民党在三边顽固反共的军事、政治堡垒。

二、新十一旅的创建及党的兵运工作的开展

1945年，在安边发动反内战起义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是由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子俊）最早拉起的，其前身是冯玉祥留守宁夏平罗的骑兵第四师苏雨生所部石英秀第九旅和谷莲舫第八旅。

1929年冬，石英秀在陕北著名的共产党人唐澍、谢子长领导的“反蒋倒井（井岳秀）”的清涧起义影响下，由靖边柠条梁率部投靠冯玉祥留守在宁夏平罗的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同时横山的谷莲舫、安边的王子元也拉起了部队，相约一起投靠苏雨生。苏即根据他们各自所带来的人马枪弹多寡，任石英秀为第九旅旅长，谷莲舫为第八旅旅长，王子元为第八旅十五团团长。苏雨生老基本部队编为第七旅，包头土匪头子马大牛任旅长。

此时，中共陕北特委乘八、九两旅扩编之际，先后派出刘志丹、谢子长、张东蛟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100多人到八、九两旅搞兵运工作。苏雨生对他们都进行了“封官许愿”，任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团长张廷芝），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因部队尚未组建起来，则暂任第九旅副旅长），张东

皎为第八旅十五团副团长。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决定组建学兵队，归王子元十五团辖。并同王子元商定，由王子元掩护在该部的地下党员，谢子长为王子元继续招兵扩编队伍。不久，学兵队正式建成，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同时建起了地下党的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特支归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部队到甘肃后又归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过一段时间。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命苏雨生部开拔甘肃平凉接防。苏部途经固原时受到地方小军阀黄得贵阻击，损失较大。同时甘军陈珪璋第十一旅已占据了平凉，苏部遂撤到宁夏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又遭马鸿宾所部冶成章（外号野骡子）袭击，损失更惨。在进退不得的情况下，石英秀、王子元决定八、九两旅脱离苏雨生，并带残部开到豫旺县下马关驻防。是年8月，驻兰州的雷中田收编其为第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开拔甘肃靖远驻防。年底，由于王子元与石英秀意见不和，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王子元任营长，张东皎任副营长，调防兰州。石英秀率第三旅，移防定西。从此，地下党组织即分开在两部活动。

1931年夏，石英秀第三旅由定西移防到静宁一带，部队得到一定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驻陕杨虎城所部孙蔚如十七师入甘，击败了雷中田，将石英秀第三旅改编为新十一旅，石任旅长，谷莲舫任副旅长。归西安绥靖行辕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领导。全旅共编两个团，陈国宾任一团团长，冯杰山任二团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

1932年春，新十一旅开拔陇东庆阳地区驻防，石英秀将驻平凉陈珪璋第十一旅刘保堂特务二团收编为新十一旅第三

团。不久，又将三团并入二团。二团团长冯杰山被撤职，刘宝堂接任二团团长。

由于中共陕北特委及刘志丹、谢子长不断派出共产党员到新十一旅做兵运工作，使新十一旅地下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此时，新十一旅两个团都已建起了党的特支。1932年至1933年期间，由地下党组织掌握的王子元部队，先后举行了兰州北水门、甘肃西华池、靖远等地的武装起义。张东蛟牺牲，王子元流落外地，后回了陕北，王子元部队随之解体。牛化东、高昆山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转到了新十一旅，更加壮大了该旅地下党的力量，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3年春，新十一旅仍驻陇东庆阳地区。该旅的成分本来就很复杂，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加之，此时国民党“蓝衣社”军统特务已打入新十一旅内部，使斗争更为复杂化。是年，石英秀以共产党员杨觉民（石的亲戚）为主成立了第三团，杨觉民任团长。其主要军官有共产党员陈毅平、朱侠夫、杜陕山、杨定芳等人，先后共招收新兵千余人。后军统特务向驻兰州西北绥靖行辕主任朱绍良报告说，新十一旅第三团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朱绍良要追究此事，石英秀只好把三团并入第一团，并“礼送”杨觉民等共产党员离开了新十一旅。石英秀也离开部队到北平去治病。

1934年春，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所辖仅两个旅，即李贵清新十旅，驻防靖远；石英秀新十一旅，移防会宁、静宁一带。人们讥称邓部为“新半军”。

不久，石英秀病逝北平，立即引起了旅长“宝座”之争。旅长一职本应由新十一旅正宗派、老资格的陈国宾接任，但却被收编的刘宝堂采取诱骗的手段夺走。刘的心腹、复兴社特务

史钊城接任二团团长，陈国宾只代理了7天旅长之职，就拔旗易帜了，从此，陈国宾仇视刘宝堂，陈刘结怨，且矛盾日趋加深。当时地下党组织分析形势，根据陈、刘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积极利用矛盾争取陈国宾，反对刘宝堂，以达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开展斗争之目的。

三、新十一旅的发展与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进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邓宝珊新一军和鲁大昌一六五师及驻榆林的高双成八十六师，合编为二十一军团，邓任军团长，驻防榆林。名义上是抗击平绥线日军西侵，实则是企图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正当驻甘部队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榆林开拔时，突然蒋介石命令尚在甘肃的一六五师、新十旅停止前进，分别并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改任邓宝珊为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37年，新十一旅在向榆林开拔中，途经安边时驻了一个冬天，1938年初移驻榆林城南三岔湾至鱼河堡一带。此时，二团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复兴社特务分子张鼎丞（二团少校团附）破坏殆尽，一团八连连长、地下党员任怀义也突然叛党，向刘宝堂出卖一团地下党员牛化东（中校团附）、李友竹（又名树林，少校团附）、高昆山（二连连长）、冯世光（四连连长）、高宜之（五连连长）、朱之春（六连连长）、谢有德（九连连长）、胡立亭（一营营附）、贺志平（一营副官）9人系“赤化分子”，说他们在部队宣传“赤化”，“暗助共党”等。刘宝堂即背着邓宝珊，旨意亲信史钊城、张鼎丞伙同榆林特务机关向西安驻陕绥靖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此事。蒋即电令邓宝珊严查。邓先把一

团长陈国宾叫到榆林了解情况，陈返回后问李友竹有无此事，李巧妙地周旋应付，随后李即报告牛化东：敌人已审察到一团党的活动，并想借机剪除一团的进步势力，要有应变措施。二人即找来团里地下党员冯世光、高昆山、胡立亭等连营军官研究对策。为了保持新十一旅这支党的力量，乘机扩大影响，做好长远打算，最后决定：一、将情况报告中共绥德特委，听取党的指示；二、通知党内同志注意掌握好部队，并动员新十一旅内部秘密组织“混成独立旅”（人员大部分是在西兰大道上收容的长征红军掉队战士）做好起义准备。万一发生情况，由谢有德指挥起义，把一团拉到解放区；三、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扭转被动局面。首先邀请一团三个持中间态度的营长即曹又参（一营）、柴明堂（二营）、宋子元（三营）去做团长陈国宾的工作。然后再请团长陈国宾尽快去向邓宝珊说明事实真相：即刘宝堂有野心、时刻寻找机会吃掉一团，现他们阴谋用赤化罪名把一团骨干除掉，换成复兴社分子，为他们叛离邓总司令，投靠胡宗南创造条件。陈国宾去向邓宝珊说明真相时，还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团没有问题，邓说让牛化东来榆面谈。牛化东、李友竹等人得知后，经与绥德特委联系和党内研究，认为邓宝珊将军历史上曾与我党有过联系，抗战态度坚决，并与蒋介石、蒋鼎文等人素有矛盾，颇受歧视，是同情进步的。牛化东去榆安全没有问题。牛化东去了榆林，邓一见牛的面就说：“你胆子不小啊，敢来见我。”牛化东从容地对答。邓又说：“我想你知道我是不会把你送往西安去的，别人告别人的，你干你的，向上我负责。”就这样，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和对付下，一场反共告密阴谋终被挫败，但陈国宾与刘宝堂的结怨更加深刻。是年秋天，邓宝珊为了缓和陈国宾与刘宝堂的

矛盾，决定先将一团调往安边驻防。

1940年春，新十一旅全部移防安边。旅部和一团一部驻安边；一团另一部驻白泥井、砖井一带，二团驻靖边柠条梁。

安边是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张玉亭及其子张廷祥一伙政治土匪多年经营的老巢，是他们兄弟父子的“家天下”。新十一旅到达安边后，敌人营垒的斗争也相当激烈。当时，有三股势力：一是以旅长刘宝堂为首的一伙反动的复兴社分子。主要成员有：旅参谋长石佩玖、旅政治部主任吴棻、旅副官长任怀义、二团团团长史钊城、二团团附张鼎丞、炮连连长慕寿山，还有军统特务陈大备、龙在中以及第八战区驻新十一旅情报参谋秦光南等人。他们追随蒋介石，依靠胡宗南，凭借自己掌握着新十一旅的大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二是以一团团长陈国宾为首的民主进步势力。主要成员有：一团一营营长曹又参、二营营长柴明堂、七连连长屈怀礼等人。他们倾向共产党，主张民主和抗日，依靠邓宝珊；三是以张廷芝、张廷祥为首的一伙土顽势力。他们欺压百姓，为害一方，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他们名义上是地方保安团队，实际上是一股政治土匪武装力量。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统战原则，采取“先灭张后反刘”的办法，使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在敌人营垒里得以生存和发展。

新十一旅进驻安边后，无疑压住了张廷芝、张廷祥一伙以往在这里的威风 and 荣耀。所以，他们时刻梦想恢复昔日的“天堂”。张家父子先是利用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与陈国宾团长的矛盾，对十一旅内部进行挑唆离间，企图吞并十一旅取而代之。结果被刘、陈所识破，弄的声名狼藉。张氏父子阴谋败露后，便磨刀霍霍，伺机报复。到了1941年秋，在接到胡宗南的密

电后，他们终于密谋出一个暗杀刘宝堂、整垮新十一旅的计划。此时，张廷芝拼凑了 600 多人，被胡宗南任命为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暂驻安边东滩的堆子梁一带，准备移防绥远；张廷祥把 300 多人的保安队编成了陕西保安十三团，当上了团长，驻安边城内，与新十一旅联防。他们为了迷惑刘宝堂，使出一招美人计，特请新十一旅军需主任朱仙洲做媒，将张廷芝的女儿淑琴许配给刘宝堂之子刘汉。刘不知是计，欣然与张家结亲和好，使张、刘两家表面一派和睦相处的景象。

1941 年 9 月 4 日下午，张家以张廷芝移防辞行、欢迎胡宗南所部何文鼎二十七师的点检委员魏高参前来点检，以及庆祝张、刘两家联姻为由，在安边城内张灯结彩，大摆宴席，邀请刘宝堂及新十一旅驻安边的连以上军官赴宴。席间，张氏父子与宾客频频敬酒，张廷祥端酒来到刘宝堂面前说：“欢迎亲家莅临……三哥，咱们干杯！”话未说完，突然拔出手枪，当场将刘击毙。霎时宴会大乱。事先埋伏在宴会大厅附近的二张部队一齐出动，将新十一旅赴宴的全部军官扣押起来，并向驻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五个连发起进攻。安边城顿时笼罩在恐怖之中。

新十一旅部队在下级军官的及时指挥下，全力应战，战斗相持到第二天早晨。张家见久攻不下，便请绅商刘文卿、余鼎九等人出面调停。结果商定：张家释放除陈国宾外的新十一旅全部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城内部队全部撤出城外。此时，老奸巨滑的张廷芝父子预感后果不妙，便偷偷携带金银细软，全家逃到城外堆子梁布防，准备与张廷祥形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对这一突发事件，当时因公外出未参加宴会的一团副团长、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立即向中共三边分委作了汇报，分委指示牛火速回安边，掌握部队，收复安边城，借机消灭二张。牛副团

长立即赶到新十一旅白泥井防地，召集地下党员和党外进步军官开会，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曹又参任总指挥，牛化东、柴明堂、米积山（二团二营营长）任副总指挥，部署讨张计划，营救被扣官佐。同时，牛化东还以个人名义给安边城内保安十三团的中队长夏品三、杜廷之写信，让他们作内应，届时开城门放部队进城。夏、杜二人原是牛的部下，早有归附之心，很快复信表示：“惟命是从”。

9月14日晚，事变时撤出来的十一旅部分官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反攻安边，他们在夏品三接应下，从东门秘密进城，将正在城墙上巡视的张玉亭当场击毙，又经过二小时激烈巷战，张廷祥弃城潜逃，后被十一旅官兵在鹑怪子沟其姐家中抓获，押回安边公审枪决。负责追捕张兰亭、张廷芝父子的十一旅营长柴明堂，因徇情受贿，将二张放走。

刘宝堂遇刺后，在选择十一旅旅长职务上曾发生了激烈斗争，最后在地下党的影响作用下，由团长陈国宾继任。陈当了旅长后，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靠近进步人士，为我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乘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所属何文鼎二十七师进驻安边，妄想借调防之机，彻底整垮新十一旅，打开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此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察觉，遂调王震三五九旅进驻靖边张家畔、内蒙城川一带，阻击二十七师南下。何文鼎一看八路军出动，害怕吃亏，不敢贸然前进。邓宝珊也乘机几次急电蒋介石，陈述利弊，蒋介石终于收回了成命。

1944年春，陈国宾旅长在安边病逝，又发生继任旅长职务的激烈角逐。二团长史钫城为首的一批反动军官到处游说，

上窜下跳，妄图拥史上台。一团地下党组织分析认为：现任一团长曹又参拥护我党的各项抗日主张和政策，又是十一旅创始人之一，深孚众望，他能接任，将有利于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最后议定，派李友竹到榆林说服邓宝珊将军。邓分析了各种形势后，毅然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曹又参接任代旅长后，一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改观，除牛化东、李友竹外，团里还增加了王子庄任参谋主任；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共产党员，党组织已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进步力量迅速发展。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夜，中共三边分委指示十一旅党组织：一方面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一方面准备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打内战的阴谋，积极培训干部，团结进步力量，发展外围组织，对所有军官和士兵普遍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同时指示地下党组织，积蓄实力，加强活动，一旦时机成熟，就率领全旅进行起义奔向光明。

四、震惊西北的新十一旅安边起义获得成功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为己任，但深感榆林邓宝珊和左协中二十二军反共不积极，驻安边新十一旅不可靠，于是命令胡宗南以整编和调防的办法对付邓宝珊。计划将二十二军和新十一旅共编为一个军，何文鼎任军长。名义上仍归邓宝珊指挥，实则编后脱离邓宝珊调往绥西去打内战。曹又参得知此消息后，亲赴榆林向邓宝珊请示办法。曹走后，史钫城、吴棻、张鼎丞、任怀义一伙叛特分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安边城内四处游说串联，瓦解一团。张、任对一团三连连长、共产党员赵武臣说一

团如不去包头接受整编，二团就要于10月28日开进安边城以武力解决一团！紧急时刻，赵武臣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十多年来，党在十一旅的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如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党的事业将会蒙受极大损失，三边地区的党组织和延安党中央的整个斗争也会受到影响。党组织一致认为，起义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遂派党员冯世光和进步人士王子庄到定边向警三旅旅长兼三边地委书记贺晋年汇报安边方面的情况。经三边地委请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新十一旅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先发制人。同时派警三旅八、九两团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10月24日晚，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李友竹、高宜之、谢有德、冯世光、赵武臣和王子庄等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拟定起义方案，并成立了以牛化东为总指挥，王子庄为副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同时派高昆山去白泥井二营防地，传达起义命令；调二营朱子春六连来安边，供指挥部机动使用；严密监视柠条梁方面史钊城二团的动向。

1945年10月25日拂晓，震惊西北大地的起义枪声在安边打响了。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分头行动，紧闭城门，切断对外联系。起义队伍首先逮捕了副旅长吴棻和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以及国民党驻安边县党部书记谢永鹏、公安局长、邮电局长、税务局长等人，并击毙拒捕的反动军官张鼎丞，县长连友贤跳城墙逃跑。接着起义部队又扩大战果，消灭了敢于顽抗的残敌，迅速占领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机关，时近中午，拿下全城。当日下午支援起义的警三旅一部在副旅长吴岱峰、参谋长张文舟等率领下进入安边，受到全城军民的热烈欢迎。至此，十一旅旅部及一团全部共二千余名官兵在安边起

义成功了。

10月27日，走向光明的第十一旅全体官兵和警三旅一部官兵在城内召开祝捷会师大会，中共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莅临大会，会上王子庄代表旅部庄严宣布：十一旅官兵为反对内战而光荣起义，同时宣布坚决消灭驻扎在柠条梁镇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宣读了致十一旅起义的贺信。

10月28日，攻打柠条梁的战斗开始，至11月3日攻克柠条梁，击毙史钊城以下百余人，俘虏800余人，其残部驻堆子梁防区周效武营400余人溃逃榆林。11月5日，曹又参旅长暨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李友竹、赵级三、冯世光等新十一旅全体官兵，通电全国，把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以特务手段消灭异己之阴谋而发动的安边起义内幕，公之于世，号召全国人民解决反对内战，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起义后中央将新十一旅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沿用新十一旅的番号，任命曹又参为旅长，牛化东为副旅长，王子庄为参谋长，为加强领导，并派郭炳坤为政治委员，杨林为副政治委员，苏效蒙为政治部主任。

起义后不久，贺晋年陪同曹又参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贺晋年、曹又参说：你们是火车头！又拉着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这个头你们开的好，革命不分先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少奇等同志设宴欢迎曹又参将军一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专门组织了欢迎晚会，阎揆要参谋长致欢迎词，演出了评剧《逼上梁山》，表达了中央领导对起义的高度重视和勉励。

五、新十一旅安边起义的历史意义

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中发生较早的一次反蒋爱国起义。它发生在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反映了人民渴望民主和平，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建立卖国独裁政府的心声。这次起义不仅拔除了国民党长期盘踞在陕甘宁边区内的反动堡垒，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北线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解放了三边地区周围 8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十一旅这支旧军队自身获得新生，从而也壮大了三边地区的革命力量，而且沉重打击了蒋、胡集团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斗志，为其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100 余次、170 多万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毛泽东主席形象地喻之为“火车头”。正如起义周年时，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发表的贺电和《解放日报》短评所言：“在此一载之中，全国各地蒋军追随贵军之后而起义比比皆是。先锋作用，昭然可见。”“新十一旅的起义，是如象高树勋、孔从周、郝鹏举、潘朔端以及其他许多起义一样，证明蒋介石的卖国罪行，一定要遭到破产。自新十一旅起义后，边区周围的起义事件继续不断发生（如陕六团三大队及胡宗南部），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最近驻横山一带胡景铎所部 5000 余人的义举，尤为震动西北，以至全国。可以断言，今后将有更多的蒋军官兵接踵加入人民军队，蒋介石的不义之师是注定要毁灭的。”

这次起义是经中央批准，在中共三边地委领导下，由牛化

东为首的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联合上层进步军官组织策动代旅长曹又参率部举行的，它轰动塞上，震撼西北，影响全国。是三边乃至陕西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事件，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重要事实，也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纪念新十一旅安边起义 60 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研究十一旅起义的原因和成功经验是颇有意义的。

1. 十一旅起义及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有一支凝聚力、战斗力极强的地下党组织。如前所述，早在十一旅前身国民党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第八旅十五团（团长王子元）、第九旅（旅长石英秀）创建时期，中共陕北特委等党组织即乘该部扩编之际，先后派遣不少共产党员、进步青年，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打入这些部队，建立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兵运工作，曾领导发动了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1935 年、1936 年期间还曾收容过红军长征中掉队下来的一部分伤病员。到 1937 年底，新十一旅由甘肃开赴榆林时，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发展，虽然二团的地下党组织遭到该团团附、叛徒张鼎丞瓦解，只剩下个别党员起通风报信作用，但一团形成了以牛化东为核心的地下党组织，李友竹、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等都是党的重要负责人，他们在营里设支部、连里设小组，平时以组织军事学习、文化学习、读书会等形式活动，从战略和策略上很好地保护了地下党组织。陕北当时为抗日战争后方，又有八路军留守兵团，正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驻定边警三旅旅长贺晋年等都曾在新十一旅搞过兵运，联系广泛。十一旅党组织向上归中共绥德特委和三边分（地）委领导。一

团的这些党的骨干力量，主导了新十一旅进步发展的方向。先后在粉碎反共告密事件，平息张家父子对刘宝堂旅长和陈国宾团长的挑拨事件，安边“鸿门宴”等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在新十一旅内部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斗争中，每逢关键时刻，地下党的同志，为了积蓄力量，做好起义准备，同敌人施展的各种伎俩作了殊死的斗争。

2. 严峻的内战形势，是新十一旅起义的直接原因。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却在暗中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继续实行独裁统治，进而在中原上党、邯郸等地燃起内战火焰。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使全国人民免受自相残杀、遭受同胞蹂躏之苦，呼吁和平，民主建国。不少有良知的国民党指战员也深明大义，反对内战。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点进攻。胡宗南因驻安边的新十一旅反共不坚决，觉得不可靠，故借调防包头改编为正规师名义，实施分化瓦解。在这决定新十一旅前途和命运重大关头，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一方面积极与中共三边地委、警备三旅、中央保安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部队内的国民党死硬分子等进行坚决斗争。党组织一致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积极倡议、组织实施，经中央批准，于10月25日在安边举行了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新十一旅这支旧军队里播撒下的革命火种，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酝酿、运行、扩散，到解放战争初期，终于酿成熊熊烈火燃烧起来。

3. 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是新十一旅起义取得成功的

重要原因，也是起义取得的基本经验。党的兵运工作本身就是统战工作。我党各级党组织都较重视新十一旅的统战工作，尤其是重视该旅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曹又参是新十一旅第四任旅长，知识分子出身，思想进步，倾向我党，主张抗日不反共。1943年冬，曹任新十一旅一团团长时，西北局就根据该旅地下党的汇报，积极做曹的统战工作。西北局直接向曹拍电报，让其派代表到延安谈判。经过驻定边警三旅旅长贺晋年（30年代初贺在曹的特务营四连当排长）的斡旋，曹同意派苏杰儒、阎孔照（均系地下党员）到延安进行谈判。前后共谈判了两次，西北局同意了曹提出的三点意见：一、不脱离邓宝珊的领导；二、不离开安边的防地；三、不脱离与定边八路军的关系。西北局并托代表带回给曹又参支援的法币30余万元。这对掩护该团地下党员活动和后来的起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尤为重视，所以，在新十一旅每遇到关键时刻，邓宝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对该旅的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的统战工作也很重视。1945年夏，抗战胜利前夕，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意图，积极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在一团举办了两期军训班。名为“军训班”，实则是对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全体官兵认清新十一旅的出路何在。只有走向民主、走向革命，才是光明的前途；跟着蒋介石、胡宗南走，便是死路一条！随后，地下党组织还倡议并经请示三边地委的同意，建立了统战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让开始觉悟的军统特务贺登阁担任促进会主任（贺在安边起义后送往延安经教育释放，在1949年又率旬邑保安团起义）。参加促进会员有三四十人，大都中、下级军官，

在起义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4. 大气候、大环境的影响，是新十一旅安边起义获得成功的重要外因。1940年前后新十一旅驻防安边，正是中国人民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坚持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变本加厉地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并准备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同时驻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在北边搞摩擦。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形成包围圈，实行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妄图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些反共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前方抗战和后方防御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由文年生、阎红彦率部保卫延安的南大门，驻防富县的焦道原一带；由王世泰、贺晋年率警三旅并配合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保卫延安的北大门，驻防三边地区；由王维舟、耿飚率三八五旅保卫延安的西大门，驻防陇东庆阳地区；由王震率三五九旅从华北回师，保卫延安的东大门，对抗绥德何绍南。这是当时陕甘宁边区总的军事态势。而新十一旅除驻安边、柠条梁等几个小城堡、寨子外，其余定边、靖边、盐池、吴旗、志丹和内蒙古的城川以及甘肃的庆阳、华池、环县等广大地区都属于红色解放区。这对新十一旅的主要防地安边形成了一个红色包围圈。加之，从1939年冬到1943年秋，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展，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解放区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这对安边这座白色“孤岛”客观上促成了可变的外部因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革命的三大法宝。毛泽东说过：“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的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②新十一旅安边起义是党的三大法宝的出色运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新十一旅曹又参代旅长，追求民主，深明大义，对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起到了保护、支持等重要作用，最后领衔发表起义通电，从而对新十一旅起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十一旅中共地下组织核心负责人牛化东副团长，率先提出起义，积极倡导、组织，并亲自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对起义的成功举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将永载史册，成为鼓舞和激励后人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注释：

①这一方针是毛泽东 1939 年 12 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中提出的，原文是“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36 页）。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指示中，对这一政策作了更完整的概括，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56 页）。同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要求陕西省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新 1991 年版第 457 页）。之后成为党指导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05～606 页。

“你们是火车头”^{*}

——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 牛化东 李树林 王子庄
冯世光 高宜之 朱子春^①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在唐澍、谢子长领导的反蒋倒井（井岳秀）的清涧兵暴影响下，于1929年冬，由陕北靖边县的柠条梁率部到宁夏平罗，投冯玉祥所属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被苏收编扩建为第九旅，石英秀任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1930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乘九旅扩充之机，先后派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九旅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苏雨生被马鸿逵驱出宁夏，该旅又奔到甘肃靖远，被兰州的雷中田改编为第三旅，驻防定西、静宁一带。“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杜斌丞入甘视察后，又将第三旅改编为陆军新十一旅，石英秀仍任旅长。1931年12月间，杨虎城派孙蔚如联合平凉驻军陈珪璋进驻兰州，消灭了雷中田。1932年初，陈珪璋因反对孙蔚如而被歼，新十一旅又收编了陈部的刘宝堂团为二团。此后新十

* 本文选自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三边风云》，原载《宁夏文史资料》1984年第12期。

一旅又和李贵清的新十旅合编为新一军，邓宝珊任军长。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刘宝堂从陈国宾手里抢任了旅长。此事引起一团结团长陈国宾大为不满，从此，刘、陈交恶，结下了难解之怨。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彻底控制甘肃，任命邓宝珊为二十一军团司令，要邓率军离甘开赴绥远抗日，企图借日本人的手消灭邓部。途中新十旅被胡宗南吃掉，只剩下了新十一旅。邓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行至陕北榆林，因归绥、包头已经失陷，再未前进。从此邓和蒋、胡加深了矛盾。

1939年夏，随着形势的变化，新十一旅逐渐移防到安边、白泥井、柠条梁一带。刘宝堂在安边期间，为了争夺地方权势，和安边的地头蛇保安团头子张兰亭兄弟及其父子4人矛盾日趋严重，最后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与此同时，刘宝堂觉得久居邓宝珊之下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便通过复兴社多方活动，欲弃邓而投靠胡宗南，邓闻讯后对刘宝堂大为不满。

当时刘宝堂和二团结团长史钊城靠的是复兴社，一团结团长陈国宾靠的是邓宝珊，再加上榆林和安边周围都是红区，这些客观情况，为我党地下组织在新十一旅内部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中共三边分委（1942年底改称地委）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要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采取先灭张、后反刘的斗争策略，利用敌人矛盾，削弱敌人力量，并使自己在利用敌人矛盾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遵照三边分委的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向敌人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团结广大官兵，节节取得胜利，直至最后曹又参旅长通电全国，率部光荣起义。起义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曹又参旅长，称赞新十一旅官兵说：“你们是

火车头”。

一、新十一旅地下党的组建与发展概况

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是1930年春在宁夏平罗扩建九旅时建立的。谢子长曾在该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旅长，对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不久，就被调回陕北扩充武装去了。在长期的工作中，党员有进有出，但党的组织一直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该旅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曾领导过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有力地打击过当地的反动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曾掩护过地下党的不少同志脱离了虎口。1935年还收容过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不少伤病员，其中有的及时转送到延安。

1937年底，新十一旅开驻榆林时，二团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臣瓦解，剩下的个别党员只能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是一很大损失。唯有一团党的力量较强，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等。当时营里设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有时一个连只有一个党员干部。连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军事学习组、文化学习组、读书会等形式出现，因为这些形式对团结教育士兵能发挥好的作用，官兵都表示欢迎。从1937年冬部队由甘肃开到陕北后，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归三边分委和绥德特委领导（因驻三边时间长，主要是归三边分委领导），上级党的负责人先后有：王世泰、贺晋年、张文舟、白治民、高峰、朱子休等。前来布置与检查工作的先后有：葛申、黎洪洁、张友生、李启明、李明波（黎光）等。

二、粉碎叛特的阴谋活动

1938年初，新十一旅驻防榆林城南三岔湾、归绥堡、米家园子、刘官寨、渔河堡一带后不久，旅长刘宝堂、政治部主任吴棻和二团团长史钊城、团副张鼎丞等复兴社分子，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的军统特务，向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及二连连长高昆山、四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副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等9人系赤化分子。蒋鼎文立即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邓接电后，通知一团团长陈国宾到榆密商。陈从榆返团后，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想来想去，认为其中李树林系新十一旅的创建军官，曾因共产党嫌疑被人密告过三次，其中两次还下过他的枪，结果均不属实。如果李真是共产党员，他早就走了，哪能待到今天？于是决定再从李问起。第三天晚上，人睡定时，陈将李找去说：“有人又告你们是共产党员。”李笑着说：“告我为共产党员这是第四次了，究竟是不是，8年来团长应该知道了。现已半辈子过去了，该留、该去、该杀，团长决定吧！”陈说：“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不信，如果信，我就不问你了，其他人你说是不是？”李说：“还有谁呢？”陈一一点出姓名，李沉思了一会说：“此事不但关系每个人的前途，而且关系一团的存亡问题，我不能冒说，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陈说：“那此事就交给你去详尽了解吧”。李回到宿舍后，把所谈的情况告诉了牛化东，牛认为事关重大，不能坐以待毙。两人分析后，提出了一连串怀疑：为啥告的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没有新党员？老党员中为啥没有八连连长任怀义？是

不是任怀义叛党了？牛说：“现在团长既让你调查，那就不至于马上就抓这些人抓起来，明天咱俩分头出去找附近的党员通通气再说。”

第二天早饭后，牛化东先到一营四连把特务告发情况对冯世光说后，接着又找来胡立亭、高昆山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党组织在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遂决定：第一，速将情况汇报中共绥德特委；第二，通知被告发的几个连长要作好最后准备，在必要时把部队拉走；第三，让可靠的人分别征求三个营长的意见，然后再让三个营长去找团长说明利害关系。于是当即决定让冯世光去找三营营长宋子元（系陈团长的外甥），李树林去找一营营长曹又参。曹又参得知情况后，表态说：“我早就知道刘宝堂认为跟邓宝珊没出息，这是他要耍的一个阴谋，妄想吃掉一团，投归胡宗南。”随后便派人从20里外把二营营长柴明堂请到他家，和三营营长宋子元一起商量对策。三位营长意见统一后，共同去见陈团长，对刘宝堂作了历史性分析，认为：

第一，刘于1932年随陈珪璋在陇东失败后，为了寻找出路，才带了些残兵败将投到新十一旅，被石英秀收编为第二团。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本应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继任，但却被他施展阴谋夺走了旅长职务。他任旅长后，又要阴谋把任怀义连从二团拨到一团，名曰充实一团，实则为他做侦探活动。

第二，为卸掉陈的臂膀，曾把一团中校团副王子元调到二团一营当营长，美其名曰给以实权。

第三，1936年在甘肃堵击红军时，因一团逃掉一个被俘

红军侦察员（实际是陈国宾和高宜之相商放走的），刘向邓宝珊汇报说一团不可靠。现在他和史钊城、张鼎丞先后参加了复兴社，极力想用赤化罪名把几个得力连长除掉，换成忠于他的复兴社分子，妄想吃掉一团，为投归胡宗南创造条件。

陈听了三位营长的分析后，认为刘宝堂欺人太甚，第二天便去榆林向邓宝珊作了汇报，并以自己的脑袋作保一团没问题。邓听了陈的汇报后说：“既然你老哥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答复，由我邓宝珊负责。但蒋鼎文要我把为首的牛化东解送西安审处，你回去后让牛化东来榆见我，当面说明情况，以消除怀疑。”陈回团部向牛化东、李树林说明了邓的态度后，牛正准备赴榆时，恰巧绥德特委派人来到，经过党内研究，又详细分析了邓与蒋、胡的矛盾，邓与刘的矛盾，邓与陈的关系，邓与共产党的关系等等，认为邓深知过去失掉李贵清第十旅的原因，是由于下级军官追随了国民党政工人员造成的。国民党在新十一旅一团中的政工人员过去始终站不住脚，表明一团的军官是可信任的，此时不会把牛送去西安，遂同意牛去见邓。牛化东到榆林后，邓宝珊一见他就说：“你的胆子不小啊！还敢来见我。”牛回答说：“军人唯命是从，军长要我来，我怎能不来。我去西安何时动身？”邓说：“我想你知道我是不会送你去西安的，你来了好，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你好安心工作。”牛说：“人家告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怎能用共产党员呢？”邓说：“人家告人家的，你干你的，向上答复我负责，你们不要管。”话刚说完，马占山将军来到，邓随即对马介绍说：“这是被人告的共产党员牛化东。”马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邓说：“人家说是。”牛化东见此，便自动退避。

事后不久，任怀义在一次酒醉后，埋怨刘宝堂手软不敢杀

人，由此进一步证实了任怀义叛党。再加上陈向邓作过保证以后，邓对陈说的“你们要注意任怀义”，就完全肯定了任怀义已经叛党，告密是他无疑了。此后刘宝堂为了安慰任怀义，特破格提升为旅部副官长，这场风波遂暂告平息。

三、利用陈国宾战胜刘宝堂和张兰亭

1940年底，刘宝堂向陈国宾提出：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没有文化，不会搞军事训练，难以胜任，建议撤销营长职务。柴随陈多年，是患难之交，陈对刘的建议当即严词拒绝。不久，刘向邓宝珊提出，说陈年老无文化，应免去团长职务，可提升为副旅长。陈得知这个明升暗降的消息后，采取的对策是，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假装脱离一团而迷惑刘，暗地却做了反刘的部署：一、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在他“治病”期间，全团只准听从一营营长曹又参指挥（因团副牛化东当时不在团里）；二、秘密告诉二营营长柴明堂，刘若乘他“治病”之机，下令撤柴的营长职务，柴借口团长不在，坚决不从。事情若闹大，由他回来收场；三、陈密访了三边的土皇帝张兰亭父子，请其援柴反刘。张满口答应的情况，陈也告诉了柴。

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张玉亭及其子张廷祥等，系三边的地头蛇、大恶霸地主。当时张廷祥任三边保安团团长，驻防安边城。他们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曾血腥镇压、袭击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八路军解放了定边、靖边两县城。刘宝堂旅进驻安边城后，更进一步压住了张家昔日在三边的威风，所以，张家父子既仇视共产党，也仇视刘宝堂。他们虽不敢与我八路军公开对抗，但以为

从刘宝堂手中夺取安边地方权势还是有力量、有办法的。他们利用刘、陈矛盾激化，也妄想坐收渔人之利。因此，陈国宾秘密与张家勾结，张家便乘机答应，一拍即合。

陈去兰州后，张家迫不及待地盼望刘部尽早发生内讧。有一天，张廷祥从榆林回到安边对柴明堂造谣说：“我在榆林时，听说刘旅长将你呈报邓军长，决定撤你的职。”柴听后不加分析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按陈团长行前所嘱去办，请你们帮助。”张廷祥当即表示帮人帮枪都行。在此情况下，柴明堂便召来五连连长高宜之（地下党员）、七连连长屈怀礼（柴的亲信）相商，柴说：“现在刘宝堂要撤我的职，我准备按陈团长的嘱咐去办，张家也答应帮助我们，我宁愿把枪交给八路军（因他家在红区），也不交给刘宝堂。”三人商量结果，认为事关全团，必须和一营、三营相商后再定。为了慎重起见，可先把一营的赵武臣、三营的赵级三两位连长（均系柴的好友）请来商量，然后再请他俩回营商量。第二天，高宜之召集了二营的部分党员，又作了认真分析，认为：（1）张家一贯诡计多端，表示慷慨助我，必有企图；（2）一个营长突然以武力反对旅长，理不赢人，若去参加八路军，也会影响联合抗战；（3）二营的问题涉及全团，必须和一营、三营相商，不能单独行动；（4）营长要单独干时，须极力说服，不能盲目蛮干。要和三个营的负责人共商，尤其要听取曹又参营长的意见。

第三天，赵武臣、赵级三前来，柴明堂、高宜之、屈怀礼和他们共商时，除柴外，其他人均认为张家父子的话不能全信，张家父子的帮助也不可靠。但柴仍坚持说，刘宝堂要撤他的职，卸他的枪，时间不能等了。高宜之见此情况，首先表示说，事关全团，我们不能冒然行事。陈团长行前说一切要听曹

营长的指挥，这样大的事，怎能不事先告知他呢？高说：“我提个建议，大家考虑可否？今晚请两赵赶回各自的营里，经过明、后两天的商讨，我们于后天晚上采取个拉弓不放箭的办法，把队伍拉在城上，不管刘旅长发觉否，待曹营长到来后再去见他。问明为何要撤柴职？不管是真是假，事出有因，我们就有理可讲了。”五人一致同意。会后，又单独告诉赵武臣，务必向三边分委汇报，让曹又参务于第三天的后半夜赶到安边。

第三天下午，高宜之又和柴明堂商量的具体行动，到晚9时，柴明堂通知五、六、七连，以防止张廷祥要袭击杜廷之、夏品三两个保安中队为由，将部队拉在东、北、西城墙上，三面警戒。然后又当着张家派出帮助的五名心腹的面，把八连连长关玉梅找来说：“刘旅长决定明天要卸我二营的枪，命你率领全连今晚待命攻打旅部，活捉刘宝堂。”关受命后，认为以下犯上，其罪难当，他悄悄派人给刘宝堂通信，让刘避开为好。刘宝堂闻讯后，立即派旅部警卫连上了东南角城楼，自己藏在南城夏品三的保安队队部。

到10时许，东城墙哨兵报告，旅部警卫连占据了五连防地东南角城楼，不让他们去巡查。紧接着柴明堂派人来到五连说：“据张家来说，刘宝堂已到南城夏品三的保安队处藏身，建议我们攻打夏品三，捉拿刘宝堂。”五连连长高宜之对来说：“你将东南角城楼的情况告诉营长，八连就不要出动，我有办法，请营长放心。”此时11时已过，张廷祥见柴营迟迟不动，恐暴露自己的诡计，就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方法，摇身一变，连续向刘宝堂告发柴营要反。刘宝堂见告，便开始怀疑，柴营谋叛张廷祥如何知道？再一想关玉梅所说的时间已过，为

啥不见行动，是不是张家从中挑动？刘宝堂因对这些问题无法解释，最后便派军需主任毕安之（高宜之的乡友）到五连询问情况。高说：“你来得正好，我本想派人问旅长为啥派兵占据我连城防据点，因看到旅长警卫连剑拔弩张的情况，不敢前去请示。请毕主任速回报旅长说明情况。”刘宝堂听了毕的回报后，认为自己可能受了张廷祥的挑拨，即又命毕安之告诉高宜之，事出误会，速将部队撤下城墙。高宜之对毕说：“我连上城墙是柴营长下的命令，你去给柴营长讲，看他怎么个撤法。但必须说明旅部警卫连的枪口为何对着我连，难道我们有什么问题吗？”刘宝堂听了毕的二次回报后，确认自己上了张家的当，对下无理可讲，于是便请地方绅士刘文卿等出面调解。绅商们问柴明堂营长时，柴装糊涂说：“旅长要想撤我的职，下个命令就行了，何必来这一手？下面的情况我还不了解，请你们到连里看看。”这些调解人接着来到五连找高宜之问明情况。高回答说：“刘旅长既然请你们调解，看来他是中了邪风。情况复杂，我个人意见，现在双方都不要盲动，待天明曹又参、李树林（此时三营营长宋子元被撤职，李树林任三营营长）两位营长来后，共同辩明是非。”第二天早6时许，李营长由柠条梁出发，率九连谢有德、十连赵级三两个连进入安边城。10时许，曹营长由定边出发，率三连赵武臣、四连冯世光两个连来到安边东关，共同开了个连以上干部会，决定由曹又参代表一团出面同刘宝堂和地方绅商们商谈。商谈结果，决定首先给榆林邓宝珊去电，说明这次事件情况。电报大意是：因刘旅长不慎，引起柴营长和他的对峙，请速派要员前来调处。

邓宝珊接电后，立即派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从榆林星夜赶到安边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柴明堂让文书写信申诉，信中告刘

宝堂听信张家父子谗言而轻举妄动。八连连长关玉梅，此时又怕刘旅长怪罪，又怕柴营长报复，躲到曹又参处求救，不敢出面作证，以后被迫离队回乡。刘因早有撤柴之举，且又觉轻信张家父子的挑拨而理亏，故把这次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张廷祥父子。至此，张家父子才知自己反而上了当，有口难辩。调解结果，刘宝堂承认了错误，为了表示“诚意”。主动电请在兰州“治病”的一团团长陈国宾回部队主持工作，原想撤柴升陈之意从此作罢。最后以柴营撤出安边城外，曹营调回安边城内收场。

四、智复安边城

张家父子在陈国宾、刘宝堂冲突中，因扮演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角色，有苦难言，愈加仇视刘宝堂，以后便密谋了一个暗杀刘的周密计划。他们利用国民党驻榆林特务和个别军阀，一方面大唱反共高调，一方面积极招兵买马，扩大军事实力，张廷芝收编 600 余人，当上了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暂驻安边城东的堆子梁。张廷祥当了陕西保安十三团团长，将保安团编了三个中队，约 300 余人，驻安边城内。与此同时，他们又请新十一旅军需主任朱仙洲（朱曾是张家的部下）为媒，将张廷芝的养女张小芹（据刘文卿之子刘丰林回忆，应为张廷芝之女张淑琴，张小芹是冯世光为在世当事人讳而演义的。——编者）许配刘宝堂之子刘汉，借以表面讨好刘，刘不知是计，欣然同意与张家结亲和好。

1941 年 9 月 4 日下午 3 时，张廷芝和张廷祥在安边城内张灯结彩，大摆宴席。一是欢迎胡宗南部二十七师师长何文鼎

的点验委员魏高参前来点阅二张的部队；二是庆贺张廷芝荣任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宴席安排魏高参、刘宝堂、陈国宾、曹又参、米积山（二团三营营长）以及地方绅士刘文卿（据刘丰林回忆，他父亲未去赴宴，参见本书《安边事变追忆》——编者）、国民党靖边县县长张鹤亭等就座于张廷祥保安十三团团部；邀当时驻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连级以上军官，就座于张廷芝的临时驻地万发店。

张廷芝所部以点验为名，从堆子梁全部进驻安边城内。事前张以应付点验为借口，向刘宝堂借了军服 500 套，手榴弹 500 颗，子弹 2000 发，刘竟然不知是计，慨然相助，席间，熙熙攘攘，敬酒猜拳之声不绝于耳。正在这时，张廷祥乘向刘宝堂敬酒之机，抽枪将刘击毙。霎时，团部和万发店里早已埋伏好的张部，同时出动，扣押了新十一旅参加宴会的全部军官。

刘宝堂被击毙后，二张立即向城内新十一旅的五个连队进攻，战斗相持到五日清晨，二张见久攻不下，便请城内绅士刘文卿、余鼎九等人出面调解，双方暂商定：张家释放除陈国宾以外的全部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城内的全部部队撤出城外。此时，张兰亭、张廷芝眼见事态恶化，无法收场，便偷偷地携带金银细软，逃到了城外的驻地堆子梁。

这一突发事件，完全出我地下党组织的意料之外。幸好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因公去定边，未去赴宴。牛得知事变情况后，马上向三边分委和驻军领导人作了汇报。分委当即决定：让牛速赶回安边，组织全旅指战员消灭二张，我驻定边部队随时准备增援。

牛化东走到砖井时，听到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除陈国宾仍

被扣留外，部队已全部撤到白泥井一带，便立即赶到白泥井，召集了高宜之等地下党员和党外人士柴明堂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第一，成立讨张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柴明堂和二团三营营长米积山任副指挥。以为旅长报仇为号召，说服二团三营官兵共同讨张（后来，一团一营营长曹又参等被释放后，来到白泥井，牛让曹任总指挥，自己任副指挥）；第二，智取安边城，若不行，再强攻。随后，地下党组织又派冯世光向三边分委和定边驻军领导人汇报了智取安边城的方案，并请求支援，这些计划均立即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

智取安边城的方案是：以牛化东个人名义给保安十三团的中队长夏品三、杜廷之写信，让他们作内应，在攻城部队到达东城门后，秘密开门放部队进城。夏、杜二人原是牛的部下，早有归附十一旅之心，故复信表示：“唯命是从”，并约定9月14日晚12时，夏见牛后立即开门。

9月14日（冯世光、刘丰林等回忆为9月8日——编者）晚12时，新十一旅的攻城部队，在夏品三部的接应下，从安边东门秘密进城。此时，张玉亭率其护兵正好巡视到东门，被夏当场击毙。经一小时激烈巷战，张廷祥弃城潜逃，新十一旅顺利地收复了安边城，救回了陈国宾团长，安定了民心。一周后，张廷祥也被擒获，经大会公审，予以处决。但负责围打堆子梁的柴明堂因受张廷芝的重贿，放走了张廷芝父子及其家属。到1947年夏，我军收复安边的战斗中，张兰亭被炸死在安边西城墙门楼上。其子张廷芝直到全国解放后，在包头被处决。

刘宝堂的忠实干将史枋城、张鼎丞，在刘死后，非但不为刘报仇，反而在榆林大肆活动争当旅长。此事引起了一团官兵

的气愤，跟随刘宝堂多年的人，见此也均先后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团便派专人赴榆，请王子庄托人说服邓宝珊，让陈国宾继任旅长，最后得到了邓的同意。

这场斗争，我们利用矛盾，支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消灭反共顽固势力，取得了节节胜利，维护了与新十一旅合作抗日关系，稳定了三边的局势。

五、三破敌特诡计

在张廷祥、刘宝堂同归于尽的情况下，陈国宾从实践中认识到：一团官兵为自己奋斗不懈，忠实可靠，只有积极追随邓宝珊，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才能生存。由于陈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引起了胡宗南的不满，胡遂下决心要整编新十一旅。

1943年夏，蒋介石令其嫡系部队何文鼎的二十七师进驻三边，新十一旅调离三边接受改编。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加强对延安以北的封锁，另一方面借改编之名，妄想摸清新十一旅内部情况，消灭地下党的组织。

地下党组织将上述情况向三边地委汇报后，党中央指示：这是蒋介石借换防之名，行进攻延安之实的挑衅行动。决定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和警三旅，进驻张家畔、城川一带，阻击二十七师。同时公开通知新十一旅，在三天内将驻防白泥井的柴明堂营撤走，让出堡子，以做抗何据点。并指示我地下党组织配合此次战斗，抵制何部换防。柴明堂接通知后，因未见新十一旅下达命令，不敢作主撤离，两难之中，他又把高宜之找去，让高去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商谈。高故意说：“过去人家告我

是个赤色分子，我不敢去。”柴说：“别人去不会谈，还是由你带上我的信去谈为好。”高问怎么个谈法，柴说：“你就说我处于两难境地，希望八路军三天后打寨子时，给我们留条退路，落个被打跑而不是自动撤走的名就行了，并希望对我们留下的家属不要为难。”高去向贺晋年说明来意后，贺说：“你们的难处，我们理解，为了避免伤亡，到时双方枪口朝天。”高回营向柴明堂报告后，柴欣然同意。

第三天晚饭后，贺晋年旅长率部队由距白泥井寨子东 10 华里的宿营地出发来攻打寨子，此时忽接延安来电，令停止向新十一旅进攻，贺晋年遂派秘书李明波（黎光）通知了柴明堂。据事后了解，原来何文鼎见八路军出兵抵抗，不敢迅速前进，邓宝珊乘机几次急电蒋介石，陈述利弊，蒋才收回换防成命。

1944 年初，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等一伙复兴社分子，鉴于换防不成，又从内部捣乱，他们借冯世光去定边之事造谣说：“四连连长冯世光要扣旅长，准备暴动后投归共产党。”在此谣言煽动下，他们急忙占据了安边北城墙一带，形成火并阵势，使陈国宾旅长一时难辨真假，处于戒备状态。他们的目的是，妄图以此挑拨陈旅长解除冯世光的连长职务，削掉自己的臂膀，并进而引起邓宝珊对一团的不信任。此计被参谋主任王子庄识破后（王是陈旅长从军部要来并被任命为参谋主任的），立即向陈旅长说明，让陈千万不要上当，并以自己的性命向陈担保。陈派人调查，果属造谣，方作罢。

1944 年 4 月 5 日，陈国宾病逝。在谁继任旅长的问题上，一团和二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二团方面为团长史钫城助

威争夺旅长的有副旅长兼政治部主任吴棻，军统特务尤在中、副官长任怀义、团副张鼎丞等。这些人上串下联，大造舆论。针对这一情况，一团地下党组织认为，一团团长曹又参坚决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又是新十一旅创始人之一，在官兵中威望甚高，应坚持支持曹继任旅长。为了争取邓宝珊的同意，党组织决定派李树林去做说服工作。

李借为女儿婚事请邓当证婚人为名，乘机向邓面陈了曹当旅长的好处。与此同时，又请党外进步人士（邓的好友）向邓荐曹。邓本对史钊城曾密电陈长捷和董其武，要求离邓归胡之事不满，此时又考虑到曹继任旅长后对稳定三边局势、维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确有好处，便毅然决定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复兴社分子施展的第三次诡计，遂又被粉碎。

曹又参任代旅长后，一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下党员牛化东任一团副团长，三个营长中，李树林也是地下党员。十三个连长中，有十一个连长是地下党员。可以说，一团完全被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了。这时，正值美国公开声明支持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三边地委当面指示牛化东，中央要求我们都要认真准备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同时积极组织党外爱国人士反对蒋介石投靠美国，实行独裁。据此，地下党组织首先在一团办了两期排长以上干部训练班，借以对下级军官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班主任为王子庄（1945年加入党组织）。第一期的军训队长是李树林，第二期的队长是冯世光。其次，成立了“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借以宣传民主，广泛团结党外进步人士。为了迷惑敌人，让被国民党特务排挤出来的郝登阁当促进会主任，牛化东任副主任，王子庄任组织部长，冯世光任秘书长，李树林任军事部长。第三，在一团各连

中，普遍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加紧进行反内战教育。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使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为以后反内战起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六、新十一旅起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一方面在重庆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共产党代表团举行假和谈；另一方面实行独裁，企图独吞胜利果实，遂于八、九、十月间连续在绥远、上党、邯郸等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并指示驻西安的胡宗南做好围攻延安的准备。

胡宗南遵令，调兵遣将，严密封锁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但由于驻榆林的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反共不坚决，尤其认为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不可靠，便决定以调防和内部瓦解的办法，对付邓宝珊部。在通知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接受改编正规师的同时，又通知该旅副旅长吴棻及二团团团长史钫城等复兴社分子，对新十一旅从内部进行瓦解。代旅长曹又参得知调防改编消息后，亲自去榆林向邓宝珊请示。曹去榆后，吴棻、史钫城二人便于10月15日派复兴社分子张鼎丞、任怀义来到一团游说，大肆宣传改编为正规军的好处。因不知我连连长赵武臣是地下党员，以为平素与他们相好，便对赵说：“一团若不接受改编，我们二团便于本月28日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安边，乘机以武力解决一团。”赵将这一情况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去定边向三边地委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汇报。又经三边地委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命葛申随冯、王返回安边参

加起义领导工作，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八、九两个团和七团的一个营，按时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

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臣等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商定了起义方案：一、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指挥；二、派高昆山（地下党员）去白泥井二营防地，传达起义的命令；三、调二营六连（连长朱子春）来安边指挥部机动使用。

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新十一旅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以及国民党定边县（驻安边）县党部书记、公安局、税务局、邮电局局长等人，二团团副张鼎丞因拒捕被击毙，县长连友贤跳城墙逃跑，起义指挥部立即派部队迅速占据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部门。当日下午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也率部进了安边城，受到军民热烈欢迎。

27日，起义部队和警三旅在安边城内开了会师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参加了大会。一团起义的官兵1500多人和旅部直属机关的500多人均参加了大会（约占全旅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会上，旅部参谋主任王子庄宣布新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举行起义，并宣布了坚决消灭驻柠条梁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宣读了致新十一旅的贺信。

二团团长史钊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在距安边城60华里的柠条梁部署顽抗，妄想依靠暗堡和外壕等坚固工事，联合地主武装力量坚守城防。与此同时，还命炮连连长慕寿山组织突击队，在城外偷袭我攻城部队，并急电要求胡宗南派部队增援。

28日，攻打柠条梁的战斗打响后，二团负隅顽抗，我方因采取围打劝降的办法，致使战斗相持了4天。11月1日，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亲临阵地正式命令强攻，11月3日拂晓，攻占了柠条梁，击毙了史钊城等100余人，俘虏慕寿山等800余人，二团周效武营官兵400余人从堆子梁防区溃逃榆林。

起义开始时，地下党组织为了让在榆林的曹又参返回部队参加起义，牛化东急电榆林邓宝珊：“二团要以武力解决一团，一团发觉后，正在对峙中。”曹又参得知报告后，星夜返回，曹回到安边后，部队夹道欢迎。11月5日，曹又参旅长暨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李树林、赵级三、冯世光等全体新十一旅官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起义通电。这次起义对随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起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起义后，毛主席在接见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十一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经查《解放日报》未见此社论——编者），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意义和功绩。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司令设宴招待了曹又参代旅长。陕甘宁晋绥联军总司令贺龙专门为曹又参组织了欢迎晚会。

党中央为了加强新十一旅的工作，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的番号，任命曹又参为旅长（曹于1948年8月入党），派郭炳坤任政委、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团、营、连中也配备了政工干部。团、营、连的军事干部，均由起义的地下党员和军官担任。

从此，这支部队得到了新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新十一旅在解放战争中，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牛化东（1906～1995），陕西定边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参见本书《牛化东将军传》。

②李树林（1905～1997），字友竹，横山县清平堡胶泥墩村（今属靖边县）人。1921年入横山一高，1925年春参加学兵，1926年由郭洪涛、叶贤英介绍入党，之后投身横山农运，1929年冬受党派遣入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搞兵运工作，在学兵队受训后历任连长、少校团附、营长，新十一旅起义后任二团团团长，独一师参谋长，解放三边，转战西北。1950年夏独一师改编为坦克第三师，开赴东北，改任北京第一、第三坦克学校校务部副部长、物资保证部部长。1956年5月转地方工作，任内蒙古第一机械厂（167兵器厂）副厂长。1997年11月14日逝世，终年93岁。

③王子庄，又名临轩、麟选，横山县波罗镇烂泥湾村人。1930年参加冯玉祥西北军，任九旅旅部书记官，历任新十一旅团参谋主任、营长、副团长、邓宝珊军部参谋、十一旅参谋主任。起义后任新十一旅参谋长，不久加入党组织，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民政局局长、甘肃省政协秘书长、副主席。参见本书《十一旅起义亲历记》。

④冯世光，米脂人，早期党员，在十一旅任四连连长，十一旅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起义后任新十一旅一营营长，建国后在西安市电力电容器厂工作。

⑤高宜之（1906～1994），字子奇，佳县乌镇乡古城村人。10岁时到米脂县城读私塾，后入榆林职业中学上学，1925年秋入北京工业大学，1927年又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由邓小平（时名邓希贤）、张汉俊介绍入党。1924年秋经阎揆要介绍入神木高志清骑兵旅任掌旗官，

从事兵运工作，先后参加了神木手枪连兵变、定边任和亭团兵变。1932年入新十一旅，历任一团上尉副官、一团二营营长。起义后任一团一营营长、三边军分区军法处长、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50年转业地方，历任宁夏灵武农场场长，宁夏农垦局副局长、局长、农科院副院长、宁夏大学总务长，是宁夏农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0年后任宁夏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

⑥朱子春（1911～），米脂人。1926年至1928年在榆林六中上学，1929年在镇川当教师，由马明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派到新十一旅做兵运工作，历任文书、司务长、排长、一团六连连长，起义后任副团长。1949年银川解放时，任团政委，1953年转业后任中共银川市委书记，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任畜牧局局长。

塞上风云

——忆国民党新十一旅安边起义

☆ 贺晋年^①

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三城从西到东排列在长城脚下，是我北国古战场之一，历代兵家争夺之要地。蒙、回、汉族在这里杂居，因此又是三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这里地势开阔，天高云淡，辽阔的草滩上放牧着成群的马、牛、羊；每年都举行规模盛大的赛马会，就是抗战期间也未间断过。骆驼商队往来其间，驼铃声不绝于耳。1945年10月，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原国民党邓宝珊所部新十一旅在安边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起义，曾被毛主席诙谐地比做“火车头”。

新十一旅的前身是冯玉祥旧部苏雨生在蒋冯阎大战期间乘

* 本文选自定边县委党史办《三边风云》，是作者1983年2月回忆撰写，原载《革命回忆史料》第3期。

① 贺晋年（1910～2003），陕西安定（今子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当时任八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装甲兵副司令员。他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机拉起来的几个旅（七、八、九、十一旅）之一。当时，我党为了开展工作，派谢子长、刘志丹等到宁夏平罗一带活动。因此，苏雨生的部队中有我党的地下组织。刘志丹在八旅十六团任团副，谢子长在九旅当副旅长。大约是1930年春，谢、刘向陕北特委要干部。当时，刘澜涛担任陕北特委秘书长，便介绍绥德第四师范、榆林第六中学及地方上几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我党在八旅十五团办的学兵队学习。这些人毕业后有一部分就留在原部队中，更加强了我党的影响。以后杨虎诚、邓宝珊相继开驻甘肃，这些部队也跟着二易其主。新十一旅便是九旅发展演变来的。

从土地革命战争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中只有两边（定边、靖边）在我们控制之下，安边（国民党定边县政府所在地）和柠条梁（国民党靖边县政府所在地）一直在国民党手里，抗战时期，新十一旅旅部并一团驻安边城，二团驻柠条梁。我曾先后担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和八路军警三旅旅长，司令部驻定边。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巩固三边，西向宁夏，北向伊克昭盟发展，这样新十一旅便成了我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到1944年，该旅有我党不少党员（一团副团长牛化东，连、营长冯世光、李树林等），还争取了许多同情我党的军官和士兵（代旅长曹又参、参谋主任王子庄等）。由于我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攻势，新十一旅一直同我们实行联防，共同抗日，摩擦甚少。

另一方面，由于三边战略位置重要，胡宗南对新十一旅一直不放心，早想伺机把“杂牌”的新十一旅吞并掉。在该旅也有反动军官，参谋长石佩玖、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史钊城（二团

长)和我党叛徒张鼎丞(二团团副)等与之相呼应。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并且磨刀霍霍,把主力和远在东南亚的远征军运往东北和其他地区,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随着形势变化,我党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变化为:巩固发展我党和新十一旅的统战关系,保存力量,促进该旅进步势力,待机发动起义,统一三边。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新十一旅的起义,不仅是我党在三边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并且成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一个“火车头”,在西北和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起义的导火线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旅长病逝。第一团进步官兵坚决拥护团长曹又参任旅长;二团长史钊城垂涎旅长位置已久,又有吴棻(原旅政治处主任,后升任副旅长,也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石佩玖、张鼎丞帮他上蹿下跳,所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还是决定由曹又参代理旅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积极反共,为了加紧准备内战,将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接受改编为正规师,妄图吞并掉新十一旅,并预定史钊城担任整编后的师长。曹又参得知调防整编的消息后,亲自去榆林向邓宝珊请示。曹去榆后。新十一旅参谋长石佩玖、副旅长吴棻与二团反动骨干密谋,准备把二团从柠条梁调进安边城,以武力整掉第一团。10月15日,吴命令二团团副张鼎丞率领卫士10余人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官兵宣扬整编的所谓“好处”,同时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来瓦解一团的革命力量。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情势紧迫,

如不及时起义，一团革命力量即难保全，新十一旅的进步势力也会遭到摧残。因此，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到定边警三旅部来找我汇报情况，并请求援助起义。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准备调我去东北工作，正式命令未下达之前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向中央建议要求留我处理完新十一旅的问题后再去东北。

说起来我跟新十一旅还有点渊源呢。1930年4月，陕北特委派我随谢子长、刘志丹到宁夏王子元团的学兵队当兵，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搞兵运工作，于1930年9月以后在新十一旅曹又参特务营的四连当过排长。后来参加几次兵暴，都跟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的领导有关。抗日战争期间，我又跟新十一旅在三边搞联防。统战工作、党的工作都是通过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具体去做的，不论在新十一旅的上层还是基层中，我都有很多熟人。所以，局势变化了，要我留下继续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新十一旅的冯世光和王子庄来到定边，商谈有关起义事项，我们决定10月27日起义，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驻三边保安科科长葛申随冯世光、王子庄到安边去，名义上是警三旅的联络参谋，实则秘密地带进一部电台住在冯世光连里。

不几天，冯世光又于10月23日到定边向我汇报，说是由地下党员赵武臣连长处得知二团已决定于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的名义进驻安边整掉一团。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新十一旅提前于25日起义。我对冯世光说，届时将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领先头部队去安边，大部队随后就到，支援起义。

二、安边得解放

新十一旅旅部及驻安边一团的起义工作，虽然处在急迫的情势之下，由于有长期的工作基础，组织领导又比较周密，进行是很顺利的。从1945年春开始，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即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在一团办了两期排以上骨干军训班、训练班。军训班主任是王子庄，他那时尚未入党，但一直为党工作。第一期军训队长是李树林，第二期军训队长是冯世光，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这次训练，名义上是军训，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这些经过训练的骨干，为新十一旅反蒋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为了团结党外人士，促进新十一旅进步力量的发展，经三边分委研究同意，于1942年就在新十一旅成立了统战性质的群众性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在推动新十一旅上层人员参加起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决定新十一旅提前起义的指示下达后，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高昆山等，以及从我们这里派出的葛申，共同开会研究，由牛化东担任起义总指挥，并命令驻防白泥井的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要听从调动，同时将该营朱子春（地下党员）领导的第六连调进安边执行任务。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围攻旅部，扣押了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邮政局、税务局局长等人。同时，冯世光立即带人来到“万发店”。这是新十一旅过去头头们自己开的一家骡马大店，

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商人旅客。既是客店，又兼做生意，烟土、皮毛、布料、食盐等什么都有，满院子拴的骆驼、骡马、毛驴。这儿还是新十一旅某些有烟、赌嗜好的官儿们聚赌、抽大烟的地方，经常是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烟气腾腾，难得有几个清晨是安静的。

冯世光带人闯进张鼎丞住的那间大房子里，只见桌面上杯盘狼藉，隔夜的酒席尚未撤去。张鼎丞敞着领口，嘴里斜叼着一支香烟，满屋子里到处坐的是人，也有斜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除了张鼎丞带来的卫士外，其余的就是他想煽动跟他一起去整编的一团某些人。他们见冯世光带人进来，张鼎丞的卫士们霍地站起来，都想抄家伙，他们的盒子枪有的背在身上，有的挂在墙上。

冯世光大喊一声：“你们要干什么？”

张鼎丞以为自己胜利在握，便伸出一只手掌向下按了按，他的卫士们又都坐下了。张鼎丞不紧不慢地说：“你来的正好，你要是同意整编，跟我走准少不了你的好处……”

冯世光冷笑了一声“你当然有好处，可没有我们一丁点的好处！你别在这儿封官许愿了！”说着手一抬，顶上膛的手枪子弹就飞出去，结束了张鼎丞这个叛徒的可耻生命。跟着冯世光进去的人，同时用枪对着张鼎丞的卫士，冯世光沉着地向其余人宣布：“我们起义了！”

这一切情况，葛申通过电台报告给我，我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枪打得好！”——好就好在对起义持观望和犹豫态度的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我意识到，如果不抓紧部署力量，柠条梁离安边比定边离安边要近，二团要是抢了先，起义还有夭折的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张文舟按预定方案带领七团4个连，赶

快开进安边城。

参谋长张文舟带领4个连抵达砖井后（这儿离安边城还有50里路），马上给冯世光写了一封信，说支援起义的队伍快到城下，请作好准备。冯世光的队伍正好守在西城，张文舟队伍从西边来，当晚即开门迎进城内。因为动作神速，连牛化东总指挥事先都来不及通知，他听冯世光说警三旅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高兴地说：“赶快欢迎！赶快欢迎！”这时城内的起义军已经占领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并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张文舟带进去的4个连，分到城四周和起义军共同把守。城内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召开了起义部队和八路军的会师大会。新十一旅参谋主任王子庄代表该旅宣布武装起义，并作了攻打柠条梁二团的誓师动员。会上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宣读了支援起义声明。

至此，红旗插上了安边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解放了定边、靖边县城后，曾攻打过安边和柠条梁，因为该处城墙坚固，暗堡工事密布，没有拿下来。现在安边的新十一旅一团起义了，只剩下一个二团在柠条梁。打下柠条梁，“三边”就一片红了。

三、万事俱备

张文舟参谋长出发前，我们曾商定，必须攻打柠条梁，只有把顽固、反动的二团消灭掉，新十一旅起义的全部成果才能保住；否则，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由于柠条梁城外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所以该地易守不易攻。我们进安

边后，宜从速用兵，采取偷袭手段攻打柠条梁。不料此招没有成功，偷袭被敌人发觉。张文舟即拍电报给我，打与不打让我决定。我马上从定边赶到安边。

我到安边后，决定把警三旅八团的六个连从吴旗调来，布置在柠条梁南面；七团两个连（有两个连留在安边）攻打柠条梁的西门；九团和新十一旅一团的一个营从北面进攻。并将八团分成三个梯队从南面主攻，爆破手用炸药实施爆破，把城墙炸开后，突击队即用梯子登城，进城后向东发展。柠条梁只有两个城门（西门和东门），东门方向我没有部署部队，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有我们的一个骑兵大队，东南是陕甘宁边区，敌人若弃城而去，只能从西北绕道逃向榆林，我们的骑兵大队就正好在半路上消灭他们。开始，军委答应给我们两门三七战防炮，准备用骡马驮载运来，后未运到。敌人的团指挥所设在柠条梁西北城角的炮楼上，打起来要费点事。

10月底的陕北，气候已经变的寒冷了。我们三面进攻柠条梁的部队住在帐篷里，周围都是沙漠，西北风一刮，飞沙走石，到处昏天暗地，黑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们亲自动手，割来荒草，铺在帐篷里面的沙土地上，累了就躺在上面休息休息，饿了就吃点干粮。那时的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小米加步枪嘛，干部战士都一样；若是能喝上顿热小米粥，就算很不错了。

旅指挥所分设在八团的西侧和七团的南侧。从10月25日起义开始，到11月3日对柠条梁实施进攻，前后共准备了一个星期。我曾亲自带人到城墙根去摸地形。城上的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动静，有时一梭子机枪弹扫过来，有时扔下手榴弹，我们就隐蔽好，等它爆炸了再往前察看。摸清了地形情况，我思

考着拿下柠条梁的各种因素：过去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攻坚战难以奏效；就是现在装备比过去好多了，敌人也还是居高临下，很难接近。另一方面，新十一旅已经起义的人们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跟我们党和人民一条心的，但是也有少数军官对国民党的整编抱有幻想，想升官发财，同时对人民军队严格的纪律生活不习惯；对我们不发薪金，还要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也不很理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起义部队。柠条梁不攻克，反动的二团不消灭，地方恶霸地主的基础也不会动摇。这样一来，不仅一团和旅部不能巩固，还会引起其他变化。这是促使我下决心非打柠条梁不可的主要原因。

我翻来覆去地想着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作战方案便在头脑里逐渐形成：围着柠条梁城四周 50 米远挖一道堑壕，把地下挖上来的土，都朝城墙那面堆起来，给敌人造成视觉屏障；另外从斜方向再挖许多条交通壕与这条主堑壕相联。这样，我们的火力组织、人员运动和转移，就不受开阔地形的限制了。指战员们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在前面放个哨兵，后面的人就摆开干，每人分一段，两三个晚上，这个野外筑城工事就完工了。

1942 年到 1945 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展开了一个练兵运动，我们警三旅涌现出许多特等射手，有的战士能把手榴弹扔到五六十米甚至远达 70 多米。我把他们组织起来，站在堑壕里，只要城上的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射击，百发百中；有的从堑壕里就能把手榴弹投进城里去，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为了在总攻前更多地给敌人施加精神压力，从部署在旅指挥所前面（主要对准柠条梁的西南角）的迫击炮阵地抽调了两门炮，在柠条梁西门外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把炮

架在这里。迫击炮手在大练兵运动中，学会了红军时期赵章成创造的迫击炮直射法，几发炮弹就把西门楼轰开了个大缺口。

没想到我们使用的这几招，在总攻前果真收到了镇住敌人的效果。战后我从一个叫米积山的营长俘虏那里得知，当敌人看见我们把战壕挖成后，离城这么近，他们站在城墙上都傻了眼，精神防线被我们击溃了一半。米积山还对我说，因为过去他们了解警三旅没有战防炮，当西门楼被轰开一个大洞，敌人便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没有平射炮的消息不确切，他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了。

总之，经过一周的战前准备，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总攻命令了。

不过，这期间也曾发生两件事，完全可能动摇我们的进攻决心。其一，新十一旅一团起义后，曹又参日夜兼程从榆林赶回来。曹又参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驻地，因不了解起义的全部情况，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部队撤回定边，柠条梁的问题不用武力，让他去和平解决。当时，我没有时间去跟他讲道理了，我考虑的那些因素，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把他的来信压下，没有回他的信。其二，没料到总攻的前夜，中央军委从延安给我们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红军在1936年时打过柠条梁，该地易守不易攻，估计我们打不开，不如巩固安边以待时机。这是中央军委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打下柠条梁，安边是很难巩固的。我分析中央电报的精神，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攻打，只是担心我们打不下来。我军的作战传统，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定的可行条件下，一个指挥员应该有机断专行的胆识和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这个电报正好在下达总攻命令前收到，已是深夜了。我把张文舟请来，马上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再次检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野外筑城，改变了不利我军的地形，在火力配备上，虽然没有攻城直射火力，这两天用八二迫击炮组织对城内敌人的密集射击，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进攻时，集中几十门掷弹筒，再组织好特等射手和机枪火力，完全可以把敌人压住。大练兵中，战士们都掌握了一套白刃格斗的硬功夫，这一切都坚定了我们的决心。经过讨论，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不变。

下半夜了，我跟八团团长郭宝珊通了电话，我说：“你们的把握怎么样？伤亡可能大一点，要忍得住……”电话里传来郭宝珊坚定的声音：“请旅长放心，没问题！”“那好，拂晓前准备好！”

4点差5分，我又一次跟郭宝珊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问：“上不去怎么办？我把中央军委的电报都压下了。”郭宝珊一字一字咬着说：“打不进去，我拿头来见你！”

四、发起总攻

4点整，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从柠条梁南边城墙处传来。这时，影影绰绰只见这里那里闪动着火光，从望远镜里看不清整个战斗进展的情况，只听见响彻晨空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只看见强劲的西北风扬起的尘沙搅和着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一片混沌。

我的眼一直紧盯着手表，15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攻打

西门的七团副团长冯友才首先带人打进去了。但是，那里不是主攻方向，我只放了两个连没有后劲，突破口很难巩固住。电话向我报告，西门的敌人正在组织反扑，冯友才从敌人手里夺过大刀同战士们一起砍杀敌人。我说：“一定要他们顶住！南城的情况怎么样？”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因为是外部爆破，所以爆破效果不理想，云梯已搭上城墙，我们的掷弹筒和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我心里沉了一下，炸不塌城墙也是意料中的事，只要把敌人震慑住，能搭上梯子就行。不过这样就会增加登城部队的伤亡……正当我寻思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进攻南城的第一梯队已登城！”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了一句：“命令第二梯队赶快跟上！……”随即拿起望远镜向八团发起进攻的战壕走去。

这时，天已经放亮了。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看见城头上厮杀的情况。我们的战士用刺刀，敌人则用大刀。这场白刃战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八团的第一梯队杀进去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也跟着杀进去了。登城后主要靠的是白刃战。战后，八团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个战士在肉搏中，头上被敌人砍了11刀，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我们部队在大生产中自制的毡帽，挨了这么多刀，却只伤及皮肉，未触骨头，所以他能坚持拼倒好几个敌人，最后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柠条梁就是靠这样的英雄战士打进去的！

八团进城后，战斗按照预定的方案向东城发展。我和张文舟在城外沿着墙根往东走。太阳出来后，我们在东门被八团拿下的同时就进了城。通过望远镜，我发现西北角和北城的敌人还在抵抗，我们一直朝敌人的团部走去。

这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子弹在空中飞啸，迫击

炮、掷弹筒、手榴弹在四周轰响。我们尚未到达敌人团部，在攻进城内的七团、八团一部分，攻打北城的九团和起义军的一部分夹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被粉碎了。

我们加快了步伐。忽然，城上传来旅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的呼声：“史钊城在顽抗中被打死了！史钊城被打死了！”

……听完九团的营教导员李国秀关于北城战斗经过的汇报，我和张文舟相视一笑，就在占领后的敌人团部里给中央军委拟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在全体指战员作好充分准备后，经过激战，现已攻克柠条梁，特此报告。同时，写了一封回信给曹又参旅长送去。听说他看到信时，说了一句：“他真的打进去了！”原来曹又参不相信我们能攻下柠条梁，才想“和平”解决的。

五、回到延安

新十一旅总计官兵 3500 人。起义的有一团官兵 1500 人，旅部直属通信、骑兵、侦察、勤杂人员 500 余人，占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二。柠条梁战斗，除击毙二团团长沙钊城以下官兵 100 余人外，还俘虏米积山、慕寿山等官兵 800 余人，该团周效武营官兵 400 余人从堆子梁逃向榆林。

打下柠条梁后，曹又参还在白泥井，我们回到安边便派人去请他。第二天曹又参回信说马上就来。我们随即派队伍出西关列队欢迎，大家高呼口号，庆祝起义成功。起义部队旋即奉命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起义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参谋长，干部名单也都准备好了。改编后，部队仍驻安边、柠条梁一

带。

曹又参同志是陕北人，过去到北平上过大学，一直倾向革命。他当团长、代理旅长时，十分信任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等地下党员，重视他们的意见。每到斗争的紧急关头，都要找他们商量后才定决策。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和请示工作，西北局通过苏杰儒给了曹又参指示，还拨给他的部队30万元法币作为军饷补助金。他和王子庄对新十一旅的起义都有过重大的贡献。1948年8月，曹又参光荣入党，成为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

新十一旅起义后，我曾陪同曹又参到延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一路上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不停地抽着烟，很少说话。他是在回顾自己和新十一旅走过的曲折道路，还是瞻望着未来的前途，当时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见到他，听我介绍这就是曹又参时，毛主席笑着握住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特别是当他会见过续范亭（过去当过邓宝珊的参谋长），听续范亭说：“好嘛！革命就是像小河汇成大河、大海一样，你先走一步，邓宝珊也会来的！”曹又参心里觉得更坚定踏实了。

接着，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了曹又参；联访军贺龙司令员还特为他组织了欢迎晚会，阎揆要致欢迎词，会上演出了评剧《逼上梁山》。

在党中央礼堂里，我碰到刘少奇，他对我说：“我们发了电报，担心你们打不下柠条梁，又得罪榆林的邓宝珊，现在打下来了，好！原本不是不让你们打啊！”

新十一旅起义后，经过改编、整顿，成长很快。从该旅在起义一周年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的致敬电，以及新十一旅发表的起义周年宣言中，摘录两段，即可窥见一斑。

“去年今日敝旅响应你们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的口号，粉碎国特兼并阴谋举起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从此部队面目一新，士气大振，改革制度，实行民主，内部益臻巩固，力量更见强大，证明你们指引的方向之正确。兹值周年纪念日，敝旅官兵在热烈庆祝之际特向你们致敬，愿继续努力，永为人民尽忠，并愿以本部新生，昭告国人，劝海蒋军起义，并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反对蒋介石卖国的内战政策，共同努力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去岁日寇投降，方幸国势稳定，和平有望，民主可期，无奈蒋介石仍本一贯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内战，又策划兼并本旅为赢得内战之牺牲品，本旅迫于去年今日起义，深庆从此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共同努力。”

解放后，曹又参任宁夏专员，1970年病故。高昆山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参加组织起义的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李树林、高宜之、赵武臣等都还健在。我写这篇回忆录，是受大家的嘱托，为了纪念故人，也为了说明新十一旅当年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所有不愿为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当炮灰的人们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党长期工作的结果。

当中央红军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尚未传到陕北前，陕甘宁地区的革命虽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不过当时进行的学运、工运、兵运工作，也曾播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新十一旅起义，也是我们党的初期工作中，在兵运方面播下种子的一个收获吧！

十一旅起义亲历记

☆ 王子庄

1930年，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在宁夏平罗扩编队伍时，我就参加了该部石英秀的第九旅。该部后改为雷中田的第三旅，“九·一八”事变后，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直到1945年反内战起义，我的前半生和新十一旅息息相关。新十一旅起义时，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确是一个激进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工作，很多往事也是难忘怀的。

一、投笔从戎

1926年，我在榆林中学读书。当时国共合作，革命处于高潮阶段，我受学校共产党员和进步老师的影响，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捕杀共产党人，陕北也开始清党，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也因嫌疑不能继续在榆中读书，回到横山（当时我家还是米脂县属地，靠近横山县城）当了小学教员。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内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陕北特委也决定大抓武

装，乘当时苏雨生扩编队伍的机会，由谢子长联络，利用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是陕北人，和我党有过一些关系，大批派人进去，并通过办学兵队的办法，为我党培养一批军事干部。谢子长还担任了石英秀九旅的副旅长，刘志丹任八旅十六团的团副，张东蛟任王子元十五团的学兵队队长，高岗任副队长。陕北各县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学生和农民到兵营去扛枪杆子。当时民间议论，陕北青年“有精神的多是共产党，没有精神的多是大烟鬼”。因我在教学期间参与了筹办农民协会，并参加了控告劣绅等地方工作，有些劣绅说我是共产党。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在地方上已难以立足。幸好我的同学张东蛟、胡立亭、高岗、李树林等先后都去了苏雨生部，我在他们的影响下，1930年2月初，也离开家乡投奔石英秀的部队。

石英秀，又叫石子俊，是陕北靖边县人。原是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世秀骑兵旅二团一个连长，驻在柠条梁。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反对军阀井岳秀的“倒井”运动，谢子长领导的清涧兵暴，石英秀是支持的。他的连里就曾有过一些共产党人。后来石英秀投到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下，被收编为第九旅，驻宁夏平罗一带。1930年春，石英秀派郑得胜回到陕北招兵买马，招了100来人。返回平罗时，途经柠条梁遇到我，就要我到他连当文书，我同意了，即在郑连暂当文书。

有一次，连里给旅部写了报告，石英秀问是谁写的，郑得胜说是我写的。石英秀认为写得好，要我到旅部去，郑得胜说他不识字，要求把我留下，石英秀说：“这样的人才有大用，不能留在连里。”原来我在离开家乡时，横山县高小校长曹雨三就给石英秀写了一封推荐信。石英秀和曹雨三的关系很好，

到旅部后我才把信交给了石，石责怪我为什么早不给他。这样，我被任命为旅部书记处的司书。书记处还有个书记官李藩丞，司书李子栋和我共同负责办理石英秀的一些公文函件。

二、谢子长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当时，九旅旅部驻在平罗火神庙。有一天，石英秀旅长派人将我叫到他的住所后，见谢子长同石坐在一盘炕上，石对我说：“给浩如（谢的字）盖一些九旅的关防大印和旅长印章的空白公文纸。”这些盖有关防大印的公文纸可以作通行证用，也可以作委任状用。石英秀让我给盖上二三十张，谢子长对我说：“同志，多闹几张！”我就准备了五六十张。一会儿，谢子长亲自来到书记处，问我：“闹了多少？”我说：“有五六十张。”谢拿过关防大印自己就在纸上加盖，把剩下的白麻纸都盖完了，高兴地说：“大麻纸一张，就是革命的本钱。”

高岗让我去安边，回到新十一旅。不久，苏雨生部在开赴平凉接防时。途经固原受到黄得贵阻击，后撤到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又遭冶成章的袭击，伤亡惨重，遂石英秀部和谷莲舫、王子元部脱离苏雨生部，移防甘肃靖远，被驻兰州的雷中田编为新编第八师第三旅，我任旅部书记官。“九·一八”以后，杨虎城部进入甘肃，遂将三旅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此时我已升任旅部少校参谋，石英秀旅长的一切事务，仍较多地由我来承办。

我虽然当了少校参谋，但不太懂军事知识，困难诸多。1933年初，我主动要求到西安进了杨虎城办的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当年秋季毕业。回来以后，石英秀任命我为新十

一旅一团中校副团长。1935年石英秀病故，二团团长刘宝堂耍手腕从一团陈国宾团长手中夺走了旅长宝座。从此，陈、刘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陈国宾是个老粗，缺少计谋，但他人缘好，讲义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曹又参当时任一营营长，我是中校副团长，还有李树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来了牛化东，都成了陈国宾的左膀右臂。陈国宾对我的意见，真可谓言听计从，因为我知道我当时没有共产党嫌疑。1935年夏，一团调到兰州，部队由我负责训练，曾受到军部参谋长张性白的褒奖。人们都说一团有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随邓宝珊部开到陕北，一团驻防安边，二团驻柠条梁。刘宝堂为了拆散陈的势力，分裂一团，要我到二团当营长，陈国宾受骗，我被调二团。1940年春节刚过，我到二团一营去上任，还不到一周，二团少校团副张鼎丞就通知让我到柠条梁西门外一个旅店里去。到了那里，旅长刘宝堂、二团团长史钫城均已在座，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刘宝堂让把登记表拿出来，要我们填表，原来这是军统复兴社的登记表。刘宝堂和史钫城、张鼎丞等都是复兴社分子。我刚去，他们就要把我拉入复兴社组织。这些，我当即向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李树林都说知，冯说：“人家也要拉李树林入，入了也好，便于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一年，我到武汉蒋介石办的军官训练团受训，在西安和张鼎丞吵了一架，回来后半年没活动。张是我的单线联系人，我就问：“入了复兴社怎么活动？”张鼎丞说：“停止活动了。”实际上人家对我不放心，不让我参加活动了。

1941年，“安边事件”中，刘宝堂旅长被三边反动民团头

子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设计谋杀，二团团长史钊城想当旅长，鉴于陈国宾本人尚不反动，在驻防安边期间与三边八路军警三旅关系处得还不错，三边党组织有意争取让陈国宾当旅长。当时我正在榆林，牛化东给我去信，让我在邓宝珊处活动，后来又派李树林向邓宝珊做工作。我是通过榆林一位和邓有交情的绅士白伯英及总部一些朋友给邓做工作的。我秘告他们说：“论资格，陈国宾是新十一旅的老人手，石英秀病故后就该陈国宾当旅长，并且已经当了几夭，结果被刘宝堂耍手腕从陈的手里夺走了旅长职位，一团官兵一直愤愤不平。陈国宾为人忠厚讲义气，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复兴社分子，当了旅长对邓总司令一定忠贞不二。史钊城、张鼎丞都是复兴社小头目，又是山西人，早已和同乡董其武挂勾，想离邓归董。”邓宝珊是杂牌军，原来怕胡宗南把他消灭在甘肃而出来抗日，结果两个旅只带出一个新十一旅，另一个旅（第十旅）被胡宗南搞走了。由于这些原因，邓遂任命陈国宾继任了新十一旅旅长。我的活动被史钊城察觉，对我更加不满，告我通共。

1941年，我营四连驻榆林为邓宝珊守卫，该连连长魏长林，是史钊城的铁杆。他天天打麻将，输了钱，把连里士兵个人打毛线赚的钱也要去还债，不少士兵开了小差。邓知道后非常恼火，把我叫去，要我把魏长林的连长撤了。我让邓给团长说一声，邓生气的让马上就撤。这使我左右为难，总司令指示不办不行；办吧，团长不知道也不行。我就和营副吴善养（二团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商议，认为魏长林这个人很坏，是史钊城安在一营的一颗钉子，总司令说了，就照办，如果先和团长史钊城一说，他不同意就不好办了。我就集合队伍宣布让魏长林停职检查。史钊城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责问我：“一个

营长，怎么能随便把一个连长撤了?!”当场下了我和护兵的枪。当时，正是数九天气，很冷，我出来时未穿衣。史钊城下了我的枪，就到榆林金岗寺（邓的住地）告状去了，团部其他人都出去送，我趁便回营部穿大衣。快回到营部门口时，他们就追来了。我也很恼火，对营部哨兵下令：“追来就打!”他们不敢追了。本来我准备穿大衣再去的，我是执行邓宝珊总司令的命令，没有错误，但这样一来，就不能去了。史钊城告我造反，把我的营长给撤了。

邓宝珊听了史钊城的报告，也很生气，怪我为什么要跑，把我的枪、马都收了，调回总部。后来邓宝珊问我：“我去信让你暂缓执行，你怎么不听?”我说：“赶收到你的信时我已执行了，我也为难。他们下了我的枪，我不是跑，是回营部取大衣的。”邓这才消了气，对我说：“你的一切我负责，就在榆林住下，哪也不要去了。”给了个总部少校参谋的名义，实际上是我软禁在榆林城。在总部，我从未穿过一天军衣，也未上过一天班。

1942年初，史钊城借口吴善养家里有困难，让回地方上作点事，把二团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员也撵走了。吴善养临走时从三岔湾来榆林看我，说他到延安去找组织。

3个月后，吴善养又回到榆林，对我说：“麻子（高岗）说给你编个保安团，你干不干?”当时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员。我说：“不是干不干的问题。我凭什么当八路军的保安团长，我连一个人也没有，共产党再没人，也不缺我一个。你回去说一下，还是让我干点别的什么工作吧。”

不久延安又派徐子犹来到耳林川，也不敢进榆林城，捎话

要我去那里见面。耳林川离榆林 100 多里，人家不让我出去，没接上头。

1943 年 4、5 月间，吴善养又到榆林，告诉我，高岗让我赶快离开榆林到三边新十一旅去，并说高让他也赶快去。

这时，史钊城还在告我，诬陷我谋刺团长，要求军事法庭审判我。胡宗南致电邓宝珊，要邓将我解运上去，以便军法审判，幸好这时邓去重庆未归。邓宝珊总部参谋处长赵廉清，有点正义感，经常到我家吃荞面，对我较好。他说邓总司令就不该撤我的营长。我给赵廉清送了二两大烟土，赵说：“不要怕，电报还在我手里，史钊城告你，实际是在告邓总司令，你不必怕。”这才知道，人家还在告我。赵廉清让我不要怕，我倒不是怕邓宝珊抓我，是怕特务把我秘密抓走。同时，高岗已有让我去三边新十一旅的指示，我就以回家给父亲上坟烧纸为名，向赵处长请假离开榆林。

1943 年夏天，我回到安边，见到陈国宾旅长，陈说：“回来好。”牛化东、曹又参等人对陈国宾说：“子庄回来，旅长看怎么安排，得有个地方。”陈国宾就任命我为旅部参谋主任。

1944 年夏，高岗给我来了一封信，很长，信中告诫我：“再不能白了少年头，要干一番事业，现在正是时候。”高岗见了苏杰儒，听说我穷得不行，还托人给我捎来两包大烟土。1945 年春节，我在家门上写了一副对联，用了“不能白了少年头”的词，旅参谋长石佩玖看见了，说：“老兄心有大志”。这些人是很敏感的。实际上这时我确实已经开始作起义的准备工作了。

三、民主运动促进会及与特务的斗争

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特务、叛徒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安边，当时是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西北部三边地区的重要据点，是特务密集之地。有国民党、三青团、CC，还有复兴社。特务之间也相互倾轧，我们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和这些特务打交道，牛化东、冯世光他们不行，太红，我这个角色还可以，人家都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还加入过复兴社。

1944年春，我去榆林，CC特务谢永鹏带着电台、家眷准备去三边，他来找我，公开说他带着电台，问我住在哪方便一些，实际上他想到安边对我们进行控制。我想好了，你想控制我们，我还想利用你呢。就说：“你就住在安边吧，你的安全一切由我负责。”到了安边我就安置他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我把这些策略和想法告诉了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牛化东等，他们非常同意。在和谢永鹏聊天时，我有意问他：“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国民党，还参加入过复兴社。人家共产党不要我。我对国民党也看不惯。我是主张中间路线的。不信党，也不信共，谁的对赞成谁，主张民主。”谢说他赞成我的观点，也觉得国民党很腐败，自己也是混事而已，后来还把复兴社密告我们的情况透露给我。

1945年春，从西安又来了一个军统职业特务郝登阁。安置住到我开设的店里。我们经常聊天，他大骂西安大特务李犹龙，说他看透了国民党，三边地委保安处曾派葛申来安边了解郝的情况，郝登阁也去过定边。葛申了解后对郝说：“你要革

命，我们欢迎，但要等待。”葛还对我们说：“对郝登阁要再看看。”

为了准备起义，我们办了两期排以上军官训练班，我任班主任，冯世光任队长。对下级军官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还报请三边地委批准。成立一个“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宣传民主，广泛团结进步人士。为了迷惑敌人，民主运动促进会还选郝登阁当了主任，牛化东为副主任，我任组织部长，冯世光任秘书长，还让谢永鹏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排以上官佐都被吸收进来，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定边派来张景生，以同学的名义住在我家，帮助我们起草促进会的章程等，从事革命活动。

1945年10月起义时，我们先把谢永鹏、郝登阁扣了起来。郝登阁要见牛化东和我，问为什么扣他？我让人告诉他：“现在搞民主的行动开始了”。郝是绥德人，说：“搞民主，是我教给他们的，他们才搞民主，搞了民主倒把我先扣起来了。”起义后，我们把他和谢永鹏都送到定边转送延安，延安组织上给他们做了工作，建立了关系后，把他们放了。后来郝到旬邑当了国民党的县长，带了一个保安团起义了，真的革命了。谢永鹏释放后在榆林还为我们做了些工作。

四、点委受贿，为我说话

1945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派员来三边点验新十一旅，实际上是考察新十一旅一团是否赤化了。点委到了榆林后，听到特务们说安边不敢去，新十一旅一团已经赤化了。我们得知情况后，即令住榆林的同志就近欢迎点委来安边。点委

来安边时，我亲自到中途迎接。到安边后亲自招待并请点委到牛化东、冯世光等家里去玩，吸大烟等等。我故弄玄虚地向点委说：“你看牛、冯等像不像共产党？他们都吸大烟，瘾很大，而且都有很大家产，人称牛 10 万，冯 8 万。”点委说：“这哪是共产党？”我们还给点委送了钱和皮大衣等物品。后来西北长官公署给新十一旅拨发步枪 1000 余支，还有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9 月间接到一批步枪，其余正在运输途中，部队起义了，未能收到。由于点委回去的汇报，直到我们起义了两三天，榆林方面还不相信我们会起义。

五、贺晋年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命令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往包绥线上进行整编，企图清除新十一旅一团的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并预定由史钊城任整编后的师长。地下党组织和我们一分析，认为新十一旅一调走，一团就完了，新十一旅也完了。所以，我们积极向曹又参旅长建议，不走，逼得不行就起义。曹又参当时还有幻想，希望邓宝珊能顶住不调。于是就亲自去榆林找邓宝珊活动。结果邓也抗不住，没办法，非调不可。为了麻痹和迷惑我们，放出风说整编中一团军官都要安排，还说让牛化东任师参谋长。

与此同时，二团团副、复兴社分子张鼎丞亲自到安边进行活动，大肆宣传改编成正规的好处，拉拢下级军官。张对一团三连连长赵武臣说：“跟上走，你的前途由我负责。”赵武臣是地下党员，把张的活动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

10月20日，牛化东、冯世光和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应该立即起义，不能再坐失时机。遂议定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和我到定边，向驻定边部队警三旅贺晋年旅长汇报。

我以买布为名向旅参谋长石佩玖请了假，到定边后立即向贺晋年汇报了情况，说明非起义不行了，请求警三旅给予援助。贺即向三边地委汇报并向延安中央军委请示。

10月23日下午，贺晋年约冯世光和我到定边东门外边墙上，在一个看瓜棚子里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对起义的具体事宜又进行了一番研究。我说：“安边没问题，新十一旅自己就能解决，柠条梁非打不行，一团没力量，主要靠八路军了。”冯世光却说只要给他两个营，包打柠条梁。我认为他对二团史钊城的反动性、顽固性估计不足，就对贺晋年说，不要听世光胡吹。贺晋年最后说：“打柠条梁由我们负责，我们可调几个团支援你们。现在有了黄色炸药，一下就可以把城墙炸开。”当时，警三旅七团在盐池，八团远在吴旗，需要三四天才能赶来，遂定于10月27日起义，贺晋年旅长决定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带部队先到安边。

冯世光10月23日晚即赶回安边，我24日晚回去。回去后觉得很累，正准备休息，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赵武臣都在赵级三家，派人找我去。我已经躺下了，先后三次派人来找，说化东有要事研究。我去后，他们说得到消息，张鼎丞要走了，并散布说一团如不接受整编，二团便于28日以长途野营名义进驻安边，以武力解决一团。当即决定提前于10月25日起义，并决定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为指挥，我任副指挥。由冯世光派人到定边向贺晋年报告提前起义的情况。派高昆山到白泥井，带着我给一团二营柴明堂营长的亲笔信，调

二营朱子春连到安边，并告知柴有什么事听我的命令。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安边城门紧闭，不准出入。首先抓了新十一旅反动军官副旅长兼政治部主任吴棻、参谋长石佩玖，占据了邮政局，封锁了对外联系。谢永鹏是我扣的，郝登阁也扣了。张鼎丞是冯世光到万发店抓的，因张拒捕，被当场击毙。当时还没有公开宣布起义，说是搞独立，搞民主。

10月25日晚，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率警三旅七团部分部队赶到安边。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北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旅部一团、警三旅七团、八团和安边市民参加了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也出席了大会。由我正式宣布反内战武装起义，并下达了攻打柠条梁、武力解决二团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代表警三旅宣读了贺信，表示欢迎起义，支援起义。

堆子梁驻二团周效武营的两个连，一团派李树林带部队去包围时，已经跑掉了。柠条梁史钊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积极部署顽抗。当时寨内有七个连的兵力，寨堡比较坚固，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易守难攻。

10月28日，攻打柠条梁的战斗打响了。11月1日，贺晋年旅长亲临指挥，发起强攻。11月3日拂晓攻克了柠条梁，击毙了史钊城，俘虏了慕寿山等800余人。打下了柠条梁，整个三边“一片红”了。

六、曹又参说：“起义，对对的，前途光明”

安边起义后，由于我们控制了邮政局，封锁了消息，两三天后，榆林方面才听到安边出事了。但传说不一，有的说一团

“红了”，有的说是一、二团闹矛盾。榆林也闹不清楚。曹又参旅长这时还在榆林，他心里有数，就趁机向总部说他赶快回去看看，出了榆林城，他怕人家追他，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回到白泥井。

曹又参青年时代在北京上平民大学时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组织上曾经让他参加共产党，他没有参加。这个人思想进步，但小心谨慎。他曾经对我说，斗争这么尖锐，参加不到头，还不如不参加，在党外照样可以做些工作，能做多少是多少。在北京上学时，假期曾到包绥散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当了一辈子兵，从来没放过一枪。就是有个嗜好，爱吸口大烟。1926年春，他出任国民党靖边县县佐（驻柠条梁）。当时，石英秀骑兵连驻柠条梁，二人关系甚密。石英秀被苏雨生扩编为第九旅，曹又参就任该旅参谋长。苏雨生失败，八、九两旅相当一部分官兵逃回陕北，石英秀、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率两旅的部分人到甘肃靖远，被兰州雷中田收编为新编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1935年秋，曹又参改任一团一营营长。1941年，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被张廷芝弟兄谋杀，陈国宾任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1944年陈国宾病故，曹又参任代旅长兼一团团长。

由于曹又参思想进步，对牛化东、冯世光等地下党的同志一贯信任，每到斗争紧要关头，都找牛化东等商量。1932年，高鹏飞领导的陇东西华池起义，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这次起义是杨林、苏杰儒两人周密策划的。起义前后，慕寿山在曹又参面前竭力攻击地下党员，说：“李友竹（李树林）、冯世光是危险分子，应早处理。”石英秀也知道这一情况，问曹又参，曹说：“我相信李、冯即便是共产党员，也绝不会危害新十一

旅。”石英秀从而再未追究此事。1938年，新十一旅移防榆林，刘宝堂、史钊城、张鼎丞及叛徒任怀义，密告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等9人是共党分子，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曾电告邓宝珊，令将牛化东严解西安。在曹又参支持帮助下，劝说一团团长陈国宾向邓宝珊活动，担保牛等没问题，使一团地下党组织未受损失。新十一旅二团由于刘宝堂、史钊城等复兴社特务严密控制，地下党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丞出卖瓦解，最后只剩下个别党员，发挥不了作用。而一团由于曹又参的保护，牛化东任一团副团长，3个营长中李树林是地下党员，13个连长中11个是地下党员，一团基本上为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

原来曹又参早就和谢子长有过接触。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请示工作，西北局还拨给他30万元法币的补助费。

曹又参从榆林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柴明堂处，闭门不出。他不是反对起义，而是不了解安边发生的新情况，认为我们没等他从榆林回来就发动起义，是牛化东和我把他甩了，面子上下不来，打下柠条梁后，贺晋年旅长让我去请他，延安要求务必把曹又参请回来，领导起义。

这时，榆林也派出部队来支援柠条梁，已到了昭皇。我们怕榆林把他劫持走了，我带了二营六连和赵级三营的三个连，连夜赶到白泥井东堂。东堂距白泥井寨子还有十里地，我派人送信求见曹旅长。曹传出话来让我一个人进去，不让带兵，我也不敢进去。白泥井寨子很坚固，旅长在里面，我们是来请他的，又不能攻打，一时处于僵持之中。

那天中午，正在吃饭，突然阴云密布，骤雨大降。

我令部队紧急集合，冒雨开进了白泥井寨子。我令二营六

连朱子春（地下党员）连长带队走在前边，到寨门口哨兵拦住不让进寨，朱子春骂道：“妈的×，瞎眼了，我们是六连，回防来了，进！”哨兵也认得朱连长。六连进寨后立即上了寨墙，控制了寨子。我到二营营部，柴明堂派人报告了曹旅长，曹让我去他的住处，我冒雨跑了十来里，想稍事休息，吸口大烟，喘口气再去。曹旅长迫不及待，亲自来到营部，上了炕问我：“子庄，这是咋回事？”我说：“起义了。邓宝珊也不能顶住调防，不起义咋办？！不都完了。”然后我详细汇报了他走后安边发生的新情况及不得不立即起义的原因。曹又参听后这才说：“对对的，前途光明。”同意回安边，带头起义。

我立即派人给贺晋年旅长送信，贺旅长派军政及地方民众代表到白泥井欢迎，曹又参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安边。然后由贺晋年旅长陪同到了延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毛主席在枣园小礼堂接见了她，毛主席听了贺晋年的介绍后，笑着握住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

新十一旅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第一个信号。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十一旅起义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火车头。”在解放战争中，后来陆续有国民党的成百名将军率部起义，其影响和意义不容忽视。

新十一旅起义后，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被任命为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我任参谋长。起义后，我就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伪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 及三边起义*

☆ 慕寿山 石佩玖

伪新十一旅原是由三边的失意军人和一些地主、土豪组合的。起先归驻宁夏的苏雨生骑兵第二军，后由马鸿宾推荐给甘肃，为雷中田的第八师收编。1932年3月，邓宝珊入甘主持伪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后，新十一旅改归邓指挥。1939年邓改任伪新编第一军军长时，该旅即编入新一军编制。1935年以前，旅长一直是石英秀，以后由刘宝堂升任旅长。1941年秋，刘宝堂被张廷祥杀害后，陈国宾升任旅长。1944年春陈死后由曹汉杰（又参）升任旅长。兹就该旅1935年夏及1936年秋在甘肃与长征红军接触，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开赴三边又与陕北红军联防及1945年10月由曹汉杰率领在三边起义的经过，加以叙述。由于事隔日久，我俩水平不高，难免有不符合实际或与事实出入之处，请熟知者加以订正。

* 本文原载《甘肃文史资料》第五辑（1965年10月出版）

一、在甘肃中部参加反共战争

（一）第一次与红军接触经过

1935年夏，红军徐海东部由川陕边区向陕北推进。朱绍良把新十一旅布置在静（宁）、会（宁）、庄（浪）、隆（德）四个县，命令上说：“被国军‘包剿’漏网‘残匪’徐海东部，由甘南向陕北逃窜，将路过该旅防区，着该旅迎头截击，务要歼灭残余股匪，如有漏网，唯该旅是问。”但执行命令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当时追击红军的伪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伪第一师胡宗南部均距红军很远，驻陇西、临洮的伪第三军曾万钟部按兵不动，唯有驻蒿店、三关口一带的马鸿宾部出击，却被红军击溃，一直追到平凉城下。新十一旅虽有枪一千多支，均系老套筒、八二式和自造步枪，弹药缺乏，不堪作战，便把部队集结在隆德、静宁、会宁三县城，闭门自守，不敢出击，红军亦未攻城，仅在静宁城外五里地区驻了一夜，陆续由单家集北去。隆德方面曾在城外接触一次，当时十一旅的官兵还没有听说过轻机枪的响声，骑兵连长石子杰，一听机关枪声，就吓糊涂了，一口气跑回静宁说：“红军真利害，不知打的啥枪，和母鸡下蛋一样呱呱的叫。”事后朱绍良也未追究新十一旅的畏战责任，却派伪新一军参谋主任李平之为督导，命该旅在静宁、庄浪一线的威戎镇、屏峰镇、三合镇、水洛城、莲花城建筑碉堡直到秦安，以防第二次中央红军的过境。

（二）第二次与中央红军的接触情况

1936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会师甘肃会宁前，朱绍良把伪

新一军所属两个旅和一个骑兵营，配备在定西一带。军队的部署是：新十旅第一团在定西，第二团在靖远，新十一旅的第一团（缺第一营）在岷口，旅部和第二团（包括一团一营）在定西以及以东清凉山、西巩驿、会宁县城一线。当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会宁县城时，驻在城内的新十一旅二团的两个连正在上晨操，连长还在睡觉，即被红军包围缴械，连长安子谦、原镇藩被俘后，红军以军乐队欢送出城，过去的伪政工人员“红军捉住军官非杀不可”的欺骗宣传，被红军的这个措施揭穿了。

朱绍良接到会宁失守消息后，大为震怒，立即电令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迅即率部收复会宁县城，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同时派邓宝珊亲往定西督师，刘不得已，即率部进攻会宁县城，部队到达会宁县城时，正值中午十二点左右，远看城上并无红军动静，问附近老百姓亦不悉情况。兵临城下后，一团中校团副张锡轩以望远镜观察城头，被城上红军击毙，并伤了一名传令兵。刘宝堂即令将会宁县城包围，战斗到夜十二点，突接邓军长由定西送来朱绍良的电令说：“红军会师会宁，大军正向会宁推进中，希该旅立即撤到定西清凉山。”这个命令的来历，战后据邓对人说：“朱绍良要牺牲十一旅，我在电话上建议：这样大的战事，牺牲一个旅有什么价值，还是撤下来吧。”朱遂下了命令，以飞机投掷在伪新十一旅一团团部，才转送到十一旅。撤退中部队非常混乱，赶天明跑了六十华里，到达西巩驿。刚休息做饭，又接飞机投下命令：“立刻撤上清凉山。”部队连饭都未顾上吃，出村时附近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在飞机掩护下才撤上山头。及至退守定西东山，又与红军掩护侧翼部队形成对峙状态，双方不时开枪射击，一直相持到七月上旬，红军分向陕北和河西出发时，又令新十一旅分两

路追击，但均未接触，一直跟进，一路把中央红军徐向前部送到靖远过黄河为止；一路把中央红军送到了陕甘边境。在这一战役中，新十一旅官兵没有看见过伪中央军的部队，直到返防静宁，才见到了胡宗南的一部分队伍，自称是由松潘、茂州追击红军到此的，每兵还给了一百元的犒赏费，纪律非常坏，砸窑子、打商店、赌博强奸，无所不为，当地民众叹息说：“中央军比十一旅还坏。”

二、抗战期间开赴三边与红军联防及分化起义情况

新十一旅在“内战”的岁月里，幸运地逃出了蒋介石的“剿灭赤匪”与“消灭杂牌部队”双管齐下的魔爪，它的部队素质也得到了提高，原来不太称职的干部，大部分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一些军官和淳厚的甘肃农民士兵，纪律性和战斗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七七”事变后同仇敌忾，争先请缨抗战，在1937年9月被编入伪二十一军团战斗序列，得到“开赴陕北，堵击晋、绥西侵日寇”的命令，官兵欢喜若狂，立即作为军团的前卫，星夜开到了陕北三边的安边堡和柠条梁一带，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原地停止待命”的电令，就在这个地区停滞了八年，经历了残酷的“友军”火并和内部分化，终于归向了人民。

（一）新十一旅到三边后和陕北红军的关系

陕北红军的领导人贺晋年等1930年曾在新十一旅呆过一个时期，离开时还带走了一部分人枪。彼时旅长石英秀和营长曹汉杰等是痛恨他们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石英秀死后，第二团团长刘宝堂当了旅长，他是陕北靖边人（应为保

安，今志丹县人——编者），为人正直忠厚，有正义感，也有浓厚的封建地方思想，所以他到了三边，受到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号召，决心与红军团结抗战，这是其进步的一面；同时却帮助三边土匪张廷芝弟兄，幻想共成大事，终于遭到了张氏弟兄的杀害。当新十一旅由甘肃向陕北开拔时，是经过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华池、保安、靖边等地到达三边的。沿途边区的军民，处处供粮供草，欢迎欢送，该旅官兵颇受感动，每到一处，架起枪支，吃饭宿营，毫不戒备，当时有人提出“要防范着些！”刘宝堂笑着说：“现在团结抗战了，我们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几条烂枪，他们想要就拿去，不想要咱们还扛着，不要鬼里鬼气的。”新十一旅初到三边时，红二十九军军长贺晋年和骑兵司令部均驻柠条梁、定边一带，新十一旅便和红军驻在一起，常在一起开大会，彼此互相拉歌子，空气极为融洽。只在开会挂像上彼此互有意见，红军不同意挂蒋介石的像，新十一旅不同意挂毛主席的像，经双方协商后，每开大会，便只挂孙中山的像。这样在一起住了三个多月，消除了昔日的隔阂，结下了新的友谊。

（二）抗战初期的陕北形势和新十一旅的布防情况

伪二十一军团长邓宝珊到达榆林之后，太原和包头相继沦陷，察哈尔和绥远省退下来的地方军队，大部分流亡在榆林地区。伊克昭盟的达拉旗、郡王旗的王公被德王勾去，投降了日寇；日寇还在杭锦旗的阿拉庙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接近榆林的札萨克旗的沙王，是伊克昭盟的盟长，此时动荡不定，莫知所从。邓宝珊便一面安抚流亡部队，一面把刘宝堂的旅部和第二团调入榆林，以一个营住在札萨克旗附近的十八尔台，以资保护和监视沙王。另派新十一旅的一个骑兵连配合定边的蒋云

台旅摧毁了阿拉庙的日寇特务机关，陕北局势遂安定下来。1938年春日寇扫荡晋西北的偏关、五寨、神池、河曲、保德及陕北府谷等县，榆林告急，邓宝珊遂将驻安边的新十一旅第一团也调到榆林，不久日寇撤退，榆林又趋稳定。但驻定边的伪一百六十五师的蒋云台旅被胡匪宗南撤回甘肃整编，三边防务又告空虚，伊南的乌审、杭锦两旗，亦呈现不安，邓遂把新十一旅的第二团的团部和一营留驻榆林，二营仍驻十八尔台，其余全部又开回三边，伊南也安定下来。新十一旅和红军相处友善，没有摩擦。以后伪一百六十五师和新十旅都被胡匪宗南整掉，惟新十一旅因远在三边幸免了。但新十一旅和红军的友好关系，在蒋匪看来，则是勾结红军危害国家民族，因此就暗中指使三边土匪张廷芝弟兄下了毒手。

（三）张廷芝弟兄火拼新十一旅的前因后果

靖边县（回忆有误，应为吴旗县——编者）的恶霸地主张兰亭、张玉亭弟兄和两个儿子张廷芝、张廷祥，远在民国初年，就组织团队，为害一方，剥削压榨，奸淫虏掠，极为残酷。陕北红军刘志丹闹革命时期，张家便是最凶恶的地头蛇，勾结上井岳秀的部队，到处捕杀革命群众，当时张廷芝自称为“黑军”，流窜在三边一带。1936年冬，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张匪被红军消灭殆尽，其残部退守安边堡，“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停止了战斗，张匪便逃脱了红军的巨掌。“七七”事变发生，张匪又复活起来，并且还被当时察哈尔游击军总司令张励生收编为第二路司令。于是张廷芝大肆扩充，收编流氓地痞六百余人，驻扎安边附近的堆子梁。张廷祥被陕西保安处收编为保十三团，有三个中队约三百余人，驻在安边城内，他们弟兄是以反共起家的，此次复活，便在反共上大用功夫。

先是新十一旅调驻榆林后，安边和柠条梁的防务由张廷祥接替。刘旅长驻榆林时，曾派连长慕寿山把存放在兰州的大烟八千多两带回陕北，经过柠条梁时，被张廷祥将烟土扣去三千多两，并借此向西安保安处电报，企图一下子把刘宝堂搞掉。但刘向上陈述此案时，以红区老家烟土，恐被红军搜去，才派人取来途中被扣云云。张廷祥的毒计没有得逞，又耍了一套恶毒的手段。时靖边县龙州堡附近有个阎家洼寨子，驻着张廷祥的匪徒三、四十人，张廷祥再三请刘旅长派队护送粮食接济，刘始终未允。1940年秋，伪军委会西安办公厅电令新十一旅“协助保十三团给阎家洼寨子守军送粮。”刘接电后，即电邓宝珊说：“阎家洼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边区，距我防地一五〇华里，在我无足轻重，为了避免摩擦，团结抗战，最好撤退。但熊主任（斌）来电，命我旅协助保十三团护送粮食，如果出兵送粮，势必引起战事，如不送粮，则又违抗命令，究应如何处理，请电示遵。”邓复刘说：“已转请熊主任核夺，可暂缓送。”电后一月有余，未见熊的复示，但阎家洼寨子已经失守了。这便给刘坐上了通共的罪名，伪陕西保安处密令张廷祥对新十一旅进行火拼。刘旅长还闷在鼓里，他为结好张氏弟兄，除以武器械弹帮助外，还把张廷芝的姑娘和自己的儿子刘汉订了婚约。1941年9月4日，张氏弟兄发动了火拼新十一旅的战斗，驻桃力民的伪二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派了姓魏的高参去安边点验张匪部队，张廷芝在点验的借口下进了安边城，还向新十一旅借去军衣五百套，手榴弹五百颗，子弹两千发。是日下午三时，张氏弟兄以欢宴点委为名，把新十一旅连长以上军官请去作陪。在筵席的安排上：刘旅长、魏高参、陈国宾、曹汉杰、定边伪县长徐绍林、伪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

寿昌等在张廷祥的保安团团部；其余连长等人在张廷芝驻的万发店。席间张廷祥击毙了刘宝堂，张廷芝扣押了赴宴的新十一旅军官。随即派队分头攻打安边的新十一旅部队。当时该旅在安边只有五个连，排以下官兵起而抵抗，相持了半天一夜，次晨讲好条件，释放了被扣的营连长，撤出安边，移驻白泥井。适第一团少校团副牛化东因事在定边，闻讯后与红军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商妥，派兵在安边城外边墙下埋伏，暗中协助。又秘密联系好安边城内保十三团夏品三、杜廷之两个中队为内应，由曹汉杰、牛化东为指挥官，率领新十一旅部队攻克了安边城，歼灭了保十三团，张玉亭被击毙，其子张廷祥被虏获后活祭了刘灵。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由堆子梁突围，带三十余人逃到波罗，被伪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窝藏，后来脱逃到包头投降日伪，当了汉奸，日寇投降后，跑到宁夏，后为马鸿逵所利用，又在三边解放战争中扰乱了几天。

这次战斗结果，新十一旅在红军的帮助下，给三边人民拔掉了一个为害六十年的祸根。可是蒋匪帮以未曾消灭新十一旅为大恨，接着又来了一个“换防整训”，把驻桃力民的伪二十七师换防三边，新十一旅调往桃力民整训。新十一旅奉命后，所有军官均恐慌万分，莫知所措，可是延安方面看出这是蒋帮调何文鼎部向边区进攻的阴谋，便派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进驻张家畔附近的毛团窟窿，把新十一旅所驻的小桥畔、堆子梁、白泥井等据点包围，声言先消灭十一旅，再迎击何文鼎。夜夜对以上据点进行佯攻，新十一旅便天天向上告急，相持了半月有余，终于迫使蒋匪帮收回了“换防整训”命令。最后邓宝珊派其副参谋长于建旗作了连络，和王震、贺晋年一同到了安边，相见之下，彼此紧紧地握着手，会心地笑了。

（四）新十一旅的分化

刘宝堂死后，第一团团长陈国宾升任旅长，一营营长曹汉杰升任团长，邓宝珊派伪总部参谋石佩玖为旅参谋长。第二团团长史钊城部因追剿张廷芝匪众，也率该团第二营到了三边，驻在柠条梁。从此特务云集三边，进行分化，终使新十一旅内部分裂。旅部和第一团是一个局面：陈国宾出身寒微，当时已经六十一岁了，极想给自己儿孙搞些家私，但其子陈俊士却极不成材，挥霍无度。其妾生子甚幼，陈为给幼子敛些财产，在安边开了一座宝源店，专做贩卖大烟和投机生意，经常派队保出保入。该旅一部分中下级军官，系三边人，也想乘机打捞一把，为将来退伍地步，上下机契相投，便大量走私贩毒。其中有些人因经商关系，和驻在定边的红军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挂上勾，但这些人并不是有了觉悟，想弃暗投明，而是为了自己发财。团长曹汉杰则另是一种局面：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看风转舵，既要交好于定边，也不愿脱离邓宝珊，以维持现状，徐图发展为主，因而对各方面都使用应付和拉拢手段。第二团团长史钊城和陈、曹又不相同：他是山西河津人，伪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其团副张鼎丞山西介休人，是胡匪宗南在天水所办的军训班毕业。这两人受蒋帮毒化教育很深，因而是一对坚决反共的人物。当时军统特务尤在中、伪八战区的情报参谋秦光南、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吴棻，还有傅作义派驻该团的徐高参（带有电台）等，这一伙都是鼓励史钊城忠诚防共，并认为曹汉杰勾结共军，加以防范。因此，史在柠条梁筑了一个城寨，城墙下和街道中设有暗碉，以作防共据点。在防区乡村内设有“秘密监视哨”，在连队中设有“秘密防共小组”，这些人都由他自己掌握，营、连长都不知道。连内拉一个兵或来一个人，

第二天团长就会叫去谈话，因此共产党的活动很难深入。至于参谋长石佩玖，是邓宝珊派去的，当然一切按邓的意旨。他各方面都对付，但因邓、石都是甘肃人的关系，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甘肃籍的，都暗中拥护他，因此石佩玖在当时新十一旅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1944年春，陈国宾病故了，史钊城和曹汉杰二人争旅长，当时参谋长石佩玖在榆林，旅部参谋主任王子庄便封锁了关防。一、二两团互不往来，二团迫炮连连长慕寿山是史钊城的亲信，他原在一团当过连长、副营长，与一团团长曹汉杰也相好，他遂来往于史、曹之间，为之说合。邓宝珊也派副官处长彭玺到三边调解，当时邓因曹汉杰在三边与红军相处友善，便任命曹为代旅长。史钊城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和一团不相往来，还是慕寿山从中拉拢，曹汉杰去了柠条梁一次，才慢慢地言归于好了。

（五）新十一旅的三边起义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不久，伪中央发布了一道命令，叫新十一旅开赴包绥接收。这个命令在新十一旅引起了两种反映：第二团团团长史钊城原是一个反共健将，当然毫无顾虑，他又和傅作义、董其武等都是同乡，董还和他有同学关系，过去曾有徐高参的连系，认为开到包绥前途无量，因而积极准备开拔。相反的第一团却忙了手脚，认为过去有通共的罪名，势难赦免，开出去必然会被按图索骥，进入罗网。同时大部分营、连长，都借有伪兵站支部安边仓库的购粮款作生意，因为胜利炮响，物价暴跌，谁也还不上此项债款，一有移动，此事如何了结。于是代旅长曹汉杰赴榆林见邓，请示办法。可是牛化东、王子庄、冯世光等迫不及待，惟恐旅长回来发生意外，便

和驻定边的警三旅旅长贺晋年说好，于同年十月十一日（原文如此，与牛化东等回忆有误——编者）清晨，开放了安边西门，迎接贺晋年部队进城，同时扣押了参谋长石佩玖、政治部主任吴棻和伪县长、书记长等人。并将安边的二团团副张鼎丞击毙在万发店，第二天派兵攻打柠条梁。当时柠条梁驻有二团团部和迫炮连、旅部一个骑兵连、第三营全部和二营的一个连，共计七个连，于19日拂晓攻入城内，巷战至下午，才击毙了史钊城。驻城外三官庙的张梯青连和驻堆子梁的周效武营均逃往榆林。曹旅长闻讯后，即由榆林赶到白泥井，驻在该团二营，给贺旅长写了一封信，请他立即停止进攻柠条梁，由他负责和平解决。但信到之日，柠条梁已攻下了，曹旅长便处在两难之中。后来贺晋年亲到白泥井与曹会晤，商妥新十一旅起义办法，乃由贺陪同曹汉杰到了延安，发出新十一旅起义的通电，归向人民。

对《伪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及三边起义》一文的几点订正*

☆ 李树林 冯世光 王子庄

我们读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65年10月出版）所载慕寿山、石佩玖写的《伪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及三边起义》一文以后，认为其中有些地方与历史事实不符，特做以下订正。

一、原文说：“伪新十一旅原是由三边的失意军人和一些地主、土豪组成的。”这与事实不符。据我们所知，新十一旅初成立时，为了买枪买马，曾利用个别地主分子当过几个月的名义团长，其他先后担任过旅长的石英秀、陈国宾、刘宝堂，都是农民出身，原在井岳秀部任过连长，后来到了十一旅，在下级军官中，除一部分行伍出身外，多系青年学生。

二、原文说：“刘（宝堂）为人正直忠厚，有正义感……受了中共统战的号召。决心与红军团结抗战。这是进步的一面。”又说：“蒋匪帮便给刘坐上了通共的罪名，……暗中指使三边土匪张廷芝弟兄下了毒手”等等，均与事实不符。据我们所知，刘宝堂及其亲信的二团团团长史钊城、副团长张鼎丞，

* 本文原载《甘肃文史资料》第八辑。

都是复兴社分子，并分别担任旅团复兴社的头子，在旅部和二团均有特务分子活动。从政治态度上看，刘宝堂的反共立场非常明显。绝无所谓“受了中共统战号召，决心与红军团结抗战”的所谓进步的一面，所谓张廷芝弟兄与刘宝堂的火拼，是因为他们积有私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而决非由于刘宝堂有什么进步表现。

三、关于该部起义问题。原文说：“该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系三边人，也想乘机大捞一把，为将来退伍地步，上下机契相投，便大量走私贩毒。其中有些人因经商关系，和驻在定边的红军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挂上勾。但这些人不是有了觉悟，弃暗投明，而是为了自己发财。”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新十一旅从1930年起，就成立了党的地下支部组织，以后十多年中，党组织继续发展，党员人数逐渐增加，先后在党的陕北特委、陕北红军、延安保安处直接领导下，在谢子长、杨林、贺晋年、王世泰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才举行了“靖远兵暴”、“西华池起义”和“三边起义”。其次，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在十多年的工作和多次的起义中，许多同志奋不顾身，完成任务，为革命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如张东蛟、吕振华、史梧亭、郝新亚、崔仰亭、李培青等，不下数十人。这是铁一般的实事。决非所谓“乘机捞一把”或“为自己发财”。至于新十一旅起义与贺晋年同志的关系，是革命工作的关系。并非所谓因“经商”才“挂上勾”的。贺晋年同志自十一旅建立时起，即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打入该部做兵运工作。以后又组织了“兰州水北门兵变”。在兵变取得胜利后，参加了西原义勇军任大队长。失败后回到陕北红军，直至1945年他任陕北红军警三旅旅长时，与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并进行了正确的指导。

四、关于1940年给阎家寨子反共据点送粮问题。文中说“邓宝珊电刘宝堂：‘已转请主任（熊斌）核夺，可暂缓送。’电后一月有余，未见熊的复示。但阎家寨子已经失守了。这便给刘坐了通共的罪名。”亦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刘宝堂命令李树林（新十一旅一团三营营长，中共党员）派了两个连与张廷祥（伪保安十三团团团长）的队伍一道，将粮送至阎家寨子。在送粮以前，地下党组织要李给八路军预先通知。所以李树林便以没有团部命令为词，争取时间。并说服了伪县长张鹤亭以李、张两人名义给八路军保安团送了信（信由八路军柴福俊营长送给了高维嵩团长）。三天后，新十一旅一团副团长万兆春带来了团长命令，李树林及营附常佩亭带两个连的兵力，随张廷祥父子将粮送到了阎家寨子，送粮部队在回程中，张廷祥父亲张玉亭偷袭了八路军张家畔驻防的保安团，柴福俊营长中弹牺牲，给八路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原文中说没有送粮并说刘宝堂因此被坐上通共罪名，加以杀害，并非事实，应予澄清。

五、文中对于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的记述也有失实的地方，订正如下：

1935年红军徐海东部向陕北推进，路过静宁、隆德县城附近时，新十一旅部和二团虽然住在静宁一带，但却闭门未出，所以不能说是参加了反共战争。1936年9月，中央红军北上，在会宁会师前，新十一旅二团驻会宁的两个连被红军先头部队包围缴械，并将两个连被俘军官，以军乐队礼送出城。以后，国民党政府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命令刘宝堂亲自率领二团收复会宁，遭到惨败，遂又将一团调来增援。但一团地下党同志因事先得到党的指示，佯作应付，并未实战。在西

山与碉堡里的红军相峙几个钟头，队伍受了红军团结抗日的宣传后，于晚间撤退。随后，刘宝堂及二团团长史钊城、团附张鼎丞等，为了向蒋介石国民党邀功讨赏，表现非常积极，由定西出发，随伪中央军尾追红军至陕北。一团则奉命在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等部后面，跟进至靖远附近，始终未与红军正式战斗过。

安边事变追忆

☆ 刘丰林^①

十一旅旅长石子俊死后，本来应由一团团长陈国宾接任。鉴于陈是位大老粗，年纪又比较大，于是由年富力强较有作为的二团团长刘宝堂充任。

抗战初期，随邓宝珊调陕北，进驻三边，刘力图攀附中央系，准备整编部队。首先得换掉尾大不掉的陈国宾。1940年秋末，有一次陈在我们家对我父亲说：“当初旅长轮我当着咧。咱心盘算你（指刘）年轻，又认得几个字，让给你。如今不想要我，为啥不直说？打发个婆姨对我老婆说：大哥老了，该休息了，到总部当个少将参议比较合适。……我走兰州见朱长官去来……”

陈走后不久，驻安边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发动兵变，准备劫持旅长，刘宝堂仓慌出逃，至南城三皇庙保安队驻地避了三天难，经我父亲等人穿梭斡旋，和平解决，兵变未开枪，戒严了三昼夜。

1941年春夏以来，刘宝堂通过赖拂庭（晋陕绥边区总司

^① 刘丰林，安边堡人，刘文卿之子。本文是作者1983年1月10日回忆，原件存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令部政治部主任、黄埔系）等人掖助活动，决定编师，以逐渐达到“中央化”。

事变前张廷芝弟兄的状况

1930 年左右，张兰亭、张玉亭、张廷芝、张廷祥因吴旗川闹红军，北上盘踞安边、柠条梁一带，要粮要草、绑票、拉伕，民不聊生。1933 年严冬，我父亲受地方父老秘密委托，前往榆林，通过井岳秀（同盟会时代的同志）的关系，派八十六师高双成部接防安边、柠条梁镇。将谷莲舫的陕西警备骑兵旅全部调西安。

张廷祥随部南下，不甚得志。1939 年前后返三边。1941 年春，怂恿县长徐绍林强行撤换保安大队附，取王星五而代之。旋即编为陕西省保安十三团，属波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胡奎生）管制。

张廷芝在抗战开始后背离八十四师高桂滋，一度流窜，后来通过某种关系，编为绥蒙游击支队，当了司令，归东胜伊蒙保安司令官陈长捷所辖。他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贿动西安办公廨蒋鼎文高级幕僚，企补兵源，正式编师。

事变原因

此刻刘宝堂与张家弟兄同驻安边、梁镇一带，争夺势力范围，覬觐渐生。刘宝堂势众志满，不以张氏弟兄为虑，有几件事开罪于张家弟兄。

1. 1941 年春，张廷祥准备为靖边阎寨子（孤立的反共据

点)武装运送子弹,向十一旅借几箱,刘不但没给借还背地诮议。

2. 同年5、6月间刘支持了徐绍林、徐子埭等特务制造的所谓“党案”,诬张廷祥属下连长多人为共产党员。

3. 张廷芝正往返于三边、西安之间,积极活动扩编,不料办公廨某要员示以刘宝堂密告张家弟兄“三代为匪”的机要电报。

这个电报稿是当时十一旅参谋主任汝玉明拟。当年事后,汝调任兵站二十一仓库副库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和王益轩等人闲话时还朗诵了一通,确有“三代为匪”之语。这句话对张廷芝这样一个闯荡江湖、自命英雄的人刺激到不可接受的程度。杀机萌动,俟机报仇,势在必行。

将计就计

张兼程返防,适刘旅长派军需主任朱仙洲前往堆子梁,为乃郎刘汉求婚于张兰亭长孙女(张廷芝之长女淑琴),伊祖父认为门当户对,当即许婚。张廷芝在朱仙洲领刘汉走后对妻女们说:“看那不像个内官子?”表示不满。但封建家庭只好权遵父命,将计就计,决定于旧历七月十三日订婚。

有机可乘

接着东胜陈长捷派魏高级参谋,榆林派保安副司令刘某,同时各率校阅组来安,分别校阅游击队与保安团。该两部全部集结安边城待命听点。

鸿门宴

1941年9月4日（农历七月月十三日），由张玉亭以游击队副司令身份大设筵宴，为魏、刘两上级洗尘并为其姪孙女订婚。邀请定靖两县县长及十一旅连长以上所有官佐出席作陪。

张玉亭亲自敬酒毕，命保十三团军需主任刘化民招待划拳。还未开始吃喝，张廷祥冲门而入举手枪对准了刘宝堂喊了声：“不许动！”，“啪”的一响，刘被当场击毙，所在赴宴十一旅军官及随从勤务兵一千人等，顷刻都作了阶下囚，是时下午四点正。

激 战

张玉亭当时干哭号叫：“我这个大大，这下动下了！”

张军两部向十一旅据点突击遭拒，一时不能得逞，张廷祥准备撤退。他父亲当机立断教训儿子，如果撤离安边，人家一定把我们当土匪消灭，不可退，撑着打。

十一旅各据点除东门任连长因病未赴宴，万发店两个连因校阅组王参谋也因病未去临阵指挥外，其余统由排长指挥，一个军人在情况未明以前，谁打我，我打谁，张部虽纠集一些亡命之徒，激战十小时，伤亡惨重，没攻克一个阵地。张兰亭从小南门携眷逃往堆子梁。

最后由十一旅一团团长陈国宾被胁出喊话说旅长已不在（死）了，劝大家暂且撤出城去，再作商处，五日凌晨，十一旅撤离。

束手无策

我父亲当天未去赴宴，第二天战斗结束后，从城外张仰光处回来，甫入街门，张廷祥从战场上下来，跟着数十名弓上弦、刀出鞘的马弁，顺路进来，第一句话：“伤亡重得很！”刚落座说了句：“刘叔，吃了饭来盐店来。”拨腿离去。

此后三五日我父亲忙个不了，被迫参与讨论所谓善后事宜，曾决定：

1. 电报榆林刘旅长系兵变中，中流弹身亡。

2. 释放被扣十一旅官兵，陈国宾未获准出城。记得是六日上午曹又参来我们家一趟，和我父亲谈了几句，离开安边。

3. 召开市民大会，两位点验长官还讲了话。刘副司令操一腔山东口音，慷慨陈词，说什么孙悟空跳不出如来的掌心，听了令人捏一把汗。此人有点胆力，口才爽朗，话讲得很好，耸人听闻。

大概是九日下午，我父亲从张公馆回来对我说：“榆林当局电飭谈张等具报兵变详细经过，刘旅长中流弹而亡，唐塞不过去。决定派他以地方公民代表身份，会同张乐天（保十三团副团长）第二天赴榆林相机如实报告。他本人立场鲜明，当面宣称：此行我不可能为你们圆谎，等于告你们一状，只能要求当局顾全大局，和平解决，免致战祸，以息民命为词，权且走一次。

哥俩意见不一致，张廷芝赶往堆子梁，临行上马我父亲还叮咛他的意见主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来他们真是束手无策，只好让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吧。

反 攻

就在当日午夜，枪声骤起。十一旅与杜廷之、夏品三（保十三团两个中队长）里应外合进城了。战斗进行了约一个小时，陈国宾的随从副官白占奎挝门高喊：“刘先生，团长上楼了，请你呢！”

我父亲当即上了鼓楼，呆在陈国宾的指挥所里，临时参赞。由于牛化东派警卫保护了我们家门口，乱兵没敢私行抢劫。

此刻张玉亭已被杜、夏打死，张廷祥已跃城逃跑。

经过数小时激战，张部所据各点均先后被击退占领，直至上午十时许，西城守军顽抗不退。我父亲给冯俊超（据守该点的游击队团、长张廷芝表弟）写了封信，以人格担保负责人身安全，请其前来鼓楼。冯登楼后，我父亲当着陈国宾等当面对冯说：“你们双方的曲直恩怨姑且难论。今天大势已去，安边是你的第二故乡，应以父老生命财产为重，快快结束战斗，退出城去，要报仇，以后重来。”冯俊超听了有理，回阵地说服了部下，不知是携械撤离，还是缴械投降，总之，战斗结束。

朱仙洲被二团一位王连长迎面抓住要杀头，幸遇陈大少（陈俊士）过来挡住说：不可乱杀人，见了团长再理论。倒霉的朱媒人。

报 仇

“报仇须是父子兵”。没过一星期张廷祥被十一旅骑兵连陈

连长（刘旅长外甥）和副连长刘明堂（刘的胞弟）从鸱怪子沟追获了。割断了腿跟腱，游了街，苟活了三五日，在刘旅长的追悼会上，由总司令部俞参谋长宣布因伤病故。实际上在戏楼的对面某连部的囚室里，该时枪毙，会后士民们割头祭灵，可谓死无葬身之地。

追悼会

刘宝堂的追悼会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参谋长俞代表邓宝珊在安边主持召开，定边八路军警三旅派联络参谋参加并讲了话，定边商会代表长袍大褂也参加了追悼。国民党各方高级将领多送了挽联，剧团唱了一本《大报仇》，可谓极备哀荣。

遗孀三，回平凉。遗孤：汉（嫡出）、光（庶生），后均力学上进。

张廷芝的下落

安边失败后，张廷芝从堆子梁携眷逃往横山波罗，投奔胡奎生，后解榆林，押二十二军司令部，过了好久，和另一名惯匪头子张板楼越狱逃往包头，传说是张毓宾、张乐善做人情私行放纵。

张在包头见了大汉奸王英，王告以大局，日本人将要垮台，所以张又回到固原高桂滋部，当了别动队队长。

无辜株连

打死刘旅长的同时，靖边县长张鹤亭也被张廷祥命令士兵击毙，因在梁镇时不睦。定边县长徐绍林因支持张廷祥充任保安大队附，免于罹祸。

这次事变拉了一下锯，张家暂时得胜，与十一旅有关系者受害，士民们趁火打劫，小学教员慕义三的一顶礼帽也被抢去了。十一旅反攻成功，和张家有瓜葛者，横被株连受害，重者抄家，轻者遭劫，而杜、夏所部两头发洋财。

姑妄论之

所谓“安边事变”根本上是张、刘争势力范围的一场小闹剧。

刘宝堂没有政治头脑。对张廷芝既刁难、密告于前，又登门求亲于后。既然认为张氏弟兄羽毛重新丰满对自己是一种威胁，然而，却没有应有的警惕，可能对“鸿门宴”这一点历史常识也没有。

张廷芝确实对刘密告他“三代为匪”不能忍受。你编你的师，我活动我的事，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不愿捧场，也犯不着拆台呀。

两个校阅者集结张部于安边城，给发难造成了最有利的客观条件。

至于“美人计”是小哥们“将计就计”。老团长（张兰亭）是正正经经地允亲办喜事，谋杀刘氏不可能让他知道；老营长

(张玉亭) 据刘化民谈当时的气急败坏情景，也不会预谋杀刘。

弟兄俩虽密行策划，究竟水平有限。为什么不劫持缴械，打政治官司，估计榆林方面、定边方面都会顾全大局，和平解决，怎能枪杀陆军少将，落得个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呢？

另一方面推测：计划是扣，不是杀。但张廷祥临时感情用事，杀了。看看老团长当夜出走，善后决策一直拿不出来，弟兄俩意见不一致，张廷芝愤然离去等迹象，很属可能。

哪一方面、主要是谁支持此事，局外人不得而知，张廷祥打死了人，支持者、同情者爱莫能助，不易看出来。

参加了绥远“九一九”起义的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胡景通（胡奎生）当年是张廷祥的上司。张兰亭、张玉亭早年也曾在国民二军胡景翼（胡奎生兄）部下当过中下级军官，张桂英她妈就是张兰亭驻防开始时娶的，据说胡景通、胡景铎现在陕西政协工作，对“安边事变”梗概，会知道一些吧？赵子实对此事知道的情形比较多，此人当年曾直接参预张廷芝在西安的活动。赵是保安人，刘志丹的亲戚，解放后在关中一带工作，这会问问刘景范、刘大嫂可能知道下落。

至于贺晋年将军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统战工作政策，利用矛盾消灭了顽固派，稳定了十一旅一团长驻安边，给地下组织造成了有利条件，为以后 1945 年十一旅起义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共二次合作以来，蒋介石有意把邓宝珊安排在榆林作为与延安方面的一个缓冲人物，先后的顽固派分子、反共将领、摩擦专家，像何绍南、包介山、何文鼎等哪个硬斗过共产党？而十一旅的换防，整编等关键事情得以累次应付过去，与邓将军的“等半年、瞪半年”作风与做法是分不开的。

安边事变历史补白

☆ 强文元^①

张廷芝事后给我说了他们父子4人吃掉刘保堂旅的计划。于1941年古七月十三日上午12时，张家约定古楼打钟开席，宴刘宝堂等，席间张廷祥把酒看好后，张举枪对准上席的刘保堂说：“三哥，你不要动！”刘很快扶住张的右手（持枪之手）说：“怎么了？”一边把手往口袋里插。张廷祥扣机朝壁放了两枪，没打上刘。席上张事先安插好的人，从桌下进去击毙了刘宝堂。同时打死靖边县县长张鹤亭（张自立）。打死张鹤亭的人叫诸兰，是张玉亭（张廷祥父亲）的勤务。打死刘宝堂的是王义元，是张廷祥部下的连长，系张廷祥的姑舅。

古七月十三日晚，八、九点钟时，张廷芝带兵从安边小南门出去，跑到堆子梁。跑的原因是怕共产党牛化东包围安边（因为刘和共产党有亲），所以开往堆子梁以应付之战。七月十七日晚12时，牛化东十一旅已到，派人城下喊话，守东门的夏品三就指使蔡德打死了老营长张玉亭，顿时，城里大乱。张廷祥知事不妙，独身跑到鴉怪子沟，被刘明堂抓住拉回来。张

^① 强文元，陕西定边人，曾任张廷芝警卫，特务连连长。本文系作者1984年11月25日回忆，原件存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廷芝走时把镗重抬到柴明堂家里，所以柴围城没伤张，面朝天放枪，有意放走张廷芝。

牛化东十一旅，占据安边，开大会追悼刘宝堂，割断了张廷祥的卵筋，又处决了性命。

张廷芝部于 1947 年在刘文卿等人的保举下，回定边被编为“三边清乡总队”，张任总队长，强文元任特务连连长。后又改番号为“三边游击纵队”，张任游击司令。

1949 年定边二次解放，马鸿逵的队伍全部退到灵武。张军到灵武是七月间，八月间灵武解放后，张廷芝甩掉步兵带领骑兵逃到土圪堵庙（蒙地）时，张宣布愿跟我走者同行，不愿跟我走者解散回家。当晚兵弃枪散，赵级三、张勇汉逃跑。

忆安边起义和解放柠条梁

☆ 马文俊^①

我是1942年5月在柠条梁镇拿粮食换布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的。国民党把我编在十一旅一团二营六连四班。班长叫刘长恒，排长叫解占鳌，连长为陈俊仕，营长是李友竹，团长陈国宾，副团长牛化东，旅长刘保堂，参谋长石佩玖。十一旅共有两个团：一团驻安边；二团驻柠条梁，团长史钊城，副团长张鼎丞（1945年伪十一旅起义时张被击毙）。

关于安边起义的情况

1943年，我到团部给陈国宾当勤务。1944年我又给牛化东当勤务。牛化东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十一旅已发展李友竹（三营营长）、王子庄（参谋主任）、朱子春（六连连长）、张成石（参谋）、高宜之（二营营长）、冯世光（四连连长）等几个党员。牛化东经常和共产党的部队——警三旅有来往。因为我是牛的勤务兵，牛在夜间经常到定边去（警三旅驻定边），所

^① 马文俊，靖边县新城人，十一旅老战士。本文是作者1983年8月7日回忆，原件存靖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以我知道牛的情况。同时我跟牛在夜间活动的事，牛一再告诫我不要给任何人讲。

1945年农历9月的一天，牛在他家对我说：“咱们走一条新的道路，永远的道路，再不给国民党效劳卖命了，你跟不跟我走？”我说：“团长走到哪，我跟团长干到哪！”牛于是说：“如果敢打的话，你今天晚上把张鼎丞（二团副团长，此时住安边）打死。”同时还给我交待得很清楚：让我打张时特别注意，张的枪法好，为人厉害，把张打不死，你就活不成，而且组织上也要蒙受损失。接着叫我把李友竹、王子庄、朱子春、张成石、高宜之、冯世光等找来，说有紧急事情商量。不一会儿，几个人就到了牛的家。牛叫我把大门关上，做好警戒，说不管谁来，就说我病了，不要给开门。约两三个小时后，这几个各回各的岗位去了。这时，牛给了我一把三保险驳壳枪，15发子弹，让我到西门找冯世光，说那里要来八个穿灰衣服戴毡帽的人，要我保护好他们的安全，带他们到他这里来。并说如出了问题，就要枪毙我。我到了西门十几分钟后，这几个人就来了。有一个和冯认识，冯向他们介绍了一下我后，便由我带他们去牛家。我把手枪提在手里，装着押几个共产党人犯，一直把他们带到牛家，好在半道上没碰上一个人。到牛家后，我的任务仍然是担任警戒。这次谈话的时间较长，约四五个小时，中间还在牛家吃了饭。饭后，牛又让我把这几个送到西门冯世光处。我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带回西门。之后，牛到西门又和这几个人开了个小会，然后对我说：“今天晚上就看你的了。你能把张鼎丞打死，咱们就能顺利地走上新的道路。”并告诉我：咱们夜里4时行动，让我事先呆在冯世光连，听冯指挥，和冯连一起行动。说完这些后，他们几个人又检查了一

下我的枪，询问我准备的情况，待觉得满意后，便又忙别的事情去了。

张鼎丞住在万发店西边的3号房间。张只有两个警卫，都住在东边灶房。夜里4时前，我们先在万发店的房上上了两个班，一挺机枪，两箱子弹。由班长王建民指挥。准4时，我和另外两名战士从万发店的后院墙翻下去。后院有狗，狗相当厉害。我们下去时候抛了些馍，狗吃馍就不吠了。我们从后院隔墙上搬掉了一扇门走到前院，然后三人分成两路行动。我摸到3号房前，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提着“三保险”，腰里还别着一支驳壳枪，猛一脚将门踹开，手电筒一打，大喊：“不许动！”说话中我就开枪打在张的背心，后又连发两枪，张立即毙命。张毙命后，我在张的房间拿到两支手枪，急忙跑出。这时，我看到张的两个警卫人员也被另外两名同志从房间押出，被我们的人送往连里。我于是赶快跑到设在钟鼓楼的临时指挥所，向牛作了汇报。牛听了很高兴，夸奖我几句后，又让我协同冯连去缴石佩玖枪。并告诫我不准将石打死。人逮捕后送北门楼高宜之处。不一会儿，我便到了石的大门前，打门叫参谋长开门。可等了好一会，门没开。于是我翻墙进院走到石的住房门前。我报告了我的名字，我说：“参谋长请开门”。石问：“有什么事。”我说：“牛团长有一封信让我送给您。”石说：“明天早上再看嘛。”我说：“不行，团长让我今天晚上一定交给您，有急事。”于是石就披了一件衣服下来给我开门。一进门，我就把枪口对准了他。石说：“你把我打死算了。”我说：“我们起义了，只要你顺应历史潮流，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说话间，我把石的手枪也缴了，然后把他押送到北门楼高宜之处。这时，我见高的房间里已押来很多人，都是些平时

比较效忠的国民党分子。我完成任务后，又跑到牛那里。这时，南城、东城已枪声四起。牛边指挥战斗边问我任务完成了没有？我说圆满完成了。这样到了第二天早上，定边的八路军来了。他们城里进去一部分，城外围了一部分。又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剩余的顽固分子有的被消灭，有的投降。于是，驻安边的十一旅一团起义成功。

上午10时许，国共双方部队在旅部操场上集合开大会。牛化东先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八路军是来慰问我们的，咱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后，咱们就要跟他们所领导的军队走，打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接着，八路军警三旅张文舟参谋长讲了话。他说：“旧的十一旅现已变成新的十一旅了。对于你们举义旗的行为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对于你们的投诚，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会后，我们杀猪宰羊，庆祝胜利。

解放柠条梁 击毙史钊城

1945年九月份原三边国民党十一旅一团起义后，经过一天的休整，部分赶下午5时出发，直奔柠条梁消灭史钊城部。这天雨下得很大，部队走了一夜，快到天亮时来到柠条梁。我们去的部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三个团，原国民党十一旅一团。敌人只有一个团，两个骑兵连。我军的计划是八团攻南城（团长郭宝珊）；九团攻东城；七团攻北城；十一旅一团攻西城。东城门我们故意给敌人留一缺口，我们的部队埋伏在沙窝里，等敌人逃出来时消灭。我们的指挥部设在大梁洼，离城3里左右。天亮前我们已将柠条梁城团团围住。当

时，指挥部抽调我和另外3名枪法好的同志，配合炮兵排（排长姓张）埋伏在北门外，任务是不让敌人从北门逃出去。开战后的第二天，敌人的安副官带着八、九十人从北门逃出来同我们接了火。战斗中，张排长牺牲。我看情况危急，自告奋勇担任临时指挥，接连打死敌人5个，把敌人从北门逼进去。天黑后，牛化东派人命令我们撤退，我们回到指挥部待命。第三天，指挥部派我给冯世光送信。我把信送到前线，冯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就在我返回时，敌人发觉了我，齐开枪打我。我爬在沙窝里，听见敌人在城墙上猖狂地讥讽我：“红军脑子，头上留几个壕子，下来三个小子，两个见了阎王，一个也成了龟孙子。”一会儿城里出来12个敌骑兵，快速朝我藏的方向奔来。在离我十来步远近时，我突然开枪射击，三枪连毙两命。敌人见势不妙，勒马而逃。我乘机回到指挥部，贺、牛首长亲自把我接进去。由于史钊城负隅顽抗，这次战斗一直打了7天7夜。到第七天前半晌，我铁八团首先将城攻开。接着，进去了八团、十一旅一团与敌人共战斗4个小时。史钊城败退到北城后仍不投降，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和我军打了一个小时，最后，被我战士捉住用大刀砍死。至此，柠条梁城解放。在一片祝捷声中，我军又出击堆子梁。

解放柠条梁

☆ 李新民^①

柠条梁镇，简称梁镇，是靖边县有名的五堡一镇之一，位于靖边县城（张家畔）西 90 华里，红柳沟西岸的一道柠条梁上。它西距安边 60 华里，南距长城 60 华里，北至内蒙城川 50 华里，也是三边很有名气的古老大镇和联接晋、陕、宁、蒙的交通要道。1935 年 5 月 28 日，中共西北工委指挥的西北红军解放靖边县城（镇靖）之后，国民党靖边县政府西逃到梁镇，从此，这里成了靖边县唯一的一块国民党统治区。

1945 年 9 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想着如何医治好战争创伤，建设新生活。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又一次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对他这种倒行逆施行径，就连国民党军队中的开明军官都坚决反对。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牛化东、王子庄以及谢有德、李树林、朱子春、高昆山、柴明堂、冯世光、赵武臣等同志的策划鼓动下，旅长曹又参毅然率部下一个团以及旅部全体

^① 李新民（1919～ ），靖边县镇靖人。1936 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靖边县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副校长。本文系作者 1984 年 9 月 10 日回忆，原件存靖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人员在安边起义，加入我解放军行列。这对国民党部震动很大，之后几天，国民党队将领高树勋也在河北举行了起义。安边解放后，唯有柠条梁这个黑据点还未解放，驻扎在柠条梁镇的十一旅的另一个团拒不投降。此时，三边解放区大部分连成一片，柠条梁据点成为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我人民解放军决心击沉这只孤舟，拔掉这个黑据点。

驻守在柠条梁这个团的团长叫史钊城，是个思想极为顽固反动的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分子，曾残酷地“清剿”过附近的解放区。他依仗城池坚固，视野开阔，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同时幻想榆林的国民党军队接应他突出包围，强拉民夫修筑工事，妄图负隅顽抗。在旅部和另一个团起义以后，他依然唆使部下到附近的解放区进行大肆骚扰破坏，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他们这伙人切齿痛恨。柠条梁镇内居民本来已被他们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强拉民夫修筑工事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大家都盼望早日解放柠条梁，有的人还跑到解放区请求解放军快来。10月28日，在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和参谋长张文舟的带领下，我们的军队包围了柠条梁。

那几天正在下着毛毛细雨，中共靖边县委书记鲁直、县长李坤润通知我立即带领担架队和民兵赶赴新桥村，支援解放柠条梁的战斗。我当时担任靖边县委组织部长，接到命令后带领40多人，急行军80多里赶到新桥村。

史钊城那个团共有3个营，团部和两个营驻守在柠条梁，一个营驻守柠条梁北边50华里的堆子梁。我警三旅七、八、九团全部投入战斗，八团担任主攻。原十一旅起义的部队担负围攻堆子梁敌军的任务。由惠长文营长带领的保三营和由曹动之大队长、惠志高政委带领的蒙汉支队及我地方武装担负截击

敌人援兵、防止城内敌人突围逃跑的任务，同时防止小桥畔敌人的逃跑。以侦察敌军具体火力部署、消耗敌军实力、瓦解敌军士气为目的战斗很快就打响了，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惠长文营长在围攻小桥畔国民党地方民团张子英匪徒时，不幸牺牲。

我带领的担架队，一部分跟前锋部队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由我带领在柠条梁的南山新村待命。

攻打柠条梁的战斗连续进行了7天7夜。我们和解放军在一个战壕里，为作战服务。如有伤员，由担架队立即送走。民兵、担架队员与解放军一起向敌军喊话，劝他们认清形势，早日投降。敌人凭借他们自以为坚固的堡垒阵地负隅顽抗，还幻想榆林敌军前来接应。他们没有吃的后，便杀死战马，以图苟延残喘。但无济于事。我军铁八团再显神威；第七日凌晨发起总攻，以不怕牺牲的精神从城东门一角攻入城内，然后穷追猛打，在镇西北角击毙敌团长史钊城。

那天天刚亮，枪声逐渐稀少，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我们送完一批伤员正返回阵地，看见几个人慌慌张张向城外跑着。从衣服的标志上看，就知道是被打散准备逃跑的国民党士兵。我和担架队长卜云堂及队员们虽然手中只有几支破枪，而且仅有几粒子弹，但我们毫不畏惧，大家齐声向逃兵高喊：“缴枪不杀！”“快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那几个家伙开始并不听，仍在跑。我们就一边追，一边向他们放枪。敌人见到处是我们的人，无路可逃，最后乖乖地缴械投降了。那天我们共捉了20多个俘虏，缴获了十几枝枪。大家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赶赴柠条梁。

打下柠条梁镇后，我和三边分区副专员马万里接上头，把

俘虏交给解放军。一会儿，上级指示：把我们缴获的枪支归我们使用。我们高兴得叫了起来。

之后，马万里副专员对战后重建工作进行了安排：指定我为柠条梁区区委书记，并留下马海旺等几位同志，由我们负责选拔积极分子，搞废保建政等工作。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柠条梁废保建政筹备委员会，里面有地下党员谢九才、安边县派来的牛山、靖边县派来的强振东、中学的田校长，民主人士张润民、陈奎生、旧保长魏开汉（以后叛变），还有我。

我们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安定民心，清理了战场，妥善安置了我军牺牲人员的遗体，并将敌军的尸体清理掩埋掉，史钊城的尸体由他的小老婆运往榆林埋葬。靖边县派来公安局长王国桢、吴旗县派来公安局长白培民，共同协助清理敌人档案。我们把柠条梁划为4个乡，分别着手建立政权工作。

11月底，三边地委决定，柠条梁镇暂归定边县领导，牛山担任区委书记，强振东担任区长。我完成了建政筹备工作的任务，仍回靖边县委工作。

柠条梁解放后，群众喜气洋洋欢庆解放。镇头街尾欢声笑语，村村户户热闹异常，沉浸在翻身得解放的喜悦之中。群众把参加支援柠条梁解放战斗编成歌、戏在街头上演：“红缨杆子长，人马闹嚷嚷，摩拳又擦掌，解放柠条梁。”“顽固不化史钊城，脑袋开花命归阴。劝你投降你不投降，看你有什么好下场！”他们有的模仿国民党军队惨败的狼狈相，有的扮成我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尽情地享受胜利的喜悦。

人民群众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喜悦。人民群众的欢乐，就是我们的欢乐。我怀着完成任务的愉快心情，背着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驳壳枪，踏上归程，回到靖边县。

打柠条梁

☆ 高锦武^①

我警备第三旅在旅长贺晋年的指挥下，攻打龟缩在柠条梁土城内的国民党新编十一旅的第二团。九团打南门，八团打东门，七团打北门。我任九团副营长。因为我们只有几门迫击炮，没有平射炮，打了6天6夜还没打破土城。大家很恼火，自告奋勇，组成攻坚队。我们营教导员和我都报了名。大家抬着用竹竿做的云梯，往城墙一靠，就争先向上爬。我们营教导员刚爬上去，就被敌人捅了一刺刀，栽下来牺牲了。同志们怒火中烧，一齐向城墙上守敌扔手榴弹，趁机冲了上去，打开缺口，大部队紧跟而上。天大亮后，开始肉搏，半前晌，大部分敌人投降，只有敌团长史钊城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指挥部本来要求我们不要打死史钊城。虽然我们围住了他，但靠不了身，谁上前，他开枪打谁。当他打伤几名同志后，我们团参谋长一枪将他击毙，才结束了战斗。

^① 高锦武（1909～1985），靖边县畔沟人，1935年参加革命，时任警三旅九团副营长，建国后曾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监委书记。本文系作者1984年3月17日回忆，原件存靖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赵级三叛变时脱险经过

☆ 赵淮川

1945年10月，原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由代旅长曹又参及牛化东等率领在安边宣布反内战起义，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党派郭炳坤、杨林带了一批干部到新十一旅工作。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按照人民军队的宗旨、制度，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工作。当时，我被组织分配到新十一旅一团二营任教导员。经过一年多的工作，部队有了明显的进步。

一

不久，全国解放战争爆发了。

1947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23万大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胡宗南部主力于3月19日侵占了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后，驻宁夏马鸿逵也派其主力部队暂九旅、一六八旅、骑兵第十旅等部，约1.6万余众，在暂九旅旅长卢忠良的指挥下，向我三边分区发动了进攻。

当时新十一旅一团驻守盐池。按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坚守三边、坚守城市的指示，一团作了坚守盐池的准备。

这年春天，我得了一场病，牙痛得张不开口，连饭也吃不成，身体很虚弱，在定边治疗休息了两三个月。一天下午，分区司令部让我带一部电台同在旅教导队学习的二三十个学员一块赶回盐池县。

天黑以后，我们来到花马池。盐湖硝冰水白茫茫一片，迷了路。当时马鸿逵侵犯三边的部队已逼近盐池附近，我怕误入敌群，就带领大家沿着边墙摸索前进，夜里10点多钟，从北门进了盐池县城。

第二天上午，团部开会，决定按上级指示死守盐池城，乘机给敌人一个杀伤。

3月23日傍晚，敌人开始用炮火对城西北角进行试探性佯攻。24日拂晓，突然向南城猛攻。

当时一团一营守北城，二营守南城。二营四连人数很少，没有战斗力，五连多数是刚从吴旗招来的年轻娃娃，还没有枪，只有六连人数较多，防守南城制高点。由于敌人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不久，城防被攻破，敌人冲进城里。

这时，团部传令兵给我传来命令：“团部叫撤退！”但是没说往哪撤，在哪集中，于是我就到营指挥所问个明白。我到了营指挥所，已无一人，营长高宜之、副团长高昆山、司号员、通讯员都已撤离。我又找到北门团部，团部和一营也都撤光了。我再次赶回鼓楼时，守南城制高点的六连已被敌人包围，电话线也被切断，身边又无司号员，遂与六连失去联系。我想调集四连和五连的兵力冲进包围圈解救六连，已不可能，弄不好可能要全营覆没。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只好带领四、五两连从东门突围出去，向苟池方向撤退，第二天天亮与营部及团部会合。

宁夏解放后，据被俘的六连连长刘北平讲，敌人攻进城后，他们从南城门突围时，指导员张泰先与通讯员牺牲了。他带六连残部撤到城内一座炮楼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中午。有一名战士连续打死打伤敌人四五人，终因孤立无援，弹药已尽，不少同志牺牲了，剩下的同志最后被迫向敌人缴械。

二

盐池战斗后，一团撤到定边附近的梁圈一带休整了几天。

据说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准备撤销一团赵级三的团长职务，决定由旅参谋长王子庄接任团长。王子庄不愿意接任，领导意见也不一，下不了决心。最后让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野战司令员郭宝珊相机行事，郭觉得难办，就没有撤赵级三的职务。

后来在阆门开了一个动员大会，准备迎战。会后，警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一团由郭宝珊副司令员、王子庄参谋长率领，当夜开到定边西南羊圈山附近。白天休息了一天，晚上夜行90里，到盐池县南面的大水坑，埋伏了一天。因敌人一个团靠得很紧，无机可乘，又返回定边城南彭滩、阆门一带。八团在北边，离城近，一团在南边，离山近，处于二线。

4月3日早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定边，后来侦知我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警八团在阆门一带，遂即转向八团进攻。从上午9点开始接火，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

警八团在1945年冬攻打柠条梁战斗中，消灭了国民党新十一旅二团史钊城部；1946年冬，奔袭兴武营，消灭了马鸿

遼騎兵十九团团部及两个连，号称“铁八团”，很有战斗力。领导有轻敌骄傲情绪，加之求战心切，战斗打得很激烈，也打得很英勇，一个营一个营跟敌人拼，最后团长王正川受伤被俘，政治处李清春主任牺牲，一、二营损失很大。

由于敌众我寡，弹药不济，部队伤亡惨重，郭宝珊副司令员下令撤退，并命令我：“你们二营掩护八团撤退！”我们营就沿着边墙，由西向东边打边撤。到澎滩附近时，敌人骑兵第十九团、第二十团已从两侧迂迴包围了我营，在山畔上用机关枪扫射，截断了向南山撤退的道路。队伍一下乱了，失掉控制，各自弃路逃跑。

上了山畔，敌人又拦住去路，用机枪扫射。我们组织了一些人打排子枪，敌人暂时退了下去，又改从后面迂迴射击。这时天色已晚，碰到了八团三营副营长刘思孝，刘营长说：“赵教导员，我实在累得不行了，你掩护我们撤退。”我说：“你们走，我们掩护！”就这样边打边走，走走打打，太阳落山时，到了油房涧。

部队到油房涧休息了几小时后，突然四连副连长乔树礼和司务长在窑外大喊：“发生情况！”有20多个人一下子跑了出去。我刚到窑门口，乔和司务长抓住我的两臂，拉着就向外走，并让黄排长先带队伍走。把我拉出二三百米以后，乔说：“我们的家在滩里，被敌人占了，害怕伤害老人和妻子儿女，我们要回去了。你革命多年，还是革命去吧，我不害你，我带你出来，是怕你喊叫，那我们就走不了了。现在你回去吧。”我说：“别那么近视，今天打了个败仗，革命就完了？以后你会后悔的。”我怎劝他也不听，他们还是走了。

我回去立即叫起五连连长徐汝贵，向他说了乔树礼叛变的

情况，然后和徐连长带上五连连夜赶到孙克崮岭，找到团部。第二天中午找到了高波、赵级三和郭宝珊等人。

三

后来部队继续向东南转移，司令部和二团驻在崔涧，一团驻姚家峁子。

经过盐池、定边阎门两次战斗，以及零星的叛变、逃亡，一团损失很大。二营四连只剩下三十几个，五连有七八十人，六连全部损失。一营还有3个连，但全团只有300来人。经过初步整顿，司令部决定一团仍保留团的建制，取消营的编制，直辖5个连，并决定给补充一些人员和武器。

到姚家峁子的第三天上午，我去各连了解情况，分发宣传品，做思想工作。下午4点左右，在我返回团部途中，碰见团部通讯员，说是去传达命令。我要过命令看了看，是通知夜间转移，有高波和赵级三的签名。我回到四连连部，太阳已落山，这时又渴又饿，在连部喝了点绿豆汤。

正在这时，团部王宝山传令让我回团部开会。我正要走，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我没意识到是出了事，以为有人乱打枪，还骂了声：“游击习气！”当我走到团部窑门口时，赵级三的传令兵马德功和军需官突然夺去了我的驳壳枪。然后他们又去隔壁下营部通讯员的枪。我乘机躲进厕所装作小便。他们急急忙忙走出了大门。只听赵级三问“教导员呢？”有人回答“不见了！”赵级三忙说：“走走走！”带上队伍小跑叛变了。

赵级三叛变走后，夜很黑，我找了一个老乡领路，找到郭宝珊、李友竹（即李树林）等领导，汇报了情况。

赵级三叛变时，捆走了政委高波、七七剧团的丁光明。高宜之营长，还有3个指导员也都被捆走，后乘机脱险跑了回来。

赵级三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叛变投敌，实际上后来跟他当反革命的只有少数人，多数都跑回家了。1949年我军收复三边进军宁夏时，赵级三走投无路，又跑回来投降。终因罪恶严重，被我镇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我在三边的兵运活动^{*}

☆ 马文瑞

郭洪涛同志在 1933 年腊月间回到陕北，在佳县曹家圪和我接头的。我通知马明方、崔田夫特委同志来佳县开会，郭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说我们是“富农路线”、“消极怠工”、“右倾”等等。马明方和我不同意，抵制了北方代表的指责。当时特委书记是崔田夫。……郭洪涛传达上级指示时说要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开展兵运工作。那时的情况是：我们在高志清部队原来有工作基础，在井岳秀的教导营原有好多个党员，但后来都不存在了，只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谷莲舫的骑兵旅有若干党员。谷旅下面有段幼安的一团、张廷芝和张廷祥的二、三团。段幼安是从高志清部队哗变出来的，张廷芝和张廷祥的部队是恶霸武装。安定游击队失败后，好多同志跑到三边搞兵运，于是特委决定派我到三边组织指导兵运。我到三边后把这 3 个团中的同志都找到，并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当时河北孙殿英土匪有一两万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屯垦部队，它开赴宁夏地区时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在孙殿英部队里搞活

* 本文选自《陕北革命根据地》：马文瑞《回忆陕北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系作者 1984 年 3 月 17 日回忆，题目是编者加的。

动的有南汉宸、葛霁云、阎红彦等党员同志。我到三边时，他们派了两个代表，一个叫艾稚卿（党员），一个叫刘天民，到三边来联络谷莲舫部，并找共产党，找红二十六军。他们在三边没有找到关系，找到杨国栋。杨在谷莲舫部当参谋主任，虽消极了，但还没有自首叛变，是党的同情分子，和我很熟。杨介绍艾稚卿和我接洽，我就给志丹同志写了封密信，派神府来的两个农民同志送去，志丹收到了信，派红军连指导员曹士荣来找我，然后同孙殿英部去联系。孙殿英打宁夏失败了，曹士荣没有找到我，回到保安上旦八寨时被敌人发现而牺牲了。后来杨虎城把谷莲舫的部队调去西安。我的行止怎么办？一个是随部队到西安，一个是留下来回特委，我们商定随部队到西安，在开往西安途中驻庆阳时，我们让郝醒民同志带出十多人和若干枪枝到南梁苏区，其余未动。到西安后杨虎城把谷莲舫部队缩编成一个团，我们的一些同志所在连队被遣散，于是我就让他们回陕北安定一带继续搞武装活动，我自己回到陕甘边苏区。

甘肃、宁夏兵运工作回忆

☆ 张秀山

1930年和32年初，党组织两次派我去杂牌武装王子元部做兵运工作，并参与领导了靖远兵变。起义虽然失败，但在宁夏、甘肃两省的部队驻扎地区，经过我党不少同志的共同努力，播下为后来举行胜利起义的火种，并培育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这批干部后来都为党作了有益的工作。

宁夏、甘肃兵运工作概况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把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到河南去了，为了稳住后方，1929年冯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一带。苏雨生乘机大肆扩军，不管什么人，只要去，就收编。他共编了三个旅：把他的老基本队伍编为第七旅，旅长是包头土匪马大牛，都是骑兵，大约一千人马；收编了陕北谷莲舫部队为第八旅；石子俊（秀英）部为第九旅，这两个旅是步兵，每旅两个团，每团四个连，每连实际上只有十几个人。另外，谢子长和平罗见苏雨生时，苏雨生委任谢子长同志为第十一旅旅长，只是尚未正式下委任状，也未发关防印信，因子长同志原计划把

“后秋天”的杨根伍、周维奇部策动到宁夏，可惜未收编成，十一旅未组织起来。在平罗时，石子俊也给了谢子长同志九旅副旅长的名义，子长同志回陕北时就借用了九旅的印信盖了白纸使用。据说苏还委任包头土匪杨侯小部为十旅，但杨侯小未到平罗，苏部即开走了。杨部后在伊盟和陕北、陇东一带流窜。

1930年初，佳县国民党县长陈 说我是共产分子，通缉我。2月初，我躲到榆林中学，利用社会关系住在老百姓家里。陕北特委派杜鸿章找我谈话，说宁夏时机很好，苏雨生派了代表到榆林和井岳秀联络，代表是一个同学（当时把党员同志称同学），要求多派党员到宁夏做兵运工作。杜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很高兴，答应去。后来到了宁夏，才知道苏雨生的代表就是在八旅十五团任副团长的张东蛟。

当时，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很重视。1929年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遵照党的“六大”精神，积极动员陕北党员到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部队以及“后九殿”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抓到武装力量，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随后，特委又向宁夏苏雨生部派了许多党员去工作。志丹利用社会关系还亲自到张廷芝部队里活动。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领导下，西北党的军事活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阶段，打下了1932年创建红色武装的基础。

杜鸿章和我谈过后，过了几天，我就和曹华山动身了。曹华山雇了两头骡子驮着简单的行李从榆林南门出去。因陈 已派人来榆林抓我，我不能走南门，便由几个榆林中学同学护送由西门出城，沿无定河边走到南关外，再和曹一同走。

到宁夏平罗县姚伏堡后，我先在八旅十五团军需处当军需

员。不久，因一连没有党员，组织派我和高昆山去一连，我即到一连当了二等兵。这时，八、九两旅都有党员，二连排长吕振华、三连排长汪兴民、司务长贺志平、四连排长牛化东、姜跃都是党员。姜跃任宁夏军委书记（先叫特支）。刘志丹在十六团任副团长，他安排好工作后就回陕北了。

八旅十五团团团长王子元，陕北定边人，是个政客，有野心的小军阀。1929年底和石了俊、谷莲舫等带队伍从陕北开到宁夏平罗一带，投靠了苏雨生，苏的师部住平罗城内。王子元从陕北只带来4个连，以后从宁夏出发向固原开拔时，住在磴口的二连又叛变了（吕振华同志以后1个人跑到靖远归队），三连连长赵万顺离去，四连连长刘子贞在固原战斗中牺牲，实际上王团的军官大都是党员，他的部队的训练和以后的扩充基本上是我党帮助搞起来的。30年在靖远时，他曾试探性地问副团长张东蛟：“咱们将来在哪一方面干？”张说：“谁给咱们饭吃，咱们就给谁家干。”王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红、白两家那方面干？”张未答，用旁的事叉开了。后来，张东蛟请假到北平（北京）结婚（他爱人韩瑞冰北平人，也是党员，婚后二人到了兰州返防），团里就没人工作了。部队驻在定西时，党员李罕言（湖南人）经过宁夏、兰州找到我们部队，住在学兵队。王子元听说了，马上找李，叫李当副团长，坐在团部办公。王子元很少到团部办公，经常住在公馆里。他用李罕言是有用心的，因为他估计李是共产党员，又学过军事，能管理部队。31年夏，王团开到兰州后，张东蛟同志也回部队了。张、李以及从学兵队毕业的学员（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带兵当了连、排长），加紧练兵，把定西召的新兵训练成能打仗的士兵。王子元很高兴，认为有

了升官、扩充势力的资本。我党也加紧了控制部队领导权和教育士兵的工作。

1930年5月，苏雨生部奉冯玉祥的命令移防平凉，行至固原就受到甘肃小军阀黄德贵部的堵击，不让进城，苏部打了半个月，也没有打开固原城（实际苏的基本部队也未参加战斗，只是八、九旅围城，并未攻城）。后来黄部反攻，十五团损失较大，团副姚铁俊阵亡，四连的党员也死了两三人。这时，冯玉祥中原战争失败，陈东土匪陈珪璋已占据平凉。苏部只好返回打宁夏，到宁安堡（即现中宁县）时又被马鸿宾部冶成章（冶骡子）团所阻。苏下令攻打，大约一个月也未打败冶骡子。后苏部攻下宁安堡，抢劫一空。八、九两旅本来就弱，跟着苏雨生打仗，人员武器也得不到补充。苏师部有许多破旧铅枪，出发时抓老百姓的骆驼驮着，也不发给八、九旅的徒手兵。此时七旅马大牛脱离了苏部，八、九旅看到苏部无前途，也脱离了苏雨生，撤上罗山。在宁安堡哗变时，把苏雨生的军械处的枪和子弹抢了。我们学兵队拿了一批“马提尼”、“后登七响”、“毛式”枪等旧式武器。带着苏部军械处的人员和物资上了罗山。十五团把军械处的子弹和少数枪也收缴了。为此还引起九旅石子俊的不满，派曹又参来质问张东皎同志。

在宁安堡脱离苏雨生时，八旅旅长谷莲舫不愿意走。但九旅石子俊和八旅的十五、十六两个团已商量了，石子俊和王子元强迫谷脱离苏部，谷只得依从跟着走。我记得那天晚上，天黑不久，石子俊给王子元送来信，规定出发时间、路线和新的口令。口令规定只由八、九旅和徐连（苏雨生师部直属骑兵连，是十六团的一个连长策动哗变的）使用。信送到张东皎手中，我正站岗也看了。东皎派我送给住在地洞内的王子元。王

问：别人看过没有？我答：团副看了。上了罗山后，徐连长认为石子俊诡诈，不愿归九旅管，编为八旅第三团。后在下马关（预旺县）驻地九旅和十六团把三团解决了，三团的大部分骑兵跑了。

在从下马关往靖远开拔之前，谷莲舫走了；十六团团团长张廷芝带着收编的周维琪的骑兵队，来把他的十六团也带回陕北。还在部队到达下马关之后，就派人去兰州和军阀雷中田（雷原是冯玉祥的师长，冯失败后成为地方小军阀，驻兰州）联系。这时，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就为雷中田所收编，八月间开到靖远驻扎练兵。十五团未回陕北，完全是我党在其中做了工作。当时如果回陕北，这支我党很有基础的部队将没有发展，甚至会被井岳秀打垮。另外，石子俊、王子元为了他们个人势力的发展也不想回陕北。我们党开会分析了这些情况决定去兰州。年底部队开到兰州，住拱星墩营房，半月后又开到定西及李家堡内管营宁远镇（当地叫牛营店）一带招兵和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王团不隶属石子俊的九旅管辖，但石子俊总想控制王团。所以九旅和王团的矛盾愈演愈烈。既谁也管不住谁，又因势力都弱，谁也离不开谁，走到哪里都驻在一块。当时，我党比较倾向王子元，反对石子俊，因为王子元暂时可以和我们合作。队伍开到靖远，地方开欢迎会，县长致欢迎词，光讲欢迎九旅。十五团学兵队和几个连代表在自由演讲时，说自己是八旅十五团某连的兵。主持会的县长忙补说：今天是欢迎八旅和九旅的武装同志。在台上坐的王子元很不高兴，石子俊不高兴。王、石不合，在定西宁远镇发生冲突。雷中田就将王团改为工兵营，调到兰州。1931年8月，王部奉雷中田命在兰州城内

打马鸿宾时出了力，得胜后雷即委任王子元为甘肃保安司令部第三游击司令，队伍又开赴靖远。

王子元在靖远大肆扩军，把部队迅速扩大为不充实的3个团，约一千几百人。1931年秋冬之间，陕西杨虎城派孙蔚如的十七师进军甘肃，联合陇东的陈珪璋师打兰州，雷中田失败。当孙和雷在定西清凉山鏖战时，王子元派高昆山（党员）当代表，到会宁和陕军联络，投靠孙蔚如（在此之前，杨虎城经过杜斌丞已和石子俊、王子元联系好）。雷的一个炮兵营败退到靖远时，王将其缴械，除步枪外还有九门迫击炮（无炮弹）。1931年冬，孙蔚如委任王子元为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又扩充成立了炮兵营和骑兵营，这两个营的营长沈毅民（炮兵）和汪兴民（骑兵）虽然都是党员，但已蜕化变质，不革命了。王子元的侄子王治邦从高广仁土匪部队中带着几十个人来了。编为王子元的特务连（警卫连），王治邦还兼了一团一营的营长。王子元并且依靠靖远收编的反动势力杨梓才的三团。这样王子元就有了自己的反动力量基础，开始排挤共产党。

王子元这支部队里党早就进行了活动。开始，党的秘密组织是由陕北特委领导，派到部队内的党员军官和士兵有几十个人，八、九旅都有秘密支部，上面领导机构是军委。第一任军委书记是八旅十五团四连的排长姜耀。姜到兰州后养病，离开部队。第二任是黄培中（字育华，任连长），在定西李家堡和回军打仗时牺牲了。以后石子建当军委书记。王子元和石子俊在定西分裂后，党的秘密组织分成两部分活动。王子元部开到兰州，党委改为团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石子俊部的党组织也归陕西省委领导，石部后来开到庆阳地区驻防。

我是王、石定西分裂后离开王子元部的。1931年春，王

子元团部驻在定西李家堡。原一连连长陈国宾已升任一营营长，他原来的基本队伍一连改为二连。由柴明堂接任连长，学兵队毕业后分我回这个连当司务长、排长。那时，沈毅民任一连连长，汪兴民任三连连长，这两个连是我党党员带的队伍。雷中田命令王团向通渭的马廷贤回军进攻。军到时，回军撤退了，王子元率部队返到宁远镇，他住在柴明堂的二连连部（一个小土楼）。

三月的一天晚上，陈国宾召集柴明堂和沈毅民到营部开会，策划缴王子元的枪，搞掉王子元，投靠石子俊，自己当团长。会后，沈毅民回到一连连部。当时我是支部书记，高昆山、王明贤是支部委员，我们三个正在一连开会，沈向我们报告了陈国宾开会的情况，支部决定派我立刻去给王子元报告消息。我们分析认为：陈国宾和石子俊勾结（石旅部驻定西城内），如果成功，会把我们带兵的党员撤掉，为了保存势力，必须反对石、陈的这个阴谋。

我给王子元报告了这件事后，王带着护兵从后门跑到一连驻地去了。柴明堂带着二连的排长和陈国宾的护兵去抓王子元扑了个空。这样一、三连和二连就在宁远镇前、后街形成了对峙，但未交火。后经石子俊派参谋长杜立亭调解，陈国宾带着他的二连到定西城内投靠石子俊，石部后来开到静宁，归孙蔚如后又开到庆阳、合水一带。部队里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保存了一些力量，以后陕北又去了一部分同志工作，到1945年终于促成曹又参当代旅长时的起义，参加了解放军。

我在分裂的当时并未暴露，也混在队伍中随陈国宾到定西城内。过了几天，我怕陈国宾发现。追查出报告王子元的事，和石子建（军委负责人）商量后），脱离部队，和高岗一同到

平凉和刘志丹同志一块工作去了。

我党基本掌握的学兵队

王子元团驻平罗姚伏堡时，我在一连当兵。这时，陆续来了一批榆林中学的同学，其中有黄培中、李树林等 10 数人。谢子长从陕北把原来准备组编十一旅的同志也送来了，有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同志。张东蛟由陕北回平罗后，在十五团组织了学兵队，有 40 多人。学兵队的人员在姚伏堡已集中了，到立岗堡（现贺兰县）才正式成立。张东蛟兼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李树林是司务长，卢子元、常紫良是军事教官，主要讲教典范令，也讲一点测绘、骑兵战术等军事科目。由陕北来的两批同志都编进去当学员，曹华山、常焕章到平罗先分到九旅，这时也调来，编入学兵队当学员。学兵队是我党策划组织起来的，党员占多数。我那时任学兵队的党支部书记，后来石子建任支部书记，我为军委委员。1930 年秋，部队在靖远时，黄培中（字育华）任军委书记，他在学兵队是文书。学兵队的队部即是军委办公室，在靖远教育馆（现是农机厂院内）的楼上。晚上，我们常在那儿开会。党在学兵队里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向明、李培清等同志都是这时发展入党的。在学兵队里，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党员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也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为以后搞兵变打下基础。

当时军阀部队里士兵的生活非常苦，但是学兵队里政治文化生活很活跃，经常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唱少年先锋队歌，精

神很愉快，因为大家都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学兵队里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我记得大家还编了许多秧歌，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反动军阀搜刮老百姓、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丑恶行径。比如在靖远练兵，看到黄河上汲水轮水车汲水浇地，有的同志作歌：

靖远人民真聪明，
黄河上安了汲水轮，
浇水地不用费劲。

党员高子祥（十五团书记官），在固原战斗后曾写词抒情，表现了当时一些革命青年的思想状况：

从军今半载，
遍足陇东游，
历尽千般苦，
挥刃未甘休。
誓愿杀敌尽。
旋里伴耕牛。

当时，学兵队的同志写的秧歌和诗词大量的都是揭露军阀混战不休，土匪猖獗，兵匪不分，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的情景。有一首是写当时甘肃情况的：

甘肃封建割据，
股头统治人民，
搜刮剥削，
苛捐杂税。

官兵变土匪，
土匪变官兵，

民不聊生，

十室九空。

还有控诉军阀混战，战火连绵的：

宁夏出发打固原，

固原退回打宁安，

石子俊要上罗山。

上了罗山回头看，

看见八旅没法管，

起阴谋解决三团。（石子俊打八旅收编的三团）

固原死了姚团副，

宁安死了韩参谋，

士兵们死得真苦。

队伍到了下马关，

穿衣吃饭真困难，

派代表四处趲赶。（陕北土话找主儿）

也有骂军阀的：

“三多”司令石大眼（石子俊三多：官比兵多、
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

天天起来抽大烟，

扣军饷不要球脸。

旅部住在定西县，

扣了军饷成千万，

内管营队伍捣蛋。（内管营属定西县，过春节没

发一个饷钱，下级军官和士兵都闹起来了。)

部队到了驻地，学兵队常演新内容的戏，对驻地老百姓和士兵进行宣传，这对士兵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当时，党组织也很注意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1930年在靖远、定西驻防时，针对部队顽固势力增强和一部分党员在部队里职务升迁，给党带来了一些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党内进行了反对升官发财思想的教育。因在固原战斗中把党内文件丢失了，我们在靖远写党员教材时，我和黄培中几个人凑六大文件基本内容，大家都说不全，“党员须知”也写得比较简单，党的“十大纲领”只写了九条。但是对六大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前途等基本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党的有些工作是很不错的。后来听说，高鹏飞等同志在连队和蜕化分子卢子元做过非常坚决的斗争。卢子元（河北人）上过军事学校，在学兵队当教官，以后到九旅当连长。高鹏飞、曹盛荣、曹华山在学兵队毕业后分在他的连内当排长。卢要贪污军饷（也叫维持费），高鹏飞等同志发动士兵向卢斗争，卢理亏自杀未死，离开部队走了，高鹏飞继任连长。这次斗争对1932年高鹏飞等同志在西华池领导兵变成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整个部队里党的工作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从宁夏出发后，就和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络，使政治教育没有坚持下去。学兵队毕业后，党的工作更涣散了，有些党员身上个人主义膨胀，只顾升官发财，不肯管党的工作。甚至有人蜕化变质，投靠军阀，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

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军事教育，学兵队的学员于1931年春在定西毕业，大部分分在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当连长、排长、

司务长或文书。学员中也有不革命的，也有后来叛变走向反动道路的。

附：学兵队名单

大队长：张东皎（字伯英）
分队长：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
司务长：李树林（字友竹）
教官：卢子元、常紫良
学员：黄培中（字方华）、吴焕文（原名吴世彩，字焕文，土改时叛变）、李向明、李培清、高鹏飞、曹盛荣、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曹华山、史法直（郝醒民）、吕效端、姜鹏扬（姜耀的弟弟）、李仲英、营正本（营老脑，在下马关跑了）、李登榜（在下关跑了）、杨林（雨培）、吴文中、高上一页中、韩士杰（韩参谋之弟）、王德胜、路文昌、魏景明（原名魏长春）、白天齐、任正乾、常焕章、阎宝富、曹炳奎、石子建、霍义林、黄子元、张汉臣、杨宗智、冯振江、魏邦定（靖远打拉池人）、王品肖（王宋义在宁夏李岗堡入学不久回陕北了）、宋长荣（在固原战斗中，敌已攻到我军阵地前沿几十米的地方。双方火力很猛烈，他突然一个人向敌方跑，跑了几步便倒了，李副官拽着他的脚拉回来还末看死活，就撤退了，把他丢了。没有命令他就冲锋、乱跑，可能是神经失常。）（到定西还招了一批青年学生，名字忘了）。

忆在三边做兵运工作

☆ 胡颖民^①

我是1930年春由陕北特委派到三边搞兵运工作的。当时安边驻的是张鸿儒团，定边驻的是任和庭团。我去时担任中共三边区委书记。区委管辖定边、安边等支部。定边支部书记赵觐龙（米脂人，兼共青团三边区委书记），安边支部书记韩一凡（安边人），区委委员有汤登科（汤中甫）、龙施普、韩一凡、杨和春（神木人）、赵觐龙等人。高尚信是团区委副书记。三边共有党员30多人。高广仁营里有几个党员和高尚信单线联系。我的公开身份是安边高小教员。我去三边还兼任谢子长旅党团（以后改称党组）书记。我在安边半年时间，去定边10多次。刘志丹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时，指示搞兵运工作的方式是打上国民党的旗号来搞。驻宁夏平罗的苏雨生（暂二军军长）要扩充部队。张东蛟（党员，横山人）是王子元团副团长，和我单线联系。这时谢子长搞起个第十旅并当旅长，陕北特委通知各县派遣一些党、团员到十旅等部队搞兵运工作。我到安边先整动三边党、团组织，接着就搞兵运工作。三边区

^① 胡颖民，榆林人，中共早期党员。本文是作者1982年9月16日回忆，原件存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委主要是搞兵运工作。陕北各县过往同志称三边区委是“中转站”，被派去的同志通过三边区委分配到王子元、石子俊各个部队搞兵运。

放暑假我回榆林，见到李文芳，向特委汇报了三边兵运情况。特委指示我脱离三边地方工作，作谢子长部队的专职书记。不料暑假期间，三边形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刘志丹打庆阳失利，张廷芝派兵袭击三道川，周维奇向张廷芝缴枪，三道川被搞光了，十旅被搞光了，谢子长走了。高广仁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没有落足处，后被宁夏马鸿宾收编了。安边张鸿儒把高尚信捉住枪决了。

我在王子元部队里的兵运工作回顾

☆ 汪兴民^①

1929年冬天，我和张东蛟、牛化东、姜耀、朱光霁、王国栋、姜鹏扬（姜耀弟弟）、夏逢时（夏和尚）、刘世庵、刘子贞10人，经刘志丹介绍到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我们从三边动身到盐池住了两个月，过罢阴历年，开到宁夏平罗姚伏堡。这时张东蛟又返陕（榆林、绥德），领来了高岗、张秀山、高昆山、贺晋年、徐子猷（我是徐的入党介绍人）、康明礼、贺子平、李友竹等大几十个党员和青年学生。他们一到，全部编成学兵队。张东蛟任学兵队队长，谷莲舫任八旅旅长，石子俊任九旅旅长。我在谷旅王子元十五团三连当司务长（连长赵万顺，砖井蔡渠人）。八、九两旅统归苏雨生骑二军所辖。后来，苏雨生率八、九两旅及其原来的部队第七旅赴平凉接防，途经固原被黄德贵部击垮，刘子贞和夏逢时阵亡。苏部从固原撤下来打开了宁安堡（即中宁），但冶成章部队住的寨子未攻克，

^① 汪兴民，定边县安边堡人，生于1907年，中共早期党员，1929年经刘志丹介绍到宁夏苏雨生部八旅王子元团学兵队受训，历任排、连、营长。十一旅起义前退伍回乡。本文是作者1982年12月4日回忆，原件存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八、九两旅脱离了苏部撤到下马关，后来又经冶成章派人说合，把八、九两旅编成伪甘肃雷中田新编第八师（系刘郁棻残部）的第三旅。石子俊任旅长，开赴定西一带驻防。邓宝珊入甘后我们又归了邓宝珊。编为警备三旅，王子元任旅长，张东蛟任三旅参谋长，开赴海原一带驻防。张东蛟在海原搞“水泉插红旗”兵变失败，脱离王子元。但王子元仍然往回叫张东蛟和杜鸿范（杜斌丞的儿子，共产党员）。杜没被叫回来，最后走了西安。张东蛟说他要回去见王子元旅长。此时，他已挂了花，不防被牛化东团骑兵营（我是营长）贺子平连的三排长张生华打死了。

刘志丹领我搞兵运

☆ 刘实庵^①

1929年的秋季，刘志丹由保安来到安边召集慕义三、田佐勤、高尚信（团员）和我等七、八个党、团员在安边城西教养所的菜园子开会，刘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追念烈士李子州，告诉我们他在南山组建游击队，没有枪枝，要求我们活动的给他搞些枪枝。

会后我们就活动搞枪，办法是我们通过王子元（安边人，原在任和亭团当过连长，当时闲住）到任和亭团买了一支手枪，钱由我们党员共同筹措，我自己拿出七十元银洋，枪买下就交给刘志丹，他住了两三天就把枪带上回保安去了。

1929年的春季，谢子长由南面来到安边住在东街姓郭的饭铺，经和党组织接头，派我同谢子长一同到盐池活动，我们住在盐池县城一个镇川堡人开的旅店里，以经商名义待了两个多月，目的是等待事先已派到宁夏的两个同志回盐池接头。后

^① 刘实庵，又名文华，定边县安边堡人，生于1906年，1925年冬在榆林中学由刘志丹、汤中甫介绍入党，曾任中共安边支部书记，三边区委委员，1932年自动脱党。后落伍回乡。本文是作者1984年11月25日回忆，原件存定边县委史志办公室。

来回来一个，另一个等了好久没等上，我和谢才又回到安边，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后回到子长去了。

1929年冬天驻宁夏平罗苏雨生军（冯玉祥部下）扩充军队，谷连舫、石子俊（靖边人）、王子元（安边人）、张廷芝（吴旗人）四人被苏雨生分别收编，谷连舫任第八旅旅长，石子俊任第九旅旅长，王子元、张廷芝分别任第八旅十五团团团长、十六团团团长。同时，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又来到安边搞兵运工作，把安边党员刘世庵（后任团部军需主任）、牛化东（后任第四连一排长）、朱光霁（后任第三连长）、刘子贞（后任第四连长）、姜耀（后任四连二排长）、夏逢时（后任第四连班长）、王国栋（后任团部军需）、贺寿卿（后未去）、汪兴民（后任第三连司务长）、张东皎（后任少校团副兼学兵队长）派到王子元团活动，张东皎负责支部工作。

1930年春苏雨生将谢子长收编为第十旅，谢来时只带一百多人，多系学生党员（横山高岗、子长贺晋年、米脂高昆山、榆林贺志平等），旅未建成，把这一百多人中的三十多人编成十五团学兵队，高岗、李友竹任班长，张秀山编在十五团一连当司书（因该连没党员）。

八旅驻军宁夏姚伏堡，后移立岗堡，九旅驻军平罗县城。

1930年6月苏雨生军奉命调防去平凉，经过固原时被黄德贵团打败，官兵损失重大，党员刘子贞、夏逢时和非党进步中校团副姚铁骏（山西离石人）牺牲。部队折转回平罗，路经宁安堡时与冶成章决战，后八、九两旅见跟苏雨生没希望，就从苏雨生部变出跑到乐山、甜水堡、萌城一带，过了十多天后被兰州雷中田收编，部队开到下马关驻防。此时王子元派我同谷连舫、张润民去宁夏领饷，我走到吴忠未去银川，回到安边不干了。

曹又参传略

☆ 曹国权

曹又参，原名汉杰，1901年2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海流兔河大湾村。祖上以农牧为业，后因农田草原逐渐变为沙漠，加之欠高利贷过多，家庭生活遂贫寒下来。

曹又参从11岁起，断断续续上了4年私塾，15岁到横山县城高小上学，18岁考入榆林中学，21岁考入北平平民大学政治经济系，25岁毕业。他家境贫寒，学习成绩优良，上中学和大学的学费大部分靠亲友接济和横山县及榆林道补给津贴。

1921年至1925年，曹又参在北平平民大学读书，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看到了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他尤其痛恨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对人民的压榨，曾想毕业后回陕北靠自己的热血联络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们打倒井岳秀。在北平上学期间，他同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常有交往，多受教育和启发。

1925年暑期，曹又参由北平平民大学毕业，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聘，到榆林中学当教员兼训育主任。是年冬，榆中一部分学生为要求参加校务会议而闹学潮，井岳秀派来100

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强行把十几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押出榆林南门外驱逐出境。井岳秀的这一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对曹又参刺激很大，他愤而辞职，决心开始倒井的实际活动。

那时，驻在陕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中，有几名小军官同他熟识，所以他选定柠条梁作为倒井的基地。1926年春，他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当上了靖边县县佐（驻柠条梁）。这年5月，在柠条梁县佐公署，他同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张润民、杨子显等6人开了个倒井的秘密会议，决定联络与井岳秀蒲城系部队不和的陕北地方部队，伺机兵暴倒井。同年秋天，他借故到榆林打听情况，得知杜斌丞对井岳秀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就将他们的倒井计划告诉了杜斌丞，得到杜斌丞的鼓励和支持。根据杜斌丞的意见，曹又参决定“倒井拥高”（高志清当时是驻神木国民二军骑兵师师长）。此后，他们的倒井活动就在杜斌丞的领导下进行。为了便于奔走各地进行倒井活动，曹又参辞去了县佐职务。到1927年秋共联络了30个连的倒井部队。这时，井岳秀对他的活动已有所察觉，于中秋节暗杀了思想较进步的驻清涧的石谦旅长。曹又参同几位倒井的人紧急商定，9月15日前后举行倒井暴动。为此，他亲自到神木向高志清主力部队通知此计划。但是，高志清借口杜斌丞去平津未回而不动，其他人则又借口未得到高志清的命令也按兵不动，这次倒井运动失败了。井岳秀四处抓人，曹又参于1927年冬到1929年秋期间，两次到北平躲避。后又从北平到绥远第一师范当教员。

1930年春，蒋、冯、阎新军阀酝酿内战，冯玉祥将其驻西北的嫡系部队调往河南，留其杂牌军苏雨生部驻守宁夏。苏雨生乘机扩充军队，中共陕北特委利用时机先后派了不少共产

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曹又参这时也到宁夏参加苏部，任石子俊九旅参谋长。不久，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甘肃平凉接防。苏部在接防过程中，先后遭到黄得贵、冶成章等部的阻击，伤亡惨重，石子俊旅脱离苏部，驻防下马关。8月，石子俊的九旅、谷莲舫的八旅，被兰州雷中田收编为第八师第三旅，驻防定西一带。“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部孙蔚如率十七师入甘，驱逐了雷中田，三旅又改编为陆军新十一旅。1932年冬，邓宝珊入甘，孙蔚如回陕，新十一旅从那时起归邓宝珊指挥，直到1945年10月起义时止。

曹又参起初任旅参谋长，1931年夏至1941年夏任特务营营长，1941年秋至1944年4月任一团团长，1944年夏至1945年10月任代旅长。

曹又参在新十一旅期间，始终坚持进步立场，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早在1930年，中共就在苏雨生部的八旅、九旅（即后来的新十一旅）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组建了学兵队，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秋，部队开到甘肃靖远，顽固派扬言“共产党要组织暴动”，九旅旅长石子俊拟清洗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十五团团长王子元部地下共产党员较多。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张东蛟、高岗找曹又参谈话，要求得到他的掩护，并请他设法消除当前危机。曹又参请他们指定一名负责人同他经常联系，彼此双方诚恳地接受了对方的要求。1930年冬至1931年春，高岗、李树林、黄育华3人经常到曹又参家中商量问题。1931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派胡立亭来新十一旅做兵运工作，李树林有意安排胡住在曹又参家中，胡先后任曹又参的副官、

副营长，负责党组织和曹又参之间的联系。

1930年冬，曹又参辞去旅参谋长职务，搞了一个特务营，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核心，掌握了一部分实力。

1931年夏，新十一旅到甘肃静宁一带。以石子俊、陈国宾（团长）等为首的顽固分子，对内克扣军饷，对外搜刮民财，内外怨声载道。曹又参曾计划以暴力清洗石子俊、陈国宾等人。从此，该部队内部进步势力同反动势力的斗争，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

1932年春，新十一旅开到陇东庆阳一带。当时刘志丹、谢子长已在东山竖起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红旗，曹又参想依靠内部日益强大的进步力量和反帝同盟军的支持，清除石子俊、陈国宾等反动军官。但石子俊对曹防范很严，不让他带的那个营进城或靠近旅部。同年夏，曹又参带两个连到了西华池，高岗也由东山来到西华池。曹又参向高岗谈了新十一旅内部的情况和清洗石子俊顽固分子的计划，高岗完全同意，并决定曹又参到庆阳对石子俊进行麻痹工作，设法将自己带的4个连全部调进庆阳，以利实现其计划，但当曹又参到达庆阳后的第4天，高鹏飞（一连连长）、曹盛勇（一连排长）把曹留在西华池的两个连拉到东山。石子俊得知此情况后，就把曹又参暗中监视起来，将靠近曹又参的几个连的武器也全部收缴，并驱逐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致使清洗石子俊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4年秋，曹又参到南京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以求摆脱石子俊的控制。他在10个月的学习中，进一步看穿了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围剿”红军，对外丧权辱国，屈膝投降日本的丑恶面目，对国民党更为深恶痛绝，

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5年秋，曹又参从南京军校毕业回到原部队，此时石子俊已病故，旅长由刘宝堂继任，他任一团一营营长。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经甘肃时，曹又参赞同地下党组织的意见，避免与红军作战，并将红军沿途散发的传单、标语口号等，收集起来阅读，并送给邓宝珊。曹、邓的关系原来就很好，此后就更加相契。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十一旅奉命由甘肃静宁开赴绥远一带抗日前线。路经庆阳时，受到八路军驻庆阳部队首长袁国平、王维舟等的热烈欢迎。袁、王向曹又参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与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一起抗日，曹又参表示完全赞成。

新十一旅到达陕北安边时，归绥、包头已经失陷，部队便在安边一带驻扎了一个冬天。

1938年初，新十一旅移防榆林城南三岔湾、归德堡、米家园子、鱼河一带不久，复兴社分子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的军统特务，告发了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四连连长冯世光、五连连长高宜之、九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副胡立亭等9名共产党员。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党组织得知此消息后，经牛化东找一营营长曹又参商量，约请二营营长柴明堂、三营营长宋子元商量对策。曹又参指出，这是敌人耍的阴谋，妄想吃掉一团，投靠胡宗南。3位营长意见统一后，共同去见一团结团长陈国宾，分析了这件事情背后敌人的企图，争取陈国宾向邓宝珊担保，才将这批共产党员保护下来。

1940年春，新十一旅全部从榆林移防到安边、柠条梁一带。这时，适逢高岗在延安任职、贺晋年率部驻防定边。他们有机会向曹又参详谈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曹又参提出希望把延安出版的刊物和报纸经常寄给他看。从此，他与延安和定边有了经常的来往，贺晋年、朱子休、李启明、葛申等常到安边他家做客。在他先后担任过营长、团长的一团中，早已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团副牛化东、李树林、营副胡立亭、副官贺志平及连长冯世光、高昆山、赵武臣、高宜之、朱子春、谢有德等都是共产党员。曹又参同这些党员关系密切，许多重要问题都同他们商量，地下党组织不便于做的一些工作，也就让曹又参去做。

1941年秋，安边土匪武装头子张廷芝、张廷祥弟兄妄图吞并新十一旅，霸占安边，在一次宴会中击毙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并将该旅驻安边连以上军官全部扣押。曹又参等人脱险后，到白泥井连夜与牛化东等人开会，议定由曹任总指挥，牛化东任副总指挥，依靠驻定边的八路军的援助（借粮、借款、借兵），并由牛化东联系他原来的部下安边保安中队长夏品三、杜廷之里应外合，迅速消灭了张氏弟兄的土匪武装，收复了安边，拔掉了张氏父子几世经营的武装巢穴。这一事件后，一团团长陈国宾任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

1941年冬，曹又参邀请驻定边时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的贺晋年等来安边视察，一团全体官兵以阅兵式列队到西门欢迎，并设宴招待，同他们长谈了3天。

1944年4月，新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在谁继任旅长的问题上，一团的进步势力与二团的史钊城等复兴社分子展开了激烈斗争。一团地下党组织派李树林去榆林说服邓宝珊，邓

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

曹又参任代旅长不久，中共三边地委派葛申到安边了解情况。为了葛的安全，他把葛接到自己的家中住，随后又派人将葛申护送出安边地界。在这年秋天，曹又参通过苏杰儒向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联系，请示工作。西北局让苏杰儒传达了党的指示，并给了曹又参 30 万元法币的补助金作为军饷。

由于曹又参同中共党组织的频繁接触，致使安边国民党的特务和二团史钊城等特务分子不断向蒋介石报告曹又参有通共活动，蒋介石多次密令邓宝珊查办。邓宝珊亦为此苦恼，要曹又参对那些情报人员尽量应付，使之尽可能少报告一些。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10 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同志派杜立亭来安边传达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希望曹又参和新十一旅走上反内战的道路。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将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接受改编为正规师，妄图把新十一旅吞并掉。曹又参得知调防改编的消息后，经过反复考虑，总结了他个人及新十一旅走过的曲折道路，认为只有起义才能摆脱新十一旅被覆灭的命运。因此表示决心率部起义，走向光明。为了慎重起见，随后他决定带病去榆林见邓宝珊。他对杜立亭说：“一切问题到榆林后决定。你回延安请示一下，最好也去榆林一趟。”临行前，他向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也简略地谈了他的意图。

曹又参到榆林后，正值傅作义连续急电催邓宝珊去绥远。邓起程时对曹说：“你在此养病等我，我在一个月之内一定回来，咱们需要研究一下中国的时局问题。”曹未来得及同邓密谈率先起义反对内战之事。

1945年10月26日晨，曹又参接到安边发生事变的报告。当时还不清楚内情，当日下午他即带着自己的骑兵卫队日夜兼程返回白泥井一团驻地，才知道是二团团团长史钊城勾结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二团副团长张鼎臣等复兴社分子乘他不在之机，阴谋以武力清洗一团革命力量。一团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个阴谋，经请示三边地委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于10月25日击毙张鼎臣，逮捕了吴棻、石佩玖，毅然率部起义。贺晋年随即率领警三旅的部分部队，帮助起义的一团，围攻驻守柠条梁的二团。经过激烈的战斗，攻下了柠条梁，击毙了史钊城。曹又参回到安边时，警三旅和新十一旅官兵列队欢迎，大家高呼口号，庆祝起义胜利。新十一旅起义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任命曹又参为旅长，牛化东为副旅长，王子庄为参谋长。新十一旅的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全旅参加起义者达2000余人）。毛泽东主席称赞新十一旅起义是“火车头”。

新十一旅起义后不几天，曹又参由贺晋年陪同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在枣园小礼堂接见他时，亲切地笑着握住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任弼时向他谈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胜利的前途。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组织了欢迎晚会，阎揆要参谋长致欢迎词。他在延安20多天中，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1946年2月，三边警备区改为三边军分区，曹又参任司令员，兼新十一旅旅长。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10月，以曹又参为旅长

的新十一旅在起义周年时，向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起义周年感言》，痛斥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和发动内战的罪恶，表示坚决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

1948年8月，曹又参由贺龙、王维舟、谭生彬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由三边军分区和绥德军分区部队组成的北路军，配合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全境。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委员，曹又参等任副主任委员。12月，宁夏省军区成立，曹又参任副司令员。此间，他亲自率部到阿拉善旗等地进行剿匪，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兵动员工作，采取积极慎重态度，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54年，他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不适宜继续在军队工作，主动要求转业到地方从事农牧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政务院任命他为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未及到位，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将宁夏省并入甘肃省，他被任命为银川专员公署专员。他工作认真负责，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研究问题。1955年、1956年甘肃省实行高征购，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一方面尽力完成任务，一方面如实向省粮食厅反映银川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此在1957年底至1958年初召开的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打成“反党分子”，并将他同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和银川地委书记梁大均打成所谓“反党集团”，均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1962年秋，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钱瑛亲自带工作组到甘肃、宁夏调查，查明了真实情况。196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曹又参甄别平反，恢复党籍，恢

复原级别，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参事室副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曹又参再次遭到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70年他在家养病时，有一次发现工资中没有扣除他的党费，他双手捧着工资，颤抖不止，问他的老伴：“为什么没有扣党费？是不是不给我恢复组织生活？”从此，血压一直偏高，于9月1日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70岁。

曹又参的一生，是曲折中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这种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曹又参请命

☆ 纪国庆

1945年秋，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锣鼓声、欢呼声还在耳边回响，蒋介石便开始酝酿内战，已经挂上西北战区总司令职衔的胡宗南，从驻防三边的陆军新编第一军十一旅来的情报，认为该旅极不可靠，决定调往包头进行改编。消息传到十一旅，官兵上下甚为震惊，一团团长牛化东和十多名营连长呈辞旅长，坚决反对他调改编。一向表现开明进步的曹又参旅长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决定亲身赴军部“为民请命”，于10月10日带领亲随前往榆林。

时任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对曹又参及其部下的请求，左右为难，他深知胡宗南固执自傲，自己既不是亲信，部队又非嫡系，说亦无用；而推托不管，既违心，又失职。颇为过从亲密的军、旅长二人商议再三，以军部的名义电请胡长官收回成命。胡仅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语回复。邓宝珊只好对曹又参说：“你我共事多年，既是上下级，又是好朋友。我看你还是先回去稳定军心。调到包头还是我的部下，至于怎么改编，到时候我会竭力周旋。”曹又参叹了口气：“我来请命，也是为保全这支部队。十一旅的官兵多系三边人，共产党在那里已有十来年的根基，人心在共产党方面。所以，部队调往包

头，到底能带过去多少，实在难以预料。既然请命不成，我回去也羞于交待，倒不如留在军部，随时效命，免得将来被革职查办。”邓宝珊半开玩笑安慰说：“我不是当面奉承，你曹又参远见卓识，是我新一军中最有前途的将军，绝非庸碌之辈，何言效命？不过，你既已临时托大事予牛化东、王子庄，不妨多住几天，听一听风声，我们从长计议。”两个人又谈到目前国共两党的动向，邓宝珊认为：国民党依仗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意在消灭共产党，独霸全中国；但共产党也不会示弱，正积极准备迎接国民党的挑战。曹又参说：“抗战八年，全国军民都需要休养生息，民心反战，军心厌战，要是国共两党真的动起干戈来，必然得道者多助，由弱变强；失道者寡助，由强变弱。我这绝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大势所趋，大道斯然。”邓宝珊赞同地点头：“所以说你远见卓识啊！”

11月26日，军部收到特急情报，说十一旅一、二两团正武装对峙。于是，邓宝珊命令曹又参速速返回，稳定局势。曹又参当然也不敢怠慢，立即扬鞭起程。

11月3日，顽固派史钫城，张鼎丞为正副团长的十一旅二团被消灭后，中共三边地委、驻军警备三旅的领导高峰、吴志渊、贺晋年、张文舟，起义总指挥牛化东、王子庄和延安派来指导起义的葛申、刘清华等立即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从曹又参一向开明，近年来又有亲近共产党的表现看，他不管是否知道部队起义，只要得到消息，肯定会归心似箭，不可能久待榆林。于是便派十一旅中平时与曹又参相善的王子庄及地下共产党员李树林（友竹）、冯世光前往二营的驻地白泥井候迎。

曹又参到白泥井，才知道部队已经起义，他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同。当李树林、冯世光提出三边党政军领导请他到定边时，曹欣然同意。二营营长柴明堂担心旅长的安危，提出派部队护送。曹又参谢绝，他说：“共产党申明大义，宽厚为怀，绝不会加害于我。我曹某人半生戎马倥偬，今后很可能成为共产党优待保护的高级阶下囚。”这回他想错了，当他到定边，质问三边地委和警三旅领导人：“共产党将我曹某置于何地？”得到的回答是：继续任十一旅旅长，且部队驻地、编制、番号等均不变更。这使曹又参喜出望外，当即表示：共产党相信我，我将矢志不渝。

事后，他对十一旅官兵坦诚的说：“我赴榆请命，原以为虚此一行，实则成功之举。如果我在着，也许还会成为起义的绊脚石。所以说，请命这步棋我算是走对了。”已升任副旅长的牛化东开玩笑说：“人的一生确如一盘棋，一步走错全盘皆输，而旅长这步棋走对了，奠定了一生胜利的基础。”

不久，贺晋年同曹又参赴延安观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会见并宴请。时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赞扬十一旅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内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

牛化东将军传

☆ 苗斌杰

牛化东，原名牛杰，字殿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906年2月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贺圈镇王来滩村，1995年11月2日因病去世于银川，享年89岁。

牛化东出身贫寒，父母勤劳忠厚，一生务农。兄弟3人，大哥牛忠，二哥牛孝，均为农民。化东7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9岁丧父，辍学回家，跟着哥哥揽长工，打短工，饥寒度日。14岁投靠姑母，断断续续又读了5年私塾。1924受其表兄丁子齐影响，转入定边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接受进步思想教育。1926年2月，经中共地下党员汤仲甫、周梦雄、丁子齐的介绍，在定边城南沙窝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定边学生中第一个中共党员。入党后不久，即被选为学生会会长，成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骨干。

1926年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牛化东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带领学生闹学潮，团结开明绅士余鼎九同国民党定边县长丁鸿藻和反动绅士白炳汉等人展开斗争，迫使当局取缔了腐朽落后的“劝学所”，成立了教育局，共产党员汤仲甫当上了教育局长，丁子齐当上了高小校长，撤换了旧校长和一批思想迂腐顽固的教师。

牛化东在领导学生会期间，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主张，成立了“天足会”，他担任副会长，宣传和动员妇女放脚。他和会长郭子范带着一群学生把丁县长小老婆的缠脚布、绣花鞋用竹杠挑着，上街游行，后又砸了丁县长与小老婆成亲的宴席。丁县长恼羞成怒，下令抓走了牛化东和几个领头的进步学生，关进了公安局。党组织通过组织师生罢课、上街游行等斗争方式，迫使当局释放了牛化东等学生，“天足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6年夏，为了反对外国洋人把教堂建在定边城内和城郊，牛化东领导学生会和洋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人走到哪里，他们就把对台戏唱到哪里，洋人在街南游说，大肆宣扬洋教能救苦救难，他们就在街北演讲，教育群众反对洋教，不要上当受骗。定边“眼光庙”里有个“同善社”，是个迷信组织，经常利用迷信活动迷惑群众，牛化东就带领学生冲进庙里，三锤两棒子就捣毁了“同善社”。

1926年秋，牛化东高小毕业，被党组织推荐到冯玉祥在兰州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当时与牛化东一起从定边走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陶新亚、李临民、郭维化、丁广智、吕振华等人，到宁夏后，陶、李、郭3人留在宁夏工作，牛化东、丁广智、吕振华和石英秀介绍的孙志元、党君祥等人一起到了兰州。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实行血腥镇压。下半年，白色恐怖的“清党”运动蔓延到牛化东所在的兰州军校，由于冯玉祥部队严密封锁消息，许多共产党员被秘密逮捕。地下党员钱清泉、王孝锡、马林山、胡清祯、贾宗周等人先后失踪，10月，反动派又以钱清泉所招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王孝锡本子上记了许多人名字为

由，把牛化东和地下党员马尔逊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牛化东遭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在炕席下用火钳子钻开小洞和隔壁房子的同志取得联系，统一口径，传递消息，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当时，冯玉祥部队军长、师长、旅长等许多高级军官的儿子也被抓了进来，他们的家属闹得非常厉害。敌人看这样闹下去不好，又没有抓住把柄，只好把抓到的人编成“三民主义教育班”，学习了两个月后，分配到各部队。牛化东被分到甘肃无线电传习所当管理员，负责上街买材料修房子。一天，他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机会，偷偷跑到黄河边，用买材料的钱雇了一个木筏子，顺水逃到了宁夏吴忠，于1928年4月回到定边，在定边高小任体育教员。

1928年陕北特委成立，决定由共产党员打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杂牌军）中，争取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1929年冬，刘志丹到定边找到牛化东说：“你搞教育不合适，还是搞军运工作吧！”并亲自把牛化东送到国民党新编第八旅王子元的部队，任四连六排排长，1930年5月升任连长。是年8月，石子俊、王子元脱离苏雨生部，投靠甘肃兰州雷中田，被改编为新八师第三旅，石子俊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牛化东仍在王子元团任连长，部队驻防甘肃靖远。1931年8月，雷中田任命王子元为甘肃保安司令部第三路司令，牛化东任第二中队中队长。年底，王子元部又被杨虎城北路军驻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改编为警备第三旅，王子元为旅长，下辖三个团，牛化东任第二团团长。其时，王子元部的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特支改为党委，张东蛟任书记、牛化东任副书记，下辖三个支部，党员90多人，大多集中在旅部和二团。

1932年5月，地下党组织派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王子元部发动兵变失败后，王子元部随之解体，牛化东、高昆山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转到石英秀的第十一旅，继续搞兵运工作。牛化东到十一旅后，先后担任副官、参谋、军械员、副团长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十一旅被调往三边一带驻防，1938年调往榆林，驻三岔湾、归绥堡、鱼河一带，牛化东任一团中校副团长。此时，十一旅内部关系复杂，地下党所掌握的进步力量与顽固势力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二团张鼎丞叛党，二团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团叛徒任怀义向时任十一旅旅长的刘宝堂告密说牛化东、李树林等9人系“赤化分子”，准备率一团投靠共产党。刘宝堂背着邓宝珊向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蒋鼎文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电文内有：“贵部十一旅一团中校副团长牛化东，据查确系奸党分子，希严解西安，以便审讯”等语。此事经一团团长陈国宾向邓宝珊以人头担保，牛化东又勇敢的去榆林向邓说明情况，才搪塞过关，转危为安。

1939年，国民党绥东军军长郭希鹏，要王子元组建一个旅，王子元找牛化东“帮忙”。经党组织研究同意，牛化东暂去王旅，被王委任为骑兵十五团团长，驻防伊克昭盟。

1940年秋，王子元旅被胡宗南调往甘肃静宁整训，部队一到驻地，旅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全被撤换，胡宗南让牛化东去天水骑兵学校任职，牛化东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以病为由，拖延未去。1941年，他又回到十一旅，任中校副团长，同时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1941年，新十一旅全部驻防在安边、白泥井、柠条梁一带。安边是三边土匪、恶霸张廷芝及其父张兰亭，张廷祥及其

父张玉亭多年苦心经营的老巢，新十一旅的到来，使张家父子失去独霸三边的威风，于是，张家父子便利用十一旅中旅长刘宝堂与一团团长陈国宾之间的矛盾，上窜下跳，挑拨离间，欲乘十一旅内讧之机削弱、吞并十一旅，谁想挑拨奸计被识破，便更加仇恨刘宝堂。从此，张家父子就密谋着一桩更大的阴谋。为了消除刘的戒备，他们请出十一旅军需主任朱仙洲为媒，将张廷芝的女儿张淑琴许配给刘宝堂的儿子刘汉。刘不知是计，欣然与张家结亲和好。

1941年9月4日，张家在安边城内大摆宴席，宴请胡宗南的点验委员、地方绅士和十一旅连以上全部军官。席间，张廷祥以敬酒为名，抽枪打死刘宝堂，随即扣押了十一旅全部赴宴军官。当时，牛化东因公出差定边，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向三边地委汇报。经三边地委决定，牛化东立即赶到部队集结地白泥井，召集地下党员和可靠的党外军人开会，以为旅长报仇为名，成立了讨张指挥部，牛化东担任总指挥（后一营营长曹又参放回，牛化东一再谦让曹任总指挥，自己担任副总指挥）。9月14日晚，牛化东带领十一旅官兵智取安边城，激战1小时，击毙张玉亭，张廷祥逃跑后被抓获公审枪决。张兰亭、张廷芝父子及其家属重贿柴明堂后，被柴放走。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之后，一团团长陈国宾继任旅长。1944年4月5日，陈国宾病逝，为旅长之职，一团和二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后经党组织积极活动，把能够与我党紧密合作的一团团长曹又参推举为代旅长，牛化东、李树林等成了一团的实际领导者。至此，十一旅一团被地下党组织控制，13个连长中，11个是地下党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对胜利果实

的掠夺，继续实行全面内战和排除异己的反动行径。他们觉得十一旅不可靠，便命令胡宗南以整编和调防为由整跨十一旅。于是，胡宗南命令十一旅开赴包头，接受正规师的改编。接到命令后，代旅长曹又参去榆向邓宝珊请示，二团张鼎丞、任怀义等复兴社分子，乘机窜到安边向一团游说改编的好处，并采取封官许愿的办法瓦解一团。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三边地委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将原定于10月27日举行的起久提前到25日，并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八、九两团和七团的一个营，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等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秘密商定起义方案，并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

25日拂晓，起义开始。指挥部派人扣押了副旅长吴棐、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国民党驻安边党部书记及公安局长、税务局长、邮电局长等人。复兴社反动分子，二团副团长张鼎丞拒捕被击毙，国民党县长连友贤跳城墙逃跑。牛化东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部门。当日下午，警三旅赶到，受到安边军民热烈欢迎。27日，起义部队和警三旅在安边城召开会师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以及十一旅起义官兵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28日，攻打柠条梁战斗打响，经过4天4夜围打劝降后，11月1日，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亲临阵地命令强攻，于11月3日拂晓攻克柠条梁，二团团团长史钊城等100多人被击毙，慕寿山等800多人被俘，周效武营400多人从堆子梁逃往榆林。

起义开始时，地下党组织为了让在榆林的曹又参返回部队参加起义，牛化东急电邓宝珊：“二团要以武力解决一团，一团发觉后，正在对峙中。”曹又参得报后星夜返回，部队夹道

欢迎。11月5日，曹又参代旅长及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等全体十一旅官兵发表了起义通电。这次起义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起义起到了一定的带头和促进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时称赞说“你们是火车头！”。起义后，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十一旅的工作，将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十一旅番号，正式任命曹又参为旅长，派郭炳坤为政委，牛化东任副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

经过十多年的地下斗争，牛化东终于盼来了起义成功的这一天。在过去的岁月，他生活、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为了迷惑敌人，掩护同志，保护自己，不得不做一些不愿做的事情。染上大烟瘾，便是其一。现在部队已获得新生，他清楚的知道，起义的官兵大部分还带着国民党军队固有的恶习，吸毒、耍赌、嫖妓、抢劫、军官打骂士兵等现象，司空见惯，如不及时改变这种习气，哪里还像革命的队伍？牛化东暗下决心，自己要带头戒毒，整肃部队纪律。

在牛化东等部队领导的带头和政工干部的教育和帮助下，全旅开展了戒烟禁毒、革命纪律大学习、大练兵，以及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收效很大，部队的纪律、作风发生了明显改变，逐渐迈向了革命化。牛化东也成了十一旅第一个戒掉毒瘾的人。一次，他去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司令员特意安排在他的房间里放上烟具，可他丝毫未动。贺老总关切地说：“戒烟可不容易，想抽就在这儿抽上一口，不要到外面去抽！”牛化东坦诚地说：“老总，你放心，我已戒掉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戒烟药说：“戒烟再难，也难不倒咱共产党人，就凭着共产党人的决心和这些药，我已战胜了毒瘾！”

1947年，蒋介石调集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

攻，3月24日，马鸿逵主力侵占盐池，几天后又向三边地委和专署所在地定边扑来。4月3日晨，卢忠良部以5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定边城。牛化东率十一旅与警三旅八团并肩战斗，保卫定边。战斗从早上9点直打到下午3点多，激战6个多小时。八团在城外阎门一带战斗，伤亡惨重，逐步撤去。城内被围困得铁桶一般，牛化东仍率部激战死守，后接到彭德怀电令“迅速撤出，否则有全军覆灭之危险！”牛化东自告奋勇，带特务营冲锋在前，机关人员居中，二团长李树林断后，冲出重围，撤离定边。

从此，国民党大兵压境，革命形势急转而下，少数革命意志薄弱者自首变节，十一旅内副旅长柴明堂、一团团长赵级三、二团副参谋长许万海等人先后叛变，革命力量受损。清乡团头子，恶霸张廷芝父子乘机打回三边，形势非常严峻。此后，牛化东带领部队转战三边，同敌人展开了不懈地斗争。

1948年秋，牛化东赴延安参加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透彻地理解，政治上更加成熟。

1949年6月14日，牛化东率三边地方部队二团和游击队1000多人攻打安边，未损一兵一卒，攻克安边城。17日，宁夏马鸿逵及其二少爷马敦静派骑十旅少将副旅长王伯祥率步骑3000多人，急行军包围了安边，同时派步三师师长马英才率一个步兵团和一个迫击炮连，携带8门迫击炮，从灵武乘汽车赶到安边增援。敌人的气焰异常嚣张，人喊马叫，扬言：“打进安边城，活捉牛化东！”“吃牛肉，剥牛皮，抽牛筋！”迅速将安边城围得水泄不通，此时我军想要突围已非常困难。面对

敌情，牛化东沉着镇定，一面指挥军民严加防守，一面思谋突围之策。下午，敌人送来以功名利禄诱降与恫吓威胁兼施的“劝降书”。牛化东阅后嗤之以鼻，回书痛斥。随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好“梅花阵”突围方案。黄昏时分，牛化东乘敌人吃饭之机，下达突围命令。他组织了4支精悍分队，前面一支勇猛开路，硬冲硬打，两侧两支防卫掩护，机关和地方政府人员保护中间，牛化东亲率一支断后。部队官兵见指挥员留在最后撤退，军心安定，士气高涨，急攻猛打，迅速冲出重围，撤离安边。

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牛化东担任了宁夏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此时，宁夏尚有马鸿逵溃散的官兵几万名，散失于民间的枪械8000多支，还有人称“贺兰王”的土匪郭栓子在宁夏北部地区不断骚扰。宁夏南部有马绍武、张海禄、李成富为首的土匪20多股5000余人，他们四处抢劫掳掠，为非作歹，先后偷袭宁夏军区所属部队26次，使我军政人员伤亡200余人。12月，宁夏省委、省军区召开会议，部署剿匪工作，成立了剿匪指挥部，黄罗斌任总指挥，牛化东任副总指挥。

多年来牛化东驰骋疆场，身上的硝烟尚未散尽，如今又踏上了新的剿匪征程。他深入群众，依靠人民，认真调研，摸清匪情，参与制定了“先打南后打北，先打马后打张”的行动方案，采取武力消灭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至1951年底，共剿灭大小匪特24股，3200余人，其中大小匪首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8000多支，以及大量的弹药和物资，取得了剿匪的全面胜利。

1950年4月，宁夏省军区党委成立，牛化东任常委。

1954年9月，中共银川地委和银川军分区成立，牛化东任银川地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1958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牛化东历任中共宁夏军区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4月晋升为少将。

牛化东一生对工作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实事求是，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处处以事业为重，事事从大局出发，一如既往，任劳任怨，真正是一头革命的老黄“牛”。1960年，组织派他去宁夏南部山区蹲点。到了县、公社、大队，处处听到的是干部如何领导夺高产，群众怎样丰衣足食的声音。可当他走进群众家里时，却看到大人小孩都穿得破破烂烂，家家户户以野菜树皮裹腹。为了能听到群众的真话，他召开了复退军人座谈会，启发复退军人说：“你们在部队里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应该对党忠诚！咱们革命军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说真话！”这时，“扑通”一声，一位复退军人双膝跪地，哭喊着说：“首长啊，首长，我们这里老百姓生活得苦哇！”牛化东赶忙扶起他，让他慢慢说。复退军人悲痛地讲述了这里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而少数干部欺上瞒下，谎报产量，还残酷地打击报复向上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牛化东听了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浑身发抖。晚上，他饭也不吃，连夜写好了一份报告材料，天一亮就让工作组的同志传阅。传阅后，他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人赞成，有的人担心，因为弄不好，就会被扣上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的帽子，丢官事小，说不定还要挨批斗，甚至坐大牢。但牛化东还是以人民利益为重，下决心要刹住这股欺下瞒上的“浮夸风”、“共产风”，他毅然以个人名义将报告递呈上去。

牛化东的报告通过宁夏军区党委上报中央。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来宁夏调查，证明报告情况属实。中央很快给宁夏调拨来救灾粮款，使人民群众度过了灾荒。人民感激党和政府，也永远感激这位敢为人民说真话解疾苦的将军。

1949年12月到1954年1月，牛化东兼任省政府编制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8月至1954年9月，兼任宁夏省政府保密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10月至1966年3月，兼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体委主任和党组书记，1960年到1983年兼任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开始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88年国家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在兼任体委领导职务期间，他积极调研，精心策划，出谋献策，使宁夏的体育事业蒸蒸日上，得到较快的发展，为宁夏争得了许多荣誉；在任政协副主席期间，他广交党内外朋友，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为宁夏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赢得了党内外群众及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牛化东对工作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对生活却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他不爱穿好衣服，也没有好衣服，伴随他的除了两套洗的发白的军装外，再就是一套灰色中山装了。老伴常嚷着要给他添新衣，他总是阻拦说：“旧衣服穿着舒服，缝缝补补不是很好嘛！”大家见他如此简朴，都称他为“布衣将军”。他不止一次对老伴和儿女说：“我死以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丧事从简，不要换新衣服，平时穿啥，还穿啥！”对吃喝他也从不挑剔，生活上只要有一盘他平生最爱吃的肥肉，就非常满足了。

他平易近人，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平时朴素的像一个老炊事员。有一次，他去西安看望上学的女儿，陕西省军区的老

战友给他安排了高干房，他却住进了一天两元钱的普通招待所，待老战友找到他时，他正和几个老乡谈笑风生，开心的聊天。当几个老乡知道他是一位将军时，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他心底善良，善到不能让人相信他曾是一位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将军。他在家从不杀鸡宰鱼，也从不吃家里喂养的动物，老伴常讽刺他说：“你在战场上杀人，怎么在家里连鸡、鱼都不敢杀？”；他同情穷人，和蔼可亲。常有家乡的亲戚找到他家，不是求援，就是办事，他总是背着老伴，借钱资助他们，热情的接待他们，尽力为他们把事办好；他喜好劳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耐不住清闲，常常到附近的农田里，帮助农民干活，要么就千方百计找些家务活去干，使他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1995年11月，牛化东将军因病在银川与世长辞，遗体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军主要机关、中共定边县委均派代表前去吊唁。

牛化东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精神和事迹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郭炳坤在新十一旅

☆ 史继法

郭炳坤（1914~1977），陕西蒲城人。1932年在三原省立第三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三中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1933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宣传部长。1935年冬调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工作。1937年4月调任中共关中特委军事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关中分委宣传部长，中共三边分委书记，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任警备三旅政治委员，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兼三边军分区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十一师师长。先后参加了荔北、扶眉、兰州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临夏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干部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北海舰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4月6日病逝。

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 1945年10月在安边起义以后，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不久，党

即派郭炳坤、杨林、冯鼎山、白寿康、苏晓蒙、高波、马光厚、赵淮川等到新十一旅工作。郭炳坤任旅政治委员，杨林任副政治委员，苏晓蒙任政治部主任，冯鼎山、白寿康先后任副参谋长，高波、马光厚、赵淮川等任团政治委员、营教导员等职。郭炳坤在新十一旅工作时间不长，对这支起义部队的改造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使部队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官兵关系上，以及军民关系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原新十一旅，特别是一团，我们党的地下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广大官兵在国民党旧军队里受了特务多年的毒化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比较模糊，一些人雇用思想严重，“吃谁家饭，替谁家干”；极少数顽固分子和投机分子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观察局势变化，伺机反水。起义不久，部队就不时发生叛逃事件。一团五连连长带着全连夜间从寨墙上溜下去逃往榆林。1946年春，部队在开荒生产时，又发生了一团骑兵连连长安玉明（原赵级三的传令兵）和二营营长赵武臣的传令兵李国华，阴谋策划带部队叛逃事件。郭炳坤等到新十一旅以后，经过整编，首先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对部队进行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制度和纪律的教育，革命形势教育。解决为谁当兵的问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按照八路军的一套改造部队，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

在如何正确看待起义和怎样改造起义部队的问题上，郭炳坤和杨林不同。郭炳坤坚持积极慎重，循序渐近，逐步改造的方法，要求派到新十一旅工作的党员要正确看待起义部队，正确对待率领起义的非党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要克服急躁情绪。

杨林是个老同志，但思想过于急躁，对起义部队的看法有些片面性，只看到起义部队原来不好的一面，看不到起义后正在进步的一面，想在一个早晨就让起义部队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杨林在一次讲话中，给新十一旅起义部队归纳了8个字：“吃喝嫖赌，抽拐骗坑。”无疑，这确是起义前旧军队存在的一些恶习，但起义后一些人正在努力改正。如果仍然这样看待，就不客观，也不利于部队的改造，所以遭到很多党员负责同志的反对。郭炳坤认为，既要看到他们过去一些不良习气，更要看到他们现在的进步表现，要多鼓励他们的进步。他多次对党内同志讲，不要急，思想改造不容易，要有一个过程。起义前，新十一旅不少人抽大烟，旅长抽，团长抽，一个连就有10多个人抽，连我们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牛化东、冯世光等也染上了这个嗜好。起义后，部队开展了戒烟活动，领导带头戒，有的营还成立了戒烟所，效果很好。一团六连原有九人抽大烟，一年后只剩下一个炊事员还没有戒掉。战士朱绪民戒掉大烟后，吃得红光满面，背柴时，一趟就背了174斤。戒赌也一样，二团五连一个副连长说：“过去赌钱输光了，借钱又输了，偷了士兵的袜子卖了赌，现在全连戒赌，再不干那下流事了！”各连还订了戒毒公约，大家遵守，互相监督。过年时，老百姓都说：“过去新十一旅放赌，现在不放了，咱们也不要赌了。”对地下党组织一些负责同志抽大烟问题，郭炳坤很客观地说：“他们在国民党部队从事地下工作，不抽大烟会被人家怀疑的。”为了作掩护，有些事情确实就在烟盘子底下商量的。起义后，这些同志都主动戒了烟。一次，牛化东去延安，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特意安排后勤部在其住所准备了一套烟具。当他听到服务人员汇报“烟具未动”时，很惊奇，贺龙不太相信，

还关照牛化东说：“想吸就在这儿吸一口，不要到外面去吸！”牛化东说：“真的不吸了，正在吃戒烟药。”

有的同志对起义干部不放心，不敢用，郭炳坤说：“你不用他，怎么改造他？”新十一旅起义时起了重要作用的旅参谋主任王子庄，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起义前，复兴社分子为了分化一团，旅长刘宝堂美其名曰让他去掌实权，把他从一团调到二团一营任少校营长，并亲自叫他填表加入复兴社。王子庄及时向地下党负责同志作了汇报。新十一旅起义，组织根据王子庄的一贯表现，培养、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段历史，郭炳坤认为，王子庄及时向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就等于是组织派进去做工作的，不能与加入特务组织混为一谈。王子庄起义后担任新十一旅参谋长。在马鸿逵部侵占三边后，赵级三动摇叛变时，王子庄为了作赵的稳定工作，无意中泄露了组织上曾考虑过调动赵的工作，并让他去接替团长的意见，因此在以后“三查”新式整军运动中，受到当面警告处分。但郭炳坤调任三边地委书记、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后，仍任命王子庄为三边东线总指挥。后来王子庄在东线防御、截击马鸿逵援榆溃兵及转战陇东的战斗中，都参与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率领起义的旅长曹又参，郭炳坤非常尊重与爱护，帮助鼓励他进步，后来由贺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鸿逵侵占三边后，为防止反动分子危害曹又参的安全，郭炳坤特意安排保护他到山西后方学习。不久，又回来担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宁夏解放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银川军管会副主任、银川地区专员等要职，对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十一旅起义后按当时八路军的一套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战士自己选举伙食委员、墙报委

员，各种模范也是选举的，战士们感到自己从黑暗专制中解放了出来，有了民主权利。还组织部队学文化、学时事政治，在军事训练中学习发扬八路军的好传统，官教兵，兵教官，出现了不少射击、投弹能手。部队也自己搞生产，种地、养猪、种菜，改善生活。废除打骂士兵的制度，学习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官兵关系。朱子春是地下党员，原任连长，起义后任二团一营营长。过去带兵靠打骂，每天总要打几个士兵，认为“兵不斩不齐”，养成了一套军阀作风，大家叫他“朱阎王”。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变成了爱护士兵的好营长。

新十一旅一团，在马鸿逵侵占三边后，投机分子赵级三蒙骗广大指战员投敌叛变，但是最后真正跟他当反革命的只是极少数几个人。他叛变后组成的所谓“骑兵支队”只有50多人，多数还是以后拉进去的新人。被欺骗叛变的一些连长后来都跑回农村了。赵级三最后也在他的传令兵逼迫下缴械投降，受到应有的惩处。说明起义后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新十一旅二团，在三边自卫战中，一直是三边地区一支地方主力部队，在保卫三边的自卫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编入独立师，后改编为坦克第三旅，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特种兵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我所知道的高昆山烈士

☆ 王子庄

高昆山烈士被害虽然 40 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和高昆山烈士认识的比较早。1930 年春，我们分别参加了冯玉祥西北军骑兵四师苏雨生部的第八旅（旅长谷莲舫）和第九旅（旅长石英秀）。部队驻在宁夏平罗县城及其郊区。我在九旅旅部工作，昆山在八旅学兵队当学员。学兵队队长是张东蛟，副队长是高岗，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5 月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苏雨生部开赴甘肃平凉接防，到固原时被地方小军阀黄得贵、李富清部阻击，返回途中在宁安堡（今中宁县）又受马鸿宾 所属冶成章包围袭击，八、九旅伤亡惨重，苏雨生的第七旅又倒戈叛变。因此，八、九两旅不得已也脱离了苏雨生，将部队由宁安堡带往下马关（豫旺县）暂住。当时，部队到了下马关，这是个回民地区，粮秣供应十分困难。为了改变当地群众的看法，部队组织了宣传力量，主要是演话剧和街头宣讲。我和昆山都参加了宣传队。通过宣传，群众渐渐对我们改变了看法。此时，我和昆山有了接触并认识了。当年八、九月间，八、九两旅在下马关都有一部分减员和分化，于是又开到甘肃靖远县编为驻兰州雷中

田的新编第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部队初到靖远时，群众有一些疑惧心理，对我们部队持疏远戒备态度。在“双十节”国民党国庆时，部队参加了纪念会，为了进一步改变群众对部队的看法，有意识地安排部队官兵在大会上自由讲话。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军、政要人讲话、继由旅参谋长曹又参讲话。在自由讲话中，下级军官和学员队的学员身扎小皮带，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讲台上，不拿讲稿，大讲国民革命问题，侃侃而谈，生动活泼，得到了群众的赞叹。高昆山当时也上台讲了话。同年底，部队开赴定西驻防。第二年初，由于团长王子元同旅长石英秀闹矛盾，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王即率原八旅的数百人由定西开到兰州。此时高昆山在王部已升任排长职务，我仍在三旅旅部当书记官。1931年春，部队又开往靖远县驻防，雷中田将王子元工兵营改编为甘肃保安总司令部第三路游击支队，王子元任司令。同年底，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命所属孙蔚如率十七师入甘，击败雷中田，将石英秀第三旅改编为新编第十一旅，我在旅部任少校参谋。王子元部改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高昆山此时已升任该部连长。

1932年春夏间，张东蛟、张秀山、孙作宾、李慕愚、王儒霖等先后在王子元部举行暴动，高昆山也参加了兵暴。兵暴失败后潜回兰州，过黄河铁桥时，被邓宝珊部守北门的岗卫扣留，幸遇守城部队排长李泽民（我地下党员）营救才释放。1933年，高昆山被派往新十一旅一团任团部副官。是年秋，我任新十一旅一团中校团副，此时，部队驻扎在会宁。1937年新十一旅由甘肃奉命开到陕北，1938年春，部队到榆林附近驻防，高昆山调到一团一营二连当连长，我被调到二团当营

长。

1940年前后，新十一旅调任安边国统区驻扎，与八路军联防。1941年9月，国民党保安十三团团团长、陕北土匪张廷祥枪杀了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事件发生后，双方开展巷战，高昆山带领突击队，英勇奋战，活捉匪首张廷祥，赶跑了张廷芝。

1945年10月25日，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举行起义。起义前的头天晚上，牛化东、李友竹、王子庄、冯世光、赵武臣、高昆山等党的地下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使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新十一旅一团起义后，高昆山又亲自参加并指挥了攻打柠条梁的战斗，消灭了新十一旅二团团团长、顽固分子史钊城。

起义成功后，新十一旅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高昆山任一团副团长。1946年高昆山、冯世光、李友竹等到延安学习期间，曾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表扬。

1947年3月，马鸿逵部向我三边地区大举进攻。4月初，定边平静无事，我们所指挥的野战机动部队，奉命在定边城南阎门一带休整。4月3日上午9时左右，我们刚吃过早饭，突然听到枪声，我忙和副司令员郭宝珊出营观察，发现敌人向我进攻，我八团（含一团）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我军伤亡很大，加之弹药不多，于下午三时后撤。在撤退中，敌人以火力、人力并追，并以数千骑兵向我撤退部队左右迂迴堵截，致使我军建制全乱，各自向南山撤退。我因指挥骑兵连向左前方敌骑阻击，掩护步兵撤退，遂将我掉在最后。我乘马经城东南马沟泉一带向南山撤走时，高昆山骑马在前面疾驰，此时敌

人在我们左前方山梁上居高临下堵截，我们的左侧又是一条沟，情况十分紧急。我在马上边驰边喊道：“赶快下马跳沟过对岸！”一瞬间，高昆山的马被敌人射倒，我即下马同他一起跳下了沟。这是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涧沟，沟中无水，很长，深约四五米，但因洪水冲刷，两岸陡峭，攀登相当困难。我们互相争着蹲下，让对方踏肩而上。他坚持要我先上，为争取时间，我就踏上他的肩头，先上了沟，随后将他吊了上来。此时我的一个警卫员已被敌人俘去，另一个乘机冲出去了。我们两人上沟后，仍向南山奔走，隔沟的敌人用机枪向我们不断扫射。他对我说：“参谋长走快些！”我说：“我走不快。”为了不连累他，我就对他说：“我们最好分开突围。”所以我们就分手了，谁料这一分手竟成永诀。

我一人徒步行走了一段以后，遇见我们的骑兵连的一位战士，我让那位战士赶快告诉连长张占魁，一定要等我。我到了骑兵连要了一匹马，就带着骑兵连从敌骑间隙中冲出，顺利地脱离了险境。事后得知高昆山在我前面又收容了我军一些散兵，并遇到了副司令员郭宝珊，也失去了乘马，见到敌骑又向郭追来，他就告诉郭说：“副司令员快走，我来掩护。”为了掩护郭副司令员突围，高昆山不幸被俘。

高昆山被俘以后，被押在银川，敌人以名利诱惑，他坚贞不渝；用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后来高昆山又被押送兰州国民党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编入青年训导大队第二中队，关押在兰州玉泉山东龙口。他与高波（新十一旅一团政委，后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在狱中组织党支部，领导狱中党员及同志与敌人作斗争。一次，高波的近视眼镜在审讯时被敌人打碎，高昆山就设法从监外给高波搞回了一副眼镜，为此遭到敌人的多次

严刑拷打。后由于叛徒赵级三等人的告密出卖，高昆山的真实身份被暴露。1949年夏，高昆山被押送到兰州沙沟秘密监狱，敌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但高昆山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始终未有变节。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高昆山被国民党特种法庭处以死刑，活埋在兰州近郊的沙沟。

高昆山献身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名留千古，业绩永存，精神不朽。

谢有德传略

☆ 张秉义 杜占胜

1907年8月14日，谢有德出生在靖边县畔沟乡祁家园子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兄妹三人，他排行老大。1918年，谢有德12岁那年，入本村私塾读书，14岁转庞家畔小学上学。1922年春，谢有德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在那里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初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翌年，因家寒辍学回家。

1925年，地下党员李象九任安边县警佐时，以老乡关系得到了井岳秀部第六旅石谦团长的信任，当了该团三连（又叫学兵连）连长，驻防清涧。谢有德的表兄吴锡昌是共产党员，给李象九当马弁，谢有德在吴锡昌的引导下，毅然弃农从戎来到三连当了兵。1926年，吴锡昌介绍谢有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部队特别支部的领导下，谢有德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学习活动，广泛地读书看报，关心时事政治，在部队党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久他当了三排六班的班长。他带的班纪律严明，除每天上操训练、上课识字外，还经常到附近村庄进行宣传，组织农民协会，举办贫民夜校，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8月，陕北革命形势逆

转，一片白色恐怖。面对这种形势，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井岳秀部石谦旅发动了清涧起义，10月12日，起义部队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的指挥下开出清涧城，挥师南下。谢有德跟随起义部队占延川、打延长、攻宜川，一直冲锋陷阵，屡建战功。起义部队攻克宜川后，遭到强敌的进攻，损失严重，只剩下两个连的兵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这两个连队接受了驻韩城杨虎城部后方留守司令王保民的改编，移驻韩城西庄镇一带。

1928年元月，由唐澍、谢子长、白乐亭、阎揆要、白志强组成新的军委，树起了“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的旗帜。从王保民部拉出了谢有德在内的180多人，举行第二次起义。部队由西庄镇出发向清涧、安定一带挺进，途中误听宜川城内兵力空虚的传言，决定夜袭宜川县城，与高双城部发生激战。激战中谢有德等30多人组成了“敢死队”，攻克了城防。但因敌人援兵已到，起义部队撤离宜川，向西进发。2月中旬，部队到达陕、甘交界地豹子川时，只剩下谢有德等20余人，不得不转入地下。

1929年，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指示，回到陕北安定县组织地下武装，谢有德担任侦察员。一天，谢有德了解到离他家不远的羊圈村，有一家豪绅，借闹灾荒，小斗出，大斗进，放高利贷，吸民膏脂，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群众深恶痛绝。他带领游击队，打死了这个土豪，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害。时隔不久，陕北特委为了加强在国民党井岳秀部我党的力量，开展兵运工作，决定谢有德到榆林井岳秀部教育团学习。学完后，被分配到高双城部二营六连任连长，不几天即秘密地建立了党小组，谢有德任组长。

1932年6月，井岳秀在榆林办了军官教导团，谢有德抽到教导团住学。在住学期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逃出榆林，跑到安定县找谢子长。谢子长派谢有德去协助新十一旅开展党的地下工作。9月，新十一旅一团炮兵连连长宋子元回靖边龙洲探家，谢有德通过与宋子元老乡和同学关系，被宋引荐到一团团长陈国宾（宋子元的舅舅）那里，谢有德被分配到宋子元炮兵连任二排长。不久，谢子长派张有生到新十一旅给胡立亭（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转交了谢有德的党组织关系，并指定谢有德参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1936年夏，新十一旅移防到甘肃静宁一带，陕北特委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帮助郭洪程（郭致礼）成立“西兰游击队”。胡立亭召集谢有德、冯世光、王创业、郭洪程等人开会，指定谢有德为指挥，王创业为联络员，通过曹又参的太太边蕉桐给郭洪程传递党的指示和枪支弹药。

1935年，西兰游击队发展到50多人，在谢有德等人的指挥下，频繁地活动在西兰公路线上，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的运输车辆，并救护了长征红军副师长马兴有，教导员陈天治，营长沈殿盛、王志平等十几名伤病员。

1937年底，新十一旅由甘肃开到陕北，暂住安边一带国统区。1938年初，新十一旅移驻榆林城南三岔湾、归德堡、米家园子、刘官寨、鱼河堡一带。这时二团的党组织已被叛徒张鼎臣瓦解。不久，一团八连连长任怀义向刘宝堂出卖了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及二连连长高昆山、四连连长冯世光、五连连长高宜之、六连连长朱子春、九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长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等九名地下党员。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电令榆林邓宝珊迅速查处。在这种情况下，

一团地下党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第一，在新十一旅的内部秘密组织“混成独立旅”（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人员大部是在西兰路上收容的长征红军战士），由谢有德直接指挥；万一发生情况，首先策动起义，将一团拉到解放区。第二，以和平斗争的方式扭转局势。由谢有德争取三营营长宋子元给一团团长陈国宾做工作，请陈团长出面，尽快向邓宝珊说明事实真相：这是刘宝堂为了投归胡宗南，摆脱邓军长，消灭一团的险恶用心。从而引起了邓宝珊对刘宝堂的不满，也保护了党在一团的力量，使这次斗争暂告平息，但却加剧了刘宝堂与陈国宾之间的矛盾。

1939年秋至1940年，新十一旅一、二团先后驻防安边、白泥井、砖井、柠条梁、堆子梁一带国统区。新十一旅进驻安边后，压住了张廷芝、张廷祥在三边的威风。所以，二张想利用刘宝堂与陈国宾之间的矛盾，妄想坐收渔利。

1941年9月4日，张廷芝和张廷祥在安边城内，借欢迎胡宗南部二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的点验委员魏高参前来点阅二张部队和庆贺张廷芝荣任察哈游击军第二路司令，大摆宴席。请当时驻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连以上军官前去赴宴，席间张廷祥枪杀了刘宝堂，扣押了新十一旅所有赴宴军官，并立即向城内新十一旅的五个连发动进攻。战斗相持到5日清晨。二张见久攻不下，通过绅士刘文卿、余鼎九调解，释放了除陈国宾以外的全部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城内的部队全部暂时撤出城外。

这一突发事件，完全出乎我地下党组织意料之外。经请示三边分委书记高峰和驻军领导人同意，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由曹又参任总指挥，牛化东任副指挥，谢有德担任攻城突击队负责人。9月14日晚上，谢有德率部队在夏品三（原是牛化

东部下，后任保安十三团中队长，攻城之前牛与夏联系好）部的接应下，从东门秘密进城，经一小时激烈巷战，张廷祥弃城潜逃，新十一旅顺利地收复了安边城，救回团长陈国宾，安定了民心。

1944年春，新十一旅以副旅长吴棻为首的一伙复兴社分子，在“迎接何文鼎来三边，接受整编新十一旅”的阴谋被粉碎以后，仍不甘心失败，又从内部捣乱。他们借一团四连连长冯世光去定边办事之机造谣说：“冯世光要扣旅长，准备暴动后投归共产党”。在这些人的煽动下，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等，急忙占据旅部北城，形成戒备、火拼状态。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也通知谢有德的“混成独立旅”做好应变准备，随时进行武装对抗。旅长陈国宾一时不明真假，处于戒备。幸好旅参谋主任王子庄说明真象，揭穿了敌特阴谋，使一场风波得到平息。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病逝，在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李树林、谢有德等与邓宝珊的活动下，将在一团中享有很高威望的一团团长曹又参提为代旅长。曹任旅长后，一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下党员牛化东任一团团副，三个营长中，李树林是共产党员。十三个连长中，有十一个是地下党员。谢有德所带的九连，由于他平时与士兵热心交朋友，常过问疾苦，生活上多方照顾，思想上经常帮助，深受士兵的爱戴和拥护，跟随谢有德毫无二心，成为新十一旅准备起义的可靠力量。

日本投降后，胡宗南为了围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便决定以调防和从内部瓦解的办法，对付邓宝珊部。不久，即通知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接受改编，妄图吞并新十一旅。1945年10月

15日，副旅长吴棻、二团长史钊城派了张鼎臣、任怀义到一团游说，以平时相好对三连连长赵武臣（地下党员）说：“一团若不接受改编，我们二团便于28日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安边，以武力解决一团。”赵将这一情况立即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对此，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去定边向三边地委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汇报，遂安排谢有德等其他党组织成员深入自己的连队，揭穿改编阴谋。经三边地委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命葛申随冯、王返回安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八、九两个团和七团的一个营，按时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李树林、赵武臣等开会，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制定了起义方案，成立了以牛化东为总指挥，王子庄为副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24日当晚，谢有德接到起义通知后，星夜抱病（痔疮病）带领全连赶到安边。25日拂晓，起义开始。他们首先扣押了新十一旅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及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等人，击毙了拒捕的张鼎臣，占据了全城的制高点和要害部门，使起义得到了圆满成功。

新十一旅起义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编十一旅番号。谢有德被任命为二团参谋长。

1947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计划被粉碎后，命驻西安的胡宗南部向我陕甘宁根据地重点进攻。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三边地委的党政部门全面转入武装斗争，并成立了三边分区东线指挥部，谢有德兼任东线指挥部参谋长。

4月初，国民党驻宁夏马鸿逵部为配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以五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约1.6万多

人马从西线向三边发动了进攻。警三旅八团在定边城南阎门一带与数倍之敌战斗一天，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失利，驻定边城新十一旅二团只好星夜突围，向定边南山转移。部队到沈口子宿营时，安边、柠条梁均被敌人占领，团长李树林等人的家属也被扣在安边城，思想发生动摇的二团副参谋长许万海借机盗用李树林名义，伙同连长张占奎策动武装叛变。当他们拉拢李树林的警卫员王有才时，引起了王的怀疑，将此情况报告李树林。李立即与政委马光厚，副团长朱子春、参谋长谢有德研究决定，由朱子春、谢有德迅速采取措施，粉碎叛变阴谋，稳定军心。谢有德为了不引起许万海的怀疑，单枪匹马来到许万海等待叛变信号的山头驻地，以团长召集开会为名，将许万海调到团部予以逮捕，并将许万海、张占奎当众镇压，粉碎了叛变阴谋，保住了二团。

4月底，三边军分区指挥部，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将三段地的保安队、城川工委保安队、西乌审司令部等五个连，在靖边的旧城统编成立了蒙汉支队（下辖三个大队），活动在靖边和乌审旗一带。同年7月，蒙汉支队在鄂托克旗同东乌审、鄂托克旗青格等反动地方武装打仗时，在敌强我弱，战时不利的情况下，谢有德奉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命令，带靖边独立营的两个连前往支援，使战局转危为安。

1948年1月26日，根据西北局和联防军司令部的命令，在三边、伊西转战一年，打出了军威的蒙汉支队开始逐步脱离三边分区的代管，正式改称为伊克昭盟支队。2月底，遵照上级指示，伊盟的党组织和武装部队暂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伊西工委和三大队，继续坚持伊西的武装斗争；另一部分是伊东工委和主力一、二大队，开赴东线，进入准格尔旗，开展伊

东各旗的武装活动。6月，谢有德由三边军分区调到伊盟支队一大队任队长。此时，正是谢有德痔疮病发作的严重时期，领导要他休息治疗一月，再去任职。但他考虑到战事刻不容缓，毅然长途行程千余里，来到伊盟支队驻地——准格尔旗沙堵镇。他报到后，便深入到各连队，从干部到战士的简历、性格、政治、军事、战斗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了解。同时，还通过二大队（基本全是蒙族）政治干事张秉义（靖边人，与谢是老乡），了解蒙族风俗习惯，掌握民族政策，并虚心向蒙族干部昌汉巴巴学习蒙语，没有多久，他基本学会了日常用语。

是年9月，国民党准旗少将保安司令奇致中，率部南渡黄河，纠集了保安师黄文廷、郝德明两个团，约800多名骑兵，进犯准格尔旗解放区的重要集市——纳林镇。纳林镇驻有伊盟支队一大队的一个骑兵侦察排和准一团的一个60多人的新兵连。该镇距准旗政府、伊东工委、伊盟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30余里，是一个前哨阵地。为了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保住纳林镇，战前谢有德亲自到这里察看地形，并部署了作战计划。根据纳林镇的地形，把原住在昌汉图坪的李生财骑兵连，调到不易被敌人包围的纳林街南岸上，以便策应和援助镇内的步兵作战。9月6日中午11时左右，黄文廷、郝德明两个团冲进了纳林镇，由于步兵连领导人思想麻痹，仓促应战，结果寡不敌众，不少人被俘，骑兵连只好撤向东台。下午，司令部接到骑兵连的紧急报告，谢有德带领一大队，跃马扬鞭，紧急北进纳林镇支援。敌人见我主力来到，拼命顽抗。为了扭转危机，谢有德立即组织突击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冲上了东北梁制高点，敌人见势不妙，趁天黑退走，我部星夜追击。第二天一早，谢有德抢先带一大队追敌到大营盘，一路上不仅追

回我方被俘人员，而且还抓了 120 余名敌兵。

由于长期的战斗生活，使谢有德锻炼的更加有胆有识，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 年 10 月初，伊盟支队参谋长调延安学习，谢有德提为支队参谋长。10 月底，伊盟支队接三兵团命令，配合解放绥包，对达旗北部的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对流窜到伊北大树湾一带的邬青云骑兵旅进行了穷追猛打。在高增培、王悦丰、高平、谢有德灵活机动的指挥下，巧妙地调运一、二大队和准一团，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大树湾旧城、钉马掌和西寨子一带，匪首邬青云率骑兵西逃，敌副团长魏灵光带 100 多人，被包围在王银贵寨中，成了瓮中之鳖。但敌人依仗墙高壁厚，易守难攻的条件，负隅顽抗。为了避免伤亡，谢有德提出了黑夜进攻便于隐蔽的意见。司令部参照他的意见，从火力掩护、突击队的组织和爆破方位、云梯安排等都作了周密安排。晚 10 时，部队强攻，不到一小时便攻破了寨子，活捉团长魏灵光，俘敌数十人，取得了伊盟支队进入伊北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

1949 年 3 月底，伊盟支队采纳谢有德的建议，主动放弃东胜，回师准格尔旗。国民党绥远当局不甘心失败，纠集了 7000 人的大军，向伊盟支队发起围剿。

4 月 5 日，邬青云、奇子礼带五六百人在打玛梁绕了一圈，东找西寻，没有发现支队踪迹，向纳林镇方向奔去。敌军走后，支队指挥部通过分析敌情，决定尾随敌人，进入纳林地区，由谢有德带准一团，高平率警卫连和炮兵排，分别抢占纳林镇西山梁两翼，建立西山梁主阵地。一大队进到纳林镇西南方干场畔沟口，切断敌军向西的退路。二大队占领南关坪制高点，侧击敌军，形成三面围歼敌军的阵势。战斗打响后，支

队发现包围的不仅是邬、奇的五六百人，还有先前侵占纳林镇的十三旅，共三四千人。敌人弄清了支队兵力少的情况后，由撤退转为疯狂的反扑。向西山梁两翼发动了营、团规模的集团冲锋。谢有德在高地上一面观察敌情，一面指挥准一团反击敌人。正在这时，谢有德腹部中弹。当他倒下的时候，还鼓励战士继续奋勇杀敌，并告诉团长朱邦仁，不要因他的受伤而挫伤锐气，想法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坚持到天黑撤出战斗。朱邦仁依照他的嘱咐，一边派人将谢有德抬到沙圪堵王玉兰家中，一边继续组织力量，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一、二大队的奋勇反击下，约晚9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利用夜幕降临，部队分头撤出战场，到沙圪堵会合。

支队到了沙圪堵时，谢有德因流血过多已壮烈牺牲，时年42岁。临终前，他告诉身边人员：第一，把他的遗体运回家乡，因为是家乡的土养育了他；第二，将两个小孩交给谢怀德扶养，并把一支自来水笔留给孩子，要他们好好学习，以后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第三，把自己的坐骑大红马送给高平副司令，加拿大手枪送给高增培政委，让他们带好部队，为全伊盟的解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烈士生前遗嘱，经组织批准，谢有德的灵柩运回靖边畔沟祁家园子。谢怀德受西北局指示，回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延安市委、市政府、有关部局、靖边县委、县政府、横山县委、县政府、府谷县委、县政府送了花圈和挽联。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许多领导人发来唁电。赞誉谢有德是“襟怀坦白，无私无畏”的战士，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缅怀高波同志

☆ 冯世光

共产党员高波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任我解放军新编十一旅一团政治委员。由于该团团长赵级三叛变，高波遂被捕入狱，前后在银川、兰州、镇江等地坐牢。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一、改造旧军队

1945年10月，原国民党新十一旅在安边起义，我党中央即派郭炳坤、苏效蒙、高波等40余名同志到安边进行整编，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编十一旅番号，高波留任该旅一团政委。起义部队的官兵思想复杂，军纪涣散，旧意识、旧观念、旧作风相当严重。在部队里工作，特别是在这样的部队里工作，不仅要有“武略”，还要善于“文事”。而从思想上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尤为艰苦。从和战士们的交谈中，高波发现他们对“改造”这个提法很不习惯，说：“改造就是要灌红水子”。于是高波就尽量避免正面直接提这个名词，变通一个他们当时比较习惯的说法。高波不喜欢泛泛的说教，他经常深入到干部战士中，和大家同吃同住同练武，注意改善士兵伙食。

发现有打骂战士的行为，立即追查。他还和战士们一起拉二胡、唱歌、演戏、讲故事、说笑话等，使战士们首先感到在八路军里当兵的温暖。接着又在战士中不断提出“怎样当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为谁当兵”等问题，引导大家讨论，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遇上一些疑难事情，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倾听群众意见。还常常利用黑板报和油印小报表扬进步的干部、战士。过一段时间，还要召开一次英模表彰会，或讲演会，文艺比赛会，采取多种形式启发教育战士使他们的思想转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由于高波的辛勤工作，一团干部战士的思想作风变化很快。大家都称赞高政委工作有方。如连指导员董克治、排长党树雄、战士李玉山等说：“高政委把咱一团办成了学校，改造成了名符其实的八路军。”所以，一团改造旧军队的先进事迹的报道和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很多。

二、身陷囹圄

1947年4月3日，定边县城被马鸿逵部侵占后，部队随地、县机关撤退到南山，开始进行整编。由于阎门一战我军损失较大，一团缩编成四个连的小团，赵级三团长，直接控制了连、排的兵权。这时安边东滩豪绅张九民伙同特务张光远（人称张三公子）与驻榆林的二十二军特务预谋，采取封官许愿的办法，策动赵级三叛变。赵级三本来就是個投机起义的旧军官，加上县城失陷，部队伤亡较大，认为我党我军前途渺茫。便于1947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驻地姚家峁子率部叛变，投降了马鸿逵部。高波被赵级三绑架，身陷囹圄。

高波被捕后，赵级三将他拖在马后，与马同样跑路，吃尽了苦头。他后来和狱中的同志谈到此事说，只要全国劳苦大众得解放，他吃点苦也心甘情愿。

高波是米脂县城人，1913 出生在一户贫农家庭。曾在米脂县城东街小学、三民二中读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积极参加当时的打击土豪劣绅，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斗争。1930 年赴西安作杜斌丞的警卫员，后任副官。1934 年入陕西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杨虎城部队排长。1936 年西安事变后，随常黎夫赴延安，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1942 年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宣传科长、警三旅民运科长，不久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在艰苦的年代里锻炼，在党的教育下成长。1945 年冬，随警三旅率宣传队开赴靖边柠条梁前线，冒枪林弹雨喊话瓦解敌军。战斗胜利后，奉命担任起义部队新十一旅一团政委，改造良莠不齐、成员思想复杂的旧军队。

三、法庭斗争

高波被押到银川后，其他遇难同志问他今后的斗争方式时，他回答说：目前“法庭就是我们战斗的场所。”所以在敌人多次提审中，高波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无情地揭露敌人的罪行，宣传我党我军的胜利和光明前程。而每次提审完，他总是对同志们说：“今天又给狗日的们上了一课。”

有一天，马鸿逵亲自提审高波，亲手递给高波一支美国香烟。高波说：“我只抽边区造的烟，不抽美国造，它是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马鸿逵说：“你在边区不过是个小小团级，在

我这里可以给你比团级大的官，把你的内人和孩子都可以接来银川嘛！”高波严厉斥责道：“你不要打如意算盘，共产党人不是为当官发财，而是为全人类的解放。我的家小，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养。你马鸿逵算是瞎了眼，叫真正的共产党人投敌，那是白日做梦。要杀就开刀。”高波义正严辞，使马鸿逵气急败坏地只好停审。

四、“正义直升”

马鸿逵欲使高波投降而无望，只好于1947年5月将高波等押送兰州国民党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编到敌青训大队二中队。狱中，高波对原八团副团长王正川说：“这里咱们的人多了，可以组织一个党支部，以便领导狱中斗争。”经在狱全体党员通过，选举高波为党支部书记，下设两个小组，原八团的党员为一个小组，原新十一旅的党员为一个小组。

青训队设在兰州五泉山四川会馆。四川会馆有一块匾额，上写着“正义直升”四个字。高波经常对人说：“我最喜欢这四个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们正气是直上重霄九的。”有一次，敌新闻处派来六七个科长，妄图以人多口众，力劝高波投降。经过4个钟头的辩论，高波舌战群凶，理若利剑，敌人被斥责得哑口无言，狼狈退阵。

由于党支部的坚强领导，高波以身作则，使兰州青训队监狱中的党员只有一人自首变节，其他同志都保持了革命气节。1948年5月，高波被解往镇江的前夕，他将狱中党支部工作交给王保民、贺志亮两同志。并对狱中支部的全体党员说：“政治生命第一，革命气节不可变。宁可为革命站着死，绝不

可在敌人面前跪着生。”同时，还留下了一首诗：

“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
身既陷图圉，当歌汉苏武。”

五、奋斗不息

高波被解押到镇江后，编入国民党最高监狱金山寺的训导所。在这里结识了共产党员秦明，他们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同反动派展开不懈的斗争。刚到金山寺，敌人要给高波换国民党士兵衣服，要他出操上课，写反省材料，他都严词拒绝，揭露敌人的反革命罪行。训导所上校主任张启奎觉得高波的行为不可思议，说：“你受共产党的影响太大。”高波针锋相对地回答：“你受国民党的毒害太深了。”张启奎一怒之下，将高波、秦明编到所谓的顽固中队三中队。关在金山寺放生寺的集中营里。此地三面环水，一面有独木桥出入，桥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此时此地，高波仍设法使别的同志能早出虎口，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他将自己的两支金星钢笔送给同难的李魁子，动员李逃跑出去找我人民解放军。当李魁子逃跑时，他又动员张汉辉、王会文、李贵枝3人也跳水潜逃了出去。为此，高波被敌加上了“越狱暴动”的罪名，遭到敌人百般拷打，施加酷刑。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硬的不行，又施软的，企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结果高波只是嗤之以鼻。在这种情况下，高波仍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同狱的黄家熊，一个吹口琴，一个拉二胡，合奏《二泉映月》、《苏武牧羊》等名曲。高波还经常放声高唱边区流行的歌谣。

六、慷慨就义

1948年10月，镇江训导所黔驴技穷，认为高波等18人属于长期感化无效者，决定送国防部保密局处以极刑。

高波从各种迹象看出了敌人的用心，便抓紧时间做诀别亲人的准备工作。他从自己的破棉衣上撕下棉花，捻成线子，给在远方的爱人陈波织了件线衣，连同别人送给他的一双袜子，托人带了出去，并给陈波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和你及安利女儿永别了。我的死是为人类的事业而死，是光荣的。我死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同志。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敌人必败。我虽死犹存，我的身体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去了，但我的灵魂永远不会被毁伤。要把女儿带大成人接班，完成我未完成之事业，女儿参军去，为成千上万的先烈报仇。你不要悲伤，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10月下旬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刽子手们采取卑劣的手段，将高波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6岁。

张东皎与靖远兵暴

☆ 甄之剑

张东皎（1903～1932），原名长发，字伯英，横山县高镇乡张家洼人。出身于富裕农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青少年时在李家洼、马岔、横山高小求学，书法工楷，作文优秀，常受老师夸奖。曾书对联“书田菽粟皆真味，心地芝兰有异香”。

1924年，在榆林秘密加入共青团，在井岳秀军中宣传马列主义。不久，他身份暴露，越城脱险。后入保定军校，并转为中共党员。毕业后，被派进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十七军，参加反奉战争，升任连长。曾辗转宁夏、甘肃、北平、南京等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29年8月东皎返里，10月在榆林与谢子长、刘志丹联系。时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搞兵运。翌年初被派往宁夏盐池县驻军四师八旅十五团（团长王子元），以少校身份开展兵运。2月，乘以师长苏雨生代表身份赴榆与井岳秀联络之机，向中共陕北特委要求增派党员。5月在贺兰县立岗堡成立学兵队，任大队长，对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秋，在靖远县城办教导队，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训练3个月后分配担任班、排、连长，掌握领导权。

1931年10月去北平，结识东城区录米仓西夹道商人韩泽九之女韩如冰（后改名韩静），与之结为伴侣。婚后不久离别，赶回靖远。

3月，雷中田把十五团改为工农营，后改编为第三路游击队，东皎任第一大队长。秋任靖远县长。冬，王子元部被改编为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东皎任副旅长。旅里有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3个支部，东皎任特别支部书记。

1932年3月上旬，张秀山到达靖远，向党的负责人张东皎、石子建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革命兵变的指示。

5月初，谢子长、焦维炽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来到靖远，同张东皎进行了秘密会晤，然后召集有吕振华、苏醒民、张秀山、石子建等同志参加的会议，由谢子长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兵变的指示，研究了兵变的具体部署：决定以王部为目标，除第三团（系地方民团所组成）外，其余队伍待时机成熟立即发动兵变，然后将兵变队伍带到陕甘边界与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会合，以壮大陕甘边革命力量。

会后，谢子长离开靖远，张东皎加紧组织起义，在王部内积极活动，秘密联系进步官兵，为兵变创造条件。为了达到整旅兵变的目的，张东皎找王子元谈话，规劝王子元参加兵变。最初，王子元持犹豫态度，未表示自己的主张。后来王子元得知谢子长背着他在队伍里活动，引起王子元见疑，又经王子元部下反对革命的一些人的挑拨，王子元感到他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威胁，立即翻脸，先后扣押了张东皎、王儒林，并收缴了王儒林营和军法处执法队的枪枝（王为二团一营营长兼军法处主任）。经孙作宾等中共地下党员多方营救，王子元将张东皎“礼送”出靖远。之后，王儒林也被放出来，离开县城。

在张东蛟、王儒林被扣押之后，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感到兵变计划已经暴露，如果不提前行动，他的营也有被缴械的危险，于是吕振华、沈韩城（士兵们都叫他“沈大个”）等当机立断，决定先把一营拉出靖远县城，向东转移，然后再和海原的骑兵营取得联系，会合后将队伍开到陕甘边。1932年5月5日晚十点左右，吕振华、沈韩城等秘密地率领全营离开县城，向东急进。但被王子元所发觉，立即派三团周维邦营追赶。第二天清晨，当兵变队伍行到达拉池附近的郎山台子停下来准备吃早饭时，敌兵追到，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但终因兵变部队人多枪少，部队又没有充分准备而被打散。

张东蛟、王儒林离开靖远后，先后赶到兰州找到谢了长和从宁夏一中到兰州的杜润滋，四人同住在闵家桥的一家烟坊里，在这里他们筹划在王部中再次举行兵变，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这期间正逢王子远派特务连长杜鸿范（杜斌丞之子）到兰州领取军装和枪弹。张东蛟将再次举行兵变的意图告诉了杜鸿范，得到了杜的赞同后，他们便分头行动。不几天，谢子长等在兰州联络了邬逸民、吴景鳌、王世昌、姜耀及青年几十名，弄到了十余枝手枪；杜鸿范也领到军装2700套，步枪八、九十枝，子弹两万发。1932年5月20日，所联络人员装戴军服和枪弹，从兰州出发，途经靖远的来家窑，由杜润滋和王儒林召集大家，宣布发动兵变的意图，给每个人发了枪枝弹药，并将部分军装掩藏在一个窑洞里，然后转到靖远县城东北90华里的水泉堡驻扎下来，派人联系县城内王子元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到水泉举行兵变。不几天，陆续来了原王子元部的同志百余人。

1932年5月30日，在靖远水泉堡竖起有镰刀斧头的“陕

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大旗，宣布成立靖远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焦维炽，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邬逸民，下属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杜鸿范，第二支队长张东蛟，第三支队长王儒林。

靖远游击队的目的是壮大力量，然后离开水泉与陕甘边界的工农红军游击队会合。游击队组建初期，人数不多，还有一部分联络的人员没有到来，因此他们又派人到定西找吕振华，去海原通知杨林、高昆山等搞兵变，同时派人到北湾、糜滩、大庙等地发动农民群众，以便队伍壮大后，再向陕甘边界转移。就在这时，王子元得到兵变的消息，急派营长周维邦为总指挥，梁占胜为副指挥，率一营兵力于6月2日进攻水泉堡游击队。在谢子长等指挥下，派王儒林带人守水泉堡后面的尖山，张东蛟、杜鸿范领一部分队伍守堡子前面的大山峁，谢子长等居中守堡子，准备凭借有利地形，同敌对阵。敌人来到水泉，全营顺砂河峰拥而上，望见堡上红旗，未敢近前，绕过花儿泉水沟，进攻大山峁。东蛟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守住阵地。周维邦重新纠合队伍再次向大山峁猛攻。东蛟面对劲敌，调配火力，身先士卒，敌纷纷溃逃，东蛟令部分游击队员绕到花儿泉背后，以腹背夹击战术，击毙周维邦，击伤梁占胜，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东蛟发动政治攻势，促使敌人倒戈。他边冲边喊：“打倒刮地皮的王子元！弟兄们不要为王子元卖命！当见旧部人员在对面，高喊：“张丙辰，我在这里，你们快过来”，不料左腿中弹，仍不顾个人安危，左手按伤口，继续深入敌阵，在混战中被俘。面对梁占胜威胁、利诱和劝降，东蛟严词拒绝：“头可断，血可流，想叫我们投降办不到”，当场被敌人刺杀。后靖远人民为东蛟在当地树碑，并流传民谣：张东

皎，陕北人，轰轰烈烈有大名，巧夺军火插红旗，水泉堡内扎大营，威震陕甘宁。周维邦，坏心肠，带兵围攻堡子湾，东皎流血为人民，世代美名扬。

敌军撤围后，谢子长等考虑：敌人虽被打退，但必然会马上纠集力量重来报复，为了保存力量，就决定主动撤出水泉。因此游击队向北转移到雪山寺，又折向东南到兴仁堡，休整二日后南下到海原城附近的园子河驻扎。谢子长写信给海原城的杨林、高昆山等同志打算由城内同志做内应，占领海原城，不料计划泄露，内应部队枪枝被收缴，未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谢子长对游击队具体作了部署，考虑到联络未到的同志必然要去水泉，再加上水泉群众关系较好，作战地形较熟，决定让部队仍回水泉。另外杜鸿范负伤要去平凉疗养，谢子长也因离陕甘边日久要回去，因此对部队编制也作了调整，第一、二支队并入第三支队，由王儒林任支队长，杜润滋任政委，谢子长、杜鸿范等离队（同行）后，游击队转会宁的宋家河畔，再由榆中和靖远边界地带转到平滩堡过黄河，经北山到了水泉堡。

这期间，敌王子元旅调防海原，孙蔚如派师部特务营王云山部到靖远接防。游击队乘敌换防之机，在水泉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力量。原来联络未到的同志陆续赶到水泉，当地群众也纷纷参加游击队，使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百人，孙作宾同志也辞去参谋主任职来到游击队。因此游击队又作了调整，编为三、四两个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王儒林，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姜耀，第二大队长杨培成，第三大队长郭映珠；第四支队：支队长孙作宾，下属三个大队，李子和为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第二大队长孙绍堂，第三大队长杨汝林。

游击队虽然枪枝少一些，但刀矛人均有一件。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他们在水泉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等口号，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水泉是由靖远通往中卫、海原的要道，有利于集市贸易。游击队动员小商小贩和当地农民群众解除思想顾虑，在水泉做买卖。一时，各地的土产、土货都涌向这里，使一度凋敝的破堡子变得兴旺起来。这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游击队的充分信赖，游击队的声势也大大提高。

游击队在水泉的活动使驻在靖远县城之敌王云山十分恐怖，但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七月下旬，敌人倾全营四个连的兵力向水泉进攻。游击队得知消息后，在孙作宾、王儒林的指挥下，立即迎击敌人。战斗经过反复争夺，敌人最后将堡子四面包围。从拂晓一直到晚上，敌以迫击炮、机关枪掩护进攻，但始终没有攻进堡子。正巧这天晚上下暴雨，山洪爆发，敌人被迫停止进攻，游击队乘机安全向北转移，撤离水泉到石门川。

队伍在石门川休整两天后，为了避免与敌正面作战，除留王儒林等人为联络同志，安排造枪枝工作外，游击队由孙作宾、杜润滋率领从黄沙湾西渡黄河，打算跟敌人兜圈子。不料，部队行到北山的扎巴岗一带（现在的兰州市白银区附近），与马鸿宾的骑兵主力冶成章旅相遇，虽然英勇抵抗，但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是骑兵作战，游击队失利，大部分队员被冲散，一部分队员牺牲，大队长郭映珠、杨培成等多人被俘遭敌残杀于一条山，孙作宾、杜润滋等十多位同志失散后潜到兰州。王儒林也因敌搜捕去了宁夏，靖远游击队就这样失败了。

1932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大

肆侵占中国领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为了挽回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民动员，共同抗日的主张。就在这时，1932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成立，书记吴鸿宾，委员有孙作宾、李慕愚、常黎夫、马豫章等，并由孙作宾任军委书记。特委决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建立一支以原靖远游击队为基础的抗日武装。1933年1月，王儒林打着西北绥靖公署驻甘行署“招募专员”的名义，同李慕愚、史梧亭、吕明成等十多人，在靖远北湾一带联络原游击队员，筹集枪枝，他们很快召集到百余人，南渡黄河到西原，于2月14日左右，宣布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儒林，政委李慕愚，副总指挥薛宝山，参谋长张子明，大队长杨拴子（藏民），下设三个中队，吕振华、孙绍堂、王丕荣分别担任中队长，另有一个侦察队，队长武振化。为了扩大抗日武装，义勇军在西原广泛了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当地农民参加义勇军，并继续联络各处的游击队员，使队伍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四百人，3月，又将部队扩大为两个大队，一个是骑兵大队，大队长杨拴子，一个是步兵大队，大队长吕振华。他们将西原的展迎福等两家地主的粮食打开，不仅解决了义勇军的口粮，还解决了附近群众的饥荒和春播所需籽种。通过这些活动，义勇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昂，附近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驻扎在靖远的敌军和附近民团都惧义勇军势大，不敢冒然向西原进攻。

3月间，义勇军离开西原北渡黄河，到达郝家川一带活动。不久，驻守兰州水北门的行署特务营二连一个班，在贺晋年、崔仰亭率领下，举行兵变，离开水北门到后长川与义勇军会合。这时队伍已发展到400多人，贺晋年增为大队长，部队

转到江沙岷驻扎。义勇军这时的计划是待进一步扩大队伍后，转移到陇南活动。

义勇军的声势使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震动很大，并将情况电报蒋介石。1933年4月下旬，敌人调动了宁夏马鸿宾部的骑兵主力冶成章旅，青海骑兵第一师的马虎臣团，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的袁福昌团，靖远新十一旅的一个骑兵营以及驻甘行署的一个骑兵连，从四面包剿过来，最后包围了红沙岷。从清晨接触战斗，直到当天下午，义勇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敌骑兵冲散，许多义勇军战场牺牲，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史梧亭、郝新亚等36人被袁福昌团俘虏，贺晋年等人被冶成章部俘去，当时在战场牺牲的二、三百人。王儒林、贺晋年等在押解途中待机走脱，史梧亭、吕振华、郝新亚、崔仰亭等被押送到兰州后英勇就义，孙作宾、李慕愚经党营救出狱，孙绍堂越狱逃跑，少数人突围后失散。西北抗日义勇军就这样被敌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安边事件”中的夏品三和杜廷之

☆ 牛化东

1941年9月4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设计谋杀了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扣押了新十一旅驻安边城内的连以上全体军官，向新十一旅驻防安边部队发动进攻，企图独霸安边，把安边变成反共的前哨堡垒，制造了轰动三边的“安边事件”。

张廷芝、张廷祥原是吴旗金佛坪的恶霸地主。张廷芝的祖父张四疯子曾是前清的武举，当过靖边、定边、保安三县民团团总。其父张兰亭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当过骑兵团长，张廷祥之父张玉亭当过靖边县团总。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革命时，张廷芝在吴旗三道川水范台、张家沟口、二将川袭击围剿过红军游击队。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国共合作抗日时期，1937年张廷芝又在靖边青阳岔袭击我八路军，并在三边抢掠破坏，经我警备二团、骑兵团围剿击溃后，龟缩在安边城继续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阀支持下，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实力，张廷芝收编了600余人，当上了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军司令，驻扎在安边城东堆子梁，张廷祥当上了陕西保安十三团团团长，收编了三个县的保安队300余人，驻安边城内。

张家弟兄虽然谋杀了刘宝堂旅长，扣押了新十一旅连以上全体军官，但攻击新十一旅驻防安边的五个连却未能得逞。新十一旅的士兵在士兵委员会的指挥下，全力投入战斗，战斗相持到次日清晨，二张见久攻不下，便请安边绅士刘文卿、余鼎九等人出面调停，二张释放除一团长陈国宾以外的新十一旅全体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在安边城内的全体部队暂时撤出安边城外。此时，张兰亭、张廷芝父子见事态恶化，无法收场，便偷偷携带金银细软，逃到堆子梁驻地。安边城遂被张廷祥控制了。

“安边事件”发生前夕，旅长刘宝堂派我去定边联系运盐事宜。事件的突发，完全出乎我地下党的意料。我在定边闻讯后即向三边分委高峰书记及八路军驻定部队负责人廖刚绍作了汇报。三边分委决定让我火速赶回部队，组织力量消灭反共顽固分子张廷芝、张廷祥匪部，驻定边八路军随时准备支援。

张廷芝、张廷祥没有抓到我，十分恼火，曾说：“怎么把他放走了！”我从定边赶到砖井时，听到新十一旅驻安边的部队已经撤到了白泥井一带，我便立即赶到白泥井，经过和地下党同志们研究，以为刘旅长报仇的名义，说服二团三营米积山部共同行动，并成立了指挥部，由一团一营营长曹又参任总指挥，我任副指挥，积极准备攻安边。在此以前，我就给夏品三、杜廷之写信，告诉他们我们准备攻打安边，消灭张家弟兄，约他们作内应。夏品三、杜廷之当时是张廷祥保安十三团的两个中队长，原来也曾是王子元的部下，我当团长，夏当连长，杜是排长。夏、杜回到安边，经常提心吊胆，害怕张家弟兄把他们收拾了，有些事常找我商量，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所以积极主张攻打安边，主要是对此二人较有把握，相信他

们可以作内应。我给夏、杜去信后，杜廷之用毛笔在一张麻纸上写了“惟命是从”四个字带回。这件事当时没敢对其他人讲，害怕露了风声让张廷祥把夏、杜害了。后来夏、杜又派人来说，不必让新十一旅部队进城，只要我去，他们两个中队也能把张廷祥收拾了。张廷祥驻安边的保安团当时共有四个中队。我劝他们，事情还得大家一起干。最后夏、杜提出不见我的面不开城门。

9月14日晚开始攻打安边。我带部队秘密到了安边东关，就与汪兴民一起到城门前和夏品三联系。汪怕出差错，让我不要露面，他先联系。这时听到夏品三在城墙上和人说话，汪就叫：“品三！品三！”夏即问：“你是兴民？化东来了没有？”我们相互很熟，声音都能听出来，我即答：“来了！”，夏又问：“队伍来了没有？”，我说：“来了！”夏让我们赶快到城门口，他就开城门。我进城后，夏品三立即向我介绍了城里布防情况，他守东城墙，杜廷之守南城墙。我说：“好！你们将两道城墙把守好，我去部署队伍。”我把进城的部队部署好后，又回到东城门楼上。夏品三让我给他的中队讲几句话，我问：“队伍保险不，里面有没有张家的人？”。夏说：“已经扣了一个分队和两个班长，杜廷之那里也扣了人。”他们对此比较有经验，我也就放心了。这时，我渴的厉害，端起一个瓷缸子在喝水，突然“乒”的一枪打来，把瓷缸子打烂了，我只抓了一个缸把子。夏品三当即举枪追查：“谁开的枪？”我急忙劝阻说：“失火了、枪失火了，大家注意，不要失火了！”事后夏品三说：“狗日的，这一枪不是失火，是有意打的！”我说：“当时你弄不清是谁开的枪，一追查，第二枪又打来了。你说他失火，他一枪未中，侥幸没事了，也就不会再開枪了。”后来，

夏检查枪膛，查明是多年前跟随过张廷芝的人打的黑枪。

不一会儿，张七（玉亭）带着几个人上城墙来了，边走边问：“品三！品三！听说城外来了八路军？”我正在夏品三身边，忙抓了夏部一个士兵的帽子戴在头上，又披了件大衣，装作夏的警卫员。张七到跟前又说：“听说城门也开了？”夏说：“没有！”张说：“咱们去看看！”说话中夏品三一把将张七抱住。我忙提醒：“你抱住干啥？还不动手！”夏当即打了两枪，将张七打死。张七的两个哑叭护兵，“啊！啊！”地乱叫。我说：“两个哑叭，怪可怜的，先带下去，以后放了算了。”这时张廷祥带人也上了东城墙。我对夏说：“不怕！打！”我和夏品三立即组织力量射击。张廷祥一看不好，即跳城墙逃跑到鸱怪子沟他姐姐家躲藏起来，一周后才被捉回来。

经过一番战斗，张廷祥的保安团基本上被消灭，唯独副团长高乐亭等一批骨干，占据北城墙的文昌阁楼，拒不交械。我命令调两挺重机枪，准备强攻。正在这时，来人报告说，新十一旅一团三营营长李友竹被高乐亭扣在北城楼上了。原来高乐亭拒不交枪，李友竹喊话让他交枪，高乐亭让李上去说话。李和高原是同学，他以为全城战斗都结束了，他还能怎样？有点大意。结果上城楼后，被高乐亭扣作人质，提出要放他们去榆林。我得到报告，就派人去联系，答应他们的条件，不伤害他们，放他们走。同时派了赵级三带五六十人到安边城东北一个村庄去堵截。李友竹回来后，后悔不迭，说他犯了一个错误。我说：“你等等看。”后来这些人都被抓回来了，李友竹欣慰地说：“噢！还是没跑了！”

当时，安边城内只有张廷祥的保安团，张廷芝的察哈尔游击军驻在安边东北20多里的堆子梁寨子。我们的部署是先打

安边，后打堆子梁；打安边的同时包围堆子梁。在张廷芝的游击军内部我也选了一个内应，是一个姓雷的中队长，约定的条件是我不到他不动。结果我们派错了人，派去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张廷芝把13皮箱的财宝给了柴明堂，买通了柴，带着一家人逃跑了。当时怕不保险，还派了刘宝堂的弟弟刘明堂带骑兵连也去包围堆子梁。结果这个饭桶不知跑到哪里抽大烟去了，张廷芝跑了还不知道。

夏品三、杜廷之在“安边事件”中协助新十一旅铲除张廷芝、张廷祥，是有功劳的。客观上也为三边除了一害，对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定是有利的。但是邓宝珊却批评我们不该拿张廷祥祭刘宝堂的灵，并对夏、杜二人表示不相信。说他们既可叛张，也可以背叛别人。新十一旅的一些人，如赵级三等，既妒又怕；夏、杜两个中队的武装装备较好，有几十把驳壳枪，这些人也想缴夏、杜的械，所以当时夏、杜的处境十分微妙。如果投奔八路军，当时还可能，夏、杜的觉悟还不到那个程度。因此，我给高桂滋写信推荐，让他们去高部，三边党组织也同意，后来八路军派了一个营把夏、杜的部队送出了陕甘宁边区。

夏品三、杜廷之到高桂滋的十七军后，张廷芝因无处投身，也跑到高桂滋那里，高也收留了。这时，夏、杜又害怕了，夏品三派其子夏钦谟回安边和我联系，我说：“不要怕！等机会把狗日的收拾了！”不久，夏品三又派一个姓于的回来联系，说他准备消灭张廷芝，让我到孟坝等候。后经请示上级党组织，未同意，认为当时对高桂滋部不能这样做，我党正在作争取高部的工作。此事也就作罢了。

王子元传

☆ 纪国庆

王子元（1899～1969），本名建基，字子元，定边县新安边乡杨湾村人，农家出身。

子元幼年就读村中私塾，后入安边高级小学，成绩优异，与同窗任志勋被选送榆林省立第六中学（即榆中的前身）深造。时值“五四”运动，校长杜斌丞、教师魏野畴、李鼎铭、杜斗魁等进步人士，多以爱国主义陶冶学子。子元与刘志丹、马明方、谢子长、杜聿明等过从甚密。六中毕业后，以成绩优良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之聘，为见习军官。半年后，因厌恶官场腐败而借故弃职返里。

时有井岳秀收编之绥远土匪赵有录部驻扎吴旗镇。其给养全由周围百姓承担，该部官兵，常四出劫掠，群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子元受众公推，奔赴西安省府呼吁，始将赵有录部调离。但仍有小股土匪不时骚扰。为地方治安计，子元举办民团。地方稍见平静。

1924年，为给地方民团添置枪枝弹药，子元带一名兵丁去北京，意欲求助于时任国民二军旅长的定边同乡郑思诚。适逢直奉军阀混战，吴佩孚从国外运回一火车皮武器，子元冒生命危险，同士兵二人从火车上拉出枪五百余枝和部分弹药，交

国民二军驻北京办事处保存，因交通不便，未能运回。

1925年，榆中校长杜斌丞与井岳秀部属骑兵师师长高志清（世秀）策谋倒井，着子元去绥远省军政界活动。事泄，受井通缉而奔走他乡，行迹不定。在此期间，曾与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刘澜涛、贺晋年、张德生等有往来。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统辖华北和西北，子元以冯拥护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投靠，先后在冯的部属苏雨生、雷中田、孙蔚如军中任团、旅长职，并在甘肃定西、靖远、海西区任警备司令。是时，共产党员张东蛟、孙作宾、牛化东、高岗、贺晋年等十余人投其麾下，子元以义气，均量才委任，分别为副旅长、副司令、参谋长、学兵队长等重要职务。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除共产党人，因特务告密，不少党员身份暴露，子元只好赏发路费，礼送出境。有的营、连长甚至将队伍拉走，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为此，受军长孙蔚如责难，解其职务。子元奔绥远，暂时寄居郑思诚处。

1934年，子元旅长居天津吉鸿昌公馆，吉嘱其抓紧枪杆子，用国民党的骨头，熬国民党的油。未几，吉被蒋介石逮捕，子元急奔泰山求冯玉祥出面营救，未及举动吉已遇害。冯亦感叹万分，并嘱子元要善于应付环境，他遂快快下山。时刘志丹信邀子元到陕北红军驻地陇东南梁堡议事。王欣然应允，于翌年夏天由天津起程，绕经西安与杜斌丞商榷后，取道庆阳欲往南梁。因红军正与马鸿宾接火，交通阻塞，未能到达，遂返回安边。

1936年，红军挥师西征，原驻定边、安边之国民党八十四师艾捷三团东撤，国民党定边县长李德庵来安会同绅商邀请子元出山指挥保安团队（约百余人）。时西征红军已解放了靖

边、梁镇，靖边县长张鹤亭及该县团总张玉亭率靖边团队 300 余人逃奔安边。农历四月初八，红军包围了安边。子元虽系城防副总指挥，但因张玉亭保安团人多，且有张之妹丈高应（王的分队长）监视，而受牵制，城防事宜多由李、张决择。红军久攻不克，派曾任过王的旅参谋长杜相亭来安边与王接洽。要王里应外合迎接红军进城。此情被张玉亭觉察，于古六月初一假子元名义，将杜诱杀于安边城下。为此，子元十分惶恐痛心，出资雇人下城掩埋了杜尸。解围后，又置棺木衣物，雇脚夫将灵柩送回佳县原籍。子元亦因之以通共罪被国民党十三军参谋长富文假借开会调去绥德，拘押于军法处准备处决。时有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在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处力保，免死获释，暂任高部参议。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高部开往晋北抗日，给予元一个骑兵营和部分地方武装，成立了晋北抗日游击队，子元任司令。后返榆林，受晋城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之命回三边组建陕北群众义勇队，因受榆林专员富文之猜疑未果。转任绥东骑兵司令郭希鹏部属新编骑兵旅旅长。

1940 年，郭部调往甘肃靖远驻防，因郭系东北军，不为胡宗南信任，将该部番号撤消，改编为骑三师，并将原校级以上的军官一律遣散。子元不辞而去，到长武闲住，卖自带枪马维持生活。

1943 年，高桂滋再次找子元去十七军任参议。这期间，王在固原萧天饭店与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员曹力如等多次接触。1945 年，同乡刘竹轩回定边时，他写一封密信交给牛化东，转致杜斌丞的“捷足先登”之意，敦促十一旅早日起义。

1946年，高桂滋部受整编，子元以中校附员退役住平凉，开磨坊维持生活。1948年父病奔丧安边。牛化东曾派人邀其进山，他表示对革命无功而未应，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李鼎新在马鸿逵部暂九旅旅长卢忠良处报告，软禁四月之久，后蒙安边绅士刘文卿说情获释，再去平凉。

1949年平凉解放后，不少同学、同事和旧日部下刘景范、王子宜、孙作宾、王世泰、惠居祺、王治邦等或函电致意，或登门造访，邀子元任职，他均以自愧对革命无功而婉言谢绝。1950年，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受中共平凉地委书记惠居祺、专员王治邦之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每当与甘肃省诸首长见面时，子元抱歉地说：“我何德何能，愧受党和人民之优待。”王世泰曾对他说：“党中央对你认可是共产党历史上的朋友，在党的萌芽时期和白色恐怖中，你帮助了革命，今天革命胜利了不能没有你的成绩”。子元在甘肃省参事室任职十七年，自觉是他一生最舒畅的岁月。遽料1967年定边县公安局以“反革命残杀罪”把他从兰州捕解定边，拘押二年余，1969年4月因病保释，7月初病故于砖井南李圈长子王亚家中。他临终遗言：“我一生犯了好多错误，最大莫过未主动早与共产党联系。但我所作所为，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1979年落实党的政策获得平反后，甘肃省委统战部决定他仍以民主人士看待，省政协王秘书长题写了“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王公子元之墓”的碑志，拨专款选墓勒石。

石英秀传

☆ 实 军

石英秀（1891~1934），字子俊，国民党陆军少将，新十旅第一任旅长，靖边县镇罗堡姬家洼人。幼时家贫，入私塾念书3年。为养家糊口，曾给有钱人家揽工种田。

石英秀身体魁梧，双目炯炯，精明强干，颇有心计。看到社会动乱，官场腐败，在30岁那年，鼓动表弟尚英贵等到靖边南山荒草滩“混事”。几个月后，拉起20余人的一支队伍，有土枪数支，刀矛若干。石英秀凭借这点实力，擒匪拿盗，维持地方秩序，博得群众好评。其后，用计收编了从安塞流窜到靖边的郝老二部20余名全副武装的土匪。经过整顿，兵员增至60余人。

1925年，驻扎在靖边的国民军任和亭营长收编了石英秀部，任其为连长。1926年至1927年，石英秀先后将流匪赵有禄、杨猴小部驱逐出境，使靖边暂免匪害，群众称颂他为“敢吞土匪的大眼壮汉”。1928年，石英秀部被编入陕西骑兵旅二团，他任连长，驻防府谷。是年，靖边年馔十分严重，石英秀资助县长牛庆誉银洋1000元，赈济灾民，因此深孚众望，当地各界人士及百姓，自制一“万人伞”，签名呈上，以表谢意。

1929年，石英秀部被调往靖边柠条梁镇驻防，同年，被

宁夏苏雨生收编，任其为九旅长。为扩充实力，石英秀收编了靖边几个民团，并派人四处招兵买马。陕北共产党组织借机派人加入石旅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苏雨生率兵攻打宁夏，失败后投奔驻扎西安的冯玉祥部。石部未去，驻军下马关、中卫一带。不久，马鸿逵在宁夏将石英秀妻子杨静贤扣留，要挟他投降，石拒不归服。马鸿逵不愿树敌，遂将石妻释放。同年，石旅被兰州雷中田收编，石英秀仍任旅长，驻防定西、静宁一带。驻陇期间，石英秀治军严明，与驻陇回军和睦相处，不少人因此称他有“古名将风度”。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行辕主任杨虎城委派杜斌丞到石旅视察，然后将其收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任旅长。

石旅各级军官大多是陕北人，军中有一批共产党员。谢子长曾任该旅副旅长，高岗、杨林曾任连长，康健民、牛化东、李树林、谢有德等也先后进入石旅任职，给党的兵运工作和军事人才的培育带来很多方便。在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多次潜入石旅，均得到保护，所以，三边流传着：“石英秀保护了刘志丹，刘志丹保护了毛泽东”的说法。

石英秀染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因戒烟患病，于1934年在北平病故。石英秀的灵柩运回后，十一旅将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后葬于靖边姬家洼。

石英秀妻杨静贤（1893～1959），精明贤慧，理事果断，家住柠条梁期间，一次偶遇土匪包围，她手持双枪，带领护兵及家眷成功突围。

石英秀生有一子一女，子：石清泉，曾在李树林部下当副官，1945年11月，他受命荷枪带信，到柠条梁与史钊城谈判。女：石清芳，谷莲舫之媳，现住西安。

谷莲舫传

☆ 郭世权

谷莲舫（1886～1959），靖边县柠条梁镇柳桂湾村人。早年毕业于民国洛阳军官学校。后经商，于民国十年（1921）任柠条梁镇商会会长。爱国将领杨虎城率部进驻三边不久，谷莲舫弃商从军，任杨部警备旅副旅长。在此期间，曾于邠县营救过陕北红军创始人、革命领袖刘志丹。二十三年（1934），升任警备旅旅长，驻防三边一带。这一时期，曾任民国陕西省政府参议员，与共产党人习仲勋等关系密切，暗中不断给陕北革命根据地以物资援助。二十六年（1937），陕西省国民政府任命谷莲舫为伊克昭盟及榆、神、府、靖、定、横六县视察团领事。抗日战争前期，谷莲舫积极为鄂托克旗游击司令章文轩提供军需物资，支援其抗击进犯内蒙古的日本侵略者。

三十一年（1942），谷莲舫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靖边县参议员。三十二年（1943）赴延安开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次年，任延安联防军司令部少将参议，正式参加革命。三十七年（1948），谷莲舫探家时，在柠条梁镇被捕，后被转送银川军法处监禁。三十八年（1949）银川解放，谷莲舫出狱，还乡养病。195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任命谷莲舫为省政府参议员。

谷莲舫晚年立志植树造林，绿化家乡，数年间，亲手植树近万株。

刘宝堂传

☆ 苗斌杰

刘宝堂，字玉亭，1900年古12月出生于陕西省新城县顺宁乡桃梨洼村（解放后划入志丹县），生前为国民党新编十一旅旅长，少将军衔，1941年9月被陕北土匪、恶霸张廷祥、张廷芝设计谋杀，年仅41岁。

刘宝堂父刘杰，生二子，长子宝堂，次子明堂。宝堂少时，家贫四壁，不曾读书，拦羊放牛，耕田种地，揽过长工，也打过短工。他性情直爽，好刀枪，善交往，重友情，讲义气，深得乡邻好评。18岁时，开始操持家业。

1918年，当地豪绅周二贡，将上面摊派的羊捐税300两白银以600两向下摊收，仅宝堂家就摊银50两。宝堂年轻气盛，对地方豪绅这种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敲诈剥削的做法义愤填膺，怒火满腔，毅然进行坚决的反抗，后被迫离家，到距家20里外的杨渠寨子树旗招兵，广纳豪杰义士，成立了地方民团，并自任团总，维持社会治安。

1921年，宝堂民团被杨虎城将军收编，任排长，驻防延川。1922年，杨虎城部在安边办起了教导队，连长孙友仁便派宝堂前往参训，历时8个月。期间，他勤学苦练，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又结识了井岳秀和刘润民，为后来的军旅升迁

奠定了基础，学习期满后，随原部队开往澄城县驻防。

1927年正月，刘宝堂利用请假回家探亲之机，又在杨渠寨子招兵买马。当时枪支奇缺，就请当地匠人杨会亭自造武器，武装兵丁。当年秋，所招兵马均被吴旗金佛坪恶霸张兰亭（又名张鸿儒，外号张六，张廷芝之父）收编为榆林井岳秀的补充营，张任营长，宝堂为一连连长。

1930年正月，宝堂再次回家探亲，石子俊旅长（时为国民党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第九旅旅长）出面请他担任副旅长。为了扩充兵力，壮大力量，在杨渠寨子，他第三次竖起招兵旗，并请杨华亭卷枪千余支。兵招齐后，即开往甘肃华池县南梁堡子、阎堡洼子驻防，后因与石子俊失去联系，被十三师师长陈珪璋收编为混成旅，任第二旅副旅长兼第四团团团长，开往甘肃平凉驻防。

1930年至1932年间，宝堂曾在甘肃营救和保护过刘志丹等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并从人、物、枪方面给红军予慷慨援助。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两支革命队伍正会合于南梁、二家川一带，由于当地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七、八百人的队伍给养十分困难，于是党组织决定在陈珪璋部搞兵运，发展自己的力量，并派代表刘约三前往甘肃陇东平凉市，办理具体归抚事宜。在刘宝堂的周旋帮助下，谢、刘二部遂被陈珪璋收编为陇东十三师直辖警备骑兵第二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领取了官方印信及军鞋、袜、衣、帽1000套，战士菜金3000元，马拐枪20支，弹药被服10驮，配修械造枪工人20名，修械工具15驮，大夫、护士各1名，西药1驮。陈珪璋委托刘宝堂为全权代表，率卫士30名，马车百辆，运送物资至新铺镇驻地。谢、刘杀猪宰羊，设宴款待。饭后，

谢子长、刘志丹、杨仲元、阎红彦、刘约三等与宝堂 18 人设香案，拈香换帖拜把子，时称“十八兄弟”。帖名“兰谱”，内容有“我兄弟志同道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努力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离叛等情，天诛地灭，此誓言书捧××为兄（弟），惠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于甘肃庆北新铺镇”（志丹县《党史资料选刊》）。这次拜把子，有私人感情，也有统战因素。在宝堂离新（新铺）返平（平凉）时，骑兵二旅两个团各派骑兵 50 名，相送 40 里，列队告别。

1930 年春夏之交，刘志丹被陈珪璋委任为暂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刘志丹旅、刘宝堂旅与高广仁骑兵十三旅接杨虎城命令，以三旅之众，在宁夏、公合、三合、早胜镇一线，堵击歼灭苏雨生部。但未料，身为总指挥的高广仁与苏雨生、张廷芝 3 人早有预谋，密秘勾结，准备北上攻打宁夏。在早胜镇，高广仁以商讨军事为名，扣留了刘志丹和刘宝堂，并把所部全部缴械，编为高部的两个团，裹胁北上，当部队行至甘肃合水县葫芦把塬时，遭陈珪璋驻西峰镇蒋云台第五旅伏歼击溃，全部缴械，这一事件被称为“早胜镇兵变”。兵变后，蒋云台持陈珪璋的通缉令，欲缉捕刘志丹。其内容为“……早胜镇兵变系共匪刘志丹捣乱，令蒋云台第五旅，擒获刘志丹，解回平凉归案法办”（志丹县《党史资料选刊》）。在此紧急关头，刘宝堂将王世泰、张秀山、刘景范、马云泽、刘约三等 100 余人暂隐蔽在该部，并与其他同志，用一匹白布把刘志丹从四、五丈高的石崖上吊下去，使之脱险。

刘志丹脱险后，仍以南梁堡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驻防此地的刘宝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使合水一带革命武装迅速发展起来。有人向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告状，说刘宝堂部

有不少共产党，不打红军。为此，刘志丹的红军与刘宝堂部用“苦肉计”假打一仗，红军败走梢林，刘宝堂拣了一些红军军帽、旧枪作为战利品，向朱绍良“报捷”，才敷衍过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刘宝堂出身贫寒，生活俭朴，同情穷人，乡土观念浓厚，有过许多支持革命的义举，但由于其长期置身于旧军队，思想上不断受到反动蛊惑，也染上一些不良作风，使其逐渐变得急功近利，淡薄道义，思想基础动摇。

1932年6月，十三师攻打平凉失败，刘宝堂率部投靠石子俊旅，被收编任命为第二团团团长，驻驿马关，后开往新铺、合水一带。1934年，石子俊旅长病故，“二团团团长刘宝堂耍手腕从一团陈国宾团长手中夺走了旅长宝座。从此，陈、刘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三边风云·新十一旅起义的前前后后》）。之后，刘的心腹、复兴社特务分子史钊城接任二团团团长，并对对陈国宾的一团实施打压瓦解。1938年初，新十一旅驻防榆林三岔湾、归德堡、米家园子、刘官寨、渔河堡一带。“不久，旅长刘宝堂、政治部主任吴棻和二团团团长史钊城、团副张鼎丞等复兴社分子，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的军统特务，向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一连连长高昆山、四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副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9人系赤化分子，蒋鼎文立即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三边风云·你们是火车头》）。告密事件后，十一旅一团曹又参、柴明堂、宋之元三位营长和团长陈国宾对刘宝堂的历史作了分析，认为“第一、刘于1932年随陈珪璋在陇东兵败后，为了寻找出路才带了些残兵败将投到新十一旅，被石英秀（石子俊）收编为第二团。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本应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继任，但却被他施展阴谋

夺走了旅长职务。他任旅长后，把任怀义连从二团拨到一团，名曰充实一团，实则为他做侦探活动。第二、为卸掉陈国宾的臂膀，曾把一团中校团副王子庄调到二团一营当营长，美其名曰给以实权。第三、1936年在甘肃堵击红军时，因一团逃掉了一个被俘红军侦察员（实际是陈国宾和高宜之相商放走的），刘向邓宝珊汇报说一团不可靠。现在他和史钊城、张鼎丞先后参加了复兴社，极力想用赤化罪名把几个得力连长除掉，换成忠于他的复兴社分子，妄想吃掉一团，为投归胡宗南创造条件”（《三边风云·你们是火车头》）。

在原十一旅许多老党员、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还有众多片断是涉及到刘宝堂旅长的，但这些片断反映出同样一个事实：此时刘宝堂旅长的思想和行为已开始向反对革命的一面脱变。

1941年，十一旅中刘陈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三边地头蛇、大恶霸地主张廷芝、张廷祥等，为了再显其昔日独霸三边的威风，利用刘、陈矛盾，耍手段，搞阴谋，妄想坐收渔人之利，整跨吞并十一旅，谁想偷鸡不成反蚀米，便更加仇视刘宝堂。他们一边扩大军事实力，一边使出“美人计”，请出十一旅军需主任朱仙洲（曾是张的部下）为媒，将张廷芝的女儿张淑琴许配给刘宝堂之子刘汉。刘不知是计，欣然同意，从此，放松了对张家父子的戒备。1941年9月4日，张家借口庆祝张廷芝荣任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同时欢迎胡宗南的点验委员点阅二张部队，在安边设下“鸿门宴”，席间，张廷祥乘向刘宝堂敬酒之机，抽枪将刘击毙，并扣押了十一旅参加宴会的全部军官。

刘宝堂死后，十一旅官兵在牛化东和曹又参的指挥下，智

取安边城，赶走张廷芝，枪毙了张廷祥。9月23日，刘宝堂旅长的遗体安葬于安边西园子陵园，警三旅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1942年农历2月，刘宝堂旅长的灵柩由安边迁回志丹县顺宁乡桃梨洼安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派红26军骑兵团参谋长刘约三参加了追悼会。

陈国宾传

☆ 党满义

陈国宾（1881～1944），国民党少将，新十一旅第三任旅长，横山县波罗镇人。幼时因家贫，未能上学，12岁开始给人揽工放羊，后入戏班，学戏习武，受尽苦难，同时磨炼了坚强意志。1918年，陈因不满靖边官场腐败，匪盗侵扰，民不聊生，于是愤然将所办戏班改为民团，自任团长，擒匪捕盗，保一方平安。

1925年，陕北高志清骑兵师任和亭团收编了陈国宾的民团，任其为连长，时石英秀、王子元、丁盘生等也在该团任连长。1926年到1927年间，他同石英秀并肩作战，先后将流匪赵有录、杨猴小赶出靖边。1928年高部骑兵师缩编成混成旅，任团5个连缩编为3个连，陈国宾四连并入石英秀三连，陈改任副连长，随石驻防府谷。其时清涧石谦“倒井”兵变失败，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等收其失散人员，脱离井岳秀，投奔宁夏平罗苏雨生部。石英秀任九旅旅长，陈国宾追随王子元，历任八旅十五团一连连长、一营营长。1930年，王子元、石英秀因意见不合分裂。1931年3月，陈国宾召集所属连长柴明堂、沈毅民开会，策划搞掉王子元，投靠石子俊，自己当团长，事变未遂，后仅带二连到定西投靠石英秀。“九一八”事

变后，石英秀第九旅被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陈国宾任一团团长。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邓宝珊宣布陈国宾主持旅部工作，但时隔7天，二团团长刘宝堂拿着委任状，带兵从陈国宾手中拿去了军印，陈、刘从此结怨。

陈国宾是个大老粗，缺少计谋，但他人缘好，讲义气，又是十一旅中的老资格，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曹又参在他手下任一营营长，王子庄任中校团副，还有李树林、牛化东等一批共产党员，都成了他的左膀右臂。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静宁、会宁新十一旅防区，旅长刘宝堂奉命堵截红军，但陈国宾一团消极应战，不打红军，还把俘获的一名红军侦察员，与地下党员高宜之商量后悄悄放掉，对外说俘虏越狱逃跑了。之后，陈多次收容、救治红军掉队伤员。抗战时期陈与边区政府签订通商通邮人员往来协议，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1938年，复兴社特务、二团团长史钊城，团副张鼎丞，一团叛徒任怀义告密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等9人系共党分子，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电令邓宝珊严查，并要求将为首的牛化东解送西安。在曹又参等营长帮助下，陈国宾团长出面向邓宝珊说情，并以人头担保牛化东等人没问题，使一团的地下党组织免遭破坏，为1945年的成功起义奠定了基础。

陈国宾在与旅长刘宝堂、地方恶霸张家父子的斗争中紧密依靠地下党员，成功粉碎了张廷祥挑唆事件和安边“鸿门宴”事件。1941年9月4日刘宝堂被枪杀后，陈国宾从实践中认识到：一团官兵为自己奋斗不懈，忠实可靠，只有积极追随邓宝珊，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才能生存。鉴于陈国宾与八路军警三旅关系处的很好，中共组织有意争取让陈国宾当旅长，牛化东、李树林、王子庄等人写信托人找邓

宝珊说情。时隔不久，邓宝珊任命陈国宾继任新十一旅旅长。

陈国宾以身作责，严于治军。每天早晨骑马带兵，严格操练。他不抽大烟，也不许部下和家人抽大烟。他规定，若发现抽大烟者，重打二十马棒。所以新十一旅在安边期间是深受百姓欢迎的，偶有一次下属士兵欺负并抢劫当地一寡妇钱财，告到旅部，陈旅长命人当众打了违纪士兵四十军棍，并让旅长夫人杜素贞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又给了二百块大洋。

陈国宾戏班出身，对部队和百姓的文化生活非常重视。1941年，他派政治部干部王益轩组建长城剧团，演员由战士和安边小学教师组成。1942年，他借派人到关中接兵之机，招募了唐立民、高菊花、惠老大等一批职业演员，购置了新戏笼，在北大操场盖了戏楼。为群众演出丰富多彩的传统戏曲和以抗战除奸为内容的新戏。全国解放前夕，这批骨干随军分别去新疆、西宁、兰州、银川等地，从事戏曲领导工作，为西北秦腔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因病在安边逝世，享年63岁。十一旅将士、警三旅负责人和安边市民在烧燎沟旁举行追悼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暨林伯渠、贺龙派4名八路军代表送来挽帐及花圈。之后将陈国宾灵柩葬于靖边新城乡高家沟。

陈国宾妻杜素贞（1899～1963），靖边大路沟乡人。彭德怀大部队途经安边时，牺牲一名干部，杜素贞主动将自己的棺材捐给部队。

陈国宾生有二子二女：陈俊士，曾任十一旅连长；陈俊才，北师大毕业，曾在李树林部当参谋，解放后转业农建师；陈芳莲、陈玉莲分别担任过教师。陈氏后代分别住在深圳、银川和定边。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党组织 及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30年9月、1931年4月)

一、中共陕西省委 1930年9月13日《工作报告》(节录)

五次扩大会议^①中对陕北工作有详细的讨论与估量，陕北在全省工作上是个中心区域，党的工作在全省说来算最有基础。尤其是士兵工作最有成绩，军支12个，并且都在统治阶级中心部队、中[心]部门、中心城市中建立了，各军支工作都很起劲。党的组织亦普遍了整个陕北，党的主观力量的确是有相当的积极，只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指导，陕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建立几个地方苏维埃政权是不成问题，因此省委特别注意健全陕北特委的指导。扩大会议决定派省委委员张文华、赵伯平两同志去改组特委^②，使特委工作能够有很好的建立。

* 本文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复制件刊印，标题系编者所加。

二、纪国祯 1931 年 4 月 20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大会^③闭会最后一天，即决定西安市委工作由我兼负，特别讨论了陕北工作，因陕北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有发动游击战争的可能。即决定以绥、米为中心，在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之下，配合横、佳灾民，并与延安、榆林军事工作配合，以发动陕北的游击战争。

此时〔陕北〕有组织者：

榆林：二十人左右；

米脂：四五十；

绥德：近百；

清涧：近百；

延长：二三十

神府：四五十；

〔盐〕池横山人：二三十；

士兵^④：榆林八九十，延安二三十（井^⑤的中心部队）；神府二三十（高志清部）；陕甘交界五六十（苏雨生部）。

注释：

①③指 1930 年 7 月上旬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②在中共陕西省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张文华当选为省委委员、赵伯平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张文华未去陕北。

④指士兵中的共产党员。

⑤井，指井岳秀。

中共北方局对中共陕北特委 的工作指示（节录）*

（1930年10月18日）

士兵运动中，目前中心的策略是组织革命兵变。陕北党应当加紧在井岳秀部队中的工作，选派得力同志，经过训练，有组织的派去入伍，在各连排的士兵中平衡发展，建立强有力的营内领导，加紧对士兵群众的宣传，组织士兵委员会（任何名义都可以），发动士兵要欠饷，要冬衣，要求军需公开，反对肉刑等等斗争。组织革命兵变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暴动的胜利，摧毁反动政权，联合当地工农贫民组织苏维埃政权。特别要排斥军官运动（不以士兵为基础）与等待观念（不反对发动兵变），同时要动员党、团及革命群众，加紧对士兵群众的宣传，发展士兵运动。

* 本文按陕西省档案保存的复制件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西北局 关于开展边区周围友军工作 给各地委的指示^{*}

(1945年10月16日)

各地委：

(一) 开展边区周围的友军工作，为目前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各地委必须认真经过各方面的调查研究，采取具体步骤，积极布置进行，力戒对此工作轻视及任其自流的现象。

(二) 我们提议，各地委及县委均应尽一切可能和力量，在周围友军的正规军军队和地方军队的各级干部中，选择几个可靠的线索，经过其家属、亲戚、朋友以及中间人士和我们干部等各种关系，采取通信、派人，或送礼等方式，分头进行联络，逐渐建立友谊的关系，并在其中选择极可靠的对象，个别发展党员。

(三) 目前在友军中的工作，仍采长期隐蔽，以待时机的方针，因此在组织上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绝对不发生横的关系，对友军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对象，一般的不在委员会上讨

*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友军”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军队的泛指。标题为编者所加。

论，由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同志直接管理。力戒张扬，并处处为对方着想，以免暴露而遭受损失。对他们的困难，应尽可能的给予适当解决，使其安心工作。

西北局常委会 10月16日

贺晋年关于十一旅起义问题 致高岗谭政的电报*

(1945年10月16日)

高、谭^①：

(一) 杜立亭^②去安边和曹又参谈了一下，曹的态度动摇，基本上还是想当国民党的官。他10日已去榆见邓^③，杜不日即可回定，其行动如何，请示。

(二) 二十二军准备编为1个师，师长徐子佳。十一旅准备编为4个营，拟将二十二军编余部队拨两个营给十一旅，仍编两个团，团长一个是史钫城，一个是由二十二军派来。二十二军，十一旅共编为1个军，何文鼎为军长，名义上仍归邓宝珊指挥，编制后有调绥西^④之说。

(三) 十一旅同志已经成立了秘密指挥部，进行反抗缩编。他们准备以武装力量坚决反柠条梁，消灭史钫城团，肃清特务，并要我带去一部分精锐兵化装加入他们进行战斗。究竟如何行动，我因对整个情况不清，故而不能答复，请立即电示。

(四) 十一旅内部现在情况，据该旅同志称：我们所能直接指挥之部队有8个连，可能争取的中间势力有9个连，顽固

* 此件摘自中央档案馆第151卷第52号。标题系编者所加。

势力有9个连，加上我们其他工作的配合，先发制人，定可取胜。

贺^⑤10月16日下午

注释：

①高，指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谭：指谭政（1907～），湖南湘乡人，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

②杜立亭（1910～1970）陕西米脂人，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参议。

③邓，指邓宝珊（1894～见1968），甘肃天水人。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④绥西，指绥远省西部。绥远省1954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⑤贺，指贺晋年（1909～2003），陕西安定（今子长）人。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参见本书《塞上风云》。

新编十一旅全体官兵起义通电*

(1945年11月5日)

(本报三边特讯) 驻安边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暨全体官兵，于11月5日发表通电，兹探得全文发表于后：

重庆蒋主席，延安毛主席，榆林邓总司令、左军长，宁夏马主席、马军长，固原高军长^①，全国各党派、各报馆及全国军民台鉴：

本旅数年以来，奉命驻守陕北，维持地方治安，赖邓总司令、左军长之领导，与地方父老之协助，幸得恪尽职守，融合輿情。虽以渊源不属所谓嫡系，待遇备受歧视，唯全旅上下，亦以此种现象，全国皆然。但能无忝军人本份，亦足以自解矣。乃至三十一年^②复兴社^③特务分子吴棻被派为本旅政治部主任以后，情势骤变。彼辈外则逞凶勒索，鸡犬不宁，内则挑拨分化，阴谋篡夺。不独对于本旅首长，即与邓总司令、左军长，亦复肆意诋毁，妄图不轨。其最显著之事实，则为吴棻到任之后，先以利诱威胁之手段，勾结本旅第二团团长沙钊城、副团长张鼎丞为其爪牙，使第二团特务化，并企图以此为基

* 本文原载1945年12月8日《解放日报》。标题为《新编十一旅全体官兵通电全国，沥陈安边事变真象，反对国民党以特务手段消灭异己之阴谋，拥护邓总司令、左军长之领导》。

础，进行其篡夺全旅之阴谋。其鬼域伎俩，全旅官兵，无不痛心疾首。抗战结束之后，本旅处境更险。吴棻、史钊城竟派遣爪牙张鼎丞等至安边胁诱本旅第一团之赵连^④，阴谋于上月25日实行暴动，里应外合，以达成其消灭所谓“杂牌军”之计划。至是，本旅上下，忍无可忍，为维持军纪之尊严与地方之秩序，不得不与地方人士通力合作，忍泪挥戈，数平叛变。事平之后，此等叛乱之发纵指使者，乃到处造作谣言，亦冀颠倒黑白，蒙混国人耳目，亦适见其作贼心虚，心劳日拙而已。夫整编全国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此全国人民之要求，亦全国军人之要求，然整编军队非消灭异己之谓也。国家化非特务化、私人化之谓也。今所喜者，虽有大罪，亦予大赏；所不喜者，虽有大功，亦予大罪。是则赏罚不明，何以为国？军队特务化私人化又何以建军？职等追随邓总司令、左军长有年，略闻军人爱国之道，对此种消灭异己，军队特务化私人化之作法，实不敢苟同。爰特沥陈真象，公之于世，今后仍当一本初衷，拥护邓总司令、左军长之领导，为和平建国奋斗到底，尽掬愚诚，伫候明教。

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及
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李友竹
赵级三、冯世光等全体官兵敬叩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⑤十一月五日

注释：

①指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国民党宁夏省

政府主席马鸿逵、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

②三十一年指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即 1942 年。

③复兴社全称中华民族复兴社，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④赵连指以地下共产党员赵武臣为连长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连。

⑤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即 1945 年。

曹又参将军对记者谈话 控诉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

(1945年12月12日)

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45岁的曹又参将军，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呈现出刚毅的精神，是一位喜欢严格军事生活的军人。他在对记者5小时的谈话中，痛陈国民党当局如何阴谋消灭“杂牌”十一旅的罪行。

曹旅长在民国十四年^①就是国民党员，十九年^②即联合三边、横山、保安、安塞等地爱国青年组织部队，至民国二十一年^③即编为十一旅。“十一旅干部大部分系国民党员，大家都诚心诚意地为实现孙总理^④的三民主义^⑤而努力。”曹旅长声称：“但盘踞在国民党领导机关的当权者却背叛了三民主义，为争权夺利，组织特务，发展小组织，更提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实行专制独裁。这些国民党当权者最初对十一旅的种种进步措施，动辄以共产党活动相诬蔑，横加压迫。抗战开始，国民党当权者借‘抗战’美名，将甘肃省地方武装部队所谓‘杂牌’新十旅、十一旅及新十四师调赴北线，名为‘增援绥包’，而中央军^⑥即乘机进占甘肃防地。新十旅及十四

* 本文原载1945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

师更在胡宗南以‘调整’为‘正牌’军即可受‘实费待遇’的诱骗下，于二十七年^⑦开到凤翔受胡宗南整编，原新十旅旅长李贵清及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及其所部官佐均被撤职，完成此一幕‘调整’的把戏。我十一旅过去一直驻防在兰州西南一带，保护地方人民，但至是则调至安边，受命封锁边区，严防共产党，当局蓄意挑起十一旅与中共部队冲突，用此‘一箭双雕’办法，削弱八路军，并借此消灭十一旅。”

曹旅长愤慨地称：“在边区部队团结为国，多方忍让下，我十一旅官兵亦尽力避免发生内争，因此国民党当权者有计划打入我旅的特务有复兴社，军统局、中统局等系统的特务，傅作义亦暗派有特情人员。其阴谋案件之最著者，有1940年复兴特务赖佛庭图谋篡夺第一团军权事件。赖系国民党当权者所委派来的政治主任兼参谋长，在下令撤换一团团营干部时，为我旅官兵察觉其诡计，遂将其驱逐出旅。1941年安边事变，系军统局特务马华彦煽动土匪张廷芝、张廷祥^⑧诱骗十一旅干部赴宴，当场枪杀刘玉亭旅长^⑨，并禁扣尉级以上官佐，妄图兼并我旅，经我部官兵奋勇作战，歼灭张廷祥，部队才得保全。至于上月事变，其实由于复兴特务吴棻（国民党当权者委派的政治部主任兼副旅长），勾结二团长史钊城、副团长张鼎丞为爪牙，谋乘我赴榆林期中，篡夺全旅。张鼎丞赴一团运动连长赵武臣，订于10月25日举行兵变，里应外合，并枪杀我旅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参谋主任王子庄，营长李友竹、赵级三，连长冯世光等忠实干部。这就是国民党天天在叫喊‘军队国家化’的作法，国民党当权者一贯执行的消灭‘异己’，兼并‘杂牌’的伎俩，难道还不明白吗？！”

曹旅长是横山县人，北平平民大学毕业生，曾在榆林中学

及绥远师范任教，又曾任靖边宁条梁分县长。他在对记者叙述往日遭遇时，抚着发光的前额，痛心地说：“我8年来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中，目睹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情形，看不见民族的前途，我是完全悲观的。我相信在国民党部队、政府与机关的公务员中，和我同样抱悲观的还很多。”但是，曹旅长脸上呈现着愉快的颜色，爽朗地说：“在我来边区游历，看到边区的各种建设之后，我才觉得中国前途是光明的。”于是，曹旅长叙述在来延途中亲见边区人民在普选中认真运用民主，慎重投票选举代表的事实，他赞美说：“多少年来志士仁人不惜流血牺牲去争取实现中山先生主张的民主政治，今天在边区及解放区彻底实现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的标志。”他称颂边区“上下一致，每个人均毫无拘束、毫无顾虑，都具有成功的坚强意志与高度的自发的热忱。”他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借外债，没有任何外国援助，没有滥发钞票，但人民的负担很轻，党政军民都同享丰衣足食，这就是因为彻底实行了民主，凡事大家商量，共同努力，有错就立刻纠正。这是光明路线的新中国的榜样。”曹旅长在回答记者询及对时局的主张时，关切地称：“今后本旅将无拘束地走在进步的路上，在邓总司令及左军长领导下，坚决与全国各党派各军及各界人士协同一致，力争实行民主。国民党当权者应当立即改变背叛总理遗教的荒谬行为，停止以武力消灭‘异己’及‘杂牌’，停止进攻解放区。”

注释：

①②③⑦：民国十四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七年分别指公元1925、1930、1932、1938年。

④指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

⑤三民主义即孙中山倡导的民生、民族、民权三大主义

⑥指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⑧张廷芝（1908～1951），陕西吴旗人，曾任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团团长、八十四师骑兵团营长、三边保安司令，是残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全国解放前夕，在绥远假意投诚，后又率旧部叛逃，被追剿公捕，在内蒙古城川公审处决。

张廷祥（？～1941），陕西吴旗人，张廷芝族弟，曾任国民党陕西保安十三团团团长，系地方土匪武装。1941年发动安边事变，枪杀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后被镇压。

⑨刘玉亭，即刘宝堂（1900～1941），陕西保安（今志丹）人，时任十一旅旅长，参见本书《刘宝堂传》。

新十一旅官兵集会 欢庆首届起义周年*

——牛副旅长号召蒋军站到人民方面来

（本报三边廿六日电）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昨在欢腾愉快气氛中渡过起义的第一个周年节日。旅部召集了二千多人的庆祝大会，并举行练兵比赛及娱乐晚会，各团队在驻地分别举行纪念，三边报及义旗报均发行专刊，曹旅长又参撰著《起义周年感言》，边府^①、边参会^②、高等法院、分区各机关、学校、市民、蒙回民旅，均送祝词贺联及慰问信。城乡民众成群结队挑羊抬鸡前来祝贺。鼓乐喧天、盛况空前。地书高峰^③、专员吴志渊暨白寿康诸同志在讲话中一致赞扬新十一旅站到人民方面来，有了很大的进步；队伍得以巩固，力量日益壮大，过去逃亡士兵很多，现在则逐渐减少，几至全无，变成了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吴志渊并代表安边收回教区土地农民向十一旅将士致谢，赞扬他们捍卫三边的功绩。乌审旗保安司令部、城川蒙古自治会暨保安营的代表谢格吴，更感谢十一旅对蒙民的保护，高呼“新十一旅万岁”。牛化东副旅长暨苏效蒙等在讲话中描绘出部队起义后新生的灿烂图景。牛副旅长称：“十一旅

* 本文原载 1946 年 10 月 30 日《解放日报》

的起义，不仅自己走上了光明的大道，也给全国旧军队标明了一条出路：任何军队，只要忠于人民，就会获得力量。”牛副旅长接着号召国民党友军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来，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新中国。最后通过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全国同胞电。

注释：

①边府系陕甘宁边区政府简称。

②边参会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简称。

③指中共三边地委书记高峰。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宣言^{*}

(1946年10月25日)

(本报讯) 去年十月二十五日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之新编十一旅于其起义周年发表宣言，原文如下：

延安新华社转全国各报馆、各社团、各友军、民主同盟诸先生暨全国爱国同胞公鉴：

敝旅成立十有九载，虽有爱国爱民之志，但在独夫统治下，动辄即以军令政令严加防制，又以系出杂牌，遭受歧视，特务专横，屡谋兼并，以此士气颓伤，更无发展，为国立功，深愧于心。去岁日寇投降，方幸国势稳定，和平有望，民主可期，无奈蒋介石仍本一贯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内战，又策划兼并本旅为赢得内战之牺牲品，本旅被迫于去年今日起义，深庆从此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共同努力。年来上下一心，共求进步，政治觉悟，日渐提高，为人民服务之思想，亦日益奠定，变悲观为勇气，化颓伤为积极，废除打骂，实行民主，学习文化，发展生产，拥政爱民，复深得政府与人民之帮助与爱戴，士气大振，信心益坚，咸表示不打

* 本文原载1946年10月30日《解放日报》。原标题为《新十一旅发表起义周年宣言，力争和平民主实现，——一年来全军士气大振，胜利信心益坚，证明为人民服务之军队即有力量》。

倒反动派誓不还家，为人民流血，虽死犹荣，部队巩固，力量壮大，此足为国人告者，实证明忠于人民之军队，就可以获得力量，而流芳千古；反之，前途即甚黯淡，至于反人民之军队，虽一时气焰嚣张，然必归于败亡，殆无疑义。一年以来，尚有高树勋、潘朔端诸将军起义将士已达十万人，声势之大，盛过民元之义军，与解放区军民之强大力量相配合，自可保证全国民主和平之实现，蒋介石之败局，山斯定矣。夫蒋介石外媚美国，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给美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美殖民地，以取得美国军火物资屠杀人民，以维持其小集团利益，然在蒋统治下服务之官兵，究何所取，衣美国服，持美国枪，来干杀同胞之勾当者，果如此忍耶，人禽不可不分，忠奸不可不察，脱去汉奸帽，高举义旗，站到人民方面，始不愧为中华好男儿也。敝旅今后将一本初衷，发扬成绩，继续进步，与全国人民一起，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反对内战，力争实现全国和平民主。谨此宣言。

曹又参率十一旅将士同叩

十月二十五日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给毛主席、 朱总司令致敬电*

(1946年10月25日)

(本报讯) 新十一旅于其起义周年，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原电如下：

延安新华社转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

去年今日敝旅响应你们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的号召，粉碎国特兼并阴谋，举起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从此部队面目一新，士气大振，改革制度，实行民主，内部益臻巩固，力量更见强大，证明你们指引方向之正确。兹值周年纪念日，敝旅官兵在热烈庆贺之际，特向你们致敬，愿继续努力，永为人民尽忠，并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共同努力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新中国。

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率全体官兵同叩

十月二十五日

* 本文原载 1946 年 10 月 30 日《解放日报》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 联司联政驰电致贺*

(1946年10月25日)

(本报讯) 十月二十五日，是新十一旅在安边民主起义周年。闻该旅将在这天开军人大会，隆重纪念。联司联政^①已驰电致贺。原电如下：

曹旅长、杨主任

牛副旅长、王参谋长

并转新十一旅全体官兵：^②

贵旅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保卫人民，迄今已满一载。在此一载之中，全国各地蒋军追随贵军之后而起义比比皆是。先锋作用，昭然可见。方今蒋美仍在狼狈为奸，残害人民，希贵旅义旗更加高举，继续勇往直前。反动派之死亡，新中国之出现，当不远矣。

此颂

起义周年！并祝

全体官兵身体健康！

* 本文原载 1946 年 10 月 25 日《解放日报》

联防 司令部
政治部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①指陕甘宁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

②指新十一旅曹又参旅长、杨林政治部主任、牛化东副旅长、王子庄参谋长。

贺新十一旅起义周年*

——《解放日报》短评

去年今日，新十一旅在安边高举反内战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短短一年，确是该旅进步的一年，全西北的人民莫不寄予深望并表庆贺之忱。一年来新十一旅在思想上、作风上、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战士们抛弃了“吃谁家饭，替谁家干”的雇佣思想，个个成了“为穷人翻身的革命战士；军官们抛弃了“棍子马棒等”的带兵方式，代之以说服教育的领导作风，官兵在政治地位上已经平等，享受着民主生活，人人爱劳动，连队成了学校。……老百姓就给他们作了一个“鉴定”：“十一旅大大不同了”。这虽是一个简单的“鉴定”，却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它包含着一个真理：正因为新十一旅站到了人民方面来，才会有了“大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任何军队，只要他走的是新十一旅的道路，都会有这个光荣的前途。

新十一旅的起义，是如像高树勋、孔从周、郝鹏举、潘朔端以及其他许多起义一样，证明蒋介石的卖国的罪行，一定要遭到破产。自新十一旅起义后，边区周围的起义事件继续不

* 本文原载 1946 年 10 月 25 日《解放日报》

断发生（如陕保六团三大队及胡宗南部），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最近驻横山一带胡景铎所部五千余人的义举，尤为震动西北以至全国。可以断言，今后将有更多的蒋军官兵接踵加入人民军队，蒋介石的不义之师是注定了要毁灭的。

我们预祝新十一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和人民结合得更紧，不断改造自己，成为新的人民军队的模范，并继续用行动来影响、来号召更广大的蒋军官兵退出内战，走上这条新生的道路。

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纪念感言^{*}

☆ 曹又参

回溯去岁今日，正是日寇投降不久，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早日实现，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日夜谋虑，企图独占胜利果实，准备继续独裁专制大动兵戈，疯狂的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反动派复施其惯技，欲乘机消灭全国所有之杂牌军队。我旅内部少数不肖反动分子，在其主子策动之下，欲吞并本旅之进步力量，达到其毒辣的消灭目的。我旅所有进步官兵，在此生死攸关之际，坚决反对内战，毅然高举义旗，粉碎了当时反动派之消灭阴谋，并给全国爱国军人，指示了光明生存的道路。

现在，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得到边区人民、政府及军队热烈的爱护和帮助，使我们万分感激和兴奋。同时，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整训，各方面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政治觉悟的提高，工作作风的转变，军民关系的融洽，战士生活的改善，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收获。全体官兵，都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来完成人民的使命。

自一月停战协定颁布后，我们以为内战威胁已除，全国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不料国民党反动派竟背信弃义，撕毁协定，到处逞凶，虽曾多次谈判，但终因反动派对和平民主毫无诚

• 本文原载 1946 年 11 月 1 日《解放日报》

意，迄无效果。今天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竟调动其百分之九十兵力，进行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置国家于万劫难复之境，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我旅全体官兵，肩负卫国卫民之重任，应百倍努力，完成下列几个任务——

首先是加强政治教育。因为我们部队过去受了十几年旧的统治和教育，无论干部和战士，在政治上都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立场，那种把军队作为私人争权夺利的工具之旧观念，尚未克服干净。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要提高政治水平，从思想上认识我们的部队不是谁个私人的，而是人民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武装。

其次是要真正在实际行动上搞好群众关系。为群众服务的话，口头上谁都会说，但在同群众实际接触中，我们就很难把握住这个原则，往往把过去旧的一套对待群众的办法就用上了，结果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群众不满，甚至于轻视我们，这是应该严肃注意的。

再次是学习新的军事技术。过去旧的一套，有的还可以用，有的已经陈腐了。新的战争，需要我们学习新的军事思想及新的军事技术。最后，现在环境日趋紧张，我们应加紧从思想上精神上物质上准备战争。以便随时随地对进攻的反动派以迎头痛击。我们既是人民的革命军队，就有责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有责任保卫国家之和平民主，有责任争取民族独立，也就应该在思想上行动上完全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坚决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迅速而确实的完成上述任务，同所有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不愿打内战的友军团结起来，携手并肩，以必胜的信心，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进步的一年*

——纪念新十一旅起义一周年

☆ 十一旅副旅长 牛化东

新十一旅为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安边起义，到现在已整整一年了。一年来，全体官兵朝着人民军队的方向迈进，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官兵关系上、军民关系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十一旅大不同了。”这是老百姓给我们做的鉴定。

我们不敢自满，当此起义一周年之际，我们愿以一年来部队的成绩来回答广大人民对我们的热望。分清了是非，坚定了立场。十一旅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了多年特务的反共教育，官兵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八路军还抱有较深的成见。

起义后，极大部分官兵从亲身体验中，逐渐认清了是非，打破了成见。二团三连六班长李顺说：“以前我总认为共产党一切都是骗人的。一年来，我见共产党样样都好，反动派要打内战，想消灭共产党，我要和他拚老命！”在一团纪念“八一”的座谈会上，许多人都说，“今天我们弄清了八路军的来历，

* 本文原载 1946 年 8 月 1 日《解放日报》

他是咱们穷人自己的军队。”有部分抱着“吃谁家饭，替谁家干”和“当兵就是为了发财”等思想，现已遭到强烈的反对。比如萧戍业说：“我们是为穷人翻身才革命，谁要自私自利，我们就反对谁！”

说服教育替代了棍子马棒，“兵不斩不齐”，这是起义前干部带兵的唯一原则，教育战士，除了棍子马棒以外，很少有其他办法。起义后，曹旅长号召全体干部，学习新的领导作风，废止打骂，他说：“打骂是落后的野蛮的一种带兵方法，侮辱战士的人格，会使官兵之间的距离越变越远。”在阅读和学习了“论解放区战场”、“官兵关系”、“领导作风”等文件之后，有许多干部都大胆的坦白的向战士反省了自己领导上的缺点。干部们慢慢学会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代替了马棒棍子，大大的改善了官兵关系。一团一营特务队董克智，起义前常打兵骂兵，而现在对战士像视兄弟一样的亲热，带着他们学习，鼓励大家进步。对有毛病的战士他三翻五次的跟他谈，如战士杨桢，曾企图开小差、经他耐心教育后，现在已转变为积极分子。二团一营营长朱子春，起义前每天总要打几个士兵，大家叫他“朱阎王”，可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爱护士兵的好营长，现没有人说他是“阎王”了。

享受了民主生活

起义以后，战士们从黑暗专制中解放出来，享受了民主的生活。大家都这样说：“以前当官的不高兴，就找当兵的出气。什么事情不论青红皂白，当官的说啥就是啥，我们心里明知不对，嘴里也不敢讲，现在可不同了，战士有意见也敢说了，话

说错也不要紧。我们有了民主权利，生活可愉快哩！”

战士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伙食委员、墙报委员等都是经过会议选举的，各种模范也是选举的。选上的感到无上光荣，落选的觉得自己条件还不够就继续求进步。战士们纷纷的说：“现在谁有本领都埋没不了。不像过去只要溜沟子拍马屁就是好的。”正因如此，大批的积极分子出现了，如一团六连战士党树勋，以前是个“烂葬”，现在却成了“活宝”。他是俱乐部的文化娱乐委员，排戏、编唱快板、发动竞赛、组织晚会，搞的非常红火。

连队变成了学校

当你晚上一走进营房，就看到战士们围着灯写字、看报、记日记。把起义前抽大烟、赌钱、吵架……的坏习惯完全变了。像一团四连杨玉岗，在月光下还看书、写字。六连蒙古战士程玉山一月学会五十个生字，战士们一有空就凑在一块研究。高兴的刘连长说：“我从没想到学习有这股热劲！”一个月政治学习一总结，平均七十七分。政治觉悟高了，文化也普遍提高了。学习方法也想出些新的：一团四连李玉山班的黑板报，二团一营特务队的识字登记表，一团二连李茂亭造猪毛笔，白土墨，解决了学习困难。

在军事学习上也发扬了官教兵、兵教官、小教员等方法，出现了不少模范人物。二团一连刘兴庆投弹五十四米，朱营长高兴的说：“过去听说八路军投七十米，认为吹牛皮。现在我们也出现了这样的能手。本事是学来的，要更努力！”

人人劳动，建立了革命家务

全旅种糜子、谷子、蔬菜……在五百垧以上。人人参加了劳动。像一团六连每天抢在前头，感动了战士。又实行了公私兼顾的分红办法，谁都认识了生产是为了大家。像二团三连赵福成说：“种菜也是革命工作，我一定完成任务。”

在生产中也出现了模范人物。像旅司侯副官，一个人种了一万多斤菜。像一团六连朱绪禄一趟背一百七十四斤菜，二团四连肖彦贞背一百六十斤柴。各连又喂了猪，开磨坊，开杀房，二团成立了军人合作社，收到二千万股金，人人入股，月月分红。战士们说：过去办得合作社，别说分红，连本也不见了。这样，建立了公私家务，也改善了伙食。一周吃到两三次面，十天一顿肉。过节每人肉四斤，面八斤。战士们说：“当了十年兵，这样过节还是头一次。”战士李学贤说：“过去当兵四年没吃面，往年哭鼻子，今天高兴的太。以前我想逃跑，现在打我也不走！”

戒掉嗜好，都学好了

旧军队里，吃大烟、赌钱，那是很普遍的。十一旅以前每连染嗜好的有十多个。赌钱，人人都来。起义后，大烟戒了，赌禁了。像一团一营特务队分队长魏孝忠说：“从前有啥希望，干到那会还不是那回事。就赌、抽、胡搞。现在大家进了步，毛病成阻碍，我就决心戒了！”

一团二营，二团一营又成立了戒烟休养所，伙食好，又讲

故事、读报，精神上安慰了他们。戒烟成绩很好。又像二团二连班长岳有善鼓励战士罗新民戒烟，给他买了五斤肉。罗新民说：“再不戒就见不了人！”下决心，十天戒掉了。团六连原有九个吸大烟的，现在只有一个炊事员没戒掉。像朱绪禄一戒掉烟，吃的红光满面，背菜一趟就背了一百七十四斤。

二团五连张副连长说：“过去赌钱输光了，借钱又输了，偷了士兵的被子卖了赌，现在全连戒了，再不会干出下流事了！”

各连民主讨论，订了戒赌公约，大家遵守，互相监督。连过年时老百姓都说：“过去十一旅放赌，现在不放了，咱们也不要赌了！”

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生产时，二团四连战士史高祥拔了百姓豆子，战士彭世喜，肖彦贞当面就批评他，以后就改了。一团三连帮百姓秋收，张排长带领着天不亮就下地，黑了才收工。一团一营特务队上士李师益，看到个老婆坐在糜子地边哭，就自动帮她收割了。一团三连学习模范杜宗有找穷苦军属帮割了三天。

热烈备战自卫

战士们听到蒋军向解放区进攻，都气愤极了。李耀华说：“蒋介石敢进来，打他个头破血流！”。大家工作自动，都很卖力气，许多战士说：“反动派要敢来，我一定缴他几支枪！”现在大家都磨着大刀，刀刃飞亮。都说：“那时狗日来，就干掉他！”一团三连战士梅先富每天擦机枪，还说：“用在一时！准备好！”现在都准备了，换美国枪，争取反动派放下武器，捉俘虏。

起义十月 面目一新

曹王两将军谈新十一旅进展*

(1946年9月27日)

去年十月间起义的新十一旅旅长，现兼三边分区警备司令曹又参将军及该旅参谋长王子庄将军，日前自防地来延公干。记者昨日往访，承告以该旅起义后之进展。曹将军身着黄呢军装，虽近感不适，但精神仍极充溢。他回忆该旅起义经过后说：“经过十个月的整顿全军面貌已为之一新。就官兵关系来说，过去遗留的军阀主义和打骂现象已逐渐肃清。最初干部们感到似乎除打骂外就无法管理士兵，现在方知用说服教育和会议检讨反而收效更大。过去营级以上干部很少出早操，现在则以身作则和士兵一同出操。象警卫连白连长不但同样带着枪弹出操，且亲自担水，受到战士们的称誉和爱戴。就军民关系说，今年六月间驻地骡马大会上，本旅一个士兵打了老百姓，我们就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给老百姓认错道歉以教育大家。至此在座的王子庄将军说：“原来旧军队中的卖烟集赌、拉丁和打骂制度已成过去了。”他说：“政治思想教育和生产劳动是提高部队使之走向人民的军队的重要因素。曹司令去年自延返部

* 本文原载 1946 年 9 月 27 日《解放日报》。

后不仅为本旅定出明确的政治方向，鼓动全军学习，今年八月且亲自出题口试旅直干部。二团六连一个士兵王大成谈：“中国不和平我就不回家，蒋介石的进攻不打垮，我就不复员！”另一面生产成绩异常惊人，现在每个连队要种十多垧菜地，从前是靠发饷，钱虽比现在多，但物价上涨的快，生活很差；现在每周可吃到两次肉和面，油菜均够定量。二团军人合作社也成立了，不到五天收足三千四百股，股金一百七十万元。由于生活日益改善，全旅上下学习情绪高涨。士兵们说：“只要革命成功了，我们要钱做什么！”连队中没有一个士兵不读报或听报，有的连队写稿的有三十多人，一个战士每月认字二、三百个，他们感慨地说：“要是早五年学习，现在多好？从前把光阴都浪费了！”在连队中，还进行士兵讲演比赛呢。”最后王子庄将军说：“但我们以为这很不够，使十一旅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民军队，还需要加倍努力”。

记者最后询以边防情形及对于国是观感，曹将军说：“蒋介石向解放区的进攻已达数月，且日益扩大，我相信这次内战是长期性的，今后，起义部队一定会不断增加，因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平民主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他坚定地说：“必须清除一切民主障碍，方能谋取全国的民主与和平。我们信心很强，虽然国民党有美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但其机构是腐朽的，人民怨声载道，迟早必须垮台，至于三边边防，现尚平静，如若有人胆敢进犯的话，我们有足够信心去保卫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按：曹又参将军，陕西横山人，现年四十六岁，民十四毕业于平大，后求学于南京高教班，民十九该旅创建时即任旅长。去年十月二十五日率部起义。王子庄将军为他的同乡好友，亦该旅之领导者。

新十一旅李友竹团长高昆山 副团长冯世光营长献地千顷*

(1946年9月26日)

(本报三边讯) 新十一旅二团团长李友竹同志，在8月21日安边城群众大会上，当场把安边砖井区350顷山地献出，并且号召：分配到地的农民加紧生产，勤俭耕种。农民十分感激。(按：李团长是陕北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十一旅起义的优秀领导者之一)。

(又讯) 自新十一旅第二团李友竹团长献出地后，该旅第一团副团长高昆山与一营营长冯世光相继献地。高副团长献出在安边城南双墩渠的土地200顷。冯营长献出在安边砖井堡及赵家圪两处置住宅2所(计正房10间，庭房14间，铺面60间)，山涧地200顷，柳树30余株以及陈家圈山地180顷。他们在献地书中说：“在蒋介石仗恃美国帮助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今天，为了加强保卫边区的力量，我们献出土地，请求政府派员协同农会委员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与居住，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政协会的协议，达到耕者有其田。”三边地委高峰同志闻讯后特致函加勉，赞扬他们的义举。(按：

* 本文原载1946年9月26日《解放日报》。

冯营长系米脂人，民国二十年^①参加十一旅，与许多进步将士一起曾向阴谋破坏和篡夺十一旅的国特进行三次大的斗争。高昆山副团长，米脂人，亦系十一旅的骨干）。

注释：

①民国二十年，即公历 1931 年。

新十一旅大事记

☆ 苗斌杰 田生贵

1929 年

冬，驻三边的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等地方武装，在陕北“倒井”运动失败后，招集失散人员、脱离井岳秀、投奔冯玉祥驻宁夏平罗苏雨生部，被编为第八、第九旅，谷莲舫任八旅旅长，石英秀任九旅旅长，王子元、张廷芝分别任八旅十五团、十六团团团长。中共陕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利用苏部扩编之机，先后派遣刘志丹、谢子长、张东蛟等 100 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苏部王子元团和石英秀旅，进行兵运工作。

1930 年

春，刘志丹、谢子长先后来安边、定边、盐池等地进行兵运活动。

夏，八旅十五团学兵队成立。和东蛟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同时建立了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张东蛟、高岗分别任正、副书记。

5 月，中原大战爆发。苏雨生奉命由宁夏平罗进军甘肃平凉，途中前进受甘军陈珪璋旅阻击，后退受宁夏马鸿宾部冶成

章旅围堵，进退维艰，遂宣布脱离苏雨生部，暂驻下马关。

8月，石英秀、王子元率部投靠甘肃临时主席王赉，合编为驻兰州雷中田新编第八师第三旅，驻防靖远。

1931年

年初，王子元、石子俊分裂。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调防兰州；石子俊率第三旅移防定西。中共地下党员遂分别在两部活动。

8月，王子元工兵营改编为甘肃保安司令部第三路游击队，王子元任司令，张东蛟任副司令兼大队长，回防靖远。此间，王部迅速扩编达1000多人，编为3个团，有中共地下党员近百名，原特支改设特委，下设军官、士兵、教导队3个支部，张东蛟、牛化东分别任特委正、副书记。

10月，石子俊第三旅协同甘肃宣慰使孙蔚如十七师讨伐驻平凉的十三师陈珪璋第十一旅，收编其残部刘宝堂团，编为第三团。

是年，石子俊第三旅受杨虎城改编，编为新编第十一旅，驻防静宁，归甘肃绥靖行辕主任邓宝珊指挥。王子元部也被杨虎城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驻防靖远。

1932年

春，新十一旅开赴陇东庆阳一带驻防。

3月，张秀山到达靖远王子元旅，向地下党负责人张东蛟、石子建传达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组织兵变的指示。

夏，石子俊将收编的刘宝堂第三团并入二团，二团长冯杰山撤职，刘宝堂任团长。

5月初，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召集张东蛟、吕振华、苏醒民、张秀山、石子建等开会，策划靖远起义。

5月30日，张东蛟等在王子元旅再次发动起义，并在水泉堡竖起“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大旗。

7月9日，新十一旅曹又参特务营一、二连，在一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和杨林等率领下于西华池起义。

1933年

春，靖远兵暴失败后，王子元部队即解体，王子元流落绥远、天津等地。牛化东、高昆山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转到新十一旅。

1934年

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成立，邓宝珊任军长，下辖两个旅：第十旅，李贵清任旅长，驻防靖远；第十一旅，石子俊任旅长，移防会宁、静宁一带。

4月，石子俊因病在北平逝世，年仅43岁。石病逝后，邓宝珊宣布由一团团长陈国宾代理旅长职务，7天后，二团团长刘宝堂持委任状带兵夺走军印，从此，陈、刘结怨。

1935年

8月，新十一旅在静宁、会宁、庄浪、隆德一线布防，奉命堵截红军。

10月4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新十一旅防区，双方未发生战斗。

1936 年

10月2日，红军第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攻克会宁城，击毙新十一旅二团二营六、七两连10多人，俘虏50多人，后经教育放还。

10月3~5日，刘宝堂亲率新十一旅与在会宁会师的中央红军发生多次激战。

1937 年

春，新十一旅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在其防区内收容红军长征过境时失散的伤病员及掉队人员1000余人，除部分营、团以上干部转送回延安外，一般战士700多人全部编入新十一旅，并秘密组成“地下混成独立旅”，进行隐蔽斗争。

8月，新十一旅奉命由甘肃现防区开赴绥远，进行抗战。

是年冬，新十一旅在开赴抗日前线中途经安边，暂住一冬，翌年春又开赴榆林。

1938 年

春，新十一旅移防榆林城南三岔湾、归德堡、米家园子、鱼河堡一带。一团八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任怀义突然叛党，向上密告牛化东、李树林等9人系“赤化分子”。中共地下党组织依靠团长陈国宾、营长曹又参等进步势力，沉着应对，粉碎反共告密阴谋。

秋，新十一旅一团调防安边。

1939 年

夏，新十一旅由榆林三岔湾全部移防安边。下辖两个团，旅部和一团团部驻安边城，一团一营驻砖井，二营驻白泥井，三营驻定边城东关、南关及砖井一带。二团驻柠条梁、堆子梁。

是年，国民党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新十一旅开始制造“摩擦”，不断挑起事端。

1940 年

春，王子庄由一团调任二团一营营长。

二团地下党组织被二团团附、叛徒张鼎丞瓦解。

冬，刘宝堂欲叫陈国宾换掉二营营长柴明堂，遭陈严词拒绝。后刘宝堂又向邓宝珊提议，陈国宾年老，宜免去团长职务，改任副旅长，陈即借口去兰州“治病”，暗中安排反刘。

1941 年

2月，刘宝堂宣称，奉胡宗南命令，对一团进行整编，激起一团官兵义愤，欲武装扣留刘宝堂，双方形成剑拔弩张对峙局面。后经晋陕绥边区总部参谋长俞方皋调解，事态平息。

7月4~9日，何文鼎二十七师点验委员魏高参前来安边点验张廷祥、张廷芝部队，经5天点验，宣布胡宗南命令：委任张廷祥为陕西保安十三团团团长，与新十一旅联防安边；委任张廷芝为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待整编结束后，即刻移防绥远。

8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派李启明、葛申，警备

三旅派黎光等人来十一旅指导地下党工作。

9月4日下午，张廷祥、张廷芝在内边城内举行宴会，宴请十一旅连以上军官及当地要员、士绅。席间，张廷祥乘敬酒之机击毙刘宝堂，制造了安边事变。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因公到定边未去赴宴。牛得知事变情况后，立即向三边地委、警三旅作了汇报。分委指示牛速回安边，掌握部队，消灭叛匪。

9月5日，张廷祥、张廷芝对安边城内新十一旅防地发动进攻未果，便请城内绅士刘文卿、余鼎九等人出面调停。下午6时达成协议：张家释放除一团长陈国宾外所有被扣军官，驻安边城内所有新十一旅部队撤出城外。是夜，张廷芝之父张兰亭携家眷从小南门逃往堆子梁临时防地。

9月6日，牛化东赶赴白泥井十一旅防区，召集高宜之、柴明堂等开会，成立以牛化东任总指挥、柴明堂、米积山任副总指挥的讨张指挥部，制定讨张计划。

9月14日（一说9月8日），晚12时，新十一旅在曹又参、牛化东指挥下，智取安边城，击毙张廷祥之父张玉亭，救出陈国宾，张廷祥弃城潜逃，后被抓回公审枪决。张兰亭、张廷芝父子逃往榆林。

9月底，陈国宾继任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

11月22日，驻定边城外新十一旅一团三营（营长宋子元）于夜间突然包围西关警三旅骑兵二团，制造摩擦事件，后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与邓宝珊交涉，并派贺晋年与陈国宾谈判，和平解决。

1942 年

春，胡宗南令新十一旅与驻内蒙古桃力民的何文鼎二十七师换防整训。三边地委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充分揭露胡宗南换防阴谋、发动广大官兵坚决抵制换防。同时，王震司令员率三五九旅驻防张家畔、城川一带，同警三旅联防，坚决抗击何文鼎南下。

1943 年

11月，曹又参派中共地下党员苏杰儒、阎孔照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工作，表示：一、不脱离邓宝珊的领导；二、不离开安边防地；三、不脱离和定边八路军的关系。西北局给曹补助法币 30 万元。

1944 年

4月5日，陈国宾在安边病逝，终年 63 岁。

本月，中共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派李树林到榆林向邓宝珊做工作，促使邓宝珊决定由曹又参任新十一旅代旅长兼一团团长。

是年，新十一旅一团 举办两期军训班，军训班主任王子庄，第一期军训队长李树林，第二期军训队长冯世光，对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迎接抗战胜利。同时，成立统战性质的“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

1945 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

降。新十一旅官兵与安边市绅民一起欢庆抗战胜利。

9月2日，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经过8年浴血奋战胜利结束。

本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官长胡宗南执行蒋介石内战政策，计划将榆林二十二军与安边新十一旅合编为一个军，内定何文鼎任军长，编后调绥远西部打内战，阴谋通过整编手段架空邓宝珊，瓦解十一旅。

10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派杜立亭到安边向曹又参通报国共重庆谈判情况，希望曹又参新十一旅走上反内战的道路。

10月10日，代旅长曹又参赴榆林向邓宝珊总司令请示办法，并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10月15日，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二团团长史钊城等复兴社分子密谋，准备把二团从柠条梁调进安边城，以武力整掉第一团。并派张鼎丞、任怀义率卫士10余人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官兵宣扬改编为正规军的好处，用封官许愿的手段瓦解一团的革命力量。

10月23日，中共十一旅地下组织负责人冯世光与进步人士旅部参谋主任王子庄到定边，向中共三边地委书记、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汇报紧急情况，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新十一旅于25日起义。

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高昆山等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研究制定了起义方案。

10月25日拂晓，起义的枪声正式打响。首先围攻旅部，扣押了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和国民党县

党部书记长谢永鹏等，击毙了二团副团长张鼎丞。

10月27日起义部队和八路军警三旅在安边召开祝捷会师大会，王子庄宣布新十一旅正式起义和坚决消灭驻柠条梁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

10月28日，攻打柠条梁战斗打响，首先进行围攻劝降，二团负隅顽抗。

11月1日，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发动强攻。

11月3日拂晓，总攻柠条梁战斗开始。经过2小时激烈巷战，击毙史钊城以下100多人，俘虏炮连连长慕寿山等800余人，周效武营400余人从堆子梁防区溃逃。

11月5日，新十一旅代旅长曹又参暨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李友竹（李树林）、赵级三、冯世光与全体官兵发表起义通电。

本月，中央将起义后的新十一旅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任命曹又参为旅长，牛化东为副旅长，王子庄为参谋长，赵级三为一团团长，李友竹为二团团长。并派郭炳坤任政治委员，杨林任副政治委员，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还从警三旅抽调大批政工干部到新十一旅帮助改造这支部队。

12月初，贺晋年陪同曹又参一行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与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曹又参说：“你们是火车头！”

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新编十一旅全体官兵通电全国，沥陈安边事变真象，反对国民党以特务手段消灭异己之阴谋，拥护邓总司令、左军长之领导》。

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曹又参对记者谈话,控诉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

1946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警三旅调防陇东,撤销三边警备区,成立三边军分区,任命曹又参为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新十一旅旅长,一团驻防盐池,二团驻防定边。

8月21日,安边城群众集会,庆祝收回教区土地分配给人民。新十一旅二团团长李友竹当场把他在砖井区350垧山地献出,之后一团副团长高昆山与一营营长冯世光也相继献地580余垧,受到群众欢迎。

10月25日,新十一旅官兵2000多人集会,欢庆起义一周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驰电致贺,《解放日报》发表短评。会议通过了《新十一旅起义周年宣言》和《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牛化东副旅长在会上号召蒋军站到人民方面来,指出“十一旅的起义,不仅自己走上了光明大道,也给全国旧军队指明了一条出路,任何部队,只要忠于人民,就会获得力量。”

11月1日,《解放日报》刊载曹又参旅长《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纪念感言》。

1947年

3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新编第十一旅改为地方部队。

3月21日,马鸿逵部从西北进犯三边分区。3月24日,侵占盐池县城,新十一旅一团撤离,4月3日侵占定边县城,警三旅八团在战斗中失利,6日马部又占领安边县城。

5月7日,经上级同意,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新十一旅二团和警八团合编为“二八团”撤销新十一旅番号。

十一旅组织沿革

☆ 马 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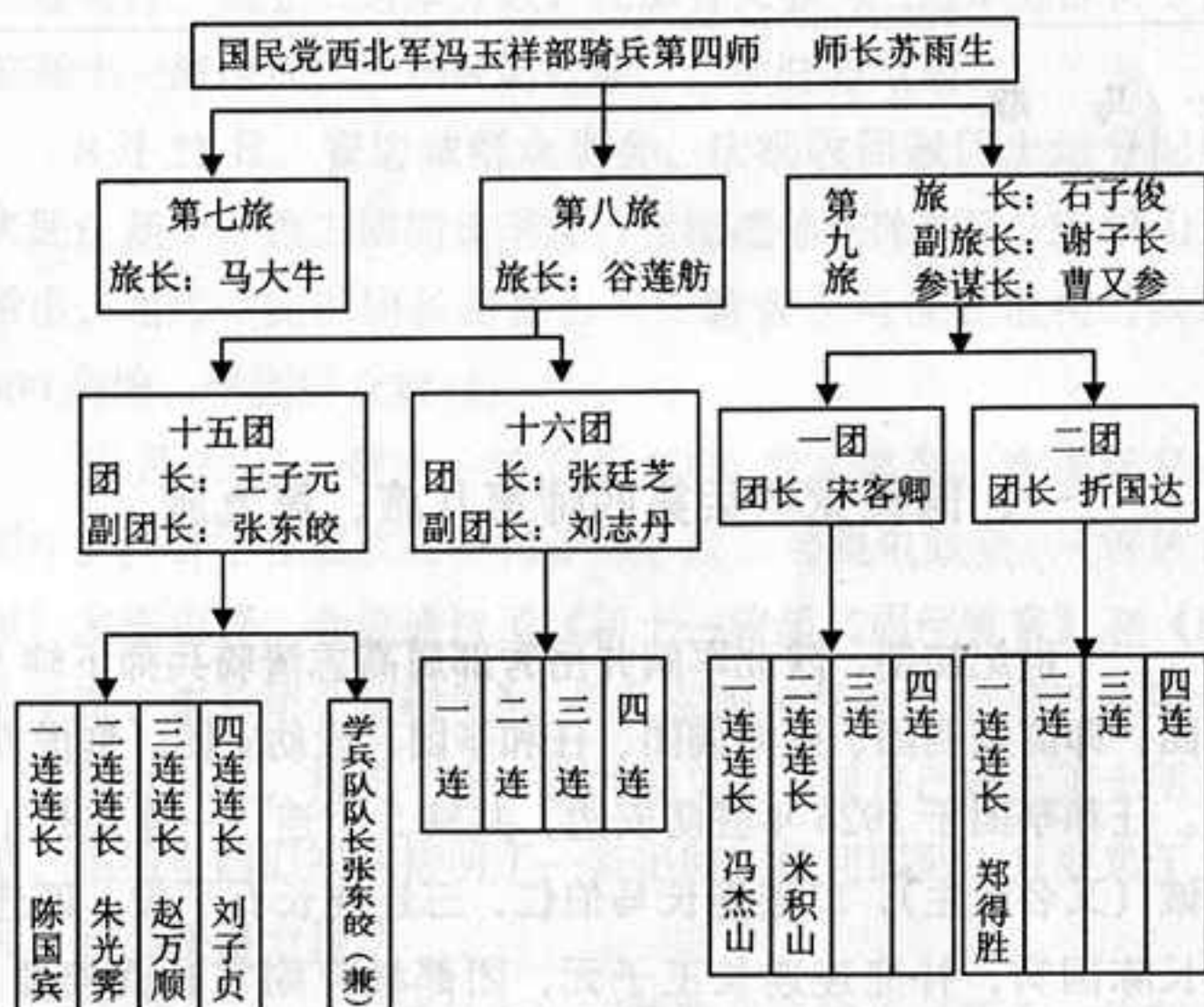
一、国民党骑兵第四师第八旅、第九旅

二十世纪初，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属高志清骑兵师下辖 5 个团，即高景明团、张鸿儒团、任和亭团、段幼安团、荆虎成团。任和亭团于 1926 年驻防安边，共辖 5 个连，一连连长丁志诚（又名盘生），二连连长马伯仁，三连连长石子俊，四连连长陈国宾，补充连连长王子元，团部教育副官长阎揆要。1927 年调往府谷驻防，1928 年骑兵师缩编为混成旅，任团缩编掉 2 个连，调回定边驻防。适时部队开展“反蒋倒井”秘密活动，到 1929 年冬，石子俊、王子元即脱离该团与驻横山的谷连舫一起投奔冯玉祥留守宁夏平罗的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苏以其原基本部队为第七旅，包头人马大牛为旅长，收编谷连舫为第八旅，石子俊为第九旅，并按他们所带人马枪弹多寡予以委任，王子元任八旅十五团团团长，张廷芝任八旅十六团团团长，每旅辖 2 个团，每团各辖 4 个连；1930 年春，谢子长等来苏部，苏委任谢为第十旅旅长，因十旅尚未组建起来，谢即以九旅副旅长名义到陕北招兵，后将所招新兵组建为学兵

队，归王子元十五团辖，是为十一旅之前身。

国民党骑兵第四师第八旅、第九旅组织序列表

(1929年冬—1930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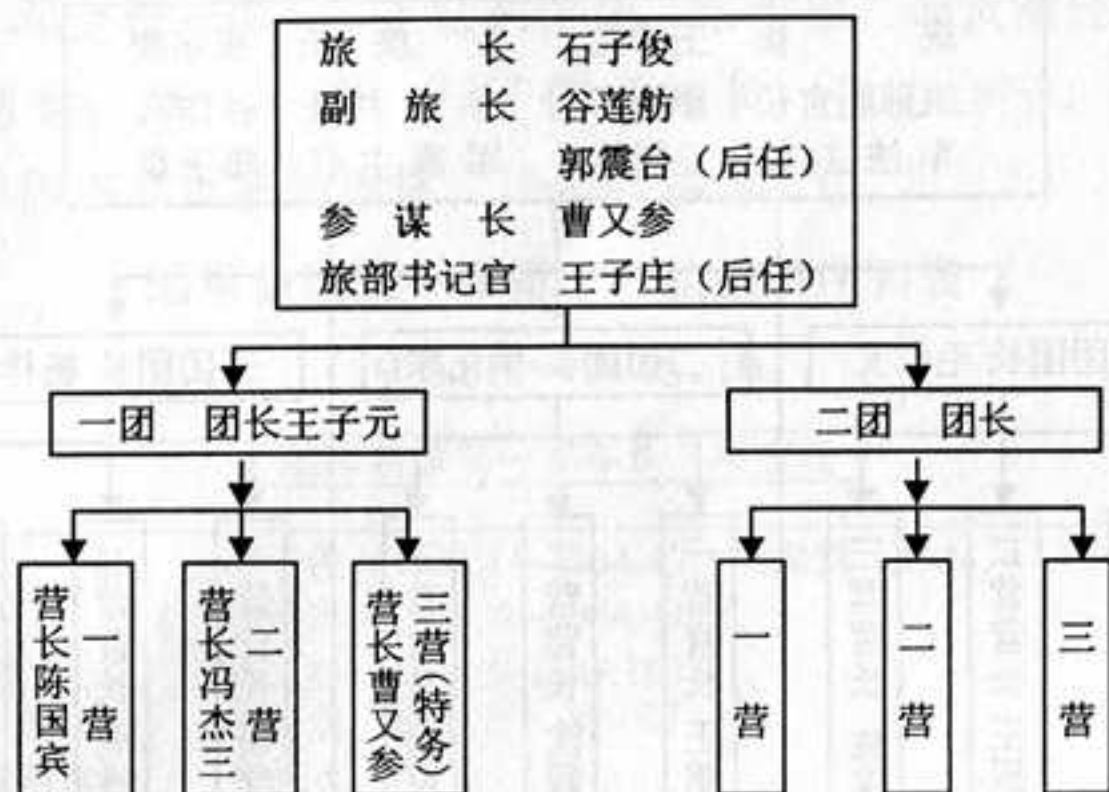


二、雷中田部新编第八师第三旅

1930年5月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甘肃平凉接防。苏部到固原时被地方顽匪黄德贵阻击，退至宁夏宁安堡时又遭马鸿宾部冶成章旅袭击，损失惨重。之后，石子俊、王子元等商议，脱离苏雨生，投奔甘肃省主席王桢，王桢遂将这支部队合编为驻兰州雷中田的新编第八师第三旅，下辖两个团，开赴靖边驻防，后移防定西。

雷中田部新编第八师第三旅组织序列表

(1930年8月—1931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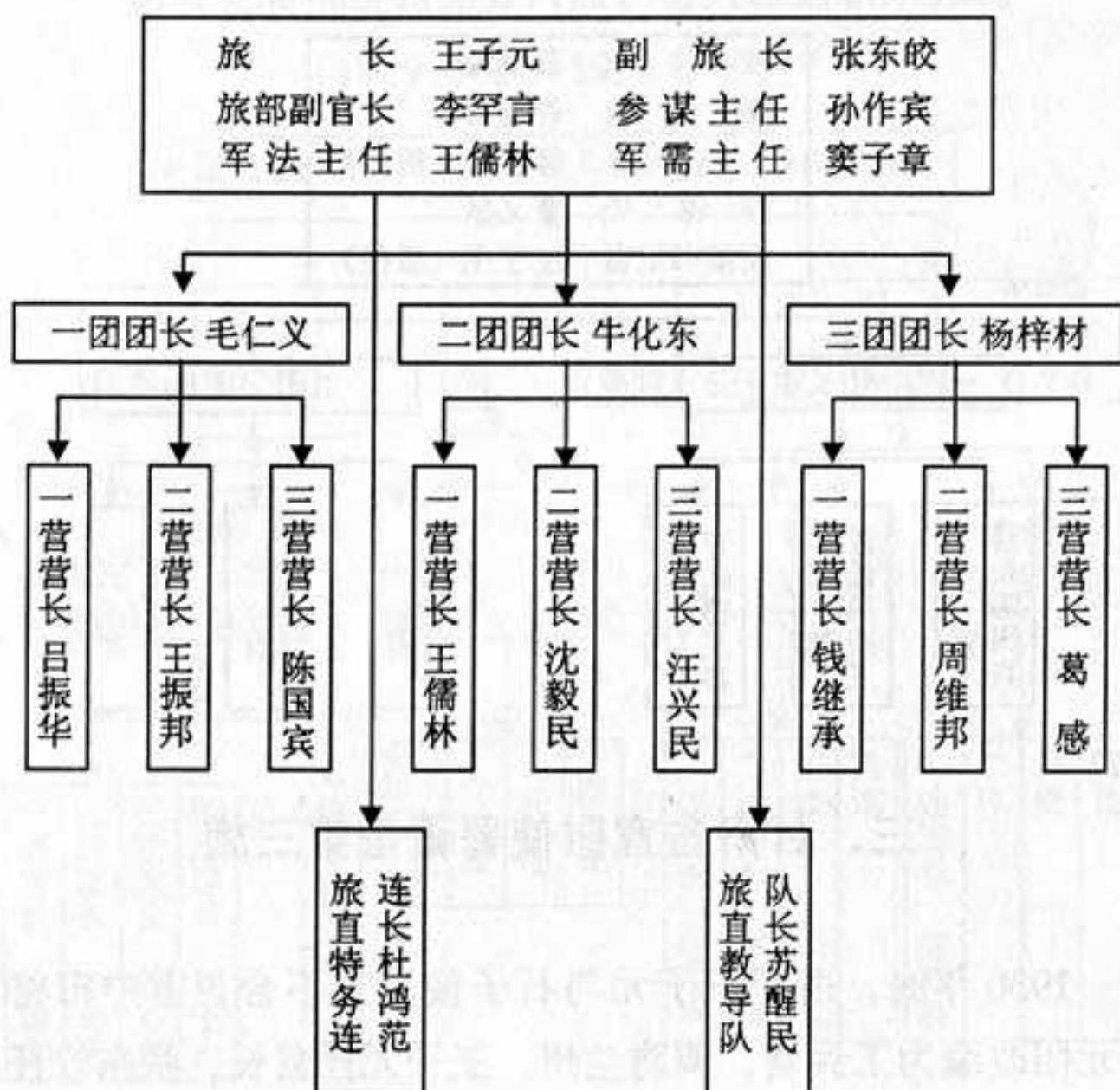


三、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

1930年底，由于王子元与石子俊意见不合，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调防兰州，王子元任营长，张东皎任副营长。同年8月，雷中田又将王子元工兵营改编为甘肃保安司令部第三路游击队，王子元任司令，张东皎任副司令兼大队长，同时返回靖远驻防。1931年11月，陕军孙蔚如部入甘，击败雷中田，将王子元部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下辖3个团。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该旅发动了打拉池、靖远水泉堡等多次兵变，1933年春夏该旅解体，王子元流落绥远、天津等地，王子庄、牛化东、高昆山等转入新十一旅。

孙蔚如警备第三旅组织序列表

(1931年11月—1933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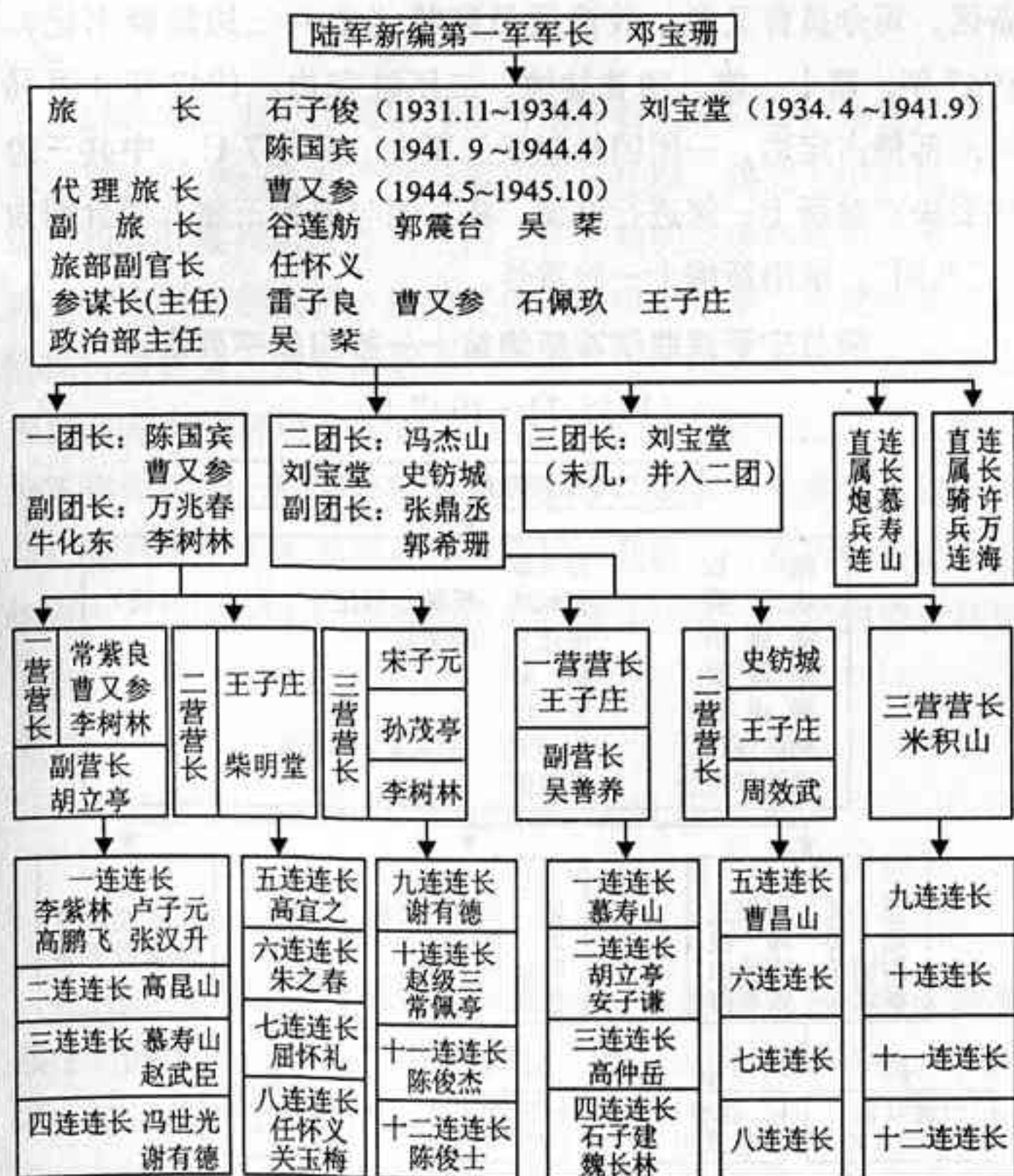
四、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

1931年夏，石子俊第三旅由定西移防静宁一带。“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驻陕杨虎城部孙蔚如第十七师入甘，击败雷中田，出任甘肃省宣慰使。同时，石子俊第三旅协同孙蔚如十七师讨伐驻平凉的陈珪璋第十一旅，收编陈部刘宝堂特务二团为石部第三旅三团，未几并入二团。此间，经杜斌丞说服，石子俊接受杨虎城改编命令，将第三旅改编为第十一旅，下辖

两个团，归西安绥靖行辕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指挥。1932年春开赴陇东庆阳地区驻防，1934年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成立，邓宝珊任军长，下辖两个旅，第十旅，李贵清任旅长，驻防靖远；第十一旅，石子俊任旅长，移防会宁、静宁，1937、1938年间移防榆林，1940年移防三边。

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组织序列表

(1931.11—194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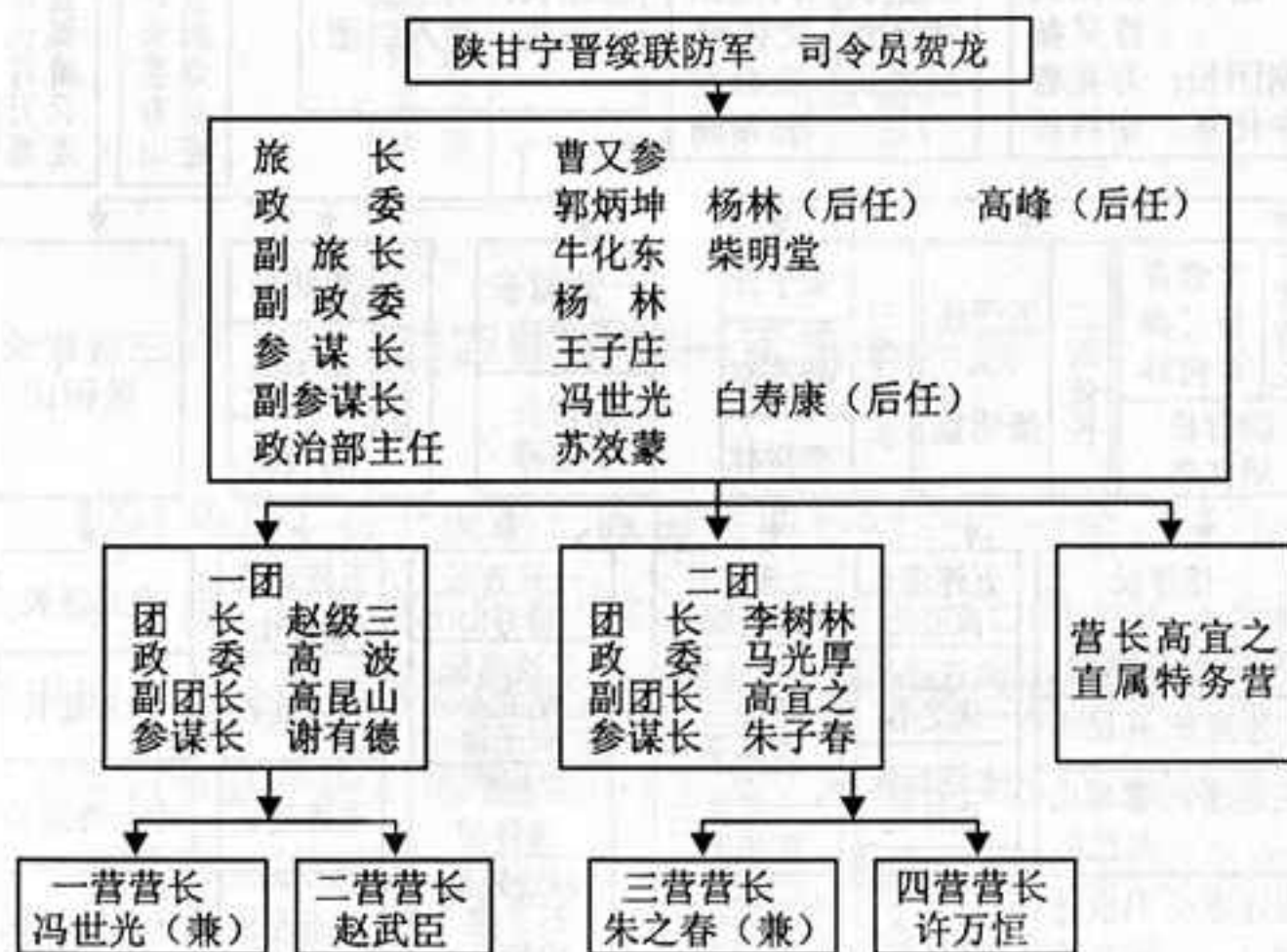


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

1945年10月25日，新十一旅安边起义成功后，被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郭炳坤任政治委员，以原一团为主编为2个团4个营。1946年驻定边的警备三旅调防陇东警备区（留八团驻定边），新十一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高峰（中共三边地委书记）。1947年，新十一旅一团驻盐池，二团驻安边。1947年4月马鸿逵部侵占定边，一团团长赵级三叛变。5月7日，中共三边地委决定对新十一旅进行整编，将二团与原警三旅八团合编为“二八团”，取消新编十一旅番号。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组织序列表

(1945.11—1947.5)



中共十一旅地下组织简述

☆ 余录荣

国民党新十一旅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当初，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该部任职，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之后，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历尽曲折，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同党的领导始终保持着联系，特别同刘志丹、谢子长、陕北红军及西北革命根据地有着较密切的关系。1945年十一旅的安边起义是中共地下组织联合上层进步军官取得的成功结果，中共地下组织及共产党员起了重要的核心领导作用。兹将十一旅内中共地下组织及共产党员依不同发展历史时期简述于后，以求知情者补充见教。

一、苏雨生部第八、九旅时期

(1929年冬—1930年8月)

1929年冬，陕北三边的石子俊、谷莲舫、王子元先后率部投靠冯玉祥留守在宁夏平罗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1930年1月，苏雨生将他们分别编为第八旅、第九旅，中共陕北特委趁八、九两旅扩充兵员的机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

年到部队里当兵，搞党的兵运工作。当时中共陕北特委军委负责人刘志丹、谢子长将这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八旅王子元十五团建立了一个学兵队。在建立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上一级领导机构叫军委，在宁夏平罗时称“宁夏军委”，第一任军委书记姜耀，直接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

学兵队地下党的特别支部

支部书记 张东皎（一说张秀山）

副书记 高 岗

组织委员 黄培中（育华）

宣传委员 李树林（友竹）

青年委员 薛应昌

此时期，陕北特委两次共派到八、九旅的共产党有五、六十人。他们是：张东皎、张生智、高岗、黄培中、李树林、薛应昌、牛化东、姜跃（鹏翔）、杜鸿范、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吕振华、杜润芝、王儒林、苏醒民、李罕言、常焕章、乔霞波、孙作宾、汪兴民、王子庄（临轩）、杨兴财、刘子贞、刘实庵、夏逢时、朱光霁、王国栋、石子建、白天齐、吴世采、魏岗、吴景敖、邬一民、张国威、孙绍堂、杨汝林、杨佩承、杜香亭、郝新亚、史梧亭（法直）等。当时，党在学兵队中还发展了新党员，如高鹏飞、杨林、曹盛荣、李仲英、李向明、李培清等。

二、雷中田部新编第三旅和警备第三旅时期

（1930年5月—1933年春）

1930年5月，八、九两旅脱离苏雨生部，被驻兰州的雷

中田编为新编第八师第三旅，驻定西一带。不久，王子元部脱离新编第三旅，被兰州宣慰使孙蔚如编为警备第三旅，驻靖远一带。这样，党的地下组织分别在两个部队中进行活动。此时，新编第三旅和警备第三旅，分别建立党的地下特别支部，上一级党的领导机构是：“西北军北军委”，军委书记黄培中，黄牺牲后由石子建任书记。先后受中共陕北特委、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

1. 新编第三旅特别支部

支部书记 高鹏飞 李树林（后任）

委 员 马子镜 胡立亭 高昆山 朱子春

2. 警备第三旅特别支部

支部书记 牛化东 姜 耀

委 员 贺晋年 杨 林 张秀山 杜鸿范

曹化民 吴启昌 张鼎丞

此时，两个旅共有地下党员约 300 人左右，上级党组织曾来新编第三旅和警备第三旅领导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有谢子长、吴鸿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等。

1931 年，王子元警备三旅先后改编为工兵营和保安第三路游击队。部队得到迅速扩编，在王部开展兵运的共产党员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数达 90 多名，遂改特支为特委，下设军官、士兵、教导队 3 个支部。

第三路游击队特委：

书 记 张东皎

副书记 牛化东

军官支部书记 李罕言

士兵支部书记 石子建

教导队支部书记 苏醒民

三、新一军第十一旅时期

(1931.9—1945.10)

“九·一八”事变后，石子俊的新编第三旅接受杨虎城的改编，新十一旅正式诞生。新十一旅下辖两个团，旅设党组，团设党总支。1932年王子元的警备三旅解体，谢子长回陕北红军中去了，贺晋年、牛化东、杨林、张秀山等又回到石子俊的新十一旅，此时，全旅地下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计有党员三、四百人。

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有：李树林、高鹏飞、胡立亭、冯世光、曹化民、吴启昌等。

一团党总支：

书记 李树林

委员 高宜之 高昆山 谢有德 冯世光

牛化东 朱子春 张友生

二团党总支：

书记 曹化民

委员 吴启昌 张鼎丞 武善养 高增业

此间，上级先后派王世泰、张友生、李明波等人到新十一旅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同时还派来白天齐、薛应莲（女）、石子建、常焕章、常佩亭、刘志强、魏书林、何志平、李治华、李洪同、张书春、杜振隆等一批地下党员，到新十一旅加强党的地下力量。

1934年李树林住军校后，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由胡立亭

负责。

1935年至1936年期间，新十一旅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地下党员已发展到五百多人，另外还新吸收了长征红军中受伤掉队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七百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后来转送回延安。

1936年，新十一旅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由中共陕北特委转到甘肃陇东庆阳特委，由中国工农红军三五八旅的王维舟、袁国平、耿飆领导新十一旅地下党的工作。这期间，由于二团的负责人张鼎丞叛变，二团地下党的负责人曹化民、吴启昌失踪，二团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停止活动。

此间，新十一旅一团党组织比较健全，一团党总支负责人是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武善养。当时，营里设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有时一个连只有一个党员干部，连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军事活动、文化学习、读书会等形式出现。

1938年，新十一旅驻防榆林三岔湾一带，地下党组织派武善养由一团去二团重建党组织，但因一团八连连长任怀义叛变，向刘保堂告密，二团党组织重建工作失败。从此，二团的地下党组织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新十一旅党的地下组织主要在一团活动。新十一旅驻榆林期间，地下党的上级领导转到中共绥德地委。

1939年新十一旅驻防安边、柠条梁一带，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三边地委。在此期间，直接指导新十一旅的上级领导有贺晋年、张文舟、王世泰、白治民、高峰、朱子休等。前往新十一旅布置与检查工作的有葛申、余光、黎洪洁、李明波（即黎光）、张友生和延安保安处的李启明等，交通员史维法。

此时，新十一旅一团设党的特别支部，营设党总支，连设支部。

一团党的特别支部

书 记 牛化东 冯世光 李树林

委 员 胡立亭 高宜之 高昆山 谢有德 武善养

一营党总支

书 记 李树林

下辖四个连党支部

一连党支部书记 张汉升

二连党支部书记 高昆山

三连党支部书记 赵武臣

四连党支部书记 冯世光

二营党总支

书 记

下辖三个连党支部

五连党支部书记 高宜之

六连党支部书记 朱之春

八连党支部书记 张有生

三营党总支

书 记 谢有德

下辖二个连党支部

九连党支部书记 谢有德（兼）

十连党支部书记 常佩亭

“安边事变”始末记

☆ 冯世光

两张委任状

1941年，我是十一旅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5月3日，我到一团曹又参营长（思想进步，倾向我党）家中聊天，我有意问曹又参营长：“听说刘宝堂旅长、吴棻副旅长和石佩玖参谋长决定，要清洗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接受胡宗南整编。有这回事吗？如果真有其事，该怎么办？”曹又参营长回答道：“我们要依靠八路军，坚决反对整编”。当时他还建议我把这个情况向贺晋年同志汇报，以防万一。接着，曹又参营长又说：“听张幼兰（张廷芝）昨天说胡宗南给张廷祥委任保十三师师长，委任张廷芝为绥蒙游击司令，他们可能要和八路军发生摩擦，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去找好友夏品三（保安团大队长，思想进步，倾向我党）探讨，去时还没等把话说明，夏品三就抢先告诉我：“昨天保安团已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准备派出二百多军官到吴旗、金佛坪一带招收他们原有的那些旧部（地痞流氓、狗腿子、恶棍），估计能招到两千多人。还计划给胡宗南发电报。让七月初派人来安边

整编队伍。”我急忙问他：“如果张廷祥整编队伍，你和杜廷之（保安团大队长）能否站住脚？”夏品三说：“估计一定会调离，换上他们的心腹人。”我当时提醒他，要注意张家兄弟的这些活动。夏品三点头称是。

6月底的一天，夏品三来到我家说：“张家兄弟已招收了两千余人，听说下月初西安点验委员来安边点编，要求借用军衣。”夏并告诉我，他准备和杜廷之去西安投奔高桂滋另找出路。

果不其然，7月4日，胡宗南派点验委员来安边，经过五天点编，宣布：张廷祥为陕西省保安部队十三师师长，同十一旅联防驻守安边；张廷芝为绥蒙游击司令，待整编就绪后，移防蒙地。

策划于密室

安边点编后不久，于7月31日，胡宗南给张廷芝、张廷祥兄弟发来密令：“将十一旅全部整垮，就地补充保十三师和绥蒙游击师，准备配合何文鼎将军进驻三边，打开进攻延安之缺口。此令在事未成功之前切勿泄露。”

8月3日，张廷祥伙同其父张玉亭，邀请张鸿儒（兰亭）及其子张廷芝进行密谋，策划吞并行动。密谋策划是在张廷祥家后院一间密室进行的。在密谋时室外护兵把守森严，门口除有固定岗哨四人外，有流动哨，任何人不得进入。在密室窗口还有张廷祥的心腹女佣人翠兰放哨，更不准闲人在窗口停留张望。密室内布置别致，炕上栽毛毯，墙上挂书画，书桌上摆着洋烟盘，“洋戏匣”正在哼哼吱吱响着，待张鸿儒父子一到，

张廷祥便殷情招待，又是敬烟，又是递茶，还端上来了刚从外地捎回来的新鲜水果和食品，一阵寒暄之后，张廷祥开门见山地对张鸿儒说：“伯父，对胡长官的密令究竟如何执行，尚请不吝指教！”

张鸿儒思谋了一会，又清了清嗓子，然后摆出权威者的架子，说：“刘宝堂这个旅的第一团，现已完全被地下共产党所操纵，贺晋年的警三旅又住在定边，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若同刘宝堂发生武装冲突，警三旅势必赶来增援，那时我们就很难逃出八路军的包围圈。所以，对密信不能轻举妄动，必须以计谋取胜才是上策”。

张鸿儒话音刚落，张玉亭就有点不服气地说：“错失良机，万事休矣！”张廷祥听了其老子的话，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还是伯父言之有理。对整垮十一旅只可智取，不可动武。”说着，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张廷芝，笑言道：“廷芝哥的妙计很多，1929年，红军周维奇营长兵强马壮，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威胁。当时，廷芝哥和妹妹少荣巧施美人计，在洞房花烛之夜，没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周维奇的全部武装。从此，我们张家才有同红军较量的本钱。这回，廷芝哥难道山穷水尽啦？”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廷祥的话提醒了张廷芝，他一拍大腿站起来，大声说道：“好！好！咱就故技重演。今天再来一个美人计，我就不信整不垮十一旅！”

张廷祥一听张廷芝要施美人计，马上献计说：“要说美人计，我倒真有个美人愿意献上”。其他几个人一听张廷祥有绝色妙计，迫不及待地催道：“快说，快说！”这时，张廷祥却拿板起来，不慌不忙地说：“咱们户家张平老头有个小女名叫小芹，年方十六，长得花容月貌，沉鱼落雁，十分美丽动人，现

在把小芹收为廷芝兄义女，对外就说是哥哥的亲生女。刘宝堂旅长有个儿子叫刘汉，今年十五岁，正当匹配，咱们找个同刘旅长姨太太相好的人去提亲，一旦刘家答应这门亲事，咱们就可以再想进身的办法了，如何？”

张廷芝高兴地说：“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假若提亲成功，我设‘鸿门宴’，邀请十一旅在安边的全体军官赴宴，在宴会上将他们一网打尽，并马上宣布撤销刘宝堂的职务，委任陈国宾团长为副旅长，提升曹又参营长为团长，宣布刘、张两个部队合编为保十三师和绥蒙游击师。此计一成，那我们不仅可以制止八路军的武装干涉，而且真正是占地为王了，妙哉！妙哉！”。

张鸿儒老奸巨滑，想了想说：“凡事都不可草率从事，还要三思而行。事先我们把家眷全部转移到堆子梁寨子里，一旦举事不成，我们也可以随时向榆林转移。”

张玉亭毫不在乎地说：“不要顾虑太多，小心过度反而什么事也办不成。事在人为，一切要为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而奋斗，没有枪杆子在手，一切都将完蛋。”并一再叮咛大家：“今天的决策，万勿失密。”

张氏密谋到此结束。

“美人计”

8月6日，张廷芝邀请安边绅商刘文卿的姨太太“白牡丹”和王伯功的姨太太“交际花”到家中吃午饭。饭后，张廷芝对客人说：“咱陕北又有了杰出人物了，刘宝堂旅长，胡长官现在很器重，不久将要任命为中央整编师师长，前途无量

啊！”接着，他又诡谲地说：“我看他那儿子刘汉，人品也不错嘛。”说着，他让站在一旁的所谓生女小芹给客人看茶，并给“白牡丹”、“交际花”介绍说：“这是令爱小芹，我不久将要离开安边，移防蒙地。我想在临行之前，给小芹找个婆家，你们看有没有合适人家？”他停了停，又接着说：“我想和刘旅长攀个亲戚，以便有个依托，今天请二位太太来拿个主意，两位太太平时同刘旅长关系密切，就请二位做媒吧！事情宜早不宜迟，若可以的话，在我临行前给他们把婚订了，了却我的这桩心愿。事成之后，必有厚赏，不知二位太太能否赏脸办一下？”

张廷芝的话音一落，“交际花”就“咯咯”的笑着说：“我还当是什么事呢？这事好办，全包在我们身上了。”“交际花”，东北人，能说会道，人又风流，并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搞“女人”外交完全是个内行。抗战时期苏联一架飞机因途中缺油，降落在安边西梁三圪塔寨子，当时安边谁也不懂外语，这一下“交际花”大有“用武之地”了。她当翻译，“野菊花”、“白牡丹”当招待。他们这“三朵花”算是为苏联飞机起飞出了一点力，但没有留下什么佳话。

话又说回来了，当“交际花”、“白牡丹”听了张廷芝要她们说媒的事后，心里乐开了花。他们知道，给这些人办事，油水是不会小的，忙忙满口应承了下来。

说 媒

8月7日上午，“交际花”、“白牡丹”陪同刘文卿前往刘宝堂旅长家提亲说媒，本来她们准备先找刘旅长的姨太太“野菊花”商量一下，碰巧刘旅长也在家中，刘旅长见来了三位不

寻常的“客人”，知道来者必然有心事，忙忙热情招待。一阵寒暄之后，“交际花”就笑嘻嘻地对“野菊花”说：“今天给刘太太锦上添花，你真是好福气呵。”“交际花”刚一说完，“白牡丹”赶快接上话茬道：“说实话，刘旅长镇守三边，真是我们的救命上帝。不然的话，我们早被红军共产共妻啦。”

“交际花”和“白牡丹”一个吹，一个捧，“野菊花”听了半天，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急忙说道：“二位太太哪来这么多的客气话，有事就直说吧！”

这时，坐在旁边一直没吭气的刘文卿没话找话地问：“听说胡长官决定把十一旅扩编为中央整编师，是真的吗？”这时刘旅长漫不经心地答道：“有这个消息”刘文卿马上接着说：“这一下就好了，十一旅的前途无量啊！”顿了顿，刘文卿又意味深长地说：“宝堂兄，胡长官把廷芝扩编为绥蒙游击师，把廷祥扩编为保十三师，待点编完后，廷芝移防蒙地，你们三人今后只要齐心联合起来，若再能把何文鼎军长迎进三边，那时，保佑了这方父老，真是功在国家，福佑乡里，可喜可贺。”

“刘兄言之有理。”刘宝堂听了刘文卿的一席话，深有同感地说：“在陕北的国军，如能都执行胡长官的命令，那一定能把红军赶过黄河。”

刘文卿见刘宝堂上了钩，就鼓了鼓勇气说：“你可给大家带个头嘛，把张家兄弟和国军都团结起来，不就行了吗？”

刘宝堂笑了笑说：“文卿兄真是高见，我照此方向努力就是了。”

“交际花”见刘宝堂心里活动了，就忙开动她三寸不烂之舌：“说真的，廷芝为了团结好陕北力量，特意叫我们来给办一件好事，说了保证让刘旅长和太太满意。”接着她就把要为

刘汉提亲的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野菊花”听了要给儿子说媳妇，急忙问：“你们说的是谁家的姑娘？”“白牡丹”不等“交际花”开口，抢先说：“就是廷芝的那个亲生女儿小芹嘛！”

“野菊花”一听说是张廷芝的女儿，受宠若惊：“呵！原来是这样，那倒很合适。就是没见过，不知人品怎样？”“白牡丹”说：“要说小芹，那可是百里挑一，长得可漂亮哩，和刘公子真是美满的一对。”几句话把刘旅长和“野菊花”说得心里乐开了花。

“交际花”看事情已成，就赶紧又说：“你们若同意，我们明天就请廷芝和小芹来你家订婚。”

刘宝堂思谋了一阵，想到这门亲事门当户对，不论从哪方面利益看，都是有益无害，而且太太非常乐意，就一口答应说：“好，就这样定了。”

8月10日，一切按张氏父子原计划进行，在刘旅长的府上为刘汉和小芹订了婚，完成了又一个“美人计”。

针锋相对

对于张氏父子妄图吞并十一旅，清洗十一旅地下党组织的罪恶阴谋，我上级党组织和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早有觉察，并采取针锋相对的错施，粉碎张氏父子的阴谋。

在张廷祥、张廷芝收到胡宗南密令不久，于8月5日，延安保安处就派李启明、葛申、黎光等同志，来十一旅指导地下党的工作，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要和警三旅密切配合，坚决抗击何文鼎伪军南下，密切注意刘宝堂

新的活动。

9月2日，由我组织在安边北城楼上召开了地下党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有陈天治主任委员（原长征红军教导员），委员 沈启盛（原长征红军营长）、马兴有（原长征红军副师长）、陈文英（八路军营长）、高海民（八路军教导员），十一旅地下党员董克治、王建民、邓占奎、邓光祖、薛应连（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我代表地下党组织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分析了敌特新的动向。我说：“刘宝堂旅长、吴棻副旅长和石佩玖参谋长已接受胡宗南的整编任务，要清洗十一旅的地下党员，妄图迎接何文鼎匪军进犯三边，阴谋打开进犯延安的缺口。胡宗南最近委任了张廷祥和张廷芝新职务，目的就是为迎接何文鼎南下铺平路道。眼下张、刘两家虽然联姻合作，但他们有很深的矛盾，我们地下党员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另外，据可靠消息，张廷芝设宴邀请十一旅在安边的全体军官，这很可能是一场“鸿门宴”，我们除做好防范准备工作外，还必须向贺晋年同志汇报，以求得警三旅的支持，粉碎敌人的阴谋。

我作了扼要传达后，经讨论，拟定出六条防范办法：

一是在宴会期间，十一旅士兵委员会为指挥部，一旦发生武装冲突，负责指挥战斗。

二是由冯世光带领警卫员王建民，隐藏在张家大院附近的小卖部内，观察敌人动向，一旦听到宴会上有枪声，立即到北城楼上打钟报警。

三是士兵委员会听到钟声后立即指挥士兵进入城防阵地，

作好战斗准备，敌人若进攻时，坚决予以回击。

四是发生武装冲突后，陈文英同志应火速去定边，向警三旅求援。

五是宴会前薛应连同志应多去曹又参营长的二太太牛青山那里，探听消息，同时还要与十一旅驻白泥井的部队随时取得联系，并及时把情报送到陈天治同志那里。

六是将这次会议情况，士兵委员会分别秘密通知十一旅地下党的工作人员，以便思想上及早做好准备，以求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

鸿 门 宴

经过一阵子的紧张活动，张氏父子自以为吞并十一旅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底，张廷芝命令他的绥蒙游击师在安边集结待命，准备移防，并放出口风，部队将于9月6日陆续由安边开拔蒙地一带。9月初，张廷芝以移防辞行和祝贺张、刘两家联姻合作为理由，发了请柬，邀请十一旅在安边的全体军官于9月4日上午9时整到张鸿儒家大院赴宴。

张鸿儒的家院座落在安边城东南角，墙院高、大门牢，大院内可容纳上千人，犹如一座兵营。平时，设岗放哨，一派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样子。

张家大院是四合头三进院，前院一进大门两边是倒坐南房，并设有门房，院子中间是大过厅，过厅东西两旁设会客室，过厅后便是北正院，北正房是祠堂。东房是住宅，西房是大餐厅，过厅和后院又各有传达室。在北正院西北有侧门，过侧门便是一个独立院，北房是张鸿儒的卧室，东西房则是绣阁

和心腹住宅。卧室内均有地毯铺面。平时，院内住有警卫部队，由张廷芝直接指挥。

9月4日宴会那天，张家大院格外森严，后院里埋伏着张廷芝的队伍，宴席几十桌，分别设在过厅和西餐厅。招待员全是张廷芝的心腹，全副武装，十一旅的高级军官刘保堂、陈国宾、曹又参以及伪定边、靖边县长徐绍林、张鹤亭等二十余人在西餐厅，由张廷祥主持招待，十一旅的二十多名中下级军官在过厅，我当时也在过厅，由张廷芝主持招待。张鸿儒、张玉亭等又在酒后离去，当宴席上吃到第五道菜时，按张氏弟兄的预谋，张廷祥当场开枪打死了刘宝堂旅长，枪响后，两个餐厅顿时乱作一团，埋藏在后院里的张廷芝队伍，一涌而出，一个个如狼似虎，将十一旅全部军官的枪下了并捆绑起来，关押在东西会客室，当时我也被押在东客室，张氏弟兄当场宣布陈国宾为副师长，曹又参为第一团团团长，并立即派兵攻打十一旅城防驻地。顿时，整个安边城笼罩在恐怖之中。

激 战

中午12时多，埋伏在离张家大院不远的小卖部里的警卫员王建民，当听到宴会上枪响时，知道已经出了事，他就按照原订计划，立即跑到北城楼上打钟报警，士兵委员会听到钟声后，马上指挥十一旅在安边的士兵，全副武装进入城上阵地，准备战斗。

指挥部设在西城楼上，陈天治任总指挥，沈启盛在北城楼上指挥战斗，当即派薛应连去给十一旅驻白泥井部队报信，派陈文英去定边向警三旅求援。

下午4时许，张廷祥带领一路匪兵向西门城楼进攻，张廷芝带领一路匪兵向北城楼进攻，一连发起十多次冲锋，均被十一旅士兵击退。

在张氏匪军遭到惨重伤亡以后，看到用强攻的办法是无法取胜的，他们又想了一条毒计，由张廷祥、张廷芝亲自押着陈国宾、曹又参和我到西城门下，要陈国宾向城上士兵喊话，要求城楼上派代表同他们谈判一块解决问题。

正在西城门楼上的陈天治很快识破了张氏弟兄的阴谋，就坚决回答：“现在还没有进行谈判的条件，要有谈判诚意，你们就立即将被扣的十一旅全部军官释放，才能谈判。”

这时，张氏弟兄躲在暗处，让陈国宾继续喊话，叫城楼上很快派人下来谈判，再不要打枪了，陈国宾的话还没有喊完，城上的士兵就开枪射击，陈国宾差点被打伤，并大声向下喊道：“陈团长，你不要再喊了，再喊就成了我们的敌人了，那就不客气了。”张廷祥、张廷芝听到城上的喊话，气得咆哮如雷，一时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大声喊叫：“先押回大院待命。”

十一旅部队，在士兵委员会的领导下，秩序井然，并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迎击张氏匪军的再次反扑。

谈 判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可收拾，张氏弟兄再也无计可施，只得请绅商刘文卿出面调停。第二天下午二时许，刘文卿带领10名代表，到十一旅士兵委员会指挥部进行协商，要求暂时停火，双方组织谈判小组，和平谈判，解决事端。

当时，刘文卿提出：要求十一旅的士兵暂时撤出城外驻

防，当即由他待在十一旅的指挥部里，以保证士兵委员会安全撤出，然后协商谈判条件，经士兵委员会研究，同意这个方案。随后，刘文卿又与张氏弟兄协商，他们也表示同意，当天下午6时，十一旅根据初步协商条件，暂时撤出安边城，驻在白泥井砖窑梁一带。

当晚7时，张廷祥派护兵把我押到他的公馆，当我刚走到门口，张廷祥忙忙迎出门来，假惺惺地笑着说：“老同学，今天的事件确系误会，请多多原谅”一边说着，一边哟三喝四地让勤务兵热情招待我，说是要“压惊”，过了一阵，张廷祥对我说：“今天宴会上，一时不慎手枪走火，刘旅长不幸伤亡，现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悔莫及。目前，只有双方举行谈判和平解决事端，才为上策，你是我的老同学，又在十一旅官兵中很有威信，请你回去先做做工作，当一下调和人，不知老同学意下如何？”

张廷祥的一席话，暴露了张氏弟兄已到穷途末路走的地步，现在以谈判为幌子，继续施展他们的阴谋诡计。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士兵委员会已将事变告知定边警三旅，他们一定会来增援的，这样也好，一方面用谈判拖住张匪，另一方面我趁机脱身，直接找到贺晋年同志报告事变经过。想到这里，我便顺水推舟地说：“谈判确实是上策，我同意。”不过，要谈判，就要迅速，迟了恐怕警三旅知道一定会出兵助战，到那时，事态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张廷祥见我表示同意谈判，喜出望外，忙叫警卫员给我拿来白洋二百块，作为活动经费，随即派6名护兵，护送我回十一旅，他说是为了保护我和我的家，实质上是在暗中监视。

当晚，我一个人骑马出城，考虑到张匪可能会派人跟踪，

没有直接去定边，而是先到白泥井十一旅驻地。到白泥井后，见身后确实没有盯哨，就一人连夜飞速赶往定边，直接到贺晋年的家中，当时贺晋年的爱人冯凤民、警卫员林林听我说了十一旅的情况后，立即报告贺晋年接见了我。

将计就计

当晚，我见到贺晋年，立即汇报了安边“鸿门宴”的事变情况。并请求派兵支援，帮助十一旅收复安边，救出被扣押的陈国宾、曹又参等十一旅军官。贺晋年听完了我的汇报后，两手插着腰在房里一边漫步，一边思考。然后沉着冷静地对我说：“我们一定要支援十一旅收复安边城。不过，从地形上看，安边城外四面开阔，宜守不宜攻。1936年，红军为了拔掉这个土围子，攻了半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目前，我们的力量同过去比较大不一样了，一定会收复安边城的，但采取智取还是比较为宜。”

贺晋年的话，我听了从内心里赞称。我正要开口，贺晋年又对我说：“世光，你考虑个意见吧！”

我思索了一会，说道：“张氏弟兄允许我出城，是要我充当中间调和人，我就以中间调和人的身份，利用谈判机会，来个将计就计，一举拿下安边城。”说到这里，我向贺晋年介绍了智取安边城的一些有利条件。我说：“夏品三、杜廷之是张廷祥保十三师的大队长，他俩又和牛化东是结拜弟兄，并同我和高昆山、李树林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夏品三、杜廷之对张廷祥很不满意。担心张廷祥会把他俩搞掉的，让张廷祥的心腹人来任大队长。现在，夏品三守东城门，杜廷之守西城门，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完成这次收复安边城的计划。”

我说完后，贺晋年高兴地说：“对，就要这样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世光，你能不能再说得更详细一点？”

我马上接着说：“我们以举行谈判为理由。先给张廷祥写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我大致考虑这样三点：一是十一旅同意在9月8日派代表在安边刘文卿家里进行谈判；二是十一旅不同意跟任何军队合编；三是谈判前，必须释放被扣押的十一旅全部军官。我们利用送公开信的机会，设法同夏品三取得联系，让他能在9月8日拂晓攻打安边时，先开东门，让牛化东进城，以便里应外和，取得配合，顺利攻下安边城。”

我讲完了自己的意见和打算后，贺晋年又谈了四点意见：

一、表示基本同意我的计划；

二、对攻城战斗事先作了详细部署。并让牛化东任这次收复安边的作战总指挥；

三、同意由我派人在5日前争取将公开信送交张廷祥，并设法同夏品三取得联系。

四、到时警三旅派廖纲绍副团长率一个团兵力攻安边西城。

贺晋年要求我在回十一旅传达攻城任务之后，立即赶到安边西城找廖副团长共同研究攻打西城的具体行动。

接着，贺司令员又详细指示说：“8日拂晓，让十一旅先佯攻西城，牛化东同志在夏品山开东门后，率部进城，进行巷战，西城外的廖纲绍团严密封锁，以防敌人逃窜。若东城夏品三不开城门时，西城廖纲绍团立即改为主攻，东城十一旅部队改为佯攻，把西城主攻的突破口放在南北两个城角处，西城门

为爆破点，以吸引敌人主力。另外，如果力量单薄的话，警三旅还可以再派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支援。

按照贺晋年同志的周密安排，我于六日赶回十一旅在白泥井的驻地。

秘密行动

9月6日，我回到白泥井砖窑梁，秘密传达了贺晋年的攻城部署，正巧当天下午，曹又参营长也来到白泥井砖窑梁，他在张廷祥接到公开信后，被释放作为十一旅的谈判代表回到白泥井砖窑梁，当时十一旅所有官兵就一致推选曹又参营长为攻城总指挥，牛化东同志为副总指挥，并研究组成了三个攻城突击队，第一突击队由高昆山同志负责，第二突击队由高宜之同志负责，第三突击队由谢有德同志负责，李树林同志为攻打东城部队指挥。同时，还决定派部队把所有通往外地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起来，防止敌探来往活动。

一切部署研究妥当后，当日晚派我的警卫员符学校同志（地下党员）秘密去安边给夏品三送联络信，联络信是用纸烟盒的锡纸封包，进城门时含在口内，当晚符学校同志就设法把信交给地下交通薛应连同志，由他转交夏品三，让夏作准备，到时开放东城门。

至此，秘密行动计划全部安排就绪。

攻城

9月8日拂晓，负责攻打安边西城的警三旅廖纲绍团已全

部隐藏在城西孙坑一带，集结待命，准备战斗，负责攻打东城的部队指挥李树林同志，率领三个攻城突击队，随牛化东副总指挥在东门边墙附近隐蔽。曹又参的总指挥部暗设在东门外“天聚成”附近的小高地。

天刚麻麻亮，牛化东副总指挥带领部队摸到东城门前，一看城门大开，并听见城楼上有人低声喊到：“化东赶快进城！”原来夏品三已将东城门放开，他在城楼上等候。当即，牛化东带了警卫员很快上到城墙上，正在这时候，张玉亭带领巡逻队从城墙上走过来，并大声喊叫夏品三询问，有什么情况，说时迟那时快，牛化东同志把头一摆，警卫员一个箭步扑上去，将张玉亭压倒在地，还没等他喊出声，尖利的匕首已刺进胸膛，张玉亭当场毙命。与此同时，夏品三的手下人也将巡逻队的枪支全部下掉，并将他们扣押起来。

接着，牛化东和李树林同志立即带部队冲进了城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巷战。第一突击队攻打安边的东西大街，第二突击队攻打南城及南大街，第三突击队攻打北城和北大街，杜廷之的保安大队攻占西城并包围了保十三师的师部。牛化东同志还亲自带领预备队迅速营救出了陈国宾团长等被扣的十一旅全部军官。

战斗打响后，由于突击队士兵们英勇作战，在中午十二时前已基本上消灭了张氏匪徒的反革命武装，控制了安边城。

战斗进入尾声，但仍有几个不甘失败的顽固派还想作最后的挣扎。当李树林同志指挥部队进攻北城时，只听城楼上保十三师参谋长周孟雄大声喊叫：“李友竹（李树林别名）！请你上楼清点武器，放我出城”。李树林同志立即只身上了城楼，没想到陷入周孟雄设的圈套。李树林同志被周匪扣押了，并要带

李一块逃跑。

牛化东同志听说李树林被周孟雄扣押，心里有些着急，想了一会，便立即派部队在敌人逃跑必经之路（城东碱壕）埋伏。准备在此捉拿周孟雄一伙，并救出李树林同志。

牛化东同志将部队埋伏布置好后，就亲自到北城墙下面，叫周孟雄出来讲话，牛化东同志严肃地对周孟雄说：“周参谋长，你也太不够朋友了，你要逃走，又何必扣押你的好友李树林呢？假若你想留下，我保证你的身家性命和官职；你若要走，也可以，不过请你将李树林放回，我保证你安全出城。我说话是算数的，明人不做暗事，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那就对你不客气了！”周孟雄听了牛化东同志的喊话，只好无可奈何地将李树林同志放回来。

周孟雄放出李树林同志后，就自己带了一部分残兵仓惶逃走。出城向东走了五里许，来到碱河沿时，只听一声枪响，喊声大振，埋伏的十一旅战士一拥而上将逃敌全部捉拿，有意放跑了周孟雄。

9月8日下午，安边城已被十一旅全部收复。

追 捕

9月8日早晨，张廷祥正当做着“称霸三边”美梦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勤务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报告说：“十一旅攻进城啦！”张廷祥一听，早已吓的屁滚尿流。这时，他也顾不上如何处置扣押的十一旅军官，慌忙带了二十多名警卫人员，从北门弃城逃窜。张廷芝正好在战斗打响的头一天，认为“大局”已定，随其父张鸿儒去堆子梁往回收

拾转移出去的家产，谁知，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料，还没等张氏父子把家产收拾停当，十一旅已经攻进了安边城。

当时，十一旅作战指挥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营长柴明堂率兵前往堆子梁追捕张廷芝父子，派刘宝堂之弟刘明堂率兵顺着张廷祥逃跑之路跟踪追击，第二天下午，在距安边城南三十多里的鹑怪子沟抓获了张廷祥及其二十余名匪徒，将其解除武装，全部带回旅部关押。

另一路柴明堂的部队赶到堆子梁时，天还不亮，正好张廷芝父子还未逃走，当即就被抓获，但张廷芝是一只狡猾的狐狸，知道抓回去，性命难保，所以，他抛出最后一个绝招：“舍财保命”，他对柴明堂说：“你打狐子为皮还是为肉？咱们是多年的好友，我把家产全部送给老弟，求你救我一命，放了我，这事只有你我两人知识，老弟一定要网开一面，放老兄一条活命，以后必要知恩当报。”

柴明堂见财心软，暗暗放走张廷芝父子，使其逃往榆林，给三边人民留下了一个隐患。

公审大会

张家父子四人是陕北特别是三边地区最大的恶霸、地主、特务和匪徒，他们糟害三边人民三十多年是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他们一贯与红军相对抗，对三边革命斗争危害极大，提起张家父子，老百姓个个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人们听到打死了张玉亭，活捉了张廷祥，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一致要求千刀万剐张廷祥。根据张廷祥的罪恶事实，我警三旅廖团和十一旅于9月10日上午在安边北大操场戏楼上召开斗争张廷

祥大会，立即枪毙了这条恶棍，为三边人民除了一害。事后，我警三旅廖团撤回定边。

选 旅 长

刘宝堂旅长被张廷祥毙命后，十一旅旅长究竟由谁继任，这是十一旅官兵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按当时十一旅的实际情况和下级官兵的愿望，旅长应由陈国宾团长继任。可是，围绕旅长的人选问题，在十一旅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第二团团团长史钊城和副团长张鼎臣一伙，他们联络一部分顽固派到处活动，以胡宗南为靠山，妄图让史钊城任十一旅旅长，当时十一旅地下党极力反对史钊城任旅长，并采取坚决措施粉碎其阴谋，我们鼓动民主选举旅长，并指定十一旅地下党的上层军官牛化东副团长，王子庄副团长以及李树林营长等，外出进行选举旅长的活动。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终于请求邓宝珊同意批准陈国宾团长为十一旅旅长，陈国宾思想进步，倾向我党，他继任十一旅旅长，对我地下党开展工作十分有利，从而使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为1945年十一旅安边起义奠定了良好基础。

抗 击 战

1942年春，延安保卫处葛申同志再次来十一旅指导地下党的工作，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对十一旅地下党员说：“张家匪徒在安边的反革命堡垒被铲除以后，胡宗南十分恼火，准备将十一旅调往蒙地进行整编，并电令何文鼎伪军立即进犯

三边，王震司令员不久即来三边指挥这一抗击战。”大家听说王震司令员要来三边，当即热烈地鼓起掌来。

接着，葛申又提出要求：“十一旅地下党要密切配合八路军警三旅搞好联防工作，将在王震司令员和贺晋年同志统一指挥下，坚决抗击何文鼎伪军的南下。”

1942年夏天，王震司令员率领三五九旅驻防三边同警三旅一块在十一旅的配合下，共同联防，坚决抗击何文鼎伪军南下。

当时，王震司令员和贺晋年同志决定：八路军在蒙地一带打抗击战，十一旅在定（边）、安（边）一带从内线侧应，严防以待，准备迎击何文鼎伪军，谁知，何文鼎却是个松狗子，一听说王震司令员亲自率部前来抗击，尻松底露。南下匪军走在半途中就又缩回去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啦！我八路军和十一旅取得了抗击何文鼎伪军南下的胜利。

尾 声

何文鼎不敢南下，龟缩绥蒙一带，胡宗南虽然恼在脸上，气在心里，但黔驴技穷，再也无计可施，三边一带已完全牢牢控制在我八路军手里。胡宗南一心想打开进犯延安的北大门，也只能是痴心妄想，一个个美梦犹如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延安的北大门——三边地区，经过我军的艰苦斗争，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1942年10月，十一旅在安边召开大会，庆祝三边抗击战取得伟大胜利，并欢送王震司令员和三五九旅凯旋延安，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后 记

国民党新一军第十一旅安边起义是发生在我县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对这一历史事件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是我县史志部门和文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责任。1984年，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初步征集整理了《党在石子俊部队中的兵运工作》专题资料。1991年，应贺晋年、牛化东、冯世光、史继法等老同志的号召，县委党史办公室曾决定征编出版《十一旅起义》一书，并做了一定的工作，征集到了贺晋年、牛化东、李树林、王子庄、冯世光、高宜之、朱子春等一些十一旅起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后因经费等诸多因素影响，工作搁浅。2004年，县委史志办公室根据陕西省党史工作五年规划（2001~2005年）要求，再次决定征编十一旅起义资料，由马骥主编，田生贵、苗斌杰协助，于2005年5月编写出征求意见稿。经政协定边县委员会研究同意，纳入政协文史资料丛书出版，并定书名为《安边起义》，谨以此献给安边起义60周年。

本书收录了十几位十一旅起义当事人及知情者的亲历见闻和所能搜集到的关于十一旅历史文献，采纳和吸收了我县文史工作者以及榆林、横山、靖边、志丹诸县史志工作部门的征研成果，在此予以说明。本书征编工作还得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中共宁夏区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热情帮助。

中共定边县委书记尚洪泽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政协定边县委员会主席高登山为本书作序。县委副书记霍东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生平，县政协副主席傅宝富、马宝珍、张林森及顾志忠同志对这项工作给以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也由于历史资料征集的未尽全面，本书可能还存在不足、纰漏、甚至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2005年8月

文史资料第六辑

安边起义

政协定边县委员会编

主编 马 骥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字数 213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本

陕内资图批字（2005）年 072 号

定价：26.80 元